

诗琳通

泰中学刊

Journal of Thai Chinese Studies

— 2026年重刊第13期 —
2026 Reprint Issue No. 13

研究领域

中泰关系研究

华侨华人研究

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

泰国经济与社会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与跨文化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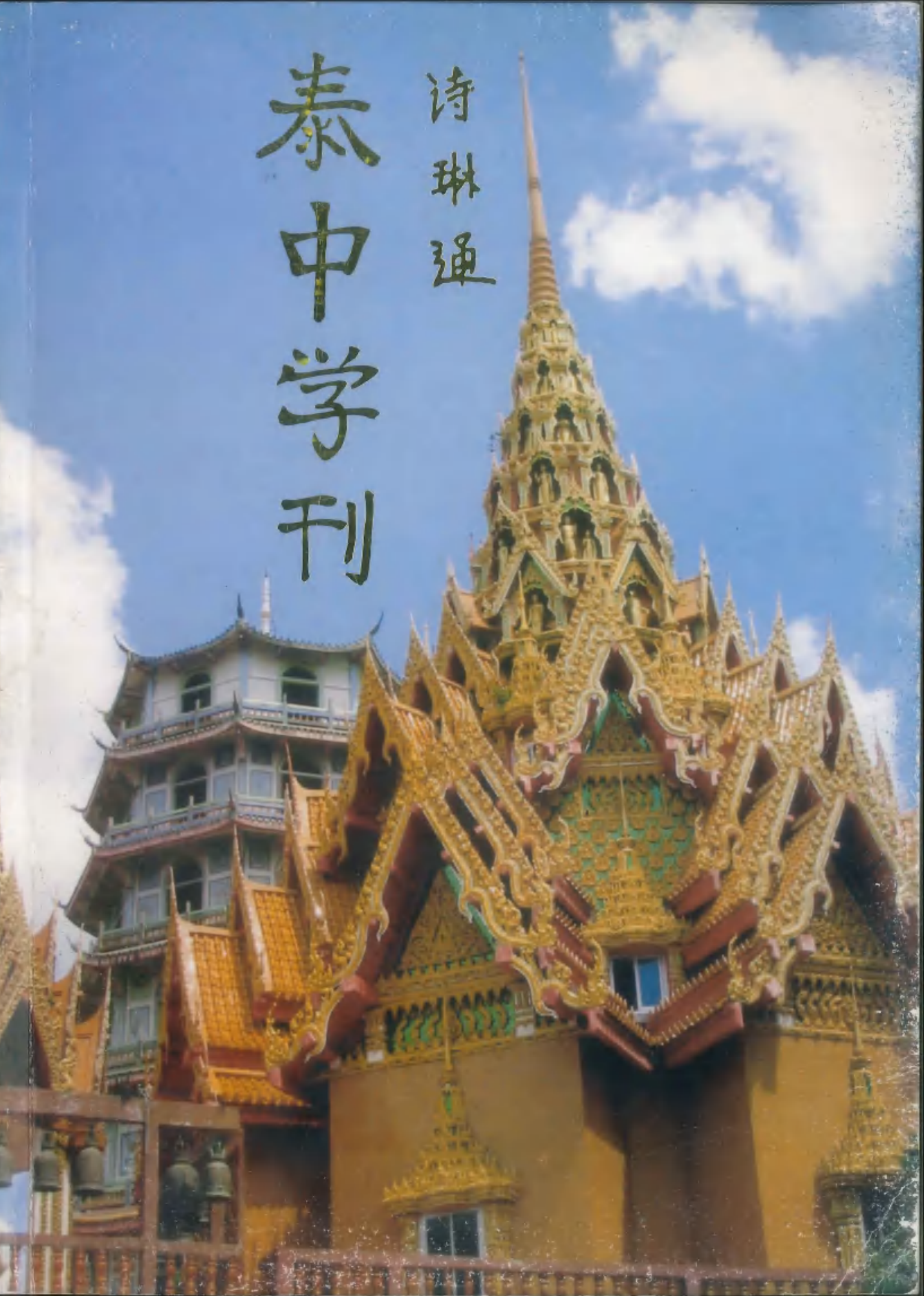


泰中学会集团有限公司



诗琳通

泰中 学刊



泰中學刊

泰國泰中學會出版

二〇〇五年九月

目 录

中泰友谊再添新篇——记北京大学庆祝中泰建交	
30 周年暨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活动	朱振明 1
中泰建交 30 年来中泰关系的发展及启示	朱振明 9
境外华人国籍问题纵横谈	周南京 18
还吾侨一个公道——探讨耀华力路事件历史真相	黎道纲 30
侨批局与潮汕侨汇	袁 丁 41
郑和船队有可能发现美洲吗?	李金明 51
泰潮的渊源: 对某些文化和语言痕迹的探索	谢远章 63
泰国潮人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	洪 林 69
泰国社会中的华人劳工——泰国劳工史的华人	方 刚 79
1. 泰国潮人与泰中关系述略	杨锡铭 88
1. 试论和平后泰国侨批史演变 (1945—1955)	洪 林 98
2. 一份华侨抗战重要文献的发现与一条	
“口批”历史资料的勾沉	陈训先 105
3. 泰国的早期华人银行	攀尼·布勒着 黎先远译 107
4. 芦沟烽火	庄明崇 122
5. 傣泰民族先民从云南向东南亚、南亚的迁徙	
与傣泰文化圈的形成	郑晓云 130
6. 从汉字的历史看中文学习诀窍	黄为绪 146
7. 会务简报	155
8. 编后	157
9. 《泰中学刊》、《泰国侨史》目录	158

中泰友誼再添新篇

——记北京大学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

暨诗琳通公主50华诞活动

朱振明

今年是中泰建交30周年，又恰逢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深受泰国人民热爱的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50华诞。为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暨泰国诗琳通公主50华诞，由中国北京大学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联合举行的庆祝活动于4月4—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教育部、文化部、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代表，北京市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广西、福建、江苏、河南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泰国盘谷银行、正大集团、泰国泰华农民银行、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限公司以及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泰国清迈大学、曼谷理工学院的教师和一批在北京各大学留学的泰国留学生等共200多人出席了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暨泰国诗琳通公主50华诞活动。

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去年就开始筹备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研讨会。研讨会原先准备在今年6月举行。后来获悉诗琳通公主将于今年4月到中国访问，而4月刚好是诗琳通公主50华诞，于是双方决定改变原先的计划，将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研讨会提前到4月举行，同时举行庆祝诗琳通公主50华诞宴会，为公主50华诞祝寿。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计划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两校并向诗琳通公主报告了活动筹备情况，并希望诗琳通公主能光临研讨会及为诗琳通公主50华诞举行的宴会及其它庆祝活动。今年2月，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收到了泰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通知，诗琳通公主欣然同意出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这次活动。

消息传来，北大泰国研究所与朱大亚洲研究所极为兴奋，立即加紧做好准备工作。北京大学的领导十分重视这一活动，将它作为北大今年的重要活动安排工作计划。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为搞好这次活动给予大力支持。中国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泰国问题和中泰关系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向会议提供论文。泰王国驻华大使馆、泰国正大集团、泰国泰华农民银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向这次活动提供了赞助。

经过北京大学的精心组织，特别是北大泰国研究所的具体准备，庆祝中泰建交周年暨泰国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活动终于在 4 月 4 日正式举行了。

庆祝大会与“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揭牌仪式

庆祝中泰建交 30 周年暨泰国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活动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庆祝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活动。第二部分是举行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泰关系”国学术研讨会。

4 月 4 日上午，庆祝中泰建交 30 周年暨泰国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大会开始。上午 10 点 30 分，诗琳通公主一行抵达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受到了等候在门口的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中泰友好协会会长广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朱善璐等的热情欢迎。诗琳通公主接受了北大学生献上的鲜花，并在留言簿上签名留念。在热烈的掌声中，诗琳通公主走上主席台。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中泰友好协会会长（原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长）石广生、中国首任驻泰国大使柴泽民、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朱善璐。

会议由北京大学副校长郝平主持。他代表北京大学对诗琳通公主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公主到北大出席庆祝活动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深受泰国人民爱戴的、中国人民的尊贵老朋友诗琳通公主曾在北大学习过，北大也是公主的母校。这次，琳通公主应邀回母校与北大师生一起共同庆祝中泰建交 30 周年，并选择她在中国母校度过自己的五十岁生日，这是北大的光荣，再次谱写了“中泰一家亲”的新章，成为当代中泰关系史上的大事。也为庆祝中泰建交 30 周年活动增添了异彩。

接着，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共北京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朱善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分别讲话。他们讲话中指出，中泰建交 30 年来中泰关系不断发展，中泰两国是和平共处的典范。政治上，中泰两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中泰两国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已成为泰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泰国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一直保持密切磋商，协调立场。泰国在中国东盟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泰两国的密切合作，大大提高了两国的国际地位。在两国的努力下，中泰一家亲的传统友好关系必将亲上加亲。

他们在讲话中对泰国王室为促进中泰关系作出的贡献，特别是诗琳通公主热心中华文化，为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推动中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予以高度赞扬。他们在讲话中指出，诗琳通公主是泰国国王普密蓬的次女。她经常随国王视察全国各地，了解情况。她多次代表国王、王后主持典礼，接受国书，颁发大学毕业文凭。她虽贵为公主，但一向平易近人，关心民众疾苦，受到泰国人

民的衷心爱戴。

1975年中泰建交,1977年,诗琳通公主就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1年起,她先后19次访问中国。中国的大江南北都曾留下她的足迹。每次访问后,她都会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书,介绍给泰国人民。泰国人民通过她的笔认识了长城、故宫、长江三峡、古代丝绸之路、沧山洱海、青海、乃至西藏。泰国也因此掀起一阵阵“中国热”、“中国文化热”。

20多年来,诗琳通公主虽然公务繁忙,但学习中文却锲而不舍。诗琳通公主曾先后三次造访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2001年2月,她又一次来到燕园,以一名留学生的平民身份醉心于学习、研究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和文化。她可以用中文写诗,会拉二胡,会写毛笔字,会打太极拳,她会以中国古诗中的名句为题作画。她最爱的文学作品是金庸的小说。她曾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学习太极拳,她曾在学生食堂和学生一起用餐。她的平和与善良为她赢得了众多的中国朋友。诗琳通公主在追求中国文化的同时,更致力传播中华文明。她曾将一百多首唐宋诗词翻译成泰文出版,并翻译了反映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家王蒙的小说集《蝴蝶》和方方的小说《行云流水》。她是目前把古诗翻译成泰文数量最多的人。诗琳通公主为中泰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首肯。原中国总理朱镕基接见她的时候,亲切地称她为杰出的中泰友好使者。2004年8月中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会见到访的诗琳通公主时,称她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杰出的中泰友好使者”。2000年,中国教育部授予她“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公主是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位外国人。2001年3月,她又获得了北大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2004年诗琳通公主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友好使者”证书。

各位发言人都一致表示,北大为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举办研讨会,为庆祝诗琳通公主50华诞举行寿宴,显示了中国人民对泰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对增进中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有重要影响。他们共同祝愿诗琳通公主生日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热烈的掌声中,诗琳通公主向大会致辞。她先用泰语后用流利的汉语作了发言。公主说,北京大学是中国的著名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涌现了大批优秀成果。朱拉隆功大学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是我学习过的地方。我希望两校加强合作,相互学习。过去两校的交流集中在文化、语言、历史方面,今后可以扩大到科技领域,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方面。交流的对象可以从大学生到硕士、博士生及教师。诗琳通公主还说,去年北京大学问我,用什么方式发展两校的关系较好。我说,建立北京大学与朱拉隆功大学合作机制最好。今天两校将签署合作协议,并将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两校交流与合作的基地。这是送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我相信,“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将会发挥作用,并为双方带来效益。诗琳通公主讲话结束,会议大厅里再次响

热烈鼓掌。

接着,北京大学向诗琳通公主敬献生日纪念品。纪念品包括一幅大型中国彩墨“牡丹富贵图”,一幅诗琳通公主在北大学习时的生活照,诗琳通公主高兴地接受礼物。

在欢快的乐曲声和掌声中,大会举行“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揭义式。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阎维方与诗琳通公主缓缓拉动引绳,书有“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匾牌正式亮相。众多的闪光灯闪烁不断,记下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对于建立“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一事,北京大学的考虑是,2005适逢中泰建交30周年大庆,也是中泰友好交流使者、诗琳通公主50华诞。公主在北大学习过,与北大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决定设立一个以公主名字命名的学术交流机构——“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作为北京大学赠送给公主华诞的永久性礼物。“中心”由北京大学校长担任交流中心理事会(委员会)主席;请诗琳通公主担任名誉主席;北京大学郝平副校长出任中心主任;现任泰国驻中大使祝立鹏、现任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以及前任中国驻泰国大使柴泽民、李享、傅学章、宴廷爱,前任泰国驻华大使敦·倪昆·谭德萨等任名誉顾问。其他成员和理事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国际合作部、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部、医学研究生院、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历史系、经济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社会学系、医学院、生命科学院、泰国研究所等相关院系及部门。

“北京大学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作为北京大学跨院系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机构,根据北大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要求,充分发挥北大在人文和基础学科的优,开展以泰国为主的学术交流工作,拓展科学技术合作的新领域:一是开展和扩北京大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以及其他泰国大学之间的学术合作交流,拓宽现有言、文学、文化、中泰关系等研究领域,如开展汉语教师培训、暑期短期学校、学学科、及理科学 科等方面的更广泛的学术合作交流;二是开展和促进与国外事 中泰研究的其他大学之间的友好合作及学术交流;三是开展和促进北京大学与国社会各界的合作交流,争取泰国企业界人士和泰国华人华侨对北京大学办学的持与合作;四是开展诗琳通公主及北京大学委托的其他学术研究与合作交流项,近期将开展的交流项目有:北京大学02级泰语专业本科学生到朱拉隆功大学文究进行为期2个月的短期学习;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与北大进行微工艺学和生物工学,尤其是自然产品学科的合作研究。

“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中国的第一个以诗琳通公主名字命名的学术交机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含意。北京大学赠送给诗琳通公主的这特殊的寿辰礼物,必将大大提高北京大学在中泰两国学术界及其他各界中持久、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中心将成为两国交流的桥梁和沟通的渠道,促进双方更深

入的交流、了解并为推动中泰友好关系向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揭牌仪式后，举行了北京大学与朱拉隆功大学两校合作签字仪式。两校的校长分别代表两校在合作协议上签了字。诗琳通公主和与会的代表见证了签字仪式。

与会代表与诗琳通公主一起合影留念后，公主在北大校领导和北大泰国研究所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办公室。

庆祝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寿宴

中午 12 点 30 分，诗琳通公主一行来到位于北大西门附近的正大国际中心，出席北大为她举办的 50 华诞寿宴。寿宴席开七桌，一张主桌、六张大桌。在主宾桌就坐的有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朱拉隆功大学校长素差达、中泰友好协会会长（原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泰国驻华大使祝立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中国首任驻泰国大使柴泽民、北京大学副校长郝平、北京市教育工委书记朱善璐、诗琳通公主的中文老师——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前任所长裴晓睿教授等。出席宴会的有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北京市各有关方面的代表、中国前几任驻泰国大使李世淳、傅学章、宴廷爱，泰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专程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泰国盘谷银行、泰国正大集团、泰国泰华农民银行、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限公司的代表、诗琳通公主在北京大学学习时为公主上课的老师和参与接待公主的工作人员、出席庆祝中泰建交 30 周年研讨会的来自北京以外的中国其它省区的专家学者代表、诗琳通公主的随行人员等共 80 多位中泰嘉宾出席了宴会。

当诗琳通公主一行步入宴会厅时，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欢迎。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致祝酒辞。他在致辞中说，“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欢迎诗琳通公主回到母校，出席我们为她举办的 50 华诞寿宴。”他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诗琳通公主对发展中泰关系的努力，并祝公主生日快乐，祝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许智宏校长致辞后，全体与会者起立，举杯共祝诗琳通公主生日愉快、健康、幸福。

北大民乐团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了一曲曲中国乐曲，为宴会助兴。他们还专门演奏了《生日快乐歌》，感谢诗琳通公主对中国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所做的杰出贡献。

席间，北大为诗琳通公主献上了高达五层的生日大蛋糕，并恭请诗琳通公主切蛋糕。诗琳通公主笑容满面地接过餐刀，亲自切开蛋糕。宴会厅中发出了阵阵掌声。

被誉为“当代泼墨画鹿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画家陈雄立现场泼墨，为诗琳通公主敬献了一幅清新雅致的《鹿趣图》。著名书法家杨重光当场挥毫，书写了一个遒劲浑厚的“寿”字，引来诗琳通公主会意的掌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为诗琳通献上了一件珍贵的生日礼物——仿制清代宫廷画家郎士宁的画作《瑞谷图》，祝愿中泰两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热爱中国书法、绘画的诗琳通公主起身走到两位画家、

法家面前认真观看他们的表演。

出席寿宴的一些代表去到诗琳通公主面前举杯祝贺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祝公主中国生活愉快。诗琳通公主的几位老师也一起来到公主面前向公主敬酒,他们希望诗琳通公主多到她的中国母校来。公主对她们表示感谢。

笔者有幸作为北京以外的中国其它省区的专家学者代表应邀出席了寿宴,并与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的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素攀·占塔瓦尼教授、研究所顾问强·提拉逸教授、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沙拉信·威拉蓬博士,泰国驻大使馆官员、诗琳通公主在北大学习时担任公主教学任务的 4 位老师,以及同为家学者代表的云南民族大学杨光远教授同桌进餐,共同感受了中泰一家亲的友谊亲情。

寿宴在北大民乐团演奏的欢乐乐曲声中结束。担任演奏的民乐团的北大同学希望能与诗琳通公主合影。公主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摄影师为他们拍下了难忘镜头。

14 点寿宴结束。诗琳通公主与与会者离开宴会厅,前往会议厅,出席研讨会。

“全球化时代的中泰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作为庆祝中泰建交 30 周年暨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活动的另一部分是举行“全球化时代的中泰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于 4 日下午正式举行。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傅增有所长主持了研讨会。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首先致辞。他说,中泰建交 30 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中泰关系不断发展,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泰两国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都是两国的著名大学。诗琳通公主是北大的老朋友,也是北大的校友,同时她也是朱拉隆功大学的校友。相在诗琳通公主的关心下,我们两校的合作一定能不断发展,为中泰两国的教育事,为中泰两国的友谊作出贡献。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素差达接着致辞。她指出,多年来泰中关系一直稳步发,两国人民重视泰中之间的友谊。在泰中建交 20 周年时,朱拉隆功大学举行过隆的庆祝活动。这次朱拉隆功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在中国举办庆祝泰中建交 30 年暨诗琳通公主 50 华诞活动,是朱拉隆功大学的光荣。今天早上朱拉隆功大学与北京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相信两校的合作一定能取得丰硕成果。这个研讨会的举是朱拉隆功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的成果,也一定会为泰中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

接着,主持人邀请诗琳通公主致辞。在热烈的掌声中,诗琳通公主先后用泰语汉语发表了讲话。她说:今天,我非常荣幸地来北京大学参加研讨会。今年是泰建交 30 周年。这 30 年是全球化迅速发展的 30 年。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人民可以

自由来往交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起着重要的作用。泰国与中国建交 30 年来,两国来往密切,友好合作。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希望这一关系能持续稳定发展。因为它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发生了变化。人们出行更方便。一个国家发生的事很快就为别的国家所知道,并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中国的强大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的发展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泰国重视中国的发展。我们要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创造美好的未来。祝研讨会成功,祝各位幸福、健康。

诗琳通公主致辞后,根据研讨会的安排,代表发言正式开始。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陈峰君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中泰关系发展的契合点及其战略意义”,另一位发言人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强提拉逸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泰中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评论人是北京大学国际关学院的张锡镇教授。接着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胡坚,她发言的题目是“东盟经济合作背景下的中泰经贸与投资关系”,另一位发言人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颂朴·玛纳朗汕副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泰中贸易与投资合作”,评论人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朱振明教授。

诗琳通公主聚精会神地听取了上述发言人和评论人的发言,并始终认真记笔记。3 点 30 分会议主持人宣布这一场发言结束。由于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将在下一个时段会见诗琳通公主,诗琳通公主依依不舍地起身与会场上的人员告别,微笑着向发言人和评论人点头致意,与会者用掌声向公主表示敬意。公主步出会场后,起驾离开北大。

公主离开后,研讨会继续进行。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沙拉信·威拉蓬博士就“泰中文化交流合作”,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裴晓睿教授作了评论。下午的大会顺利结束。

4 月 5 日,研讨会分两个组进行。一个组围绕中泰关系、泰国政治、泰国经济、中泰经济合作等内容进行发言。另一个组围绕中泰文化交流、泰国民族、泰国文化、泰语教学等内容进行交流。

按照会议安排,30 位中泰论文作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交流。他们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泰中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泰中文化交流与合作》、《泰中经济合作的发展》、《中泰在地区稳定方面的合作》、《泰中旅游两个方面的合作关系》、《中泰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中泰关系的发展在双方各自对外战略中的意义》、《泰中政治关系》、《中泰两国贸易现状及曼谷银行所表演之角色》、《中泰关系高水平发展的契合点及其战略意义》、《泰国的华文教育沿革——中泰合作的新里程碑》、《诗琳通——中泰人民的友好使者》、《东盟经济合作背景下的中国与泰国经贸与投资关系》、《中泰两国人民在相互理解中存在的语言问题》、《全球化浪潮中中泰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泰国次区域合作为云南民族边境提供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中泰关系与泰语教学》、《泰国汉字教学初析

思考》、《从村民到公民——泰国地方自治的新趋势及其启示》、《建立南宁—谷经济走廊发展华南与中南半岛的合作》、《泰国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瞻》、《中与泰国传统医药交流：历史、现状和前景》、《从语言比较看壮泰民族之间的关系》、汉文学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从语言习得的机理探讨外语教学学的方法——基泰语教学中“全程参与”的提出与实践》、《泰南四府民族问题的历史产生和发展》、中国壮族与泰国泰族的渊源关系》、《对中泰油气合作的几点思考》、《明朝对暹政策及中暹朝贡关系》、《从基数词看壮语、泰语与远古汉语的关系》、《泰中人早在古代就已经有过密切交往》、《简论傣、泰民族在语言方面的关系——(论十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的论证构思》、《中国学生习得泰语过程中的母语负移》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探讨了中泰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中泰文化的交流、中国的泰语教学等问题。是中泰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对中国泰国研究的一次检阅。

4月5日下午，研讨会召开大会，由各组代表介绍本族的讨论情况。泰国朱拉隆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素攀·占塔瓦尼教授作了会议总结。最后，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所长傅增有教授宣布，“全球化时代的中泰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至此，祝中泰建交30周年暨诗琳通公主50华诞活动划上圆满记号。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诗琳通公主的来访和在北大举行的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暨诗琳通公主50华诞活动。4月3日诗琳通公主抵达北京。当天，中国国务委员陈至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了诗琳通公主。陈至立代表中国政府欢迎诗琳通的再次访华，赞赏诗琳通多年来为增进中泰友好所作的重要贡献。并向诗琳通公主赠送一幅龙凤绣的生日礼物。4月4日下午，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分别会见了诗琳通公主。曾庆红说，中泰是好邻居、好朋友、伙伴，两国始终以诚相待、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堪称睦邻友好合作的典范。曾庆红赞赏泰国王室和诗琳通公主本人为促进中泰关系作出的贡献。他表示，中方愿泰方共同努力，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推动两国战略性合作取得新的发展。顾秀莲在随后的会见中说，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中方将与泰方密切合作，推动中泰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使“中泰一家亲”进一步深入两国民心。诗琳通公主感谢中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她表示，此次访华旨在推动泰中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作，了解中国西部的发展变化，为增进中泰友谊多做事情。诗琳通公主还表示，泰国人民介绍中国是自己的心愿，她将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不努力。

在北京参加了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暨诗琳通公主50华诞活动后，诗琳通公主往中国新疆、甘肃访问，随后回国。诗琳通公主的第20次访华也圆满结束。中国们，特别是公主的中国母校——北京大学的师生期待着公主的再次光临。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中泰建交 30 年來中泰 關係的發展及啓示

朱振明

今年是中泰建交 30 周年。这 30 年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 30 年，是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巨大变化的 30 年，是中泰两国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促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的 30 年，也是中泰关系从建交初期的“礼貌往来”进入全面发展的 30 年。30 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于中泰关系发展史来说，中泰建交这 30 年的历史将作为当代中泰关系的里程碑而永远记入史册。在中泰建交 30 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中泰关系的发展经验，有利于中泰两国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携手合作，促进中泰关系向着更加深入和更加广阔的方向发展。

1975 年中泰正式建交，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恢复了有着上千年交往史的中泰传统友谊，实现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其次，对当时泰国政局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改善也十分有益。此外，鉴于中泰两国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以及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中泰建交就不仅仅只对中泰两国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但是，中泰建交时的 1975 年，中国还处于“文化革命”时期，泰国对中国的疑虑并未随着中泰建交联合公报的签订而完全消失。中泰政治关系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中泰关系开始迅速升温。这主要得益于两件大事。

其一是中泰建交后的第二年，在中国，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1978 年底，中国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路线。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三中全会后，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和对国情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毅然决定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在国家关系上，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在党际关系上，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

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方针，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也不利用党的关系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在发展同泰国以及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从实际出发，注意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共同面向未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查，消除了泰国政界及知识界部分人士对中国的疑虑，促使他们从新的视野来看待中国、看待中泰关系，这对中泰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二是1978年底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泰国的安全受到威胁。面对这一威胁，中国积极支持柬埔寨人民抗击入侵者，支持东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主张。中泰两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都主张有关各方认真执行联合国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决议，支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建立一个独立、中立、不结盟的柬埔寨，这就使中泰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中国立场和主张与泰国及东盟的立场相近。这样，围绕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中国与泰国及其它东盟国家的政治距离逐渐缩小。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泰国积极寻求中国的支持，以抵御外国可能的入侵。中泰两国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斗争中，协同立场，相互支持，在政治、军事上密切配合，为促进柬埔寨问题获得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共同的斗争中，中泰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泰政治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印度支那半岛上实现了和平。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中泰两国面对来自另一个方面的挑战，同时，也迎来了中泰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高潮。

1997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来势凶猛，很快波及东南亚及东亚地区。泰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泰国人民遭遇严重困难。泰国的困难牵动着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国没有忘记帮助泰国克服暂时困难，尽管中国自己还面临许多困难，中国的建设仍需要大量资金，中国还是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向外国提供的巨额贷款。此外，应泰国政府的要求，中国适当增加了对泰国商品的进口。中泰两国相互支持，共同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在中泰关系发展史上再次谱写了“中泰一家亲”的新篇章。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中泰关系日益成熟。从中泰关系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几个特点：

(1) 双方关系已从经贸交往为主发展到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多方面合作。虽然经贸关系始终是中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但是，随着两国交往的扩大，中泰关系突破了单纯的经贸合作，向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多领域发展。形成了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友好合作全面发展，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的新局面。

(2) 中泰政治关系的顺利、稳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泰经济关系的发展。

到2003年泰中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1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四成，其中泰国对

华出口额约占半壁江山,同比增长六成。泰国从中国的进口近年来也以 20% 到 30% 的速度强劲增长。泰国已是中国的第 10 大出口国、第 20 大进口国和第 15 大直接投资国。2003 年,中泰贸易额 126.55 亿美元,增长 47.9%。其中,中国出口 33.28 亿美元,进口 88.27 亿美元,分别增长 29.4% 和 57.6%。¹2004 年中泰贸易额已达 173 亿美元。2003 年 6 月,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泰两国率先签署了水果蔬菜零关税协定,两国的 188 种农产品从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享受零关税。这是中泰经贸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在投资方面,中泰之间的投资已从泰国对中国的单向投资,发展到中泰两国间的双向投资。据泰国官方不完全统计,泰国在华投资总额据估计约 25 亿美元。²而据我国统计,截止 2003 年底,泰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共 636 家,投资总额为 29.3 亿美元。³泰国已是中国的第五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泰国的投资总额在东盟成员国中名列榜首。2003 年,中国新批准在泰投资企业 11 家,中方投资额 4913.18 万美元。截至 2003 年底,中国在泰投资企业共计 245 家,中方投资额 26384.41 万美元。⁴泰国成为了中国投资东盟的首选地。分布在纺织、橡胶制品、食品加工、化工品制造、金属加工、银行、保险、贸易、酒店、餐饮、房地产等各个行业。⁵显示了中泰经贸合作已进入一个更高层次。

在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方面,泰国已成为中国在海外的重要承包工程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2 年底,中国公司在泰国签订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 2330 份,合同总额 23.20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3.12 亿美元。⁶2003 年,中国在泰新签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 72 份,合同总额 16243 万美元,完成营业额 12423 万美元。⁷

(3) 中泰两国人员往来从高层到低层,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展开。中泰建交初期及其后一段时间,中泰两国的人员交往还停留在少数部门、少数单位。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双方旅游合作的开展,出现了大范围的人员交往热潮。目前,已形成从上到下,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政府,从公共机构到民间团体,从集体到个人的人员往来的大格局。大大增进了双方各界人士对对方情况的认识 and 了解,有力地促进了中泰关系的发展。

(4) 中泰一家亲的传统友谊经受住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考验,中泰全方位的、健康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已牢固确立。1999 年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泰国时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在本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源远流长的中泰关系取得了新的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⁸2004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泰国他信总理时也指出,中泰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似,两国人民血缘相通,情笃谊长。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泰关系始终稳定向前发展,真正做到了“富贵不易交、患难不相弃”。⁹他们的讲话是对 30 年来中泰关系的发展所作的客观、准确的评价。

中泰两国关于 21 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及 2001 年 8 月 29 日中泰两国联合公

的发表，¹⁰是对中泰建交以来中泰关系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对中泰睦邻互信的全方位合作关系的深化。这两份文件肯定了中泰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国际事务等许多方面对中泰两国在 21 世纪的全方位合作进行了全面规划。为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确定了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规划了发展蓝图，增添了新的内涵，有助于 21 世纪中泰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文件把中泰关系提升到“战略性合作”关系，“同意巩固中泰之间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并推进双‘战略性合作’”，¹¹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对未来中泰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5) 中泰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典范。中泰两国发展双边关系时，始终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确定的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完全超越两国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不同，使两国关系发展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睦相处的典范。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贡献。

(6) 中泰关系的顺利发展，不仅对两国的进步与繁荣发挥了促进作用，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泰建交 30 年来双方不但加强了相互间的传统友谊，同时还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在东南亚事务和国际问题上加强合作，为推动东南亚、亚洲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二

中泰关系的发展令人欣慰。中泰关系之所以能够获得全方位稳定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泰两国是近邻，两国人民的传统交往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中泰两国人民建立了牢固的深厚友谊。“中泰是兄弟”、“中泰一家亲”的说法早就在泰国广为流传，上自王室下至普通民众，都用这样的语句来称颂中泰友谊。1999 年 9 月江泽民主席访泰时，普密蓬国王在欢迎国宴上致辞时说，“泰中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关系，其重要原因是泰中两国人民有共同或相似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双方的接触和交往犹如朋友和亲戚般密切，这为促进两国外交关系和诸领域的合作取得满意结果奠定了稳固坚实的基础。”¹²他信总理也说过，泰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热切盼望泰中关系有更大的发展。¹³中泰关系所具有的深厚基础，是推动中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力量。

第二，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强合作，以维护共同利益。如前所述，中泰建交后，中泰两国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促进了中泰两国的合作。这种合作实际上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在政治上，

泰国需要获得中国的支持,维护自己的安全。中国需要加强同泰国的合作,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为共同面对世界上的各种挑战,中泰两国只有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紧密携手,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框架体系中充分合作,才能争取“双赢”。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相互依存加深。泰国看好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国经济的崛起也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开拓新的市场。中泰两国既有互补,也存在竞争,只有以合作为基础,才能使两国共同受益,共同发展。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乌泰·屏猜春指出,中泰合作之所以如此密切,如此稳固,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在地区和平与稳定、地区经济发展、贸易和安全领域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识。¹⁴他信总理说过,中国入世对泰国、对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机遇。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入世为其他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泰中两国应加强合作,这样不仅能够为彼此创造机会,也能减轻各种挑战的压力。¹⁵

第三,中泰两国最高领导人和两国政府的重视和积极推动。中泰建交30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泰关系,中国国家领导人积极推动中泰关系的发展。中泰建交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在世时完成的。他们对中泰建交和中泰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在邓小平、江泽民领导下,中泰关系保持了稳步健康发展的势头。以胡锦涛主席为首的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推进中泰关系的继续发展而辛苦操劳。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访问的第一个东盟国家就是泰国。这表明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中泰关系高度重视。中泰建交30年来,先后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都访问过泰国。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几乎都访问过泰国,有的还多次出访泰国。出访泰国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领导人之多,之频繁,在中国领导人的对外交往中也是罕见的。几代领导人对中泰关系发展的关心、重视和贡献,激励着后人珍视来之不易的中泰关系,并为维护中泰关系的发展而作出更多努力。

泰国朝野也十分重视中泰关系的发展。中泰建交30年来,泰国历经10多届政府。虽然政府频繁更替,但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保持了连续性,并且把对华关系作为泰国对外关系的重点。2001年他信政府执政后,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更加活跃。他信总理把与中国发展区域合作作为泰国的既定外交政策,¹⁶强调泰国将继续与中国携手推进双边和亚洲区域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促进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第四,泰国国王和王室成员在促进中泰关系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在泰国享有崇高威望的普密蓬国王和王室成员,一直致力于中泰友好事业,为中泰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普密蓬国王十分重视中泰关系的发展,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感到由衷高兴,认为中国的政策是成功的。在多次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普密蓬国王都对中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中泰文化交流。国王关于“中泰关

“密不可分”的崇高评价，成为指导泰国发展对华关系的至理名言。2000年10月，诗丽吉王后代表普密蓬国王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这是诗丽吉王后首次访华，也是诗丽吉王后33年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她的访问，为中泰关系发展史增添了浓重一笔。泰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对访问给予了高度评价。¹⁷2004年春节，诗丽吉王后在诗琳通公主陪同下首次亲赴被誉为泰国唐人街的耀华力路，与泰国华人共度佳节，表达泰国王室对泰国华人和中国人民的热情问候，使首都曼谷充满了“中泰一家亲”的气氛。

深受泰国人民热爱的诗琳通公主在促进中泰文化交流，发展中泰关系方面所作努力，更是为中泰两国人民所称颂。诗琳通公主酷爱中国文化，多年来坚持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画，学习演奏中国乐器，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到2005年春，诗琳通公主已经20次访华。每次访华她都写下大量的访华观感。为了让泰国人民能通过她在中国的游历进一步了解中国，同时为了让中国朋友了解她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想，诗琳通公主将她的日记整理成游记出版，其中的两本，《踏访龙的国土》和《平沙万里行》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两本书深受中泰两国读者的欢迎。诗琳通公主还翻译过一百多首中国古典诗词。其中的部分翻译成果已在泰国出版。鉴于诗琳通公主在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上取得的成果，以及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教育部于2000年3月授予她“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国王的小女儿朱拉蓬公主是一位科学家，在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爱上了中国的古筝。公主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古筝演奏技能后，在泰国举办了“中泰一家亲”音乐会。2002年8月又亲赴中国，分别在北京、西安、上海举办“中泰一家亲”音乐舞蹈晚会，并亲自表演古筝弹奏。朱拉蓬公主说，她要通过音乐这一载体促进泰中两国友好关系。¹⁸

由于泰国王室在泰国具有崇高的地位，并受到人民的热爱和尊敬，所以，王室成员对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视并身体力行地推动中泰文化交流，在泰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对加深中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五，泰国华侨华人对促进中泰关系发展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据泰国方面的统计，泰国华侨约25万，华人超过630万（占总人口的12%），首都曼谷就约有100多万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的移民同化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今天的泰国，华人已融合于泰国社会，泰国华人在法律上基本享有和当地泰人同等的政治权利。在目前他信政府内阁中，70%的内阁成员是华裔就是一个证明。在长期的生活中，泰国华人与泰国人民水乳交融，为泰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亚的评论家认为，近10年来，泰国出现一个明显变化，即不但泰国人开始公开承认他们与中国在历史上的联系，以及目前与中国越来越亲密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也使泰国华人“为自己的出身而自豪”。¹⁹泰国华人虽然已从“叶落归根”向“落

地生根”转变,但仍然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和中泰关系的发展。在中泰建交后,他们为沟通中泰两国人员的交往,促进中泰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纽带、桥梁作用。在中国遭受自然灾害,“非典”肆虐期间,他们纷纷捐钱捐物,表现出了两国人民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²⁰

三

中泰建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第一,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步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新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挑战。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泰两国加强了多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泰两国相互帮助,为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早日实现经济恢复进行了积极努力。两国的合作不但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使国家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中泰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同。但这并未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中泰建交 30 年来,两国始终坚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以此推动中泰关系稳步健康发展。两国关系进而日益密切,两国人民更加和睦相处。

第三,从大局出发考虑长远是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中泰建交 30 年来,泰国政府频繁更替,中国也实现了新老领导人交替。不论领导人和政府如何变动,两国都始终从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维护东南亚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的高度来处理两国关系,注意维护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不做有损两国关系发展的事情。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精神,使中泰关系的发展不易受负面的影响和干扰。即使出现问题,也容易解决。这对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持互信、互谅、互让是巩固友好关系的基础。中泰两国没有诸如领土、领海问题的争执,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也不时出现过一些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对此,中泰两国始终本着求同存异、互信、互谅、互让精神,对待和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维护了中泰关系的健康发展。两国以诚相待,彼此信赖的态度,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中泰关系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五,建立相应的机制是推进友好关系发展的保证。中泰建交后,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包括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对促进中泰两国各领域和各有关部门的合作发挥了保障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了中泰关系的顺利发展。

第六,促进地区合作是维护友好关系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合作日益显示出勃勃生机。近 10 年来,中泰两国在推动地区发展问题上不

加强合作。泰国政府确定把与中国发展区域合作作为泰国的既定外交政策。²¹ 随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中国政府进一步落实睦邻外交政策。通过区域组织建设和济合作等方式, 全面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正成为中国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金三角地区禁毒合作、防治艾滋合作、防治禽流感合作、中、老、缅、泰四国的小区域合作等地区性合作行动中, 泰两国相互支持, 积极促成地区合作的实现。而中泰友谊则在地区合作行动中逐步加深, 中泰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总之, 中泰建交 30 年来, 在中泰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中泰关系基本上是沿着健康、顺利的方向发展的。中泰关系是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 中泰关系的健康、顺利发展对中国人民和泰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财富。这发展不但对中泰两国, 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庆中泰建交 30 周年之际, 认真回顾和总结中泰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思考从中得到的启示, 对中泰关系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降:

中国驻泰国经商参处资料, <http://th.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0407/20040700244264.html>

《中国贸易报》2004 年 3 月 25 日。

中国驻泰国经商参处资料, <http://th.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0407/20040700244264.html>

中国驻泰国经商参处资料,

泰国农民研究中心简报, 2004 年 10 月 20 日。

www.caiec.org/welcome/asia/Thailand/contract

中国驻泰国经商参处资料, <http://th.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0407/20040700244264>.

《人民日报》1999 年 9 月 4 日。

2004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报》。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 (1999 年 2 月 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泰国联合公报 (2001 年 8 月 2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泰国联合公报》, 载《人民日报》2001 年 8 月 29 日。

《人民日报》1999 年 9 月 3 日。

13. 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 2003 年 2 月 19 日在会见泰国政府总理他信时, 他信总理的谈话, 新华社 2003 年 2 月 19 日。
14. 新华社曼谷 2002 年 9 月 1 日电。
15. 他信总理访华前夕谈泰中关系, 新华社 2001 年 8 月 26 日。
16. <http://www.sina.com.cn> 2004 年 10 月 27 日东方网。
17. 泰国的重要报纸《曼谷邮报》、《民族报》、《沙炎叻》、《星暹日报》、《亚洲日报》等泰文、英文、中文报纸都为此发表了社论和评论。见 Bangkok Post, Oct 16, 2000, The Nation, Oct 16, 2000.
18. 《中国报道》2002 年 8 月 20 日。
19.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une 7, 2004.
20. 新华社, 2003 年 10 月 20 日。
21. 2004 年 10 月 26 日, 泰国总理他信在会见访泰的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时的谈话。见 2004 年 10 月 27 日新华社曼谷电讯。

境外華人國籍問題縱橫談

周南京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力丰实、和平崛起和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境内外人士要求恢复双重国籍的呼声此落彼起，甚嚣尘上，大有气盛人之势。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由吧！

不承认双重国籍过时论

他们说，时代已经大踏步前进，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东南亚地区华排华浪潮已经退去，亲华和华气氛渐浓，关于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法律、规定或政策已经过时，已不合时宜，应予改变。我们可以把这个论点简称为“不承认双重国籍过时论”。

上述思潮（观点）在境内外各种（华文）报刊上多有反映。但以黄因慧提出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案第 0222 号》（2004 年）^[1] 和海归派代表人物王辉耀著《海归时代》一书第十章中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论述^[2]，最具代表性，故在此加评述。

关于国际政治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或巨变，黄因慧和王辉耀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如下几点：①东南亚各国已不再反华排华，不再怀疑中共要利用华人去搞颠覆、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现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均已建立邦交，在各国华人的地位也今非昔比，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规定，“似乎也已经过时”。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情况和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华人新移民（新侨、新华人）日益增多。他们的特点是：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与祖（籍）国关系密切，许多人尚有直系亲属在国内，需要经常回国；学历高，大多有专业技术知识，不少人已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后来有许多成为海归派，回中国创业，开辟新天地。这些人出于客观需要和感情因素，迫切希望拥有双重国籍，以便在中国再创业和自由进出国境，甚至晚年回国叶落归根。③目前世界上有 150 多个（各说不一，一说 50 多个；一说 70 多个；一说 90 多个，一说 100 多个——周按）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为了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适应中国日益增强的大国地位，中国应该与国际接轨，修改国籍法，承认双重

国籍,或者有选择、有条件地对应承认双重国籍。“承认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是世界潮流,中国对外开放,应当在公民国籍立法方面与世界接轨,与时俱进,有所突破。在国籍方面的适当改革,必将使祖国在人才、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王辉耀) ④1998年5月雅加达华人惨案,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已经失效,换言之,如果中国实行双重国籍政策,雅加达悲剧就不至于发生,即因为中国政府能够出面保护而使印尼华人免遭迫害。

从理论上讲,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政策,任何国家的任何政策总是与时俱进,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或更新的。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之外,个人(领袖人物)的政治理念或决策也在其中起颇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闭关政策,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比较,大相径庭,这是有目共睹的。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的形势,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显著改善,甚至正在酝酿成立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十加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良好的方面,还有其它许多方面尚待解读。黄、王二君忽略了长期以来积淀和潜藏在东南亚原住民社会里的仇华和排华思想、倾向和情绪,不论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存在这种潜流和思潮。印尼尚有50多条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令条例尚未废除,现任印尼副总统卡拉上台后的排华言论,北苏门答腊地震和海啸后围绕中国援助印尼媒体的缺乏善意的报道(如媒体有意忽视中国的援助、说中国的援助食品过期,等等),都说明了排华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东南亚上空。1993年我曾经写了一篇题为《战后东南亚排华运动探索》的文章,在结论中我写道:“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南亚不会出现新的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即使在战后排华运动频仍的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总统不当总统之后,估计也不会重新发生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有一种说法认为,一旦苏哈托总统下台,在印尼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1]事实证明,我的预测过于乐观,1998年5月在雅加达竟然发生了极其惨烈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只有1946-1948年印尼华人大屠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从此,我在预计东南亚的事态发展时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当前,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佳状态,但在外交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国家之间由于各种因素发生摩擦、危机和引发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印度战争、中越战争、印尼九·三〇事件等等,就是实例。因此,只看到东南亚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忽略或忘却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作出过于乐观的预测和判断,未必是明智的。迄今为止,华侨华人集中聚居地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依然实行单一国籍制,因此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规定,并没有过时。

脚踩两只船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境的新移民日益众多,导致境外华人社会的结构发生了

大的变化,具有与旧移民不同的新特点。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或者“空中人式的华人”,他们或者由于拥有较雄厚的财富或高级技能,而就业于和不断往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逐水草而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以“世界公民”自居。被辉耀称之为海归派中的“海鸥派”当属此类。这些人为了谋生和发展,为了他们私利,兴风作浪,特别起劲地寻求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关于这个移民群体,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作了精彩的和入木三分的描述。他写道:“现今的移民当中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前共产党国家的人,可归入归附者一类。另有一类属于旅居者,其比例比过去低一点。但有大量的人——究竟多少是没法说的——属于脚踏两只船者。其中一人说,‘我们这样的人在两个世界里坐收其利。我们有两个国家,两个故乡。要把我们算作这一国人或那一国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两者都是。这并不矛盾。这是一个人类的事实。’这种人被学者们称作‘终身两靠者’、‘来来去去者’、‘跨国者’或‘漂移者’,但既不是入境移民又不是出境移民,因为他们不是一国人的身份转变为另一国人身份,他们是‘脚踏两个世界’。……”“双重公民身份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脚踏两只船的人要求其原籍政府保留其原籍公民身份。来自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尤其如此。他们希望避免在两国公民身份中作选择,希望具有双重公民身份,从而能够合法地参与两国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第二方面的动力,……是自上而下,即原籍政府希望其出境的移民保留原籍的公民身份,与原籍社会保持联系,特别是给原籍亲友汇款。这些国家的政府又鼓励移民美国的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从而能参与美国的政治活动,足进原籍国的利益。……”“双重公民身份使得双重国籍和双重效忠都变得合法化了。一个人只有一国公民身份,这身份就有重要的意义。而一个人有两国或多国公民身份时,这身份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只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利用一国公民身份,为了某些目的而在别的情况下利用另一国公民身份。脚踏两只船的人正是为了如此利用身份,才变为双重公民身份的人。”^[4]

而由中国大陆出境的脚踏两只船者,为了掩饰他们的自私目的或机会主义动机,煞费苦心地寻找、设计或创造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或遁词。例如说什么“天生公民权不可剥夺”啦,“祖国国家和华人利益双全”啦,“恢复双重国籍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啦,“为了以主人翁姿态参加祖国建设”啦,“应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啦,“绿卡制度只是治标,并非治本”啦,以及“祖国情结”、“落叶归根”、“一举多得”、“双赢局面”,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还抬出历史上的海外华侨为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来给自己助威和壮胆,希望中国政府知恩图报,为恢复双重国籍打开绿灯。他们越说越离谱,竟然把为了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敢于牺牲一切、抛头颅、洒热血的华侨先辈先烈们,同“脚踏两只船”的机会主义的华人精英们相提并论,岂不可笑! 20世纪初,有的华侨为了支持孙中山革

命,甚至把自己的儿子卖掉以凑集革命经费。那些把外国籍身份视若金锁和命根子的人,能同华侨英雄先烈们等量齐观么?陈省身、杨振宁等也具有中国情结,他们保持外国籍身份回中国定居,申请永久居留证(即没有要求双重国籍),为中国大学教育事业发挥夕阳余热,令人崇敬感动。也就是说,双重国籍并不是华人“中国情结”的必不可少的载体。对许多华人而言,表达对中国的情感可以有多种形式:像陈省身、杨振宁等那样,回国定居,安度晚年,发挥余热;留在国外,保持外国籍,融入主流社会,利用他们在当地主流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拉线搭桥,穿针引线,促进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向钱学森、任新民等华侨先辈知识分子看齐,断然返回祖国,以中国公民身份全心全意地直接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以上事实说明,脚踏两只船者多属新型的华人移民,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形成独特的华人社群。他们的人数虽然日益增多,但毕竟只占华人社会的少数。他们游离于传统华人社会之外,具有与东南亚华人不同的理念、心态、利益和要求。他们振振有词,喜欢以全体华人利益的代言人自居,而实际上他们只代表他们个人和一个小群体利益而已。毛泽东诗云:“惟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说了不少错话,但这句诗却颇有哲理,耐人寻味。当然,时代不同了,不同时代的人之间存在代沟,观念迥异,但脚踏两只船者不妨从这句诗中玩味人生的真谛和价值。他们应该扪心自问,除了私利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的壮志究竟是什么?你要换的是什么样的新天?为此目的你准备作出什么牺牲?靠双重效忠能够换新天么?写到这里,我建议脚踏两只船者把毛泽东的诗改为:“惟有私利多壮志,敢教两船都踩扁”。

与国际(世界)接轨论

黄因慧在全国政协第 0222 号提案中写道:“承认双重国籍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世界上 150 多个国家承认双重国籍。……总之,我国承认双重国籍,对《国籍法》作适当修正,使适应潮流,与世界接轨,与时俱进,在政治方面可以抚慰海外赤子,在外交方面无‘干涉别国内政之嫌’,反而有利于‘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经济上通过吸引大量华人移民回国服务、为国服务,必将使我国在人才、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一举多得,何乐不为。”^[5]王辉耀在《海归时代》一书中,也写道:“实际上,尊重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已逐渐成为世界上一种潮流,……”,并且呼吁“加速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接轨”,其中当然包括承认双重国籍,只是他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6]

首先应该指出,现代世界上的国籍法分为两大类,即单一国籍法和双重或多重国籍法。至于一个国家究竟采用单一国籍法,还是双重或多重国籍法,则取决于该国的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客观需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

形势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变迁而改变。无所谓形成潮流与否的问题。1949-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中华民国的传统,实行过双重国籍,直到1955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不承认双重国籍条约,才改而采用单一国籍政策。而迁徙台湾岛的国民党当局一直沿用双重国籍原则。目前,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古巴、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等国。

苏联宪法第23条明文规定,苏联实行统一的联盟国籍,各加盟共和国的每个公民均为苏联公民,即在苏联时期,居住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不存在双重国籍问题。

苏联解体后,民族矛盾导致了俄罗斯联邦和其他独联体共和国之间发生双重国籍问题之争。1993年12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62条规定,境外俄罗斯人可以拥有双重国籍。为此,俄罗斯联邦政府向其他独联体国家提出要求,允许境外俄罗斯人拥有俄罗斯国籍和所在国国籍。尽管俄罗斯政府不断向有关国家施加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但到目前为止,在11个其他独联体国家,只有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国家表示同意让俄罗斯人拥有双重国籍。1992年12月24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的协议。但后来土库曼斯坦新宪法(经过1995、1999年两次修改)不承认双重国籍。2003年1月13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宣布,土库曼斯坦将中止履行与俄罗斯签署的双重国籍协定。尼亚佐夫指出,土库曼斯坦的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这一协定逍遥法外,他们逃往俄罗斯,获得俄罗斯护照,甚至前往第三国,致使土库曼斯坦执法部门无法根据现有法律对他们进行惩处。因此,土库曼斯坦政府不得不中止履行这一协定。2003年4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签署了关于停止执行俄土两国双重国籍的协定书。12天后,土库曼斯坦总统单方面签署命令,要求持有双重国籍的居民必须在两个月之内选择一国国籍作为自己的唯一国籍。为此俄土两国之间发生了外交摩擦。^[7]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宪法,均明文规定本国公民均不许拥有双重国籍。^[8]2004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责成俄议会讨论俄乌双重国籍问题。普京指出,他不久前访问乌克兰时,乌克兰总统和总理以及乌克兰公民都提出俄乌双重国籍问题。显然,该问题的提出是近几年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必然结果。^[9]

2004年1月4日,阿富汗制宪会议(大支尔格会议)经过两天激烈辩论后,终于通过了阿富汗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未来阿富汗政府各部部长只能拥有一个国籍。至于那些已经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在他们出任政府部长时,议会会对他们的任职资格进行个案审议。^[10]

印度原来实行单一国籍制,旅居国外的印度公民只要加入他国国籍就会自动丧失印度国籍。2003年1月9日,在首届海外印度人日大会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宣

布,印度政府允许部分海外印度裔拥有双重国籍,有关议案将在近期提交议会。2003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新法律,允许在国外居住的印度公民同时拥有印度国籍和所在国国籍。但是目前只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和意大利等16个国家在名单之列,而居住在海湾国家的大量印度公民将无法享受此种待遇。新法律还规定,具有印度血统的外国公民,只要其父亲或爷爷具有印度国籍,不管本人是在国外出生还是在外国长大,均可申请加入印度国籍。^[11]印度有关双重国籍的政策出台之后,目前居住在实际上也承认双重国籍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印度裔,可以在国内生活、工作及购买房产,但他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出于综合考虑,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居住的印度裔都不在双重国籍的考虑范围之内。印度发行量最大的《印度时报》在2003年1月10日头版发表的评论中,除了肯定给予海外印度裔以双重国籍的举措之外,还提醒说“对于经济发展步子不加快,阻碍投资的官僚主义不消除,认为只靠发放双重国籍就会吸引投资,这种想法‘过于天真’”。^[12]

瑞典原来实行单一国籍制,凡是加入其他国籍的瑞典公民都自动丧失瑞典国籍。根据2001年7月开始实施的瑞典新国籍法,瑞典公民在加入其他国籍后,仍可保持瑞典国籍。而且,所有在1951年1月以后放弃瑞典国籍而自愿加入其他国籍的人均可取得瑞典国籍。不过,瑞典实施双重国籍的前提是,所涉及的其他国家也必须允许双重国籍。^[13]

自从印度政府宣布给予一部分海外印度裔以印度国籍后,印度与新加坡政府之间进行关于相互承认双重国籍的谈判。但我们看不出新加坡会同意与中国谈判对应承认双重国籍问题。因为新加坡人口中大约76% (1993年) 为华人,如果承认他们也拥有中国国籍必然会引起新加坡的归属问题,不仅新加坡人不会赞成,新加坡的左邻右舍肯定也会深感不安。无怪乎,当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在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欢迎词中斩钉截铁地表示:“报告邓小平副总理,新加坡没有华侨。”

根据日本国的国籍法,拥有双重国籍的公民必须在22岁之前放弃其中的一个。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双重国籍问题引起了日本和秘鲁之间长期的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于2000年11月29日表示,只要避难日本的秘鲁前总统藤森提出愿意以日本人身份留在日本,日本将考虑承认他的日本和秘鲁双重国籍。同一天,藤森已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希望以日本人身份留在日本。^[14]

2003年8月19日,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德里隆宣布,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委员会18日晚通过了双重国籍法案文本。根据原法案,菲律宾出生的菲律宾人一旦获得其他国籍,将自动丧失菲律宾国籍。根据这个双重国籍法案,将使数百万加入其他国籍的菲律宾人受益。菲律宾国会之所以通过该项新法案,主要是考虑: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众多美菲军人的利益,使他们得以享受作为美国军人的各种福利待遇;

二、数百万拥有外国籍的菲律宾海外移民、劳工晚年回归祖国养老的要求。¹¹⁵ 菲律宾问题专家吴文煊在《利己主义要不得》(见本书)一文中,对菲律宾国籍问题已详加论述,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美国是世界上在国籍问题上采取模糊和模棱两可态度的国家。这种状况有其形成和演变过程。在美国独立初期(1795年),美国国会规定凡是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者,必须宣誓拥护美国宪法和效忠美国,彻底放弃对原籍国家的忠诚,坚决保卫美国宪法和国家安全。200多年后的今天,上述法律规定虽然依然存在,但随着时代为演变、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解构主义运动(简单地说,反对美国大熔炉理论或番茄汤理论,鼓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多民族的民族”)的兴起,排他性原则受到损害,鼓吹双重效忠、双重国籍和双重公民身份的理论(理念)大行其道。美国除了与以色列和加勒比海地区若干香蕉共和国签订有对应双重国籍协定之外,在法律上仍然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在实践上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或者十分模糊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当然,这种做法虽然是违背美国宪法的,并导致了一系列法律纠纷,但无论如何它已经形成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4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概述许多国家实行的国籍政策及其演变过程,无非是为了说明“与国际(世界)接轨论”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实际上世界上虽然有90多个(我倾向于采纳这个统计数字)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但是不能简单地概括成为“已逐渐成为世界上的一种潮流”。因为:①还有不少重要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韩国、日本、古巴等,以及在宪法上的美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在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仍然实行单一国籍制度。②各国的国籍制度(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各国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和短期利益而不断地修订或变动,其国籍政策从双重国籍制变成单一国籍制(1955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从单一国籍制度变成双重国籍制(2003年12月后的印度、2003年8月后的菲律宾等)。③一般而言,实行双重国籍制的国家多为相互对应承认双重国籍,都设有前提、条件或限制,例如印度只给予一部分海外印度裔以双重国籍,没有给予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美国在宪法上一向反对双重国籍,只是在实际上采取模糊或模棱两可的政策。④双重国籍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政治、法律及司法、经济、外交、国家安全、对侨民的有效管理和保护、税收等等问题,不能像儿童玩积木那样随心所欲地改来改去。⑤因此,如果要谈论什么“世界潮流”的话,那就是根据国家和民族(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长远和短期利益决定国籍政策,而不是赶浪潮、赶时髦或模仿国情不同的别国的做法。还有,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应该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忠于所在国,为所在国多做贡献,这才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所谓“世界公民”,毕竟只是一小撮,并不能代表境外华人的多数,也不可能构成“世界潮流”。无论如何,时至今日,“大同世界”依然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中国是一个

拥有 13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她与周围邻国的外交关系历史错综复杂，她还与敏感的东南亚华人问题纠缠在一起，也许在加拿大、瑞典可行的做法，拿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就行不通。再说，“加速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接轨”的提法，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仿佛这个口号的提倡者也主张全盘西化论，让中国在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等等方面也与世界（西方）“全方位接轨”。不然，“全方位接轨”的内涵应该如何理解？不知中国当局是否也期待这样的前景？

侨务论

黄因慧在全国政协第 0222 号提案中云：“取消双重国籍并不能阻止 90 年代末期在印尼的印籍华人惨遭迫害的悲剧，政策已失去了其作用。”黄因慧提案中的这段话，可以被解读为：一，中国的侨务政策对海外华侨的命运、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二，由于中国实行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致使中国政府无法保护印尼华侨免受迫害，从而无法避免 1998 年 5 月雅加达悲剧的发生。这样，问题就集中到：中国侨务政策的历史作用，以及中国侨务政策与海外排华运动（事件）的相互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政府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中国侨务部门的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反复宣讲，侨务的涵义就是为华侨服务。而历史证明，规定和许诺是一回事，事实和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当中国和邻国交恶，发生武装冲突或战争时，如中印战争、中越战争、印尼九·三〇事件，首当其冲的是华侨，甚至华人也随着遭殃：被关进集中营、驱逐、迫害、杀害，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政府根本无法给予保护。在中越战争过程中，情况好些，成千上万越南难民（包括华侨、华人和非华人）涌入中国境内，他们被中国政府安置收容。在中印战争中，印度华侨就命运多舛，中国政府无从保护印度华侨。在印尼九·三〇事件后，成千上万华侨、华人横遭迫害和屠杀，中国政府虽然派船接运难侨回国，但后来停止接运，仍有数千难侨留在棉兰等地的难民集中营备受苦难煎熬。在文革期间，国内许多归侨横遭各种打击迫害，致使文革结束后约有 30 多万归侨倒流出境。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及许多开国元勋彭德怀、贺龙等都被迫害致死，普通归侨还能得到保护吗？红色高棉实行极左路线，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路线一脉相承，因此当红色高棉屠杀成千上万柬埔寨华侨时，中国政府不置一词乃情理中的事。尽管以上史实都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或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它仍然说明我们不能把法律规定和许诺（承诺）当作可以依靠和可以完全托付的绝对保证。广大华侨应该醒悟到，中国向来是外交第一，侨务第二，即侨务政策永远是从属于外交政策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总是首先考虑国家民族利益，把外交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这是理所当然和无可非议的。从清末以来，经过中华民国时期，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代中国侨务政策的核心或主导思想就是中国中心主义，即中国千方百计地

海外华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然，中国侨务政策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中国为海外华侨服务，例如帮华侨教育事业（清末创办暨南学堂——暨南大学的前身；鼓励和帮助建立海外中学校等），在海外为华工、华侨提供领事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西南大方收容流落难侨，在1998年雅加达惨案之后在广州、厦门、北京等地收容逃难华人子女等等，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政府在华侨遇到局部困难或麻烦时，还提供某些帮助。但在海外发生大规模排华运动或骚乱时，历代中国政府往往是无为力的，或共对华侨的帮助是极其有限的。这与外交交涉的难度密切相关。华侨中国服务大大超过中国为华侨服务，其比例大致为8:2。因此，比较而言，就侨务双向内涵而言，中国为华侨服务方面还有广阔发展的空间。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内部问题多多（失业率高、西部贫穷落后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似乎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应该自找麻烦地重新提出早已解决的双重国籍问题。

还应该在这里说明，1998年5月雅加达排华骚乱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但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风马牛不相及。倘若中国承认双重国籍，也无法止排华骚乱的发生。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双重国籍政策，但它仍无法制止1946-1948年印尼大规模屠杀华侨悲惨事件的发生。^[1]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地区排华浪潮的频繁发生，是华侨与当地原住民之间在历史上积累的民矛盾、本能的民族猜忌、疑心、敌意等等因素的必然结果，与华侨华人具有的单一国籍或双重国籍毫不相干，华人的血统、脸孔、宗教信仰、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本身，就会激起具有民族偏见的原住民的反感和猜忌心理。在大规模排华的历史合下，广大华侨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精诚团结和顽强斗争来渡过难关，并重振雄风。

中国侨务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相矛盾。自从90%的华侨转变成成为华人之后，国把华人也列为工作对象。用国务院侨办某领导人的话说，如果不把华人列入工对象，侨办就要关门大吉。从法律上讲，华人加入外国籍，自然不归中国政府（侨部门）管辖。中国侨务部门为什么要把已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列为“工作对象”呢？要对华人进行什么“工作”呢？过去中国利用华侨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包括宣世界革命、组织华侨地下共产党等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活动都被消了，那么现在要对华人做什么“工作”呢？无非是要把华人培养成对中国友好力量，充当中外政治、经济关系的中介人，把他们的财力和人力吸引到中国，让他们帮助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等等。但过分强调和宣扬中国和华人社会的血缘关，会引起东南亚原住民的猜忌和疑心。新加坡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即东盟——周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

怀,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18] 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李光耀的提醒和看法。当某些人热衷于恢复双重国籍时,最好想一想李光耀这句话的含义,而不要让大汉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冲昏自己的头脑,搞什么“大中华经济圈”、“天下华人是一家”、“21世纪是中国人(华人)的世纪”等等自我膨胀和自我吹嘘的宣传活动。

目前,在境内外要求恢复双承国籍的日趋强烈的呼声中,中国侨务当局又面临新的挑战 and 决策。作为布衣学者,我在此向中国侨务部门进一言:境外华侨华人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群体,由于移民先后、世代差异、血缘成分、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理念、职业结构等等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层次和集团,因此,在进行侨务决策时不能只顾一头一阶层一集团,而忽略另一头另一阶层另一集团,更不能把优先考虑的重点放在少数群体(欧美澳华人新移民)方面,而仍然应该着重考虑人数占境外华人数多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中国侨务政策应该有继承性,相对稳定,不要忽左忽右,一会儿推出去,号召华人加入当地国籍,融入当地社会,落地生根,效忠所在国;一会儿在一小部分新移民的游说下,从国家利己主义考虑,又拉进来,主张恢复双重国籍或搞对应承认双重国籍,号召落叶归根,鼓吹中华民族凝聚论,搞双重效忠。这种多元的国籍政策,除了在实行操作过程中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和摩擦之外,还会在司法、国家安全、税务等方面造成许多矛盾和冲突。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周围环境和良好的睦邻关系,而在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问题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动不如一静。继续让东南亚广大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在政治上效忠所在国的同时,继续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何乐而不为。这样做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际社会效益比承认一部分新移民拥有双重国籍不知要大多少倍。重新恢复双重国籍,对东南亚华人而言,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举例,目前印尼还有50多个歧视华侨华人的法律条例,如果华人恢复双重国籍的话,他们势必丧失从事许多行业或职业的机会或资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如菲律宾《商报》社长兼总编辑于长庚所说:“我确信融合的路线是经得起考验的。……现在有人提倡双重国籍,我认为是落伍退后的想法,不合时宜,甚至是自寻烦恼,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有朝一日,人们将后悔莫及。”^[19]

结论

一,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单一国籍制或不承认双重国籍制并没有“过时”。20世纪50年代,中国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周边国际环境所做出的取消双重国籍,只承认单一国籍的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是符合海外广大华侨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时至今日,虽然经过了50年风雨和变迁,不论是中国、东南亚地区还是海外华人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实行单一国籍

制或不承认双重国籍制的根据或理由依然存在,没有加以改变的必要。

二,欧洲、美洲、澳洲、日本等地区,确实出现了新型的华人移民社群,他们的利益的确同东南亚旧

华人移民社群迥然不同。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但是,也应该郑重指出,这个社群过于势利,有“脚踏两只船”和“好处两边沾”的明显意图和倾向。为了照顾这部分新华人移民的要求,在坚持单一国籍制的前提和条件下,可以采取若干变通的措施,例如进一步放宽和简便有关出入境签证、居留、绿卡、购置房产、子女教育等等政策规定。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和正在逐步解决这部份新移民提出的许多实际要求。相信将来中国签证、绿卡等制度一定会逐步完善。

三,继续鼓励境外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融入和效忠所在国家,并且以外籍华人身份通过多种形式为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也欢迎他们回祖国定居安度晚年贡献余热,如陈省身、杨振宁等教授所作所为。

四,考虑到许多华人的“祖国情结”,我建议凡是已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一旦回中国定居,可以申请恢复中国籍。此举虽然不宜提倡,但若有此种情况,中国政府应该给予各种方便。他们的子女成年后,有权随时选择恢复中国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恢复或申请中国国籍必须履行必要的程序,经中国公安部审核批准,而不是凡具有中华血统者随时随地均可自动地、无条件地具有中国国籍。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者都必须放弃外国籍,不能搞双重效忠。搞双重或多重效忠,对中国、外国(尤其东南亚国家)和境外华人各方面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满怀中国情结的回国华侨,应该鼓励他们以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季羨林等老归侨为榜样,全心全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地为祖国服务,不应该鼓励脚踏两只船或好处两边沾的思想和行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主要依靠赤胆忠心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而不能依靠利欲熏心的脚踏两只船者。

五,国籍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敏感的,中国当局应该把握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深思熟虑,谨慎处理,不宜随波逐流,盲目地模仿他国的做法,更不应该只考虑一部分欧美新移民的要求,而忽略东南亚人数众多的华人社群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注:

[1]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编:《把握人民的意愿》(2004年卷),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第614-618页。

[2] 王辉耀著:《海归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第299-310页。

- [3] 周南京著:《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445页。
- [4]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第170-177页。
- [5] 同注[1],第614-618页。
- [6] 同注[2],第299-303页。
- [7] 新华网:陈俊峰:《土库曼斯坦宪法不承认双重国籍》,
<http://www.qianlong.com/2003-08-21 10:36:12>
- [8] 郑羽主编、李建民副主编《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19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下册,第633-634页。
- [9] 新华社莫斯科2004年10月30日电。
- [10] 新华:《东南快报》2004年1月5日。
- [11] 杨漪峰,国际在线,2003年12月26日10:03:06
- [12] 钱峰:《印度优待海外侨胞,鼓励回国投资》,载《环球时报》2003年1月16日。
- [13] 大众网,2001年7月3日。
- [14] 大洋网,2000年11月30日21:36。
- [15] 郭春菊:《菲律宾国会通过双重国籍法案》,载《东南早报》2003年8月20日;于长庚提供资料。
- [16]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第170-181页;美国双重国籍系列(1-9),
<http://www.tigtag.com/community/immigration/412113.html>。
- [17] 周南京、梁英明、孔远志、梁敏和编著:《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11月,第1-89页。
- [18]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9月,第669页。
- [19] 张存武、朱滋源等访问:《菲律宾华人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6年,第332-336页。

2005年3月于蓝旗营自乐书屋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

還吾僑一個公道

— 探討耀華力路事件歷史真相

黎道綱

1945年9月下旬，在曼谷華僑聚居的耀華力路發生了著名的9·21耀華力路流血事件。如何看待這個事件？直到今日仍有種種不同看法。

吾人以為，歷史事件要有正確的結論，才能以史為鑒，才能教育後人，後人才能有正確的是非觀。

只是，如此分清是非，嚴肅對待歷史問題的作法，在泰國很少出現。在泰國，對待歷史事件，往往是採取所謂“西他暖猜”的態度，得過且過，馬馬虎虎，對歷史上重大事件如此，對一般事件態度更是如此，“以史為鑒，教育後人”根本不可能做到，因而貽誤後人，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例如鑒披汶政府的唯國主義，歷史事實證明是不正確的，但由於沒有正面對其錯誤加以分析批評，是非曲直沒有辨清，難以糾正，其惡果至今未能消除，泰南三府問題遲遲不能解決，就與此有關。

我們在這裡重提耀華力路事件，是因為至今還有人對這段歷史老調重彈，說甚麼是“旅泰僑胞因情感衝動，致演成有名的‘耀華力921事件’，或‘部份華僑對政治知識較為淺薄，當見中國是戰勝國，而為勝利衝昏了理智與泰人互相仇視，製造不靖事件。’”

【1】或說：“當日本投降，中國勝利的消息傳出後，曼谷僑社呈現一種近於瘋狂的興奮情緒，一般缺乏教養的華僑青年，給‘勝利’沖昏了頭腦，作出毫無意識的表現。他們把積蓄多年，被欺負被壓迫的悶氣全部發洩出來，他們喝酒、狂歡、喝醉了酒就理智喪失，最先是無緣無故在耀華力路毆打泰籍三輪車夫，警察來干涉，他們連警察也毆打起來，事情愈鬧愈離譜，幾乎達到無法無天的程度。泰政府當局在無法忍受的情況下，於九月廿一日實行派遣軍隊乘多輛鐵甲車到耀華力路，實行武力鎮壓那些跡近暴徒的華僑群眾，且曾開槍射擊，演出流血慘劇，……。”【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論調的共同點是，喋喋不休地把事件發生的原因和錯誤統統推到吾僑身上。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論調的作者或是在事件以後才來到曼谷，他們道聽途說；有的人雖然生活在曼谷，但因當日政治形勢複雜，對形勢缺乏正確的認識，故以此類臆論為依據來作歷史結論，貽誤後人。

對耀華力路事件真相的錯誤說法，到了應予糾正，以正視聽的時候了。

一.《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曼谷耀華力事件”辭條

北京出版的《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歷史卷“曼谷耀華力事件”辭條【3】是這樣描述這個事件的：

暹羅極右分子利用華僑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的激情挑起的流血事件。

1944年8月，暹羅親日的鑾披汶·頌堪（Luang Pibul Songkhram, 1897-1964）政府倒台，成立民主派掌權的新政府。新政府雖然更換總理，但大泰族主義，親日排華分子仍不少，尤其在軍警的高級軍官中。華僑社團中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鬥爭激烈，反動勢力利用大漢族主義極右思潮，煽動一些僑胞，配合暹羅當局中的殘餘極右勢力，挑起中泰糾紛，製造流血事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同年9月20日晚，正值華僑過中秋節。曼谷華商聚集區耀華力路上華僑行人較多，適有一輛三輪車路過，車後插有中國國旗一面。路旁僑胞兒童鼓掌歡呼，追隨其後，其他華僑亦群起加入，造成交通阻塞。暹羅車夫見狀，將旗拔下，摔在地上。僑胞氣憤難忍，欲打車夫。車夫拔出手槍，意欲抵抗。警察路過，阻止無力。大批軍警駕車而至，向高處四散開槍，一時大亂。傷者多人，被捕數十人。同月21日晚，混入耀華力路各茶樓或躲入華僑屋後的極右份子先後開槍，挑起事端。已有準備的軍警軍訓生數千人，荷槍實彈，乘坐鐵甲車、坦克車封鎖華僑聚居區，範圍包括耀華力路、石龍軍路、三角路、新柳港、鐵橋頭、三王府等，並以步槍、機槍作無目標的掃射。令電廠拉閘停電。黑暗中，軍警以搜查槍械為名，向華僑商店、金行、居家進行搶劫。稍有不從，即遭槍殺。有的被殺後進行滅屍。同月22日，曼谷戒嚴，至翌日下午才恢復交通。同月24日，曼谷華僑在抗戰建國聯合總會號召下罷市。暹政府一方面感到事態嚴重；另一方面仍想用武力迫使華僑屈服。同月25日晚，軍警再次在曼谷新城門、三升、水門等地大肆搶劫、殺害華僑。同月26日，暹政府要求華商開市。僑團舉行會議，向暹政府提出五項要求，如撤退武裝軍警、釋放被捕僑胞、調查僑胞損失、改善對華僑的態度等。暹政府答應要求。同月30日，罷市結束。該事件損失總計：華僑死140餘人，其中沉尸河中漂浮河面者60人，400餘家華僑商店、金行、居家遭劫，財產損失慘重。被捕人數無從統計，僅22日被捕人數已近1000人。該事件破壞中泰兩國人民之間的情誼，僑胞派代表回國報告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出面干預。曼谷市出現暹羅秘密團體，號召暹人與華僑絕交四辦法的傳單等。

書中注明，其參考資料來源是：1945年10月出版由旅渝暹羅華僑互助社編印的《暹羅問題專集》和北京泰國歸僑聯誼會編的《泰國歸僑英雄錄》，1—4卷。

事件發生在1945年9月，同年10月重慶就編印了這本《暹羅問題專集》，應該說，事件還在進展中，許多真相還沒有搞清楚，加上出版地點又遠在當年通訊不便的重慶，因此，其偏頗在所難免。而《泰國歸僑英魂錄》則是近年出版，其重點是歌頌泰國華僑英魂，對於個別事件未於深究，以此為歷史事件的依據則嫌過於單薄和粗造。

二．耀華力路事件發生經過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投降，抗日戰爭勝利了。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剛剛傳出，在曼谷耀華力路的天外天地區就發生了泰軍警和華僑的糾紛事件。

1945年8月16日中原報報導說：前天（十四日）日本政府接受同盟國投降條件之覆牒消息傳至本京之後，世界全面和平以告實現，全體僑胞莫不興奮異常，但因興奮過度，遂致於是日下午有本京耀華力路天外天之事件發生。中華總商會暨六屬會館為籲請僑胞保持鎮靜態度起見，特於昨天（十五日）聯合發出通告如下。

1945年8月15日中原報刊登的泰國中華總商會暨六屬會館通告如下：【4】

查我僑居泰國，歷史悠久，各祇從事工商，絕無其他冀圖，以故泰華兩民族之關係，日益深密。詎昨本京耀華力路忽然發生意外情事，本會等殊感遺憾，為此合亟聯合通告，凡我同僑，應各站定僑民崗位，力持鎮靜。恪守秩序，各安生業，勿有絲毫越軌行動，是為至要。此告。

中華總商會暨各屬會所

瓊州公所 潮州會館

福建會館 廣肇會館

江浙會館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

請大家注意，這裡說“全體僑胞，莫不興奮異常，但因興奮過度，遂致於是日下午有本京耀華力路天外天之事件發生”，指的是8月14日的事，不是9月21日事件的描述。

1945年8月16日，中華總商會主席陳守明被槍殺。

1945年9月20日晚，在曼谷耀華力路復發生了大規模械鬥的事件，21日事態更形擴大，史稱耀華力路事件，也稱9·21事件。

由於中原報在8月31日以後停刊，而李其雄先生接管後復辦中原報，則在1945年10月1日，耀華力路事件發生期間，正值中原報停刊時期。因此，對耀華力路事

件，中原報沒有當日的詳細記載。

幸好在耀華力路事件發生後不久，曼谷《真話報》（週報）於10月3日刊登了一篇作於10月1日的《曼谷通訊》，對事件有詳盡的報導和分析，作者署名勉之。茲將“事件經過情形”章節轉錄如下：

查此次事件發生前數日，本京各市街（特別是耀華力路與石龍軍路）即貼有由“旅暹情報部”發出之“有力出力，有械出械”，鼓勵華僑攻擊泰人之傳單出現，同時尚有其他手寫之各種煽動文字，分貼於各熱鬧地區。至19日晚間，有三數百英軍手擊我國國旗，沿天外天一帶揮舞，一般兒童見狀，即高聲大呼“OK”，而成人亦相率追隨，前呼後擁，自天外天、三角路，而羅斗園、豆芽廊，所至途為之塞，正好因中央警署警察出面干涉，始行分散。

翌晚（廿日）適逢中秋之夜，耀華力路一帶游人甚多，八時許，復有英軍於天外天街某咖啡店內一面喝酒，一面手揮我國國旗，一時僑眾成群圍觀，交通為之阻塞，其時適有一三輪車駛經是街，混亂之間，該車遂撞及一著白色服裝之華僑，隨即發生口角，終及釀成觀眾圍毆三輪車夫情事，旋警察出面干涉，亦遭群眾毆擊，至此，雙方各自糾眾互毆，影響所及，附近群眾蜂擁參加，且亦有少數英軍夾雜其中，而挑撥滋事之搗亂份子即乘機大肆鼓勵，雙方互毆事件隨之擴大，致老哇力前一段馬路人山人海，情勢益為緊張。中央警察署警官坤針農氏乃率同武裝警士10餘名，乘汽車趕至肇事地點，解勸在場群眾散歸，但毫不見效，且有少數頑童燃爆竹拋向警車，而警察則一面朝天開槍，一面駛車返署。不久，又有大批武裝軍警至耀華力路一帶彈壓，一時槍聲卜卜，群眾皆各自奔避星散，商戶亦相率閉門，繁華市區頓入恐怖狀態。事後據聞稍有死傷，但詳情未悉。

21日空氣益見緊張，耀華力路各旅店之“旅客”較之往日特多，各處謠言四起，或云某方於是晚將有武裝行動，且隊伍已先佈置完竣，有者以“今晚又將有事”之消息相傳告，這晚謠言益熾，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而當晚軍警之出動，亦大為增加，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八時許，卜卜槍聲四起，耀華力路一帶交通全告斷絕，一切泰奸及鑒故欲殘餘份子之軍警，則勾結流混，乘機搶殺，附近一帶華僑之生命財產因此遭受慘重之損害。

22日晨，泰軍警仍於槍聲卜卜中在各肇事地點搜查。據云，結果捕去“嫌疑犯”數十名。至午後槍聲稍停，而耀華力路之武裝戒嚴則直至23日晚始告解除。【5】

三、英國情報部門的有關報告

上述報導中提到，“查此次事件發生前數日，本京各市街（特別是耀華力路與石龍軍路）即貼有由“旅暹情報部”發出之“有力出力，有械出械”，鼓勵華僑攻

泰人之傳單出現，同時尚有其他手寫之各種煽動文字，分貼於各熱鬧地區。”

事件發生於19日至21日，其前數日也就是16、17、18日這幾日，曼谷街頭已出現攻擊泰人的傳單，這些傳單，上文說是“暹羅情報部”的活動，實際情況是否如此，這是不是左派人士給他們橫加罪名呢？

幸好英國公佈了這個時期有關檔案，我們且看看英國檔案是怎麼說的。

英國情報處有關暹羅華人的報告：【6】

甲．1946年9月17日，東南亞最高統帥部致（英國駐重慶工作人員）Denning 內電報。

“特急。絕密。

Denning 報告如下：

駐暹羅英國和美國方面的消息都說，華人正在引起麻煩，攝政王說：有的華人集團的態度危害著和平和秩序。如果繼續發展，將引發日方的反應。

2. 如果你能晉見中國政府，要他們給暹羅的華人社會發出指示，以維持法律和秩序，並且克制暴力，我將十分感激你。

3. 供你參考，有充分理由相信，戴笠在暹羅有許多特務。

乙．1945年9月18日重慶（Denning）致東南亞最高統帥部電報

“要件。絕密。

外交部代部長告訴我，大約在8月20日蔣介石將向海外華僑發佈適當的文告。”

丙．1945年10月1日英國外交部至東南亞最高統帥部電報

“要件。

今日中國大使館的備忘錄云，據中國政府收到的報告，最近曼谷由於污辱中國國旗引發的暹人反華暴動，導致華人和暹人發生衝突，暹羅政府派約5000名軍警包圍和攻擊華人社區。備忘錄要求給予前往曼谷的中國代表團種種方便，以了解華人居民的狀況。”

丁．1945年10月5日東南亞最高統帥部致英國外交部電報

“根據與你的電報同時收到的、曼谷O.C.情報單位9月24日和25日的報告，日本投降後，曼谷華人立即企圖影響暹方這樣一個事實，戰爭勝利主要是中國的作用，顯然，華人期望暹羅不僅應以敵國對待，而且將有10000名中國軍隊參與佔領。

2. 由於過去受到歧視，華人公開敵視暹羅，而暴動發生在曼谷華人區。華文標語和傳單寫道：團結起來，和暹羅匪徒作鬥爭。有華文恐嚇信給店主，店鋪關閉，看來總罷市並非志願。商人階層害怕，如果發生騷亂，

不法份子就會乘機搶劫。

3. 軍事指揮員報告說，暴亂以後，暹羅人已能控制局勢。

6. 我在第 111 號致重慶電報（譯註：見上述 9 月 17 日電報）中，要求中國政府盡力避免華人製造麻煩。雖然我不打算支持暹羅人（他們已是如此疲乏），但從上述報告看，華人似乎製造了麻煩。在這樣微妙的時刻，（我們）不宜傾向任何一方。

英國情報部門的檔案說明：

1. 當日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在暹羅有許多特務。
2. 日本投降後，曼谷華人認為，戰爭勝利主要是中國的作用；期望不僅應以敵國對待暹羅，而且將有 10000 名中國軍隊參與佔領暹羅。
3. 華文標語和傳單寫道：團結起來，和暹羅匪徒鬥爭。有華文恐嚇信恐嚇店主關閉店鋪，看來總罷市並非志願。商人階層害怕，如果發生騷亂，不法份子就會乘機搶劫。
4. 英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給暹羅華人社會發出指示，可以克制暴力。

英國的情報正好印證了上述報導，“查此次事件發生前數日，本京各市街（特別是羅華力路與石龍軍路）即貼有由“旅暹情報部”發出之“有力出力，有械出械”，鼓勵華僑攻擊泰人之傳單出現，同時尚有其他手寫之各種煽動文字，分貼於各熱鬧地區。”這些都是某黨極端份子的意見和行動。

曼谷《真話報》上述報導繼續說：至於本京一般華僑方面，自 20、21 日事件發生後，因鑒於生命財產之易遭損害，以及因“暹羅抗戰建國聯合總會”發出“不准營業”之通告，故自 24 日起，即已有一部份人開始罷市。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5 日晚，新城們區又發生因流氓搶奪泰警武器，而再促使泰奸排華份子乘機搶殺華僑事件。至此，一般善良僑商為避免不幸計，均自動閉門停業。直到上月卅日秩序治安恢復與事件處置辦法告一段落後，始行照常營業。【7】

四．泰國政府當日對事件的看法

事件發生後，泰國政府宣傳部長派洛·猜耶南和京畿警總巡舉行招待會，向華文記者與各僑團代表解釋發生不幸事件的原由。僑社出席的代表有中華總商會及福建會館的白明坤，潮州會館的潘公輔，廣肇會館的丘玉璘，瓊島會館的吳乾選、陳嘉蘭，客屬會館的熊均靈，余作舟、吳仲衡，江浙會館的張杰陵，以及各華文報代表。

這位宣傳部長是這樣說的：“現時事端之起因，係由於同盟國之勝利，中國亦在勝利國之中。受過多年戰爭困苦之華僑，當獲得勝利之消息，歡騰過度，而忘記所居留之地方為泰國，而引起與泰人及警察發生糾紛之事。我人對此事可盡（量）使之平息。回思我人之祖先，數千年來相親相愛，有悠長之歷史，未有發生糾紛之事端，因有一部份華僑，認為泰國與同盟國宣戰，此次同盟國獲得勝利，泰國或將受同盟軍管理，將有中國軍隊來泰。其實同盟軍來泰係不確之消息。同盟軍或將未有進入泰國，設若有之，則僅小數之儀仗隊而已。……數天來所發生不幸之事件，考查其因果，華僑方面與泰國人民方面，雙方均有過失，且事端之發生，均係由小數下級人所致起，因言語及舉動之不佳所致。惟現時我人應進行解決此問題，極力抑制事端之發生。”

關於旗幟事件及語言之煽動而至於發生不幸事件，警察總巡對此分析稱，在眼前每地華僑皆售賣國旗，甚至一般小販亦皆插掛旗幟，當有人向之詢問時，即發生口角，而由個人波及群眾之糾紛，一般之意識誤認泰國與日本為戰友，日本戰敗，泰國當亦跟之戰敗。

這是當日政府官員的說法，他們雖然提到，“受過多年戰爭困苦之華僑，當獲得勝利之消息，歡騰過度，而忘記所居留之地方為泰國，而引起與泰人及警察發生糾紛之事”，但對事件的發生，也只是說：“考查其因果，華僑方面與泰國人民方面，雙方均有過失，且事端之發生，均係由小數下級人所致起，因言語及舉動之不佳所致。”他沒有把過失統統推到華僑身上。

這裡提到，“因有一部份華僑，認為泰國與同盟國宣戰，此次同盟國獲得勝利，泰國或將受同盟軍管理，將有中國軍隊來泰”，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五．“中國軍隊來泰”之說

這裡且看當事人的是怎麼說的。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南進，南太平洋戰爭爆發。民國卅一年元旦，中美英蘇等廿六國在華府簽訂共同宣言，表示一致對軸心國聯合作戰。一月四日，盟國推舉蔣委員長任聯軍在中國戰區（包括越南及暹羅）之最高統帥。年中乃有“暹羅軍事專員公署”之組織，專員為卓獻書將軍，公署設在中緬邊境之車里（今景洪——引者）。……民國卅二年七月十四日，卓獻書專員集合挺進隊下令分發到滇察和真緬邊境，滇察邊境孟臘孟倭支隊由陳文耀、鄭國振、陳復新、蔡文星等率領。滇緬邊境孟連、孟馬支隊由秦維亞、蔡峰、蔡義生、林粵、羅國英與我率領，這一段時期主要任務是蒐集情報，調查兵要地理，準備南進。民國卅三年秋，戰事急轉直下，日軍已呈敗象，中印緬戰區在英國壓力之下，重新劃分為印緬戰區與中國戰區，暹羅劃歸印緬戰區，由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任統帥，故此暹羅軍事專員公署遂

即撤消，……。”【8】

1944年秋重新劃分戰區，暹羅劃歸英國。這就是日本投降後，耀華力路有英軍士兵醉酒惹事的緣故。但吾人應注意到，前段時期，中國方面在暹羅地下工作播下的種子仍在，在基層影響仍深，因是秘密工作，其界限一時難以劃清。此後不到一年，日軍投降，群眾中有“泰國與同盟國宣戰，此次同盟國獲得勝利，泰國或將受同盟軍管理，將有中國軍隊來泰”之傳說，並不令人詫異。

六．中原報復刊後的綜合報導

中原報於十月一日復刊後，立即刊登了一篇綜合報導，【9】其內容如下：

“關於本略耀華力路、石龍軍路、新城門等地區所發生與我僑生命財產安全有絕大關係之槍殺案件，適值本報在暫時停版從事整頓內部期間，因此未能及時向我僑作報人應盡之報導義務，資深抱憾。惟事件發生以至現時為止，其事態進展程度，確具有其暫時告一段落之階段。此次糾紛，我政府當局，經於耀華力路糾紛事件發生後之翌日，即訓令外交部轉駐美我大使館向駐美暹使提出交涉。同時我方亦將採取有效步驟以求事件之圓滿解決。此為我政府對暹國所採取之途徑。……”

在“糾紛略述”一段，對事件是這樣描述的：自日本投降，全世界和平實現，我國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後，居留於暹國境內經營業之我僑眾，聞得勝利之佳音後，莫不歡躍欲狂。在此期間，詎料繁榮之市中心區，即耀華力路、石龍軍路，突於九月廿一日及廿二日以發生槍擊之事件聞矣。由於該兩日事件產生之結果，使我僑商蒙受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同時該二路區遂為暹軍警宣佈戒嚴，人心惶惶。迨二日後，同類之事件，反而接二連三繼續發生。明言之，九月廿五日晚，新城門、三界等處所發生之不幸事件，尤為重大。我僑商死傷以及財產損失，更形重大化。

基於此類事件之不斷發生，已經震動國際視聽，外人之通訊社或有所報導，甚至重慶方面之中暹協會亦曾為此次事件舉行座談會，歸納各會員之意見則不外如下：

（一）暹羅政府雖已改組，但其中仍有少數納粹罪犯混雜其中。此次軍警槍殺華僑舉動，此事擴大而未能作有效之制止，就是一明顯例證，故應將過去之罪犯一一逮捕。

（二）……。

綜上所述，即使在當日，無論是泰國政府以及各方輿論，都沒有把事件發生的過錯，不加分析地加在華僑身上的。

七．糾紛之遠近因之分析

那麼，事件發生的真正背景是什麼呢？

曼谷《真話報》的〈曼谷通訊〉對此事件發生的原因作了如下分析：

“查此次事件之發生，其遠因固由於過去鑒披汶厲行排華政策，激成華僑憤恨復讐之觀念，同時亦因其推行‘唯國主義’，養成一般泰人狂妄自大之態度與排華思想。此等因素，本即易於引起中泰糾紛之發生。而最近又因盟軍雖已解除駐泰日軍之武裝，但對於戰爭罪犯之懲辦則尚未著手，使漢奸秦奸不僅得以逍遙法外，並可乘機大肆挑撥中泰兩族糾紛，更因泰新政府成立伊始，未能迅速消除中泰兩族過去隔閡，以及採取適當步驟以防患於未然。因此，在漢奸秦奸合力挑撥之下，耀華力路之慘痛事件遂告發生，且日趨擴大。”【10】

謝光先生寫道：“8月14日剛傳出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在曼谷耀華力路的天不天地區發生了泰軍警和華僑的糾紛事件。泰國反日大同盟及時發出《敬告華僑及軍警書》，籲請華僑和泰軍警顧念兩族人民悠久的歷史友誼和親善團結的長遠利益，防止不幸事件重演。但是戰時曾與日寇合作者唯恐天下不亂，為了逃避將受到懲處內命運，乃與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勾結，利用華僑因受當局前此實行排華政策的迫害而心存不滿的情緒，極力挑唆和製造華泰人民糾紛，以轉移視線，混水摸魚，以致1945年9月20日晚，在曼谷耀華力路復發生了大規模械鬥的事件，21日事態更形擴大，史稱耀華力路事件，也稱9·21事件。泰國反日大同盟隨即在9月23日和29日兩次發表……宣言，籲請中泰人民珍重過去之友誼，勿中挑撥離間者之奸計，並主張建立中泰聯合調查團，秉公處理糾紛事件。但一些漢奸、特務等反動勢力卻要擴大事端，慫恿、威脅華僑罷市。……於9月22日和23日……會議，討論如何解決爭端問題。……邱及在會上發言，力主以中泰人民友好團結為和平解決事端的方針，揭露並譴責那些陰謀製造事端擴大糾紛的策劃者。……當局並於26日宣告成立審查中泰糾紛委員會（即中泰混合調查團，泰方6席，華僑5席，同時發出宣言，籲請中泰人民親善。”【11】

謝光對事件發生的雙方作了科學的分析，幫助我們更全面了解事件發生的真相。

八、泰文報的反應

1951年，耀華力路事件過後快六年時，曼谷中原報刊登了一篇議論耀華力路事件的譯文，原文載沙炎叻週刊。其中這樣寫道：

“究竟那一回事的內幕怎樣？根據事後加以詳細調查所得，筆者終於獲悉，那一回事變的真正導因倒是內在的政治力量，實非導因於一般得意忘形的所謂強國人民——華僑方面。政治的事變導因卻是出諸政見相左，互相傾軋的政客之流。

“因為戰爭宣告結束後，泰國內一派政客，亟須將把已有的勢力廣佈到全國各地，而欲達到此目的，這一派政客所採用的手段，無疑是採取泰國一般政客慣用的

而且是極平常的手段，那就是假手前來泰國華僑從中破壞對方，使對方的勢力完全瓦解。那時候盡人皆知，一般華僑正在狂歡鼓舞從事戰爭獲得最後勝利的情緒下，更為得意忘形於擠身五強之一的無上榮譽氣氛中，實不難以慫恿若輩華僑，對政府當局引起惡感，既能暴露出政府當局無能為力，看到局勢的弱點。當時的政府自然會因此失去民心，從而感覺到很難執行政府的任務而引咎辭職。因此，耀華力路糾紛事件，便由第三者暗中策劃慫恿，先行發出“群拍”槍聲，釀成事由。幸得當時的政府當局，深知國家及政府本身的地位，殊不適宜於斷然對付所謂強國的人民，遂極力壓制事件，不予擴大變成流血的慘劇。除開實行武裝監視及放任居間慫恿者揚武耀威權勢膨脹到最高潮，而自自然然趨於降落，以致於自行停息。所云糾紛事件，遂在如此這般情形之下，嘎然平息於廿四小時之內。”文章還說：“蓋那時受騙燃放爆竹的華僑，是由曾經實行與中國人民聯盟的一部份人士居間欺騙他們幹出來的。而且所釀成的事件，反而破壞了大多數華僑的利益。”【12】

沙炎叻週刊指出，泰方某些反動勢力渾水摸魚、製造事端的黑暗面，是吾國同胞聞所未聞的。

九、我的看法

耀華力路事件是中泰關係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對於這麼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要有正確的結論，才能以史為鑒，才能教育後人。

過去的一個世紀，由於大氣候的緣故，歷史上不少事件，其是非曲直，一直未得到正確的結論。歷史上出現的許多錯誤和垃圾都沒有及時加以清理，而往往是胡亂塞藏在地毯底下，留給後人的是一團迷霧。因此根本不可能做到“以史為鑒，教育後人”。

那麼，耀華力路事件應該如何定性呢？綜合上述的，從各個不同角度得到的資料，我同意《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的說法：

“1944年8月，暹羅親日的鑾披汶·頌堪政府倒台，成立民主派掌權的新政府。新政府雖然更換總理，但大泰族主義，親日排華分子仍不少，尤其在軍警的高級軍官中。華僑社團中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鬥爭激烈，反動勢力利用大漢族主義極右思潮，煽動一些僑胞，配合暹羅當局中的殘餘極右勢力，挑起中泰糾紛，製造流血事件。”

耀華力路事件是當日暹羅和中國某些野心家和政治痞子幹的不可告人的勾當，他們唯恐天下不亂，蓄意破壞在戰爭中受到考驗，本已經相當脆弱的泰中關係。事件過後，他們又不加分析地把促發事件的罪名加到華僑頭上。

我們的父祖輩背負此罪名已經一個甲子，現在到了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為他們平反的時候了。

註釋

- 【1】見李鐵鋒《敵掃一把》，劉純南《僑社風雲集》
- 【2】吳繼岳〈從中原報到新中原報〉，新中原報報慶特刊，1933—1988年
- 【3】周南京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歷史卷，頁279。辭條執筆人盛威中，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 【4】見1945年8月15日中原報
- 【5】謝光〈泰國反日大同盟的組織和活動〉，載《湄江風雲》，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32，附件四〈震動泰國之耀華力路事件發生前後〉。
- 【6】蒙鑾汪維帕。不律叻達納攀〈從英國情報看大東亞戰爭末期暹羅華人社區〉，法政大學泰學研究簡報，1997年8—10月號
- 【7】同【5】
- 【8】潘子明〈民族聖戰八年〉，見《鐵血雄鷹一抬高華僑抗日實錄》，頁8—9，泰國黃埔校友會，1991年
- 【9】見1945年10月1日中原報
- 【10】同【5】
- 【11】謝光〈泰國反日大同盟的組織和活動〉，載《湄江風雲》，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24
- 【12】見中原報1951年6月13日《耀華力事件經過及內幕》，原載泰文沙炎叻週刊

僑批局與潮汕僑匯

表 丁

由于近代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几乎一直处于入超。因此，作为近代中国外汇的最主要来源之一的华侨汇款对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甚大。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统计，从1931年至1935年间，中国内地接收的华侨汇款收入相当于全国外贸逆差额的38~96%；而在1936~1940年间，华侨汇款更是年年超过中国的外贸逆差。其最高峰出现在1940年，是年侨汇收入相当于全国外贸逆差的2329%，可见华侨汇款是当时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外汇收入。【1】

以华侨汇款的汇入地角度分析，近代华侨汇款总额中约80%是以广东省为最终汇入地。因此，广东一省的华侨汇款收入不仅对广东省而且对当时全中国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见表1）。

表 1 1931—1940年侨汇统计 （单位：法币千元）

年 份	全国侨汇额	广东省侨汇额	广东占全国侨汇的比例
1931	434,680	345,200	79.4%
1932	334,628	271,700	81.2%
1933	314,226	253,800	80.8%
1934	338,313	185,000	77.6%
1935	332,489	268,000	80.6%
1936	344,386	272,000	79.0%
1937	473,502	382,500	80.8%
1938	644,074	510,000	79.2%
1939	1,270,173	1,020,000	80.3%
1940	1,328,610	1,020,000	76.7%
年平均	517,508	452,820	79.2%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省政府侨务处与侨委会档案，全宗号28，目录号1。

若从侨汇的来源、民间侨汇业的运作方式和侨汇在当地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来观察，广东一境可以分成两类不尽相同的侨汇区域，即广府地区和汕梅琼地区，后者是私营侨批局集中的区域。【2】

因广东人口移居海外的历史十分久远，在移民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移出地的潮汕、梅州、海南、广府地区，还是移入地的东南亚及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等，粤籍移民都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的逐步扩散的过程，因此形成了分布极为广泛的国内侨乡区域和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地。而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近代海内外官方和私营侨汇机构的空间分布与其经营业绩密切相关。在华侨汇款集中的区域，公私经营机构云集，彼此竞争激烈，侨汇汇入数量巨大；而华侨汇款较少的地区，相关经营机构稀少甚至根本阙如。

在1936年12月4日汕头市邮政局给广东省邮政管理局的呈文中，提供了一个关于潮汕华侨汇款的统计，揭示了东南亚侨汇的地域化色彩。

据当时汕头市邮政局估计，每年汇入汕头市的华侨汇款中，大约法币40,000,000元是由侨批局（批信局）经手的。换句话说，私营性质的侨批局所经营的当地华侨汇款占侨汇总额的80%以上。因此汕头邮政局要求公营的邮政部门尽快介入侨汇经营，以取得相应利润。根据汕头市邮政局的调查，当时潮汕侨汇主要来自东南亚各国，分4个区域：

表2 1935年汕头市侨汇统计（单位：法币元）

汇 款 来 源 地	侨汇数量	备 注
英属马来亚	12,000,000 元/年	数年前最高达到 20,000,000 元/年
暹罗（泰国）	25,000,000 元/年	数年前最高达到 35,000,000 元/年
法属印度支那	3,000,000 元/年	
荷属东印度（印尼）	1,000,000 元/年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29，目录号2，卷655。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私营侨批局经营侨汇，其批信和回批都要经过邮局转送，所以汕头市邮政局能提供有关数字如下：

表3 1935年汕头市批信和回批统计

地 区	批 信	回 批
英属马来亚	634,996	621,257
暹罗	769,820	773,510
法属印度支那	106,623	88,914
荷属东印度	21,043	20,838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29，目录号2，卷655。

表4 汕头市1936年1-11月批信和回批统计

地 区	批 信	回 批
英属马来亚	721,933	689,091
暹罗	825,060	850,722
法属印度支那	143,343	117,277
荷属东印度	28,104	38,253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29，目录号2，卷655。

从汇款金额来看，当时每笔华侨汇款在法币1元至1000元之间不等，但大多数为10元以下的小额汇款，大额侨汇是十分稀少的。可知当时汕头接收的东南亚华侨汇款主要是海外潮人的赡家性汇款，参见下表：

表5 不同汇款额所占比例 （单位：法币元）

汇 款 金 额	占全部侨汇的比例
1~5 元	40%
5~10 元	30%
10~50 元	15%
50~100 元	8%
100~500 元	5%
500 元以上	2%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厅档案，全宗号29，目录号2，卷655。

值得注意的是，据当时的汕头邮政局调查，汇往汕头的来自东南亚的华侨汇款

虽同为潮人私营侨批局经营，但汇款方式却各不相同。在英属新马一带，多是由侨批局为汇款人代垫资金，待回批到达后方向汇款人索取款项。换句话说，是借贷方式的汇款；而在荷属印度尼西亚则大部分为现金交易，先付款后发寄，与普通邮政或银行汇款并没有区别。同样是侨批局经营的东南亚侨汇，在现金流方面有如此大的区别十分耐人寻味：因其对于侨批局的资金流动方式和运营方式产生极大影响，而且不同的经营手法对于侨批局的信誉和长期经营有很大作用。

表6 汕头市侨汇的汇款方式

地区	使用现金比例	贷款比例
英属马来亚	30%	70%
暹罗	40%	60%
法属印度支那	60%	40%
荷属东印度	90%	10%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厅档案，全宗号29，目录号2，卷655。

另外，我们注意到，当时在东南亚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侨批局较多地采用为华侨汇款客户预先垫付方式汇款，例如新马、暹罗一带；而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则大多数都用普通的先付款后汇寄的办法。

明清以降，中国专制王朝对于国人出洋定居采取严禁政策，对于侨汇这种来自海外华人的资金即便不予禁止，也未曾加以利用或管理。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在1918年及1921年下令取缔包括侨批局在内的经营国内外邮政的私营民信局，【3】以收回国家的邮政权，但却毫无效果。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华侨汇款的重要性，开始逐渐将其纳入政府管制。近代中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华侨汇款的官方机构是各地的邮政局所和公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广东省、福建省银行等。

1928年，国民政府在全国召开全国交通会议，决定大力发展中国的公营邮政事业，“所有各处民信局，应于民国十九年内一律取消”，理由是“邮政为国家专营事业，久为东西各国之通例。”【4】但是，对于侨批局，因为其经营的特殊性：一方面影响到中国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侨批局多半设有国外联号或分号，国民政府不可能将其全部取缔，因此不得不做出让步。

为寻求解决之道，国民政府邮政当局从1929年开始，对沿海地区的侨批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以下便是几份典型调查：

表7 汕头侨批局调查表一 (1931年6月8日)

(一) 民局名称	荣成庄		
(二) 何日开设	民国十六年		
(三) 设在何处	汕头镇邦街		
(四) 业主姓名及籍贯	黄可植梅县		
(五) 支局若干及设在何处	梅县 大埔 松口 内市 雁洋 新铺墟 兴宁 畚坑		
(六) 代办人姓名	各该代办人系在何处	用何信局名义	
古玉波	梅县	德记	
张德兴	大埔	荣成	
丘淦屏	松口	严字	
叶文根	内市	义字	
叶君亮	雁洋	裕成	
陈祝三	新铺	鹏记	
叶少田	兴宁	协成	
罗英	畚坑	荣记	
(七) 收寄信件	(子) 在何日期	拜二 拜三 拜五	
	(丑) 至何地方	吧城 暹罗 星洲	
	(寅) 按何项资例收费	一 预付若干	无
		二 投递时应付若干	无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厅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373。

表8 汕头侨批局调查表二 (1931年6月5日)

(一) 民局名称	美丰号		
(二) 何日开设	民国十八年		
(三) 设在何处	汕头镇邦路六号		
(四) 业主姓名及籍贯	黄业顺 潮阳人		
(五) 支局若干及设在何处	无		
(六) 代办人姓名	无		
各代办人家在何处	无		
用何信局名称	无		
(七) 收寄信件 (子) 在何日期	由口实力船寄无定期		
(丑) 至何地方	口实力 怡保		
(寅) 按何项资例收费	(一) 预付若干		回批无收费
	(二) 投递时应付若干		回批无收费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厅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373。

表9 汕头侨批局调查表三 (1931年6月19日)

(一) 民局名称	吕盛庄
(二) 何日开设	民国十三年
(三) 设在何处	汕头永泰街
(四) 业主姓名及籍贯	陈连合 潮阳
(五) 支局若干及设在何处	安南 东兴 怡昌 泰昌 天德 裕记 广德发 日里 吕兴
(六) 代办人姓名	陈石泉 连茂兴 刘喜合 启峰 陈宏兴 丘发利 协成
各代办人家在何处	潮阳 潮阳 潮阳 揭阳 普宁 潮安 饶平
用何信局名称	兴记 泰? 喜合 启峰 宏兴 发利 协成
(七) 收寄信件(子)在何日期	逢安南日里船期即寄
(八) 至何地	安南 日里
方	
(寅) 按何项资例收费 (一) 预付若干	无
(二) 投送时应付若干	无

资料来源: 广东省档案馆藏, 广东省邮政厅档案, 全宗号 29, 目录号 2, 卷号 373。

在对侨批局各个企业调查的同时, 国民政府的邮政部门还就各民信局及侨批局调查的结果做了分区域的总结, 以寻求对策。例如对于海南(琼州)的总结表列如下:

表10 琼州民信局详情表(1929)

否任民信局司理人为邮政办	不能。因民信局乃专为汇兑而设, 并非靠收寄信件也
获走私若干	参看广东邮务长呈文第 420/23255 号附件第三号包括在内
局办事有何项为邮局所不者	凡代客汇款, 俱送到该客家中, 且手续简单快捷, 此为邮局不逮。至于汇款之信件向不收费, 如系熟客, 虽非汇款之信, 亦不收费, 盖此等民局系专为汇兑而设, 并非靠收寄信件为生, 与广州民信局迥然不同也
有汇单若干	无有一定, 或数百元或数千元不等
信封载信若干	无有一定, 或十件或二、三十件不等
民局营业情形	近因时局影响, 生意不佳, 然多数均系兼营别项生意, 不专靠汇款寄递谋生
信局裁撤后有何难题及应办法	裁撤后各华侨必感汇兑不便而发生反感, 因各华侨家属多系住在穷乡僻壤, 不但汇兑不通, 即寄递信件亦难达到也。至于应付方法, 因各穷乡僻壤现时不能通设邮局开办汇兑, 尚难有适当应付方法也

资料来源: 广东省档案馆藏, 广东省邮政厅档案, 全宗号 29, 目录号 2, 卷号 486。

经过调查,邮政当局清楚地认识到私营侨批局办理华侨汇款的特点及不可替代性:首先,侨批局是中国与海外各国间的一种金融和商贸机构,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同时存在;其次,海外华侨华人及其汇往家乡赡养家眷的款项为侨批局提供了生存空间;第三,批信局有效地建立了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密切联系的网络,因此,取缔侨批局必然遭到海外华侨的极大反弹。【5】与此同时,邮政当局还发现,侨批局的经营网络虽然遍布中国和东南亚之间,但实际上彼此各自为政互相竞争,各侨批局业主只关心自身的利益,而将“救济侨胞”作为向大众传媒和政府宣传自身存在的最常用理据。因为当时定居东南亚的华侨逾300万,汕头、厦门等地每年还有约30万人移民东南亚,每年仅从荷属印尼汇往闽粤的侨汇达2千万法币,从英属殖民地、菲律宾汇往厦门的侨汇额每年达4千万法币,汇往汕头的侨汇款数也超过4千万法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通过侨批局汇寄。【6】故无论如何,侨批局问题牵动着东南亚华侨利益,会引发海外华侨强烈的反弹,直接影响国家的外汇收益,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其重要性。【7】虽然国民政府已经立法取消所有的私营民信局,但侨批局却不能骤然加以取缔,这不仅因为侨批局负有侨汇输入的作用,而且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没有可替代侨批局的公营机构。一旦取缔侨批局,侨汇就无法正常汇回内地,而给政府和侨民、侨眷带来很大困扰甚至是严重对立。【8】

实际上,正是由于邮政部门正确认识到当时私营侨批业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因为经济和政局关系,虽然在1928年和1934年两度强令取缔一直处于侨汇经营主导地位的民间侨批业,以便由政府公营行局垄断侨汇业务,避免外汇的大量流失。但是最终都在遭到海内外侨汇业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对下被迫让步,同意私营侨批局继续经营侨汇。

直至1940年代,公营侨汇业的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仍然十分突出。尤其是公营行局各自分行在汇出地与汇入地上的不平衡(有的偏重于国内,有的偏重于海外),而且乡村几乎全无营业网点,限制了公营侨汇业的发展。据统计,1940年代潮汕地区不通邮的村镇约占全部村镇的91.6%,兴梅地区这一比例则为83.6%。(见下表)因此使得国家行局无论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广东省银行,还是广东省邮政储金汇业局都无力解付80%以上的潮梅地区侨汇。

表 12 1940 年代潮汕地区通邮情况

县份	通邮村镇数	不通邮村镇数	不通邮村镇占村镇总数比例
潮安	79	602	88.4%
潮阳	48	282	85.5%
揭阳	85	161	65.5%
揭西	33	373	91.9%
饶平	22	571	96.3%
普宁	27	130	82.8%
澄海	43	143	76.9%
惠来	7	143	97.9%
合计	344	2595	91.6%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厅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1，卷 275。

相对于公营侨汇业，私营侨汇业的经营历史要比国家行局更为久远，其中主要的经营机构包括侨批局（批信局、民信局）、银号、钱庄、票号和商行等。它们经营侨汇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公营行局远未出世的 1870 年代。由于侨批局长期运营为其带来的信誉和便利，使之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与内地侨乡之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侨汇的汇出地，侨批局深入华侨社区吸收侨汇；在汇入地，侨批局深入穷乡僻壤分发解付，使国内侨眷足不出户便可以收到侨汇和侨信，给海外华侨华人和内地侨眷带来极大的便利。由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广东的海小移民及其侨乡眷属多为文盲或文化水平低下的乡民，其在内地眷属多居住在潮汕地区不通邮、也没有新式金融机构（银行等）的偏僻乡村，使私营侨批局的作用和影响无可替代。

潮汕地区旅居东南亚者，“其数为全省之冠”，“所有侨汇，均由批信局经手，与数甚巨”。【9】在 1937 年经邮政部门登记核发执照的 71 家汕头侨批局中，35 家侨批局拥有 3~5 家分号或联号，有 28 家侨批局拥有超过 10 家的分号或联号，“有信批信局”的分号更达 26 家之多。【10】

表 13 潮汕地区侨批局经营情况 (1936 年)

侨汇经营地	侨 批 局	备注
暹罗 (34 家)	广源、万兴昌、得合兴、钟荣顺、理元、广泰祥、振盛兴、马合丰、悦记、同发利、协成兴、合盛利、炳春、顺成利、万丰发、陈富通、普通、泰成昌、成顺利、启峰棧、义发、黄潮兴、乌源丰、广泉、金生、和合祥、马德发、广汇、挺成、洪万丰、许福成、广顺利、荣丰利、成昌利	
英属殖民地 (22 家)	有信、广泰祥、裕益、普通、光益裕、潮利亨、恒记、福成、永安、利东、联发、理元、森春、洪万丰、同利生、信大、李华利、裕大、长发、广汇、宏信、光益	其中以有信、光益及光益裕为最大
法属印度支那 (9 家)	广源、光益裕、祥盛、吴顺兴、佳兴、玉合、万丰发、利昌、光益	以玉合、祥益及吴顺兴为最大
荷属东印度 (11 家)	恒记、振丰盛、胜发、福兴、志成、联发、光益裕、光盛、有信、启峰棧、广汇	其中以恒记、光益裕为最大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675。

潮汕地区侨批局的付款方式也异常灵活，在汕头本埠及邻近村镇，侨汇现款大多派专人直接按地址送到收款人住处；至于距离较远的内地乡镇，则交给侨批局的代理人（专营侨批业务，代理汕头各侨批局派送汇款及信件、回批等）代为投递，这些代理人另雇专人派送批信，“各批信虽仅有收款人姓名，并无详细地址，但专差均甚熟悉，如遇有不明了者，可询当地乡人或由乡人引导，故不难按址投递”。此类专人代派侨汇的手续费是按惯例计算，长雇者按月计薪，每月为二十元至三十元法币，由店东供应食宿；散工则由内地代理人雇请，每月工薪约十元法币，但每周工作仅二天或三天，属于临时性质：“彼等多属农民，如遇批信到时，即出店领批分派，投妥后即返家理农”。至于侨批局付给内地代理人的手续费，“以汇款金额计算，每千元约五、六元左右。”【11】可见侨批局对办理侨汇业务和投递汇款和侨信非常熟悉，业已形成一套规范和系统的处理办法。

抗战时期，汕头虽然沦陷，但该地侨批局经营业务影响不大，甚至还出现了更具规模的侨批局。如宏通批信局，有分号及联号 56 个，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粤东东江的大部分地区和国外的英属新加坡、马来亚各地、荷属东印度、暹罗、婆罗洲、美属菲律宾等地；另外，万丰发批信局拥有 37 家分号及联号，广泛分布在海内外。【12】1943 年，原在汕头的部分侨批局内迁至国统区的梅县、饶平、惠来、大埔等地，但尚有 60 多家继续留在汕头当地，其分号仍达 658 家之多。【13】

表 14 1942 年汕头侨批局分号或联号规模

分号或联号数	0-5	6-10	11-15	16-20	20-25	26-30	31 以上	合计
批信局数日	15	39	22	6	2	0	2	86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369。

广东各地侨批局规模的扩张，其原因与海外侨汇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在三十年代，公营行局对侨汇的控制与竞争加强了，但在侨汇大为增加的情况下，公营局并不可能完全垄断侨汇的经营，作为私营的侨批局仍在积极参与侨汇业务的竞争。它在整个侨汇业经营中仍是最为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机构。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五规划课题之一)

释：

【】广东省档案馆藏，省政府侨务处与侨委会档案，全宗号 28，目录号 1，侨务委员会编《侨务统计》，1942 年。

!】本文叙述时期的海南岛尚属广东省管辖。

5】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674。

1】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485。

5】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485。

5】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485。

7】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485。

3】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485。

9】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675。

10】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378。

11】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378。

12】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369。

13】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号 369。

郑和船队有可能发现美洲吗？

李金明

内 容 提 要

本文先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谈起，认为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贡献。倘若仅是偶然从太平洋或大西洋漂流过去的人，则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荷兰人早在17世纪初就发现了澳大利亚，但人们不承认它，反而承认迟130年到达的英国航海家库克，这就是典型的例子。它说明真正的发现必须要有反馈的能力，否则只是空谈而已。郑和船队尽管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但他们没有因此在海外建立一个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地方声称拥有主权以夸耀其发现。这是由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儒家文化所决定，它与后来西方的海上扩张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今天在大力宣扬郑和船队为和平之师、友好使者的同时，如果再跟着大谈郑和船队最早发现美洲，乃至发现世界，以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那就将给自己制造矛盾，重蹈欧洲中心论的覆辙。

孟席斯提出新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几幅15和16世纪的地图，他惊讶地发现，巴塔哥尼亚和安第斯山脉早在第一批欧洲人看见它们前一世纪就已被绘在地图上；南极洲在欧洲人到达新大陆前四世纪就已被准确地绘出来；非洲东海岸被绘在另一张海图上，带有相当精确的经度，而在其后的三世纪欧洲人还不懂得计算经度等等。他认为当时唯一能完成这些地图绘制的国家是中国，于是就做出了郑和船队发现美洲，乃至作环球航行的遐想。

孟席斯做这些遐想主要缺乏的是史料依据和水下考古发现的郑和沉船残骸，因此他以强调证据已被销毁来回避要害，以1421郑和某些分船队失踪为线索进行遐想。然而，由于主观臆测的成份过大，孟席斯的遐想始终是难以令人信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孟席斯利用自己丰富的航海知识，向全球学者介绍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辉煌成就，使郑和研究重新掀起一个高潮，这些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两年前，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向世人宣布其经过14年艰辛研究得出的结论，即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70年发现美洲，早于麦哲伦一

15世纪作环球航行。该结论宣布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郑和船队是否有可能发现美洲遂成为讨论的热点。

一、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谈起

每当人们谈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总喜欢探索其远航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史研究所萨那教授在1990年智利圣地亚哥“第二届500周年正式委员会国际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道:“促使哥伦布远航的动机之一是中华文化的影响。”^[1]萨那教授的说法没有错,确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15世纪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不了解,构成了哥伦布决定西航前往中国的动力之一。然而,哥伦布的远航并不是孤立与偶然的,它是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如罗荣渠教授所言:“首先,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被遗忘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学说的恢复,意味着实验精神的觉醒;其次,哥伦布以前葡萄牙及其他西欧航海探险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努力,不断也重新塑造着西方人的地球观和扩大了对海洋世界的征服;再次,是欧洲航海技术与制图学等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所有这一切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准备了条件,而哥伦布却正是这个转折历史时代的幸运儿。”^[2]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另一个动因,是寻找东亚的市场和黄金,因当时贵金属货币短缺日益严重,引起非洲—欧亚世界市场黄金价格的上涨,故使这种冒险极具诱惑力,而且还有利可图。^[3]哥伦布虽然没有到达印度,但是他发现了至关重要的贵金属。据经济史权威估计,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40%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银生产在16世纪约为17000吨,到17世纪约为42000吨,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又将40%约12000吨运往亚洲,其中有4000至5000吨是直接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的。另外有6000吨运往波罗的海地区和利凡特地区,其中一部分留在当地,其余部分继续向东到达亚洲。^[4]如果不是美洲贡献出如此大量的金银与物质财富,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缓慢得多,英国也不可能成为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哥伦布的远航不仅根本改变了东西两半球相对隔绝发展的格局,而且由此引发的商业革命,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把原先半封闭的地区性经济联系起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东西两半球的汇合与全球一体化的新进程,从而使世界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格局。^[5]

上述说明,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贡献。如果仅是偶然从太平洋或大西洋漂流过去的人,则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就以谁最先发现美洲来说,当然是最早拓殖那里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才是从相反方向进入美洲的北欧人和爱尔兰人,而哥伦布只能算是最后的发现者。但是,在这些发现者中,唯有哥伦布的“再发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故人们始终记住的

是哥伦布对美洲的新发现。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澳大利亚的例子，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是 1770 年由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发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 1606 年，荷兰探险者就发现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 1623 年，卡坦斯（Cartensz）发现过该大陆上被雪覆盖的山峰，该大陆至 1909 年始标示在正式的地图上，当时这项工作是由洛伦茨（Lorentz）和范诺希斯（Van Nonhys）完成的。在 1642、1643、和 1644 年，埃布尔·塔斯曼（Abel Tasman）探测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海岸线和塔斯马尼亚岛，他把塔斯马尼亚岛命名为范迪门斯兰（Van Diemensland），以纪念将此探测任务交给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直至近代，在英国居民的要求下，这个旧名字才被改掉）。但是，塔斯曼当时没有发现把新西兰南北分开的海峡，这项工作大约到 130 年后才由库克完成。在 1617、1618、1622、1629、1696 和 1705 年，有多艘属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达过澳大利亚海岸的许多地方，时至今日那里还留下许多命名以纪念这些勇敢的荷兰探险者的工作。然而，从范皮门（Van Piemen）总督开始（他死于 1645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官员们就对这些探险者发现的地方感到失望。在 1721 和 1722 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曾组织过一次澳大利亚的远航，作为其环球航行的一部分，而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却无产生过任何激情。于是，不久之后英国人占领该地区时，“新荷兰”大体上仅留下一个空名而已。^[6]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荷兰探险者的最早发现没有产生过太大的经济效益，且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忽视，而库克于 1770 年对澳大利亚“再发现”后，即宣布为英殖民地，接着英政府开始向澳大利亚移民，故人们都忽视了荷兰的最早发现，反而承认是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发现”的理解，究竟什么行动算为“发现”，“发现”的真正含意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对“发现”做过这样的论述：“一个民族若要去遥远之地充实自己的财富和知识，受到启迪，必须具有返回故土的能力。后代把返回故土叫做‘反馈’。对发现者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出海，为什么敲开海洋标志着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在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探险事业中，没有反馈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享受并得益于前人的反馈，是人类的主要能力。海上冒险行动，甚至是它们的单程成功，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在历史上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到达目的地还不够，要使世界上各族人民相互得益，必须有返回的能力，回到启航的地方向乡亲们传播航海者在异国发现的物品和知识。公元 4 世纪在迦太基铸造的钱币，曾在亚述尔群岛发现，古罗马的钱币似乎是由漂洋过海而为大风驱走的船只带到委内瑞拉的。来自挪威和冰岛的北欧海盗，在中世纪似乎不时接触到北美。1291 年，维瓦尔第兄弟从热那亚出发，环航非洲，但音讯全无。也有可能，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里，中国或日本的帆船在海上速航而一直漂流到美洲沿海。然而这些行动或事件没有产生反馈，只是空谈而已。”^[7] 这段有关“发现”的精辟论述，对我们今天讨论郑和船队有否可能

见美洲，甚至于发现世界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郑和船队在1405—1433年曾七下西洋，从第一次航行的1405年计算，的确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而郑和统领的下西洋官兵多达27000余人，宝船近百艘，在当时来说，完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船队。但是，如果与后来西方的海上长做比较，郑和船队无疑是典型的和平之师、友好使者，因为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个殖民地，甚至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以夸耀他们的“发现”。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国力，但是郑和船队没有因此而凌弱小国，霸占别国的土地。这些说明，中国人没有掠夺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国家的土地开拓为殖民地的习惯。养成这种习惯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原因，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以庞大的耕地和广阔的内河航运网支持，更多的是自给自足，不需要海外的市场和原材料。二是文化原因，儒家学倡导中国人要以“王道”服人，而不是以“霸道”。这种文化与其他游牧部落或重民族的文化正成显明对比，游牧部落当一个地方的食物和水草资源枯竭时，则要移动到新的地方以寻找绿洲，他们甚至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与其他游牧部落发生冲突。重商经济，即依赖于制造和贸易经济，被迫要寻找新市场和外部的资源供应，一些岛国或资源缺乏的国家，如英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压力显得更大，这就是什么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会如此狂热地寻求殖民地，以扩大自己的国力和建立尽可能多的海外市场。日本由于其火山群岛的潜在威胁，使问题更加复杂，为此它寻求东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观中国在近代之前，强大的国力至少也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从无滥用其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过扩张的记录。美国学者詹姆斯·赫西昂(James C. Hsiung)谈到上述情况时，无不赞叹地说：“由于缺乏一种更好的词汇，只能称之为真善美。”^[8]从这点说来，我们在讨论郑和船队是否有可能发现美洲的题时，就必须引起注意，一方面大力宣扬郑和船队为和平之师，友好使者，从无海外建立一个殖民地，从无对到达的地方声称拥有主权以显耀其“发现”；另一方面又跟着大谈郑和船队最早发现美洲，乃至发现世界，以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实这是在给自己制造矛盾，弄不好又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新产物，恰如李慎之先所说：“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9]

二、加文·孟席斯的遐想

加文·孟席斯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退役军官，他对郑和下西洋感兴趣，据说因为看到一张1424年的朱阿尼·皮齐加诺(Zuane Pizzigano)海图，图上绘有欧洲和非洲部分，与现代的地图相比，这些欧洲海岸线绘得相当准确。除此之外，制者还在大西洋西海岸外绘了四个群岛，分别命名为萨塔纳泽斯(Satanazes)、安蒂亚(Andilia)、沙亚(Saya)和伊马纳(Ymana)。这些岛经明尼苏达州大学James Ford

Bell 图书馆馆长卡罗尔·厄内斯 (Carol Urness) 确认, 其中的萨塔纳泽斯和安蒂里亚岛分别为瓜德罗普岛和波多黎各岛。因此, 孟席斯则认为, 这位制图者在 1424 年曾到过加勒比海。而这些加勒比海群岛绝非是葡萄牙人所发现, 因为在皮齐加诺海图绘制时葡萄牙人完全不知道这些群岛。他们看到的可能是另一张稍后的地图, 这张海图在 1428 年落到葡萄牙人手里。孟席斯同时又发现, 葡萄牙王子亨利在 1431 年命令其船队去寻找在 1428 年海图上看到的安蒂里亚群岛, 假如葡萄牙人早已发现过这些群岛, 那为什么亨利还要下达这个命令呢? 于是, 孟席斯就产生了疑问: 如果葡萄牙人没有发现和探索过安蒂里亚和萨塔纳泽斯群岛, 那么地球上谁做过呢? 有谁给皮齐加诺和其他制图者提供过他们的信息呢?

孟席斯带着这些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他又惊讶地发现, 巴塔哥尼亚和安第斯山脉早在第一批欧洲人看见它们前一世纪就已被绘在地图上, 南极洲在欧洲人到达新大陆之前四世纪就已被准确地绘出来; 非洲东海岸被绘在另一张海图上, 带有相当精确的经度, 而在其后的三世纪欧洲人还不懂得计算经度; 澳大利亚在库克前三世纪就已出现在另一张地图上, 而其他海图还看到了加勒比海、格陵兰、北极海和南北美洲的太平洋与大西洋海岸, 那是在欧洲人到达的好久之以前。为了把整个世界的地图绘得如此准确, 这些探索者无论是谁, 都必须进行环球航行, 他们必须具有天文航海技术, 必须懂得计算经度的方法, 以准确无误地标在地图上。一张海图能准确地绘上巴塔哥尼亚海岸、安第斯山脉、南极洲大陆和南设得兰群岛, 其覆盖着北从厄瓜多尔南至南极半岛的无边距离, 这一定需要有支庞大的船队。在当时唯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物质资源、科学知识、船队和航海经验去进行如此宏大规模的发现航程,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孟席斯经过了研究证实, 在 15 世纪初确实有几支中国船队做了探索航程, 它们中最后和最大的 4 支船队联合成一支庞大的船队, 在 1421 年初启航, 最后幸存的船只在 1423 年夏天和秋天返回中国。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这些年他们航行到那里, 但是从这些地图上看出, 他们不仅绕过好望角, 而且航行到大西洋, 即在 1424 年皮齐加诺海图上看到的群岛, 他们还继续探索了南极洲和北极、北美洲和南美洲, 并且越过太平洋到澳大利亚。他们已解决了计算经纬度的问题, 且相当准确地地图上绘了陆地和天空。^[10]

基于上述的研究, 孟席斯就把郑和船队的环球航行作了一番遐想:

1421 年, 由下西洋副使杨庆、周满和洪保率领的三支船队, 结伴越过印度洋, 沿非洲西海岸到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 他们顺着赤道洋流航至加勒比海, 在那里船队分开航行。

洪保向西北航行到美洲, 在波多黎各外海遭遇飓风损失了 9 艘船, 他把船上的幸存者安置在古巴和罗得岛。然后绕过格陵兰以探索北极, 他确信再航行 250 海里就可到达北极。到达北极后, 他返航经喀拉海、拉普捷夫海、楚科奇海和白令海峡到中国。

与此同时，周满与杨庆的船队在到达加勒比海后即转向西南航行到南美洲，他在奥里诺科河三角洲着陆，然后向南驶至福克兰群岛。他们在巴塔哥尼亚海岸花6个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的海峡。一进入太平洋，两支船再度分开航行，周满航至洪堡并顺着南赤道洋流沿秘鲁西海岸越过太平洋，经马萨斯群岛、土阿莫土群岛和诺福克岛，然后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北面登陆。在这他建立了一个驻地，而后再一次向南航行到今天的悉尼附近，建了一个驻地后又南航行到坎贝尔岛，在那里他损失了一艘船。返航途中，在新西兰又损失了两艘，在澳大利亚海岸再损失4艘。此次他在布里斯班登陆，船队停泊在金皮港口，那里他们开采锡和金，然后起航向北行，一支分队从大堡礁内侧驶过，另一支分队从外侧驶过，他们比库克船长早250年到达这里。他们在阿纳姆地着陆，把他们马牵上岸开采铝和铀。

在麦哲伦海峡分开后，洪堡率领的船队则转向南航行到南极。他们到达南雷厄地并声称已到达了南极，甚至带着马匹。他们绕过威德尔海的边缘，在卡格伦(Kaguelen)岛登陆，然后继续沿着大西洋海面咆哮的西风带航行到西澳大利亚，班伯里南面着陆。在澳大利亚南部和西部损失了三艘船，他们经印度洋和南中国返航，途中又损失了三艘船。^[11]

孟席斯做这些遐想的主要依据是地图，其中如1459年由意大利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绘制的“平面球体图”。这是中世纪把地球的整个球体投影成为一个面圆形的最后几幅大地图之一，也是第一批现代地图之一，因为它在当时已说明大洋不再是封闭的绝路，而是一条通往印度的海道。^[12]毛罗在地图上的附注中写：“大约在1420年，有一艘海船或来自印度的中国帆船不停地越过印度洋，通过亚布角（好望角）外的男女岛，并航经弗得岛和昏暗群岛，向西和西南方向航行40天，除海天之外无发现任何东西。按他们估计，已航行了2000海里而无遇到运，他们用了70天返航到上述的迪亚布角。”在附注旁边，毛罗绘了一艘中国帆船，船体异常之宽，方船头，像现代的坦克登陆艇，具有郑和帆船的特征，看起来他描绘的欧洲活动房大得多。在印度洋中间写着另一些文字：“航行这些海的海船，中国帆船有4根以上的桅杆，有些桅杆可以被升降，有40—60间供商人住的船舱。”注还描述了船员在迪亚布角补充食物时，发现了巨大的蛋和下蛋的大型鸟。这种型鸟只能是鸵鸟。^[13]

对毛罗平面球体图上绘的好望角和附注中描述的郑和帆船以及鸵鸟等，孟席斯第一反应是：“毛罗如何获得这些信息？”他后来在一份15世纪描述葡萄牙人征几内亚的文件中找到了部分答案，即“毛罗本人提到‘一位可靠的人’说，他从度航经莫桑比克的贝拉到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一个名叫加宾(Garbin)的地方。”是，孟席斯确定这位“可靠的人”非尼科洛·达·康蒂(Nicolo da Conti)莫属，为康蒂在卡里卡特时，有一艘中国帆船停泊在卸货下客，并装载越过印度洋的补

给。在毛罗地图上的附注得到中国帆船航程所涉及的“男女岛”，康蒂曾向罗马教皇的秘书讲述过，且康蒂是和毛罗同时代人，都是威尼斯人，都从事探索工作。因此，孟席斯认为，郑和船队绘制的地图是从康蒂传到毛罗，再从毛罗传到葡萄牙亨利王子，这之间罗马教皇的秘书充当了中介。也就是说，郑和船队在当时先于迪亚士和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到达了非洲的西海岸。^[14]

另一幅是土耳其水师提督皮里·莱斯（Piri Reis）的地图，于1929年在伊斯坦布尔旧皇宫发现，据说是根据1531年从被毁的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所藏的旧图复制的。该图以开罗为中心作球面投影，对非洲与南美洲之间的海岸、经纬度都绘得相当准确，于是有人根据此图推断在哥伦布之前已有人到过南美洲。^[15]孟席斯首先利用皮里·莱斯地图上的说明和在地图上看到的冰雪位置，把南美洲的南端确定在南纬 55° 左右，也就是浮冰的北部界限；然后确立火地岛的纬度，以便对皮里·莱斯地图的南部作仔细检查，并将之与现代地图作比较。由此他发现，原先的绘图者已相当准确地绘出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海岸线的显著特征，如岬、湾、河、港湾和港口，从北部的卡沃布兰科到南部的麦哲伦海峡入口都相当符合。皮里·莱斯的绘图者还在陆地上绘了大量的动物。因此，孟席斯认为，哥伦布不可能是原先的绘图者，因为他从未到过赤道以南，他对这个地区的认识只能来自于他复制的1428年海图上的说明，即南大西洋群岛每天22小时处于黑暗之中；而第一位欧洲人麦哲伦在皮里·莱斯地图绘出后几年才航行到巴塔哥尼亚。这样说来，是谁最先提供信息，使皮里·莱斯地图绘上巴塔哥尼亚呢？这个人是如何获得信息呢？^[16]

孟席斯的看法是，皮里·莱斯地图无论对自然特征的描述，或者对南美洲独有动物的描绘都是如此精确，以致于它只能是绘制巴塔哥尼亚航线的海图。因此，孟席斯确信绘在西边的山脉是安第斯山脉。这些山脉在太平洋海岸向北延伸，从大西洋是看不见的，它们距离东海岸有数百里，原先的绘图者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或太平洋之前很久一定航行过太平洋海岸，他搭乘的船队只能通过麦哲伦海峡，或者冒着暴风雪和不停的狂风驶过合恩角大洋。同时，孟席斯在了解到巴塔哥尼亚的大小后，则精确地确定了皮里·莱斯地图的规模，并确定了地图上看到的陆地和群岛的纬度，如卡沃布兰科是在南纬 $47^{\circ}20'$ ，于是在地图底部看到的群岛一定是在南纬 $68^{\circ}43'$ ，恰恰是南设得兰群岛的纬度。因此孟席斯认为，原先的绘图者曾经在一艘船上，这艘船在首批欧洲人到达前四个世纪，已发现了南极大陆和南设得兰群岛。然而，要绘出如此大的陆地与海洋地区的地图，从南部的南极延伸数千里到北部的秘鲁安第斯山脉，一定要具有数以千计的熟练勘测员和航海者。为了覆盖如此漫长的距离，绘图者一定要协调，包括使用不同的船队。在欧洲人到达南极之前，唯一可派这样船队出海的国家是中国，且这种似乎有理的机会也只能由在1421—1423年伟大航行中“失踪”两年的郑和宝船队来提供。^[17]

三、郑和船队有可能发现美洲吗？

15 世纪初，中国的确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下西洋也确实称得上世界上最壮观的船队。据李约瑟先生估计：“约西元 1420 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 3800 艘船，其中包括 1350 艘巡船，1350 艘属于卫所或水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力船队的 400 艘大船，以及 400 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 250 艘远洋宝船，每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 1403 年的 450 人增加到 1431 年的 690 人以上，在最大的船上，必然超过 1000 人。另外还有 3000 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令船及警船。”^[18] 以如此雄厚的实力和如此庞大的船队，在今天看来，当时要完发现美洲，甚至环球航行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事实如何呢？郑和船队有可能发现美洲吗？我们且看看《明实录》中有关郑和出使海外诸国的记载：

永乐六年（1408）实录记载：“太监郑和等赏敕使古里、满刺加、苏门答刺、阿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诸国。”^[19] 在所列的 13 国中，属东南亚地区的有 7 国：占城、暹罗、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南巫里和阿鲁；属印度的有 6 国：古里、柯枝、小柯兰、甘巴里、加异勒和拔把丹。

永乐十年（1412）实录记载：“遣太监郑和等赏敕往赐满刺加、爪哇、占城、苏答刺、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比刺、山、孙刺诸国王。”^[20] 在所列的 15 国中，属东南亚地区的有 8 国：占城、爪哇、刺加、苏门答刺、阿鲁、南渤利、彭亨和急兰丹；属印度洋地区的有 4 国：古里、枝、加异勒、溜山；属波斯湾的有忽鲁谟斯；属非洲东岸的有比刺、孙刺。

永乐十四年（1416）实录记载：“古里、爪哇、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溜山、南渤利、不刺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司臣辞还……遣中官郑和等赏敕偕往赐各王。”^[21] 在所列的 19 国中，属东南亚地区有 8 国：占城、爪哇、满刺加、南渤利、门答刺、南巫里、彭亨和旧港；属印度洋地区的有 4 国：古里、柯枝、溜山和锡山；属波斯湾的有忽鲁谟斯；属阿拉伯、非洲东岸的有 6 国：木骨都束、不刺哇、丹、麻林、刺撒、沙里湾泥。

永乐十九年（1421）实录记载：“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巴里十六国使臣还国，复遣太监郑和等赏敕偕往赐诸国。”^[22] 在所列的 16 国中，东南亚地区的有 4 国：苏门答刺、阿鲁、南渤利、满刺加；属印度洋地区的有 6 国：古里、柯枝、甘巴里、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属波斯湾的有忽鲁谟斯；属阿

拉伯、非洲东岸的有5国：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

宣德五年（1430）实录记载：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卜刺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苏门答刺、刺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诸国及旧港宣慰司。^[23]所列的18国中，属东南亚地区的有5国：满刺加、南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旧港；属印度洋地区的有6国：古里、柯枝、甘巴里、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属波斯湾的有忽鲁谟斯；属阿拉伯、非洲东岸的有6国：卜刺哇、木骨都束、刺撒、阿丹、佐法儿、竹步。

上述几则《明实录》中有关郑和出使海外诸国的记载，基本可反映出郑和船队的航程，他们多数是在东南亚海域与印度洋一带活动，最远仅到达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即使有人认为他们“已绕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探索通向大西洋的航路”^[24]，但也很难找到郑和船队越过大西洋“发现”美洲的记载。孟席斯在提出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的遐想时，也一直苦于没有证据，他无奈地说：“虽然我确信我是对的，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中国人到达南美洲的第一手证据。最好的证据是找到一艘满载明初瓷器的宝船沉船残骸，这种沉船在证实中国宝船到过世界其他地方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南美洲海岸寻找这样的沉船可能是项漫长的任务。”^[25]为了回避证据问题，孟席斯只好采取以下两种办法：

一是强调证据已被销毁。他说道：“15世纪中叶，随着外交政策的突然转变，几乎那个时期的每一张中国地图和文件都被朝廷官员故意销毁。”^[26]很明显，他指的是成化年间东驾郎中刘大夏藏匿郑和出使水程一事^[27]。这本来就是历史疑案，严从简讲的是“匿”而不是“毁”，况且《明史》记载大夏藏匿的是“永乐间讨安南故牒”，并非“郑和出使水程”^[28]。即使退一步说，地图和文件都曾被销毁过，但也只能是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不是还留有《明实录》的记载，随行出使的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以及《武备志》中的“航海图”等等，遗憾的是这些均看不到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的记载。

二是抓住某一事件随意进行遐想。他认为，郑和有4支分船队组成一支庞大的船队，于1421年初启航，后来幸存的船在1423年的夏秋返回中国，这些年他们航行到那里没有任何尚存的记载。^[29]于是，他就进行遐想：这支船队1421年6月到达南非海岸外，其中两支分船队在1423年10月返回。在这“失踪”的28个月里，他们去那里呢？按当时的航速每小时4.8海里计算，他们可以航行10万多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4圈。^[30]这种遐想显然是荒谬的，类似郑和如此庞大的船队，在航程中有部分失散或遭难是常有的事，如果把他们都想象成去“探索新航路”或者“环球航行”，那事情就没完没了。就以锦衣卫军士杜子忠等4人来说，他们在永乐中随郑和出使西洋，在锡兰遭海寇袭击，4人被掠，至宣德元年（1426）始附搭苏门答刺的朝贡船返国^[31]；又如府军卫卒赵旺等人随太监洪保下西洋，从西洋开航时船上有300人，以后船遇难漂至卜国仅余100人，只好随其国俗削发为僧，至18年后只

引下赵旺等3人返国^[32]。面对这种事实,难道孟席斯也因此遐想他们在这18年里曾行过多少次的“环球航行”?

类似的遐想在孟席斯的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从皮里·莱斯地图遐想到,中国人一定从西北方向接近南极洲,绕过冰冻的边缘,在南设得兰群岛的西南登陆。地图上非常准确地标了三个群岛:西面的斯诺岛、南面的马蹄形的代塞普雄岛和北面的马上有4座山的利文斯顿岛。在代塞普雄岛附近还有一则注释写道:“这里是热的。”至南极冰封岛上看到这样的注释,开始时很好奇,后来才知道代塞普雄岛是活火山,见在巡游船在泻湖停泊时,也准许游客到本杰明小海湾(Benjamin Cove)的热火山水里洗澡。^[33]正因为孟席斯书中主观臆测的成份过大,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巴雷特(Tim Barrett)教授评论说:“这是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建立另一个假设的问题,最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假设之塔。即使一些关于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美洲的地图证据得以证实,把它和中国联系起来仍是另外的步骤。”^[34]而大英图书馆地图部的负责人彼得·巴博则认为,孟席斯的说法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为他的言论未经仔细的审查核实,缺乏学术的严谨性,竟然试图改写历史。他说道:“这些理论不一定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无关大碍,它们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们被彻底地愚弄了。我见过一些严谨的学者,他们对孟席斯的说法都表示怀疑,而且懒得争论,在他们看来,为此而争辩是着实的耻辱。”^[35]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孟席斯利用其丰富的航海知识,潜心于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研究并予以充分肯定,这是值得赞扬的。孟席斯说过,对如此多世纪前中国航海家的高深技术我惊叹得唯有摇头。中国天文学家测定华盖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类认识地球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他们懂得地球的圆周,则可计算南极的正确方位。通过观察南十字星座正确方位与他们罗盘正确方位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确定南磁极的方位,从而对他们的罗盘作必要的校正。《武备志》证实这确实是中国航海家的一种做法,而葡萄牙人到50年后才采用这种计算纬度的方法。^[36]此外,孟席斯对中国古代精确的绘图技术也赞叹不已,他从1502年的康迪诺(Cantino)地图看到,东非海岸描绘得如此精确,看起来似乎是借助卫星航海绘就的。在欧洲人发明钟表前200年和在欧洲人懂得如何区分南极与磁极前400年,除了中国人外,还有谁能绘出这种令人震惊的海图?有谁可能绘出早先未知的葡萄牙人的航程?当时的葡萄牙人还没有掌握准确计算经度的方法,在1541年,康迪诺地图绘就后39年,一位葡萄牙人企图以测量日蚀来确定墨西哥城的经度,结果向西偏离了近1500海里;而康迪诺地图上数千海里海岸线的经度误差仅在30海里之内。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葡萄牙人使用的是日蚀,而中国人使用的是月蚀,且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船只用三角测定经度。^[37]孟席斯这些研究不仅肯定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辉煌成就,而且证明了中国人民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曾做过重大的贡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孟席斯先生执着而又不懈的努力。

综上所述,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贡献,如果仅是偶然从太平洋或大西洋漂流过去的人,则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这从澳大利亚的例子即可看出来,尽管荷兰人早在17世纪初就已发现了澳大利亚,且在那里留下许多命名以纪念这些勇敢的荷兰探险者的工作,但是,由于它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效益,不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故当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对之进行“再发现”时,“新荷兰”仅留下一个空名而已。这个例子说明,发现必须要有反馈的能力,否则仅是空谈而已。郑和船队虽然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船队,但是如与后来西方的海上扩张相比,郑和船队没有在海外建立一个殖民地,没有占领别国的土地以夸耀自己的“发现”,是典型的和平之师、友好使者。今天我们在讨论郑和船队有可能发现美洲时,如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跟着大谈郑和船队最早发现美洲,乃至发现世界,势将给自己制造矛盾。况且孟席斯提出新说法的主要依据仅是几张15和16世纪的地图,他认为当时有可能绘制这些地图的国家唯有中国,于是做出了郑和分船队在1421年“失踪”期间发现美洲的遐想。显然,孟席斯遐想缺乏的是史料依据和沉船证据,在现存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料记载中,多数看到的是郑和船队在东南亚海域与印度洋一带活动,最远仅到达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他们不可能到达美洲或做环球航行,除非今后有发现新的资料可以佐证。

注释

- [1] 萨尔瓦多·德·马德里亚加著,朱伦译:《哥伦布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 [2] 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 [3]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 [4] 同上引书,第8页。
- [5] 《美洲史论》,第253页。
- [6] Albert Hyma, A History of the Dutch in the Far East, George Wahr Publishing Co., Ann Arbor, Michigan, 1953, pp. 172-173.
- [7] 丹尼尔·J·布尔廷斯:《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235页。
- [8] James C. Hsiung, Pacific Asia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World Order, Asian Affairs, vol. 29, no. 2, Summer 2002, pp. 106-107.
- [9] 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第4页。
- [10]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p. 3-10.
- [11] 见孟席斯在南京2002年郑和学术研讨会的讲话。

- ¹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第 228 页。
- ²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p.91-92.
- ³ Ibid., pp.92-93.
- ⁴ 罗荣渠：《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7 页。
- ⁵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116.
- ⁶ Ibid., pp.121, 123.
- ⁷ 李约瑟著、陈立夫主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241 页。
- ⁸ 《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三，永乐六年九月癸酉。
- ⁹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四，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
- ¹⁰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三，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
- ¹¹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三，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子、癸巳。
- ¹² 《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七，宣德五年六月戊寅。
- ¹³ 沈福伟：《郑和船队的东非航程》，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6 页。
- ¹⁴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123.
- ¹⁵ Ibid., p.7.
- ¹⁶ 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古里〉。
- ¹⁷ 张廷玉：《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 ¹⁸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10.
- ¹⁹ 见孟席斯 2002 年 10 月在南京郑和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 ²⁰ 《明宣宗实录》卷十八，宣德元年六月甲戌。
- ²¹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九，正统十三年八月壬戌。
- ²²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144.
- ²³ 王天有：《从孟席斯的“新发现”谈郑和研究之我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2003 年 10 月（总第 18 期），第 48 页。
- ²⁴ 彼得·弗雷：《官员宣称：郑和将军早于库克到达澳大利亚》，《郑和研究》2003 年专刊（总第 52 期），第 88 页。
- ²⁵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145.
- ²⁶ Ibid. p.331.

泰泐的淵源 對某些文化和語言痕跡的探索

・ 謝遠章 ・

泰國法政大學泰學研究所有一個進行了十年的「中國傣族和壯侗語族調查」項目，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五、六日，該所會同詩琳通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雲南文史館聯合在曼谷召開了名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傣人考察研究的進展」學術討論會，並慶祝王姐干拉雅妮公主八十一壽辰。筆者在該會提交了題為《泰泐的淵源：對某些文化和語言痕跡的探索》的泰文論文，以下是該文中文詳細摘要。

謝遠章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廿六日

公元一九五〇年西雙版納解放前，那裡一直存在著處於封建社會初期的景洪王國（儘管歷代朝廷和當局冊封他們為「車里宣慰使司」），該王國主體民族是傣泐。傣泐是泰—傣民族的一個支系，由於它保持較古老的語言和文化，被國際（特別是泰國）學術界稱為「原始泰人」。但是，傣泐並非西雙版納最早的原住民。傣泐有他們祖先南遷來西雙版納定居和景洪傣王以機智戰勝土著布朗族的故事。孟臘、孟混、孟阿等地傣泐祭孟的社神時，要請布朗、克木等頭人以原住民身份參加祭拜；景糯、孟捧傣泐舉行求雨儀式，也要請布朗、克木人參加，否則認為不靈。這些傳說和祭祀風俗特點，充分說明傣泐是遷徙來定居的民族。

X X X

遷徙傳說故事只說「坎亮婆婆」率領傣人逃避瘟疫，從「孟泐龍」（即大孟泐）南遷到現今瀾滄江畔的景洪建立「新孟泐」。但孟泐龍究竟在何處以及他們何時遷徙的，一直是未解的謎。筆者為此對傣泐文化風俗和語言進行考察，從中探索華夏文明影響的痕跡。具體如下：

（一、一）各支系泰—傣民族的歷史傳說，普遍認為他們最早的部落首領是「坤

」；西雙版納傣文文獻《泐史》也說景洪王國的締造者是「叭真」。坤和叭均為首的頭銜。已故方國瑜老先生在《西雙版納「泐史」概說》中說，「西雙版納傣文創之年代約在明初，則作書不能于明初。」「故疑《泐史》所載明初以前事，僅有口流傳，至明代始著于書。」筆者認為，叭真的「叭」這個頭銜源於印度佛教文化，洪王國建立於公元十二世紀，小乘佛教和跟隨而來的傣文尚未傳入，「叭」的頭銜當時也無從談起，因此，所謂的「叭」這個頭銜是後人所加，當時應是「坤」的頭銜，也就是「坤真」。據筆者考證「坤真」源於司馬遷在《史記》裡對西南夷首領稱謂，即「君長」。

(一.二) 傣泐及其他支系的泰—傣人在公元十二、十三世紀所建立的早期邦，均以景或清相稱，如景洪，清盛，清邁等等。景和清在泰—傣語均為同一個詞，是不同的漢語音譯而已。據筆者考證，景或清源于漢語「城」。景洪的洪是黎明，景洪就是黎明城，清盛的盛是十萬，清盛就是十萬城，清邁的邁是新，清邁就是新。

(一.三) 西雙版納過去把山區分為十二個「GUAN」，以前習慣譯為「國」。據筆者考察，實際上是中國隋唐以前的地方行政區劃「郡」。

(一.四) 過去的景洪王國議事庭委派傣族大臣分別兼任山區各郡和所轄各猛的「波朗」。傣語波為「父」，朗為拴牛、拴馬的「拴」，這個「拴」字與羈摩有對應關係，筆者認為，西雙版納這種含有「拴牛官」意義的「波朗」，實際上是對唐朝羈摩司的模仿，值得一提的是，泰語稱譯員為「朗」。為什麼把地位並不低下的譯員稱為「拴（牛馬）」者，一直是個謎。筆者認為，擔任「波朗」職務的官員，實際上是起著朝廷與山區異族之間的中間人作用，往往還要擔負通譯任務，久而久之泰國也常把譯員稱為「朗」。

(一.五) 泰—泰語往往把國王分派其子弟或大臣去分管所轄各猛，稱為「Gin Meng」，也就是「食邑」。日本學者友杉孝曾說：『在古代的泰語裡，「統治」。便體現為「津猛」，也就是「食邑」。因此，泰—傣語的「Gin Meng」或「津猛」，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食采邑制度的抄襲。

(一.六) 傣泐和其他支系的傣人，從古至今一直用干支紀年和紀日。但他們沒有以干支相稱，而是按中國東漢的習慣以母子相稱。即稱天干為「母年」或「母日」，稱地支為「子年」或「子日」，說明傣泐等傣人接受干支的悠久歷史。泰國最早的素可泰王朝，在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紀期間，有七塊碑銘曾經使用干支年和紀日（和來自印度的大曆年及來自真臘的十二生肖紀年、紀日法并用）碑銘並且注明，這種「母子紀年紀日法」是泰人紀年、紀日法。

(一.七) 傣泐和其他泰—傣人的原始宗教為社神，村寨有村社，猛有猛社。小乘佛教傳入後，他們不但仍然信奉社神，並且在佛寺圍牆邊設有「寺社」神位。筆者考證，泰—傣人信奉的社神，就是中國古代稱土地神為社的原始信仰的翻版。

(一八) 與華夏文明相一致的泰—傣人其他原始信仰。……泰—傣人的『Kwan』信仰，其稱呼與內容和中原的魂魄信仰相一致：

……泰—傣人的『Mod』信仰，其稱呼與內容和中原的巫師信仰相一致；

……泰—傣人認為『Tai』『Tuan』是萬事萬物的主宰，這個『Tai』源于漢語『太一』，『Tuan』源于漢語『天』；

泰泐稱墳地為『pa-hew』，『Pa』為林，『Hew』沒有其他含義。筆者以為它源于漢語『孝』；『Pa-hew』即孝林，泰泐之所以稱墳地為『孝林』，可能源于漢族孝道的觀念；

泰—傣民間迷信的傩鬼，與漢族傳說的傩鬼相一致。

(一九) 除了上述例舉的同源文化與風俗以外，泰泐語還有許多與漢語同音，同源的詞匯。

數目字的發音，泰—傣語稱「一」為「NENG」，與漢語不同。但是除了這個「NENG」以及百、千、萬、十萬、百萬這幾個詞以外，其餘數目字的發音（包括廿一、卅一、四十一等等），統統抄襲漢語。

日常生活方面的同音，同源詞，有：方正的正（JANG），正月的正（JIANG），工匠的匠，火炭的炭，莫要的莫，稱重量的稱，閉合的合，干枯的干，話別的話，少女的少，敗走的敗，堅硬的堅，鋪床的鋪，以及崽、娘、姆、客、變、漏、溫、烘、熟、退、開、廣、橫等等。

物質方面的同音，同源詞有：銀、銅、鉗、凳、書、箸、豆、茗、茄、瓜、葵、以及土壟的壟，手環的環，象牙的牙，紙鷂的鷂（風箏）、柏樹的柏等。

動物方面的同音，同源詞，有：象、犀、鱉、蛟、鳳、雁、燕、雀、巴（魚）馬，貓，以及岩羊的羊，鷓鴣的鷓等。

X X X

幾點看法：

泰—傣語和漢語雖然都是單音節語言，但卻是不同的語種。在地理，地貌和自然現象，如山水日月雲雨等等以及人體器官等方面，上述兩種語言的詞匯完全不同。但是，泰—傣語和漢語卻有不算少的同音，同源詞，而實際上這些同音，同源詞，絕大部份是泰—傣語的漢語借詞，這個突出的語言現象，加上泰泐古文化裡的華夏影響（諸如傳說的首領名稱，建國的地名，行政體制，曆法，原始信仰等），充份說明泰泐以及其他支系的泰—傣人的發源地就在中國。但是，在遼闊的中國版圖裡，這個發源地或者泰泐傳說的「泐猛龍」到底在那裡呢？沒有確切的資料和證據，但有一些可供參考的蛛絲馬跡。

(二.一) 僚語稱松樹為「柏」樹，柏樹產于長江流域和其以南地區。可以設想，一條發源地有柏樹，但沒有松樹，因此，在南遷西雙版納後遇到松樹，就張冠李戴地把類似柏樹的松樹稱為「柏」樹。

(二.二) 泰一條語有羊的詞匯，他們稱羊為「Pha」，但卻稱岩羊為「Yerng 或 Yerng Pha」。「Yerng」源于漢語羊，發音近似粵語：「Pha」為泰一條語岩，「Yerng Pha」即岩羊。可以假設，泰一條發源地為平原地區，沒有岩羊。南遷後見到岩羊，才根據廣東粵語稱牠為「Yerng」或「Yerng Pha」。

(二.三) 泰一條人的固有語言中，沒有「雪」這個詞；現代泰語關於雪的詞匯吸收印度梵語的借詞。現在泰語則借用漢語「雪」的詞匯。有人認為，泰一條源地可能是不下雪的華南地區。

(二.四) 中國古代百越語言有泰一條語近似的詞匯。《左傳》提到吳國被越國擊敗的戰場叫《夫椒》，並解釋「夫椒」是青山。泰一條語稱青山為「甫巧」，與「夫」十分近似。越語的詞組構詞法和泰一條語相同，如「夫椒」或「甫巧」，「夫」、「甫」為山，「椒」或「巧」為青；如按漢語構詞法，青山應是「椒夫」或「巧甫」；越語和泰一條語構詞法則與之相反。再如《越絕書》說，「朱余者，越鹽官也，越謂鹽曰余。」越語朱源于漢語「主」含義為「官」。如按漢語構詞法，鹽官應為「余」，但越語構詞法卻是「朱余」，與泰一條語一致。至于「朱」或「主」，黑僚，白僚等從古至今均稱「官」為「主」。

語言方面的線索也說明泰一條人與百越有淵源關係，泰一條發源地可能在古代越聚居區內。

(二.五) 廣東粵語一些特點值得特別關注。泰一條所吸收的古漢語詞匯其發音不少與粵語近似。因為粵語保留了一些漢語中古音。廣東在歷史上是百越的聚居地之一，因此粵語個別詞組構成仍然保留與泰一條語相一致的構詞法。如叫公雞，雞為「雞公」，「雞母」，叫客人為「人客」：說先吃，先行，先做為「吃先」，「行先」，「做先」等。

因此，筆者認為，包括泰語在內的泰一條民族發源地，應當在古代百越所分布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廣大地區去尋找。

泰一條（以及壯、布依等語）稱一種神話傳說的水怪為「Ngerk」，其體形和神態類似龍蝦，其實，這個「Ngerk」是源於漢語「鯉」，即鯉魚。

為什麼現代泰一條語把鯉魚稱為「Kei」，西雙版納僚語為「Takei」，泰語為「Jorakei」，而本來是鯉魚的泰一條語名稱「Ngerk」卻演化為神話傳說中的水怪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得到關於泰一條發源地的提示。

我們可以假設，泰一條發源地一定有鯉魚的分布，例如長江三角洲沼澤地帶，此泰一條古語有「Ngerk」即鯉魚的詞匯，後來，可能是泰一條人南遷到華南廣東，

廣西一帶沒有鯪魚的地區（廣東省靠海的韓江口汕頭地區曾有鯪魚的分佈，因此上述兩廣地帶應是遠離海的地區，這一假設與泰—傣古語沒有海或海洋詞匯的情況相吻合），但「Ngerk」這個詞匯仍然保留在泰—傣人的記憶當中，而這個記憶隨著年代的遷移，也演化為帶有神話色彩的水怪傳說，完全脫離了它原本的定義，因此，當泰—傣人最終遷徙到了滇南和中南半島區域，又遇到鯪魚的時候，他們完全記不得他們的祖先曾經稱它為「Ngerk」即鯪魚，而給它取了新名字「Kei」，即「Takei」或「Joora Kei」。同時，他們繼續稱傳說的水怪為「Ngerk」。

如果上述假設和分析站得住腳，我們就可以從中得出泰—傣人可能發源地有鯪魚的長江三角洲即古代百越主要聚居區。

X X X

泰—傣人遷徙的年代也是個難題。無法找到有關的文獻根據，筆者只好從語言和文化的一些痕跡裡提出一些供參考的線索。

（三.一）傣語稱粉紅色為「Kong」，如稱桃子為「Mak Kong」意即粉紅的果子。這個「Kong」源于漢語紅。《說文》《詞源》都注明「紅」在古代最初是指淺紅或粉紅，其含義後來才變成泛稱火、血的紅色。傣語從漢語吸收「紅」的借詞時，其含義仍然為粉紅或桃紅。說明傣語吸收華夏中原詞匯有著悠久歷史。

（三.二）秦始皇名嬴政，古時政字與正通。因此在秦始皇稱帝後，為了避諱，把正月的正讀音改為「征」，但其他場合的正字的讀音不變。西雙版納傣語和泰北歷史上的蘭那國泰語也出現類似現象。傣語稱方正的正為「Jang」，顯然是漢語「正」的同源詞。但是，傣語對同樣是源于中原的正月的正，卻發音為「Jiang」。與西雙版納有著密切歷史、文化、語言淵源的以往蘭那國清邁地區，也有同樣的怪現象，即稱正月的正為「Jiang」，但是市中心的「四方街」卻稱為「四Jang街」。過去，這一怪現象，在西雙版納和清邁都無從解釋，筆者認為，這是泰語或蘭那國泰人在中國秦漢時期接受華夏文化時，受當時秦朝避諱「政」音的影響，說明泰—傣人在秦漢時期就已吸收中原文化。

（三.三）傣語稱磚為「Din Gi」。「Din」為土，「Gi」明顯是源于漢語土壑的壑。壑為中國古代對土坯的稱呼，上古時期的周朝，就已用壑砌牆。在秦漢時期磚才成為中國北方的建築材料，後來，到了三國和晉朝時期，磚才逐漸在長江以南廣泛使用。傣語一直沿用「Din Gi」即土壑稱磚，是否可以說明，當中國已普遍使用磚為建材的三國，晉朝以後（即南北朝，隋唐），傣語等泰—傣人已南遷，由此不知土壑與磚名稱的差別。

（三.四）泰—傣人古代沒有印刷術。他們用手抄本傳抄文件，唱本等，其中有

一個折疊式的旋風裝本子。泰國的泰人稱旋風裝為「沙目泰」，即「泰式簿子」。旋風裝是中國唐朝流行的本子裝幀名稱，將長幅紙卷折疊成冊後，加一書面，使首頁和末頁相連綴。閱時可以循環翻開，連續不斷，不致散開。後來宋代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元代得到推廣，導致手抄本寫本被淘汰，旋風裝裝幀隨著退出歷史舞台。泰一傣人的「沙目泰」與唐宋時期流行的旋風裝完全一模一樣，沒有絲毫差別。

(三.五) 傣泐及黑傣、白傣等支系泰一傣人均習慣用筷子進餐。但他們稱筷子為箸。箸為中國古代對筷子的稱呼，《說文》詞條有箸無筷，說明古代還沒有筷子的名稱，明代陸容在《菽園雜記》卷一裡說：「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諺「住」、諺「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這一重要線索說明，泰一傣先民接受中原的「箸」較早，後來中國改稱「箸」為「筷」以後，他們已離開發源地南遷，故不知道「筷子」的名稱。

X X X

綜上所述，傣泐及泰泐其他支系的發源地，有可能是原百越聚居區，說不定就是粵語方言區一帶。而其遷徙時間也可能是中國唐朝（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前後。但是，這僅僅是筆者的分析和推測，不可能是定論。這一問題仍需繼續探討和研究。

泰國潮人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貢獻

洪 林

泰國華人在近代中國各個歷史時期，以一顆海外赤子之心，做出應有貢獻。這種貢獻，達到與祖國唇齒相依，共興亡的地步，為近代中國與海外華僑關係史，諸寫了一頁一頁篇章。

泰國潮人在各個歷史時期為祖國盡一份海外赤子所應有的職責，應撰寫者林林總總，這裡僅列舉泰華僑社中幾件較大事件，作為本文撰寫內容，以抒自己一點管見。

潮人移民暹羅，早在宋元時期。自明清後，潮人經拼搏後有所成就者，大多仍心系鄉梓、祖國。這裡，以泰國僑社重大事件作為拙文之重點內容。其中諸如泰國華僑抗日救國運動、暹華抵制日貨運動、華僑建國救鄉運動、暹羅華僑救濟祖國極荒運動等。以上這些重大事件正好為泰國華僑在各個歷史時期與中國息息相關命運作了歷史佐證，因此，泰華拳拳赤子心可見。

1936年，全中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後，海外華人眼見日寇猖狂，激起華僑義憤，愛國之心萌起。暹羅各地紛紛成立救國會後援會。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救國運動進入前所未有高潮，泰華的抗日組織誕生，主要的抗日組織有“暹羅華僑學生聯合會”、“暹羅婦女聯合會”、“學生抗日聯合會”、“民族抗日先鋒隊”、“商界抗日救國會”、“華僑工人抗日聯合會”、“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等，人數達十萬人左右。為著更好進行抗日活動，各個抗日團體聯合成立“暹羅華僑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力量，進行抗日活動，其主要負責人許一新、吳琳曼、邱及、許子奇、黃流等。在全暹掀起抗日救國高潮，進行抗日活動。

1937年10月，“暹羅抗日救聯”在泰華僑社中，為更好向華僑募款以抗日救國，在當年是報德善堂理事長的蟻光炎先生倡議底下，必要時可用報德善堂名義募款，因而“抗聯”成立“先烈華僑慈善籌賑會”，又得蟻光炎在僑社之威望，募款達60萬元以上。從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泰國華僑為抗日救國所得募捐款達240萬元以上，總計自抗日戰爭以來，募款所得共600萬元以上，其中不包括通過秘密渠道推銷的愛國公債和購買大批抗戰物資在內。以上這些抗日救國運動所取得的成績，與在以蕭佛成為主任的“全國勸募公債暹羅分會”中的愛國僑領陳景川、蟻光炎、廖公圃、鄭子彬、余子亮為副會長的努力號召分不開。

1937年日本在中國掀起大規模、全面的侵略戰爭後，泰國華僑開展抗日活動的序幕，還掀起還華抵制日貨運動。其中以愛國僑領蟻光炎為首的在發動還華駁運拒日貨中起著非凡作用。在抗日救國運動的深入的同時，由於在蟻光炎領導下的還華船主齊心堅決在北欖港拒絕用駁船替日本巨輪運貨入曼谷，致其貿易值驟降。因此，抵制日貨無疑地給日本在經濟上的打擊很大。同時，作為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暗中還組織了還華商界救國會，號召還華商同心協力抵制日貨，使抵制日貨運動更順利地開展。在抵制日貨運動同時，愛國華僑還成立還華抗日救國總團，嚴格對與日本勾結的只顧自己謀利的華僑奸商展開一系列措施，並由席主德與蟻光炎好友，真名林玉興）親自組織領導進行是項活動。這期間，還羅的洪門義勇隊亦配合抗日鋤奸活動，使抵制日貨運動取得更為徹底地打中日本的經濟命脈，抗日救國運動做出貢獻。

由於這一系列抗日救國活動主要參與者是蟻光炎先生，因此這位愛國僑領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釘。1939年11月21日晚10時半，蟻光炎被暗殺于暹羅華力路杭院前，送中央醫院搶救無效而犧牲。

中原報連夜發佈新聞于翌晨見報，其頭條標題是“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昨晚被刺斃命”，轟動了整個泰華僑社及泰方軍警。泰國政府總理鑒披汶·頌堪元電中說：“……不僅華僑群眾聞而哀傷，且引起泰人無限悲悼。因先生生前急於義，為華僑各方致力公益……。”重慶政府于1939年11月28日的一項褒揚令

“暹羅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僑界耆宿，卓著聲望，平素熱心公益，愛護宗國，自抗戰軍興，領導僑胞，努力捐輸……”，僑界報界紛紛發表祭文，以褒揚這位愛國僑領。1939年12月6日，在中華總商會主持下泰華僑社各界特假中華總商會舉行公祭大會，光華堂前萬人空巷，敵愾同仇，可見一斑。12月17日中原報刊出反“蟻光炎宣示紀念特刊”，充滿激情悼文，緬懷、紀念這位僑社深得人心之僑領，以追懷這位為抗日救國捐軀的愛國者。

縱觀以上各種運動的產生和展開，無一不與僑史息息相關。中華總商會、潮州會館、報德善堂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的領導人，如陳景川、公圖、蟻光炎、余子亮、廖欣圖、洪鑒澄、洪天濟、鄭子彬、陳振敬、陳守明等，食銷救國公債、抵制日貨、運糧救濟祖國、宣傳抗日救國等，都做了貢獻。據資料，陳守明在派遣全黑籃球隊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各地義賽，資支助下所得收入，全奉祖國。1938年捐獻大米一萬包支援抗戰，1939年捐款85萬元抗日經費。泰華僑領在泰國華僑史中為我們立下光輝榜樣，以及珍貴資料，不愧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品德繼承者。

這裡，須特別提到的，是泰國一位杰出的潮人莊世平先生。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世平在任的新民學校，“七七”事變後，新民學校走在抗日救亡前列，成為一個

不容忽視的堅強後盾，就是在莊世平領導、組織底下進行活動，時其為泰國華僑抗日聯合會常委。他抱著愛國宗旨，不辭辛苦地為著將華僑的血汗錢和一顆顆愛國心，所奉獻出來的物質、捐款，源源送到國內抗日前沿，這樣才對得起廣大華僑一片愛國心。當年抗日救亡許多物資與金錢都從泰國華僑抗日聯合會、莊世平手中直接或間接地得到支援。在整個抗日救亡運動中，他不僅從主張到行動，都把抗日作為首要任務。在其言教身教底下，培養出一批愛國有為青年學生，使他們成為抗日救亡的堅強隊伍，其中諸如詹炎鋒（曾帶領泰國的華僑抗日義勇隊第三隊）、姚念先、莊江生、張漢英、王耀華、鍾時、戈揚、張伯英、譚嵐、黃禮等。這些青年在祖國抗日時期貢獻出一生青春，甚至寶貴生命。

莊世平在抗日救亡中的貢獻是非凡的。新中國成立後，為建設家鄉，他發動了泰國僑領捐款。1956年建設了普寧華僑中學、普寧華僑醫院、華僑學校等。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正值國內經濟困難時期，莊世平除多方組織華僑捐助家鄉生產外，還協助促成李嘉誠先生捐資十多億港幣創辦建設汕頭大學，造就了大批莘莘學子，功不可沒也。

改革開放時期，1987年，莊世平任香港潮人捐助潮汕體育館委會主任時，以其威望，群策群力，發動了華僑捐助資金達2000萬港幣，使體育館于1990年建成。此後的幾十年間，莊世平一直不懈地為建設家鄉，發揚中華文化做出努力與貢獻，以實現其“振興祖國，繁榮祖國”的心願，是潮人為故國做出貢獻的一位杰出人物。

在整個抗日救亡運動中，還有另外一支不可忽視的抗日力量，就是地下黨（僑黨）或從事地下活動者，他們在為祖國抗日救國中，也做出巨大貢獻。其中包括秘密送地下報“真話報”被日軍查捕入獄並遭受嚴刑酷打而不屈的陳鴻（愛國抗日組織“勵志社”成員）、林川（黃子安）、“反日大同盟”南線總盟、“抗日義勇隊”南線總部主要負責人、在抗日救國中勇往直前的地下黨負責人謝光、負責“抗聯”鋤奸團的許一新、素攀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會長、反日大同盟主任，並以資金的“健齡團”中藥舖作為抗日救國活動聯絡站、將自己生死置于度外、為新四軍、八路軍募款支援祖國抗戰的章健齡，以及參加“反日大同盟”的葉祥龍等等無數為抗日救國、泰國華僑革命工作，不同程度的為近代中國歷史，以自己雙手與革命精神寫下一章一章史詩。

與此同時，不少有志青年，有感國家興亡與己息息相關，毅然回國參加抗日行列。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泰華青年處于艱辛歲月而自甘苦，義無反顧地面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奔馳于沙場。因此，在為數逾千人的勇為青年，有數百人犧牲自己，為祖國寫下可歌可泣歷史。

從1937年抗戰開始到1938年初，泰國的“抗聯”和華僑回國服務團的組織在啟明學校協助下，許多有為的熱血青年先後三批約300人回到祖國的抗日前線參加

門。而自願奔赴抗日前線的愛國青年尚不計其數。如1937年，崇實學校教師魯文、秦瑤帶領的第一批抗日義勇隊一百多人，以及1938年初由吳松帶領的約100人回參軍，參軍瓊崖游擊隊、新四軍、八路軍。他們中有歐陽惠、蘇蘭、莊國英、胡杰、陳展元、莊儒邦、王耀華、馬松、鄭忠烈、蔡漢良、蔡如秋、鄭振聲等，為日救國歷盡心酸與險阻，勇於赴國難，獻出青春與敵人奮戰，終致不少有為青年死沙場，為國捐軀。其中還有不少愛國青年紛紛進入黃埔軍校。當年，以林劍鴻、成彤、馬克武、郭日仁等一批為國捐軀者，正是年輕有為的一批泰國華僑子弟。里有一實例，就是1938年初徐州台兒莊與日本侵略軍展開的一場英勇戰鬥中，年十幾歲的泰國僑生莊明崇，由於“七七”事變而激起滿腔義憤，參加“華僑戰地通訊團”從新加坡遠赴徐州台兒莊前線，嚙日本鬼子殘暴子彈。目前，參加台莊戰役的泰華碩果僅存者就是莊明崇先生，現年已九十歲，是台兒莊戰鬥勝利歷見證者。

1941年12月8日，日軍入佔泰國，華僑和泰國愛國人士共同組成泰國抗日義軍，展開各種抗日活動。為更好配合抗日救國活動，早年回國於黃埔軍校受訓的劍鴻與何成彤在奉命回泰國進行抗日活動時，被日軍槍殺而壯烈犧牲。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奉命回泰南邊境進行抗日活動的馬克武、郭日仁，不幸成仁於攀牙國偏僻荒林中。以上只是眾多愛國青年為抗日救國犧牲之一二，尚有無數無名的無名英雄在抗日歷史中，寫下“出師未捷身先死”壯烈的一頁。以上所列的無名英雄，都是一群視死如歸的愛國青年，與泰國華僑、僑生一起為抗日救國偉大事業，獻出自己青春與生命。抗日勝利倖存者，尚為解放戰爭轉戰南北，奮勇與祖國，將自己一生獻給國家，無怨無悔當一名保衛大好河山的好戰士和兒子，近代中國史上譜寫下光輝一頁。

在抗日救國運動在暹羅展開取得輝煌成就後，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以的歷史時期，戰後的中國百廢待興，支援祖國建設與救災運動又成了暹華社會另項主要任務。因此，9月份《真話報》發表“我們泰國華僑應迅速團結”社論號華僑開展建國救鄉活動。同年10月10日各地華僑建國救鄉成立，並迅速開展工作。11月1日暹羅華僑各界建國救鄉聯合總會成立，為救國救鄉募捐，採用演出、演等形式進行，向華僑界進行募捐，勸募運動席捲全泰國。從1945年12月至1947一年多，共募得300萬銖鉅款，為建國救鄉做出了貢獻。

暹羅華僑各界救國救鄉聯合總會之成立，是在泰國反日大同盟的華僑抗日團體基礎底下成立的一個華僑共同體，包括各界華僑精英、各屬僑領及社會賢達，共祖國飢荒獻出一份力量。

建救總會的執行委員由中華贈醫所、真話報、泰華商報、全民報、青春劇社、暹華僑教育協會、暹羅華僑青年會、曼谷各業工人聯合會及宋卡、萬崙、呵叻、

孔敬、武里喃、烏汶、萬佛歲、北欖坡、喃邦、彭世洛、羅勇、萬象等二十五個單位組成。成立後，在全泰國的華僑社會中反響巨大，並紛紛成立分會、支會。1945年12月18日成立典禮上，增選蟻美厚、江楚仁、莊明華、陳軍文等及暹華婦女代表、清邁代表、陶公代表、洛坤分會代表為執委。首次執委會議推選蟻美厚為會長，並向政府註冊，取得合法地位。

據不完全統計，建教總會成立後至1946年12月，曼谷團體會員共62個單位，各地則達67個單位，總人數達10餘萬人。在全泰國各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救國救鄉募捐、義演、義賣，獲廣大華僑熱情支持與響應，慷慨輸將，充分流露出愛國愛鄉之赤子情懷。至1946年4月，建教總會共募捐而得善款已達85萬餘銖。是年5月，建教總會曾派員與華南救濟協會等慈善團體商討救鄉義款等問題。1946年5月28日，建教總會收到“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宋慶齡來函呼籲：“現因蘇粵豫鄂等地均以敵後元氣未復，更加天作人為之禍，相繼侵蝕，飢饉之災，已蔓延几遍。……深盼各地熱心愛國僑胞均能努力籌募，賜予援助。”

建教總會函達後于7月1日發表，以題為“為響應孫夫人籌款救災呼籲敬告旅暹全體僑胞書”，號召全體僑胞以祖國災難為重，踴躍輸將，共滅天災人禍而後福。同年“七七”獻金五萬五千餘銖。與此同時，建教總會還發動募集米糧救濟祖國災難中同胞，但運糧問題多方波折而未得解決。最後總會請求名譽會長宋慶齡直接向盟國救濟總署交涉，始得批准首批米糧三千噸出口祖國救濟處在糧荒中的無以計數的災民。

在整個救荒運動歷史上，建教總會不遺餘力地做了大量的功德無量工作。1946年12月，建教總會收到各界僑胞救鄉義款實際數額為八十八萬四千餘銖，分別送達華南救濟協會及宋慶齡福利基金委員會等慈善團體代為急行施賑，以救濟祖國災民。1946年12月18日慶祝成立一週年時，與會者達300餘人，包括李鐵鈺大使、中華總商會代主席張蘭臣，泰海軍少校乃他威貪隆那哇素越，諸多致詞勉勵，“為建國救鄉、促進中暹親善、促成僑社團結而繼續努力”等給總會支持。建教總會還出版了《暹羅華僑各界建國救鄉聯合總會一週年紀念特刊》，得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黃炎培、陳汝棠等及泰國國務院鑒探隆那哇沙瓦、蒙昭沙功親王、雅士報總編輯乃古臘·賽巴立暨李鐵鈺大使、僑社名人林伯岐、邱及、李一新、許元雄、蘇君謙等給特刊賀詞或刊題詞或賜文章，為建教總會留下一份珍貴的資料。

建教總會第二屆監察委員有黃聲、唐雙合、盧庭川、陳振敬、王建中、王崇山、陳鑄鏘、林伯岐、伍竹林、余子亮等。1947年11月8日，鑒於汶發動政變，建教總會被迫停止活動。因此，建教總會歷經兩年的歷史雖終告結束，但將永載泰國僑史史冊中。

在建國救鄉運動中，具同一性質的暹羅華僑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于1945年11

13日成立，完成使命于1948年6月30日。戰後中國雖為戰勝國，但久戰之亂，民不聊生，飢饉程度嚴重，暹羅華僑不忍坐視，乃發起救荒之壯舉。

暹羅華僑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之成立，旨在救濟潮汕糧荒問題。時由潮州會館、肇慶會館、江浙會館、海南會館、福建會館和客屬總會暨陳景川、蘇君謙、余作舟、翁公輔、鄭午樓、梁任信、鄭景雲、熊均霆、蟻質生、盧庭川、陳鏞鏞、林伯岐、卡介之、劉介臣、鄭寄雲、陳贊利、伍東白、陳繹如、張蘭臣、林鑑中、陳培南、陳家海、余融初、廖初初、蔡演強、周祐湛、黃鴻壁、蘇振壽、許競立、周秀蘭、雲竹亭、許春裘、曾仰梅、馬燦峰、張杰陵、莊文彬、杜國嘯、蘇谷良、黃鴻秋、黃鴻喬、李其雄、蕭元川等39人組成。

暹羅華僑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為更好做好工作和救濟任務之落實，組成理監事成員如後：理事長鄭午樓、副理事長馮爾和、秘書潮州會館（蘇君謙為代表）、財政大肇公會（代表黃鴻喬）；常務理事：蘇君謙、客屬會館（伍伯林為代表）、福建會館（蘇振壽）；理事：肇慶會館（黃鴻秋）、海南會館（雲竹亭）、江浙會館（張杰陵），六行業：米商公所（許春裘）、余作舟；銀信局公所（陳培南）、陳繹如、馬燦峰、香叻汕公所（陳家海）、杜國嘯、保險公會（曾仰梅）、紗布公所（李浚溪）、潮安同鄉會（張蘭臣）、輔益社；監事長：中原報（李其雄）；稽核：蘇谷良、反攻報；監事：百樂週刊、同聲報、僑聲報、中國人報、泰華商報、蕭元川、抗戰救國聯合總會、三民主義青年團（莊文彬）。救荒會理監事以下還設立了總務組（白明坤為主任、秘書李飄萍）、募捐組（主任鄭景雲、秘書馬燦峰）、宣傳組（中原報、光華報、全民報、泰華商報、正言報、光明週刊、反攻報、真話報、重慶報、同聲報、警報、自由人報、中國人報、百樂週刊、僑聲報、南聲報、青年公報等）。

救荒會分會總共有139個，遍佈全暹羅各府，如北部清邁、北攪坡、彭世洛、南邦等三十處，南部普吉、宋卡等35處，東部北柳、萬佛歲等十六處，東北部呵叻、烏汶、四色菊、孔敬等二十八處，中部（包括京吞二府）大城、佛統、叻丕、龍仔厝等十處。總計分會和特別募捐隊四十八處，達到凡有華僑足跡就有救荒會組織之策動，充分體現出全暹羅華僑救荒一條心，發揮“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的人道主義精神。

1945年年底，泰華僑社中的學校、戲院、潮劇等等紛紛加入救荒行列。如璇宮戲院、天外天戲院、南星戲院、西舞台戲院、國泰戲院紛紛舉辦義演籌款，收入悉數捐入救荒會。其中璇宮戲院與耶聲影片公司聯合義演“中國戰士血戰”，西舞台戲院義演“華僑血淚”、新世界戲院義演“熱血忠魂”等，轟動了僑社。尤其是耶聲影片公司發動內地所屬十餘埠之戲院進行義映，獲當地埠眾熱烈響應，取得斐然成績。1946年10月，黃曉、集英、建智、民新實驗、中華平民、中心等華校進行募捐、義賣籌款以救濟祖國糧荒。

以上團體同心協力日夜為救荒籌款，熱情高漲。當年，為救荒參加義舉的名畫

家關山月、王蘭若、黃獨峰來暹配合泰華藝人陳搏夫、陳鎮庭、陳夢虹等假廣肇會館舉行義展，所得義款共四萬四千餘銖，均捐獻給救荒會，創海內外藝術家共襄義舉之始。

泰華的潮州戲班亦不甘落後，紛紛參加義演籌款，包括中一枝香、老實順興、中正順興香、老梅正香、老怡梨春等戲班，為救荒全力以赴，籌得善款捐獻給救荒會以救濟災區同胞，義舉可風。

在救荒期間，暹羅各華文報紛紛發表社論，為救荒會打氣。其中有中原報的“加強救災運動”、新中國報“紀念《七七》與救荒運動”、光華日報的“京吞僑胞應加緊救荒”、光華報的“致實踐《為善最樂》之群”、全民報的“賑米應該賑難胞”，以及正言報小評“對救荒執委會出動募捐說幾句話”、“中華日報的小評：“請節省酒肉錢”、中華民國報小評“為一碗米運動呼籲”、南聲報小評“讀救荒會致羅卓英電後感”、中國人報的“建國與救鄉”、晨曦週刊的“《救荒運動》感言”、青年公報的“為祖國饑餓同胞呼籲”等，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救荒會行動，一方面呼籲僑胞省一粒米為救荒或指出在賑米中之存在問題。

此外，泰華文藝界也以滿腔熱情為救濟祖國災胞風雲湧地寫出心聲，在《救荒詩選》中，懷鄉君的“救我們同胞”熱情洋溢地寫出：

“八年來的抗戰/悉數與流亡/獸蹄踏過了的/更是不忍目睹漠漠的荒原！”，又寫出：荒原成立飢饉的慘象/慘象無情地換來個枯黃的面顏/千千萬萬待哺的飢民/正在伸手向著我們這兒哀喊！

誰能忘記了我們的第一故鄉？/誰能忍心看著自己的同胞死亡？/人類本該懷仁德的/何況飢饉是遍佈在自己的家邦！？

節省下是浪費的金錢/抽出百分之一的力量/誰能說這是杯水車薪/合力的涓滴荒會組織之可化為浩大的河漢。……

之也”的人

僅僅這首詩，已洋洋將海外赤子之心描繪得淋漓盡致，這就是炎黃子孫的共同行列。如璇心聲的總和，因此救荒事成。

總之，泰華各界以及媒體，都為救荒行動起來，以期達到在飢饉邊緣上的同胞戰，西舞早日解除苦痛。因此，救荒會在1945年11月29日到1946年11月28日這期間，在暹羅境內149處發動捐米，得暹政府支持，一年內輸運價值二千萬銖的糧食回國救濟，取得斐然，先後運往廣州、潮州、瓊崖等等計第一批至第六批。為使賑米運動順利進行，暹華校進荒會特組回國監賑團，由鄭午樓任團長、副團長為利華輝、秘書黃亦文和陳嘉深、

政是陳培南等。在運賑米中，出現波折，乃賴鄭午樓奔波數月于重慶、南京、上海參加義舉的名、廣州、汕頭等有關機關，難關重重，卒以暹華三百萬華僑救荒如救火熱忱，感

中外，始得源源獲准出口，得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輪船免費配運回國賑米達三萬噸，得以順利將賑米送達災區，以濟嗷嗷待哺飢民。

救荒會廣獲泰國華僑支持後，形成一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巨大浪潮，及窮鄉僻壤。在“多一士丁多一顆米”的號召下，出現熱心義舉感人場面，如中醫院院長兼醫務廳廳長鑒匿以暹羅人第一人募捐1000銖以救荒的感人事跡，就是例。總得募捐款二千餘萬銖。

據統計，募捐善款達二千萬銖，若加捐款利息，會中經費（另行籌措）和聯總運費、贈米袋三十銖萬條等在內的話，則逾四千萬銖，是歷次華僑救災捐款之冠。

救荒會本著愛國愛鄉宗旨，以救濟全國糧荒為總目標，施賑範圍遍及潮汕、興、廣肇、瓊州、廈門、湖南等。是年，救荒會共運賑米三十四萬餘包，分為十五，由監賑團分赴潮汕、廣州、海口等地監賑。施賑區以潮汕得益較優，使之免去複1934年大飢荒之慘象。

泰華的救荒運動，歷來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上所談到之處，只是海中之一粟。當年，泰華各界都行動起來，除報社在宣傳言論起著不可抹煞作用，尚有如中原報還捐獻了善款以救濟；其他如香叻汕公所、米商公會、六行金業陳煒剛金行、鄭成順利金行、成興利金行、余義瑞英記金行、天外天金行、陳怡美金行）、潮州平糶公司、葉賢才公司、有益公會等等，都為救荒會輸將。這種高義舉之旗，拂遍整個泰華僑社，人心沸騰，心繫鄉梓苦難同胞，爭先恐後有一分發一分熱。在救荒二年期間，救荒會為賑米救濟祖國同胞，共出版了十一期特刊，時向僑胞僑社匯報詳情，不僅達到宣傳，還達到宣揚傳統美德作用。盛為和平後華僑史值得記載之一頁。因此，救荒會是泰國華僑史一項最為輝煌的紀錄，是歷上華僑愛國愛鄉一次團結、合作精神的充分體現，是泰國僑史一頁難忘的記載。

泰國華人在抗日救國運動及救荒運動等，做出不可磨滅貢獻，乃誌其史。然而，災多難的中國，1945年和平後，國共合作破裂、進而內戰，直至1949年10月，中國終於向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長期以來，中國民由於外侮、戰禍延及，國內正處在褐衣不完、一窮二白的艱難竭蹶中，幾致無錫之地。但是，優秀的中華民族昂然面對現實，度過種種困難歲月。而千萬海外子紛紛回國，或參加建設，或通過學習以立身社會，充分體現出愛國愛鄉的千絲縷情懷。東南亞尤是泰國的華裔表現得更為突出。五十年代初，一批又一批追求理想追求進步的青年，毅然奔向新中國。諸如，在球壇上的、在華僑農場的、在企業事業單位以及教育戰線上等等，出現不少杰出運動員、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等人事跡。泰國潮州人子裔更是心系祖國安危。六十年代困難時期，支援的物資源

源不斷地輸送家鄉，或為糧食，或為批銀，在一定程度上紓解家鄉人民生活、經濟之困境，可以說拯救親人于飢饉邊緣。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更是海外華人貢獻國家時候。泰國潮人眾多，眼見家鄉正逐漸走出窮困，拍手開懷之餘，亦紛紛參與建設，或投資或捐獻，獻出一顆顆紅彤彤的赤子心。這裡，根據資料，單揭陽一地，泰國潮人榜上有名者，已不計其數。現在根據資料列舉于下：

許許多多愛國愛鄉的潮人領袖，在其他領域有著杰出貢獻者，應推吳宏豐、陳世賢、黃子明、張錦程、辜炳樑、紀文榮、李瑞典、陳林美葉、張蔡雨等，在揭陽、普寧及其他縣市地區興學育人、文化、經濟建設以及其他公益事業，貢獻巨大。大略統計，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捐獻款項達 10600 萬元以上。其他尚有何才林、李揚真、蕭建波、張德孝、林連修、黃漢城、周漢金、汪文盛、王文彥、石詩武、陳卓豪、汪東發、朱惠恩等，對家鄉教育、經濟建設的捐款亦達 7071 萬元以上，加上為數不少的泰華事業家捐助家鄉款項 300 萬元以上者，共 3290 萬元以上；200 萬元以上者共 2128 萬元以上，總數為 23089 萬元以上，（這裡所列乃根據所得資料記載，餘者相信為數不少，但因無資料而未能列入）。這裡，又根據資料，在八十年代初，泰國著名潮人僑領陳弼臣為建設潮汕峽山中學及其他項目，捐獻鉅款，並在汕頭特區設立盤谷銀行分行，以實際行動參與改革開放行列。

上述者中，不乏泰華社會名事業家名僑領，在泰華僑社的貢獻亦同樣偉為美談。由此可見，海外潮人絕大多數生于斯長于斯，對所在國做出應有貢獻，因未忘“根”，才能如斯的愛國愛鄉，乃秉承家訓、傳統文化與美德所然，為改革開放前後的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國（包括抗日救亡、救荒等），對家鄉的建設、興學與繁榮，做出無私的奉獻，充分體現出這些海外潮人一顆顆愛心。同時，海外潮人在為中國的日益強大這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事績，充分佐證海外華人與家鄉那種千絲萬縷的血肉相連關係，也充分體現出任何歷史時期，“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句話的真理。

因此，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寫滿外侮慘痛教訓，但也使海外華僑愛鄉胸懷愛國更為開闊。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開始，將一批一批愛國華僑和青年組織起來，他們出錢出力，捐獻資金，投身抗日救亡行列，為國捐軀，用他們的鮮血譜寫一篇篇可歌可泣篇章。在建設中國在培育人才，他們同樣用自己的愛心，譜寫出首首動人歷史詩篇。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由于有如斯的愛國愛鄉海外華人，中國這一頁近現代史於是更為充實，應為海外華人以上“千古功德事”記上光輝一頁。

參考資料：

1. 《暹羅華僑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征信錄》，1948 年出版

- 《澄海文史資料》，第五輯
《華僑歷史學會通訊》，1985年第3期
《鐵血雄風—泰國華僑抗日實錄》，1991年元月出版
《近代廣東僑匯研究》，1999年12月出版
拙作：《泰國愛國華僑抗日史略》
《泰國歸僑英魂錄》，第二、四、五卷
《蟻光炎傳》，2000年11月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
《蟻光炎先生紀念文集》，1990年10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
1. 《湄江風雲》，1993年12月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
 2. 《精忠集》，1969年12月出版
 3. 《從湄南河到湄滄江》，2003年11月雲南出版社出版
 4. 《潮州史誌資料選編—海外潮人》，2004年9月出版
 5. 《莊世平傳》，1999年12月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
 6. 《情系鄉梓》，1999年9月花城出版社出版
 7. 莊明崇：“七十八年前，一個新民學生的故事”

泰國社會中的華人勞工

—泰國勞工史中的華人

蒲瓦隆・松巴碩作

方剛節譯

依歷史事實，福建、廣東的中國人同東南亞社會的發展關連已有好多世紀了。早在公元七世紀，就有華人到東南亞一帶的大小王國落戶定居，盡管數量很少。到了公元 960 年宋王朝建立以後，由於官方重視開拓同國外的貿易，南渡到南中國海沿岸一帶古國城鎮的中國商人勞工隨之增加，這些古城鎮在往後漫長的歲月裡發展成為華人的聚居地。

公元 13-17 世紀，中華帝國歷經了幾個朝代的變換：從宋到元朝（1280—1368），到明朝（1368—1644），到滿清（1644—1911）。與此同時，東南亞各古國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從內陸、沿海到群島，許多王國衰落湮滅了，如麻喏八剎和占婆，有的王國興起發展了，如當今的緬甸和泰國。

▲一、中國勞工：泰國的發展進步

可以這麼說，自從泰民族形成，發展並能夠自立於東南亞的大地之上，也就是從素可泰王朝以來，歷代王室都非常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同時，為迴避蒙古、滿清的威懾，華人到泰國也告增加。雖然經歷了好幾百年，這些華僑在泰國也能獲得生存與發展，特別是在長達四百年出頭的大城王朝時期，他們同東南亞地區華僑一樣，牢固地維持保存了形式多樣的故國社會文化傳統。儘管明清某些時期官方嚴厲實行「海禁」，對出國外逃者扣上「逃民」的帽子，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地區，南來華人也未就此絕跡。被官方認為是「罪犯」的另一些人群，包括海盜、走私犯、刑事犯、流浪漢，即使他們有不同的背景，但還是能依靠他們的聰明才幹和勞力，把握時機活躍在東南亞一帶。林道乾一例是很好的說明：明朝末年，林道乾這個手下轄有數百福建人的敢於打劫官船的人，就帶領數百人逃亡到泰南北大年，他不但在此立足，同時在北大年口岸獲得迅速發展繁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在往後獲得賜官於北大年。

另外，那些身有技藝，有商船航行經驗，有能力進行中國帆船貿易，特別是那

懂得賄賂勾結中國官員，包括精通中文頗諳泰語的華人，都有機會從普通勞工、商販、小地區華人頭人，晉升為職位繁多的泰國高官，特別是在對外貿易中把中當為重要市場的大城王朝年代。

可以肯定，在當時，泰中王朝雙方均為認可的以「進貢」形式進行的國家間的貿易，泰方如果沒有大量的華工，沒有那些經驗豐富的能夠負責並監管每艘貢船貢的華人，那麼泰方便無從獲得巨額利潤以穩固統治階級的地位。這些事實體現在個大城王朝時代。當時的貿易大都僱用華僑，他們有水手航海技工到將貢品交換泰方需求商品的負責人。如公元1381年陳子仁，公元1477年謝文彬就是負責貢進貢明朝的人。

1629年登極的巴塞通王首次確立王室對外貿易壟斷，同時沿用中國王朝與東南沿海地帶各蘇丹王的貿易方式，而泰王室還必須依靠大量華商及華工做重要輔助。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紀，大量勞工移民仍舊湧入泰國。

儘管滿清王朝於1645年頒布海禁，但福建、廣州、潮州等地華人仍然不斷前來，以至萬佛歲（春武里）成為潮州勞工移民中心，而泰南宋卡則長久以來是福勞工的入境地，廣州人則在大城及泰海灣各個口岸各處登陸。十七世紀估計不低於12,000華人入境。

在大城王朝後期，雖然在滿清王朝眼中的「漢奸」，即當年的絕大部份華僑，要為手藝技工、富人和泰國高官的機會很少，但就當時泰國社會經濟狀況，相對處於封建桎梏束縛下的本土居民來說，華僑勞工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各處華人聚居地，主要口岸城鎮都獲得很大的發展，直到1767年緬軍攻陷大城。

吞武里王朝時期（1767—1782），俱有「皇族華人」之稱的中國潮州人仍舊不斷由泰國來，他們在昭拍耶河流域、挽巴功河流域、夜功河流域和他真河流域等地出賣勞力，棲息謀生，移民數量大大超越以往的任何年代。福建人也為同樣目的來到宋卡和馬來亞城鎮，他們在吳姓廈門人的管轄下謀生，吳氏早年抵泰國之後同博他姑娘結婚，以後又發展成為宋卡開埠的家族。一直延續到曼谷王朝初期，為出賣勞力而移民的趨勢未見減弱。到十九世紀初期，更有多種因素促使華人到泰國謀生。泰國方面，王室壟斷的中國帆船貿易迅速發展。1830年以後，曼谷已成為同各國特別是東南亞諸國貿易的主要口岸，貿易的蓬勃發展又進一步促進對中國勞工的需求，特別是中部地區各河流域的製糖業，南部那空詩貪瑪叻、普吉、達瓜巴等地的易礦業，都因應國際市場的需要迅速發展，這就必須依靠大量中國勞工為重要基礎。與此同時，華商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也大大加強，華商的大帆船數量大增，其方式是依靠或參與王室經營的大帆船業務，或同地方官員合作經營。資料顯示，當時王室經營的大帆船僅20艘，而華商同曼谷官員及沿泰海灣各主要口岸官員合作經營的大帆船多達136艘。

▲二、促使進華工出國的因素

同泰國蓬勃發展的情況相反，清王朝卻日見衰弱。西方列強的入侵，鴉片戰爭（1840—1842）的爆發以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給閩粵二省造成空前未有的沖擊，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農村凋殘，農民湧入南方沿海港口城鎮，沒有什麼比出洋到東南亞販賣勞力為更好的出路了。此外，天災也給百姓帶來無比苦難，根據統計，滿清王朝遭遇旱災 92 年，水災 190 年，這些頻繁天災是間接促使華工出國的原因。這一時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促使華工出國，這就是人口激增：公元 1700 年人口一億五千萬，到 1794 年增加為三億一千三百萬，到公元 1850 年增加為四億三千萬。十八世紀中葉人均可耕地積為 3.56 畝。到十九世紀中葉減存 1.86 畝。

在清政府方面，官方的財政危機也加劇了民工出國，19 世紀清朝規定銀元作為民間繳納賦稅之用，而銅幣則在市面流通。比率為一銀元兌二銅幣。後來演變成一銀元兌三銅幣。至此，就使那些破產農民更堅定走出國謀生之路了。

還有一個促使華工出國的重要因素是：西方學術家不大談及其卑劣野蠻的強制性的販賣華工活動，在他們的祖輩長年累月的經營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這一活動已得到迅速的發展並形成整套系統。西方列強依靠本身在國際上的政治和貿易強勢，訂出有利自己的「標準」條件，對全世界特別是東南亞各國的中國勞工進行壓榨，那個時期和以後很長的歲月裡，泰國高官和商人也從中得到豐碩的財富。

1814 年生效的根特條約使非洲黑奴販賣活動終止，作為重商主義者的西方殖民者有必要尋求廉價勞工的新供應地，他們的眼光定必射向人數成億，國勢衰敗的異教徒中國。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儘管販賣勞工在清政府列為違法活動，但南中國沿海各通商口岸已成為勞力販賣集散地。勞工販子同東南亞各地取得聯系，在各城鎮修建簡陋的住所，即所謂「豬廄」，以收容待運轉各國的「豬仔」勞工，後來並發展成販賣勞工的「買辦」。他們同西方殖民者與世界及東南各口岸的官員、蘇丹都有很好的配合，因而從中撈得大把大把的利益。1849—1852 年間，廈門市僅有兩家英國人開設的勞工販賣公司（Messrs Tait & Company 和 Messrs Syme Muir & Company）轄六家代理處，但他們散布在東南亞各地和中國內陸各處的分支機構就達三百個。

▲三、壓迫，剝削工人的方式

1855 年泰國被迫同鮑林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個約翰·鮑林就是 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代表英國在南京條約上強迫中國開放門戶的人。此後及接踵而來的許多同類條約協定，使西方各國從中掠取利益，這也就結束了泰王室的對外貿易壟斷制度。為彌補王室這筆收入，賦稅承包制被從馬來西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引進施行。與此同時，國際市場對許多商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因而東南亞地區對中國勞工的需求也

應地增加，以至當年的曼谷成為中國勞工在泰國的匯聚中心。此外還有普吉等許多西海岸城鎮以及泰海灣沿岸城鎮都是華工聚居地。當時（1855年）約翰・鮑林估計說，曼谷有卅萬人口，華人佔廿萬，他們大部份是建築國家公共工程的廉價勞工，另外一些人為華人僱用的種種工匠。

拉瑪四世時期（1851—1868），由於國際貿易方式的變更，王室始終抓緊經濟不鬆，並把利益相關各方整合於賦稅承包制桎梏的約束之下。泰南地區既有錫礦又有華工，這是資本積累過程的重要經濟基礎。與包稅制相聯結的醉麻華工的種種稅收，包括鴉片稅、酒稅、賭博稅、養路稅以至娼妓稅，成為王室最重要的收入。泰南全境的地方官員、錫礦場主、包稅人都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有包攬城鎮地區全境的，有部份承包的，有合股參份的。因此，以多方同盟性質結合起來以奪取華工創造的剩餘勞動並協調各方利益，便真正成為增添曼谷王室財庫收入的又一重要起點。

王室壟斷國際貿易失去作用不久，便有西方輪船公司取代大帆船以接載中國勞工到東南亞各國。特別是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以後，就有了大輪船固定川走廈門—汕頭—廣州—香港—新加坡，新加坡—曼谷—西貢—香港—汕頭，以及新加坡—檳城—仰光等地航線。因此，從南中國接載廉價勞工到英屬海峽殖民地以發展採礦業，工商業也就不是難事。同時有關全泰南中國勞工的稅收自拉瑪四世末期以來更為穩定了。

關於集資也不是難事，王室和地方官員是資金主要來源，其他方面有來自檳城及地方華人業主的盈利積存。這就大大吸引廉價勞工前來參加錫礦開採。當年海峽殖民地的西方事業家也競相取得泰王室的貸款。由於資金沒有問題，泰南華人也就通過新加坡、檳城等地招集中國廉價勞工以擴展採礦業務，作為礦場主人或資金債權人的王室和地方官員，就自然無須過問販賣勞工是如何侵犯人權，是如何為非作歹地以殘酷暴力支配著全過程的罪惡勾當了。

當新老礦場主人需要勞工時，就把數量報告新加坡、檳城的經紀人，他們再轉報給中國口岸的聯號，再把數額配給各分支向內地農村招集勞工。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廈門販賣勞工的公司每個人頭可得三元儲金，這是一個引人的豐厚回報。當年廈門的好手藝工匠每月也賺不到三元。因此，為了依時依約招集到勞工數量，他們出盡花招：利誘、欺騙、蒙蔽，有時為填充艙位補足定額還行綁架。不那樣就得遭到每個人頭4—6元的罰款。販賣勞工公司還有其他預支，從中國口岸被監管的食宿到新加坡、檳城約8—9元，每一勞工到泰南礦場都得負債15—18元，再加上新加坡、檳城公司的利潤10—12元，每個勞工的全部費用約30元，全都由礦場主人預先付出。

每個華工為了依契約償債，必須為礦場主勞作1—3年時光。大礦場規定華工扣工值每天六分，小礦場扣五分半，每天工作10—12小時，全年只在春節期間休息三天。當還債完畢就從契約勞工變成自由出賣勞力者。

可是，從一開始這些中國勞工就將注定是沒有自由的勞工。這是因為他們生活的週遭環境畢竟是在另一國度，他們賴以謀生的場所又是大都遠離人群聚居的偏僻山野蠻荒地帶。

每一礦場主均另開公司供應勞工的日用生活必需品，允許礦工賒欠押或貸款，但複利月息高達3%，每年春節結算，工錢則由多項因素決定：包括勞工供應數量、錫價、鴉片價格、運費等等。1880年代，大部份勞工日工資是20—29分，個別例外的是，有的城郡官員及其親屬除了在其轄區壟斷全部包稅之外，還全部壟斷錫礦開採及農業種植如胡椒及稻米等，當年拉廊蘭萱的許氏家族就是例子，他僱用滿期的契約華工，讓他們開礦又同時進行農園作業，月工資視其熟練程度而定，一般在4.50—8.00元之間，這是1885—1895年間的事。

此外，在錫礦主和自由勞工之間的分紅方式有「做拆」與「做分」，這是資方勞方對礦錫產品的分配方式，一般在偏遠礦區以及一些值得開採但又缺乏資金的礦場採用。

「做拆」的條件如下：首先勞資雙方必須簽訂文字合約，勞方以勞力參股投資，資方負責投產的種種費用，還得免費供應勞工的食宿，勞工如須急用必向資方公司貸款，這是可怕的高利貸，即「出九入十」。勞工所需日用必需品以及各種服務，必須在資方壟斷經營的附屬公司消費，比如賭博、吸鴉片、飲酒以至嫖娼等等。產品的含錫量如果低於50%，勞方分紅得59%，資方得41%，含錫量如果高於50%，勞方分紅降低為41%，資方則提高為59%。賣錫權僅屬資方，勞方無權過問，每年僅分紅一次。

「做分」的條件大都與上述「做拆」相同，不同的是每個勞工必須把其產品依每日或每一時段按事前議定的價格售予資方，錫價漲落的風險由資方負擔，市價高漲時勞方無權過問。資方還必須負責冶煉。

總之，當年泰境的中國契約勞工盡受各式各樣的盤剝，償債完畢契約滿期之後也只能成為准自由勞工，因為隨著到來的就是資方提出的種種新條件，可惜這些華工沒有準確的數字，因為1890年以前泰官方對華人入境並無作出統計，僅有的只是礦場主人的若干記錄以及西方觀察家作出的粗略估計數字。例如十九世紀中葉，西歐輪船公司估計每年進入曼谷的中國契約華工約15,000名，他們被轉送泰南錫礦場，另一部份是大人多於此數的勞工則從新加坡及檳城登陸進入泰南。因為當年從南中國口岸到海峽殖民地沿岸港口已有固定的輪船航線。而曼谷—香港—汕頭的航線是1882年才開通的，因而大量中國勞工是從海峽殖民地分別進入泰境的。更何況泰馬邊境線在當年還未能明確劃分。

與此同時，本土居民還處在封建制枷鎖之下，至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泰的錫礦開採都必依賴華工擔任。1893年，全普吉的錫礦勞工有6,038人，這不包括泰南東西海岸其他地區的錫礦場勞工人數。

王室各方都深知，自從1890年以後，財庫最重要的收入之一，包括直接和間接的就是錫礦工人的稅收，平均每個礦工每年向王室財庫繳納四十元賦稅。這個數字大大高於泰境其它部域，並在往後很長的時間裡保持著。同時，鴉片稅也是國家主要收入並為業者獲得巨額財富的源泉，而華工則是鴉片的主要顧客，以至有如下的說法：什麼地方有錫礦，那裡就有鴉片煙館。礦場主也深知，沒有任何事業比賣鴉片給礦工賺更多的錢，因為一箱生鴉片煮熟之後約1,150—1,190錢重，每錢價1.60—1.65元，每箱便可賺837.50—903.50元，更甚的是礦場主為地方權勢人物，而走私鴉片則比比皆是，他們就更易攫取巨量財富，當年普吉的鴉片市場是僅次於曼谷的全國第二大市場。19世紀90年代初年，普吉的鴉片稅收每年平均二十四萬銖，而長南其他十六郡邑每年稅收僅十九萬銖，可以肯定在全泰南僱用華工開礦的十七郡邑，販賣走私鴉片者所得的巨額利潤是財庫稅收的好幾倍。

▲四、締造泰國的現代化

十九世紀末葉，華人勞工成為錫礦場的主角以及賦稅承包制構成經濟重要組成部份，英法對泰國南部和其他部域的聯手威脅日見加強，促使泰王室必須空前認真也加速對其統治體制、財政制度進行改革，從各個方位對經濟基礎結構進行拓展，以締造國家的現代化。其成果與根基足足影響到往後整個世紀，始終是政經發展緩慢低迷的泰國社會向前進步的重要推動力。

關於對待當時的中國勞工，當局仍沿用曼谷王朝初期的政策，即吸引華人移民入境勞作並予永久居留，同時給各種從業自由，與泰國人一視同仁，當然那些自稱本屬洋人國度的除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整個拉瑪五世時代（1868—1910）。當時的全部鐵路建設也沒有讓泰國地方勞工參與。政府相信，全部採用廉價華工，至少有一半勞工在泰作永久居留，例如1909—1919年建築泰南鐵路期間，當局評估每年平均使用一萬勞工，至少必有五千人留下。這一政策應用一直擴展延伸到其他鐵路建築場地。隨著時光增長，這一政策的優越日見突現。華人入境增加，為國庫收入增加奠定基礎。也隨著他們與泰地姑娘聯婚，生育後代，終於完成當局既定的增加泰國人口數量政策的任務。這一政策的認真施行，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葉。

除上述重要因素促使華人入境增加之外，十九世紀末葉，大輪船川走曼谷—汕頭，曼谷—新加坡，以及檳城—普吉—達瓜巴—拉廊等航線的開闢，也起了一定作用，並同時推動了政府締造現代化，拓展各項基礎經濟設施的進程，從而擺脫英法殖民主義者的威脅。當局不僅整合泰王室、地方官員和華人官員富商之間的經濟利益，還開放西方殖民地中華人血統資本家到泰投資各項新老事業，包括錫礦開採、橡膠種植、碾米業、鋸木業、捕魚業、開發土地房屋不動產業、承建鐵路以及各種行業。

所有這些政策都是促使泰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隨著歲月的推移，

華人入境也告增加，英、德、中以及泰官員和華商合營的輪船公司各因運載華工來泰而更加富裕起來。二十世紀的初始二十年，曼谷、檳城和新加坡三地的輪船公司都能就各方利益很好地同全泰境的各行業進行協調，建立了良好的從南中國口岸接載勞工到泰國各口岸的預支船票信用制度。因而也使執業販賣勞工的公司暴富起來，當年川走曼谷—汕頭航線最大的公司—北德意志勞埃德輪船公司承認，每趟船都滿載，擠成罐頭沙丁魚似的華工都持預支船票，正常情況每張票價 6.50 元，但輪船公司對每個人頭要賺 5 元，而勞工販賣公司及買辦則要賺 20—50 元。尤為甚者，他們從勞工被獵獲到完全償清債務的漫長日子裡，還對勞工加上 20% 的高額複利利息。

那些能預支大量信用款額的富豪大都是經營多種事業的，當這些契約勞工償債完畢，一般仍在原處做工，也有轉到老財主的親友及有關的事業部門繼續出賣勞力。這些華人財主還能從各方面各種方式對勞工攫取利益，如出售商品，放高利貸，接收當物以及允許以賒欠方式吸鴉片進賭場。因此，華工如果要真正成為完全自由的人，除了自身的忍耐，勤奮，節儉及遠離邪門歪道之外，還得有親友的同情和支持，才能真正改變自身的地位在泰國取得立身之地，並支援中國的眷屬。否則將永遠抬不起頭，可憐地結束生命或失望地回到中國故鄉。

▲ 五、階級地位的變化

可以肯定，在締造泰國現代化的浪潮中，成功者與失敗者總是混雜其間，但如果以當時泰國的政策及在經濟上給予華人的機遇與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的措施作比較的話，那一定比不上泰國社會，而事實也為華人所確認，1903 年，全泰人口約六百三十萬，其中不低於二百萬是華人，這是西方人士的估計，這些人大都是出賣勞力受僱於華人財主的工人，僅有少數服務於西洋人及泰官僚轄下的事業。

自從十九世紀末葉，當局取消徭役制，改用貨幣稅賦，廣闊農村商業點周圍的居民逐漸增加。聚集在全國各大城鎮的華人也跟隨經濟發展，道路的開闢，特別是北線、東北線和其他路段鐵路的修築，開始向農村擴展。為鋪設鐵軌，必須披荊斬棘，穿山越野的路基工程承包公司和鐵路建築公司，包括往後的南線鐵路，全部是潮、客屬華商經營，僱用的全為廉價來自南中國的華工。當這些勞工完成合約之後，如果沒有回中國，大多在沿各鐵路重要車站及新商業點落地生根。

正是這一原因，使潮、客屬華人在沿鐵路線開發農村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潮州籍勞工大都修北線、東北線鐵路，而南線鐵路則為客屬勞工修築。這就不奇怪為何潮州人在北線、東北線創業謀生大大多於其他族群中的中國人，而南線鐵路特別是合艾市，自從當年迄今就是全泰國客屬人的中心聚集地。至於海南島瓊籍族群的勞工，他們比較集中於鋸木行業，在全國主要河流港口的鋸木廠將木材加工，或打漁捕撈，待到有所積蓄時再自行創業。福州人情況較特殊，二十世紀初，這些勞工早

受僱於馬來霹靂州種植橡膠，當泰南鐵路通車之後，他們就被老板帶到泰南沿鐵兩側開墾種植橡膠。泰政府有了吸引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華僑到泰種橡膠政策之後，客家人從檳城和棉蘭不僅帶進數額高達六百萬銖的資金，以投資合艾南下到邊境沿鐵路線兩側種植橡膠，而且還把先前修築鐵路時大都採用過的資雙方分配利益方式應用於橡膠種植，這就是橡膠園主預先墊付各種費用，勞工付出全部勞力，待到可以割膠有產品出來再按原簽合約進行分紅。

客屬人的分紅方式也影響擴展到其他地方，不局限於客家人的範圍。正好遭到國人排斥的準備在霹靂州開發大型種植橡膠的華僑財主於是回頭徵集福州籍勞工泰國南部來。經過勞資雙方的努力開墾，終於從合艾北上，把泰南的橡膠種植發到素叻他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泰南鐵路同曼谷接軌，中國勞工從馬來西亞是從曼谷孔堤碼頭的運送，以抵達泰南東西海岸進一步開拓礦場與橡膠種植，就得更加快捷便利了。這一段時間，泰南本土勞工在這場泰南經濟的偉大變革中還介入。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年世界經濟大退縮期間，在泰國各口岸入境的華工人數還持續增加，日工資平均為 75 士丁到 1 銖。這期間泰政府還有變更政策以阻止華人入境謀生定居。在政治上，儘管當年拉瑪六世大聲疾呼推國家主義政策，究其實質不過為了防止中國的共和制進來動搖泰國的封建制。如經過分析，便可發現當年頒佈的幾份法律，其基本目的是為了尋求某些途徑，把人融入當時泰國傳統的政治和社會方式。至於國王長時間以華人為抨擊目標的詩，也僅僅是政治上施展出的良策，以避免中國新的統治方式來影響泰國社會。

相反地，華人在經濟上的作用還持續發揮，同時還更加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因為王室深知，泰國社會經濟的繁榮還很必要依賴華人資本和廉價勞工。

因此，移民入境的華人和華工的數量明顯增加，因為他們進入泰國之後享有同國民眾一樣的自由執業謀生，購置土地的權利。1918—1931 年間，華人移民僅曼谷孔堤一處累達 983,212 人，這一數字不含偷渡入境及全國其他口岸的入境人數。這裡可看到，平均每年入境的華工達 70,229 人。相當同一時期，1918—1932 年間，回中國的人數為 705,590 人。相抵之後留在泰國的達 277,622 人。

儘管 1927 年泰政府頒佈了第一份入境條例，但始終沒有明確阻止華工入境的措施。到了 1932 年政治變革之後才認真嚴格施行。1929 年全國人口 11,500,000 人，其華人 445,000 人，明顯地這一數字與事實相距甚遠。

因而可以這麼說，只有到波·披汶頌堪任總理時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關於華人支配著泰國經濟及華工問題的有關政策，才較具體地得到落實。1937 年政府的人口統計數字為：全國 1,446 萬人，其中華僑 520,000 人，華人血統者 610,000 人。再過三年即 1940 年，披汶頌堪總理在國務會議上承認當時在泰的華人不低於 10 萬人。

總之，施行超過一個世紀的可以自由購置土地和勞工政策，是十九世紀後半期及二十世紀頭三十年間中國移民大量入境的重要因素。中國內部的水旱自然災害、戰爭和日本的侵略，也促成中國人移民到東南亞特別是泰國。從鴉片戰爭以後的年均約二、三十萬人成十倍地增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三百萬人。大量華工湧進泰國的問題還比不上大量中國婦女的到來，據官方統計，從1920—1929年，共有131,510人。在二十世紀初年，很難在曼谷找到華人婦女結婚繁衍後代，華工落地生根都同泰國本土婦女結婚。隨著中國婦女的到來，夫婦雙方均為中國人的子女人數越來越多，他們雖然血緣上純為華人，但在法律上卻具泰國人身份。

因此自從1932年變革政制之後，人民委員會的政府即著手解決華人的執業及勞工問題，並且越來越顯嚴厲。當局頒佈了關於入境條例、外僑登記條例，以至在邊境設卡嚴防華人偷渡入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及戰爭期間，波·披汶頌堪政府執行唯國主義政策時期（1938—1944），終於引發當時華人在泰國社會上控制著經濟的巨大變化，特別是關於華人執業謀生與土地所有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同時，華人又仍有在泰國定居謀生的期望，因而在當時以至戰後到現今，不得不自我調整，以靈活的心態去適應泰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種種條件。

今天，當年華工的後代，有些人已發展成為華人血統的泰國富豪，成為泰國工人的僱主者也與日俱增。二十世紀後半期，泰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新時期造成泰國農村社會日增失望之外，還使泰國勞工遭遇先前中國勞工的同一命運，他們遭到泰國的許多勞工中介公司和經紀人的欺騙，到台灣，到南中國等地出賣勞力，甚至賣春者日見增加，泰國無產者階級遭到卑劣的形形式式壓迫，遭受循環怪圈的罪惡折磨還將有一段好長的歲月。

▲六 小結

從上述種種事實可以看到，關於泰國社會的華人勞工問題，是歷經長年歲月的發展，匯合泰國各個歷史時期進化形成的深刻症結。同尋求真正能從各個方位了解勞工問題的知識界一樣，知識界的能力以及有開發當前泰國勞工及其技藝問題的人們，正受到有力的挑戰。因為如果有關了解泰國勞工的知識界從總的方面說，仍然僅僅踏步停留在二個世紀以來的事實上。那麼，在泰國社會和經濟問題越來越陷於危機，最終勞工階級，越來越多失業與絕望的今天，要依靠誰用什麼方法以減輕壓迫剝削和種種不公平待遇呢？過往堆積下來的問題僅僅是作為人的他們為了能在社會維持生存下去。筆者猜想，泰國社會各界在不太長久的將來，定能目睹真正的答覆。

泰国潮人与泰中关系述略

杨锡铭

泰国的华侨华人,约占其全国总人数的12%,其中潮籍华侨华人约占70%。^[1] 大的潮籍华侨华人,身居异邦,对祖籍故土却怀有深厚感情。长期以来,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巩固,成为连结中泰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就泰国华人对泰中关系的作用,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作过介绍。本文就泰国潮人与泰中关系试作概述,以期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一、泰国潮人与泰中睦邻友好

泰国与中国是近邻。历史上,两国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一直保持友好往来。在两国长期的友好交往中,泰国的潮州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泰国(1942年以前称为“暹罗”)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早在200多年前,籍潮州府澄海县的郑信(1734~1782),领导暹罗人民抗缅复国,建立吞武里王朝后,就十分注意发展暹罗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768年,郑信登位不久,即派陈美到广东请封。当时的清朝政府对暹罗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片面听信了与郑信有矛盾的仙莫士麟的一面之词,而拒绝给予郑信的册封。郑信没有灰心,继续采取措施,改善与清朝的关系。1771年,郑信把在清迈俘获的缅军官兵多人送到广东。1772年,郑信又把乘船出海谋生遭遇风暴,流落到暹罗的广东海丰县人陈俊卿、梁上选等人及其家属35人送回广东。1781年,又派人带公文到广东,希望发展与中国的贸易。郑信的一系列举措,促使清廷转变对他的态度,也促进暹罗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金定邦曾著文介绍当时的郑信以及随后的暹罗政府中的潮州人对中暹关系的贡献,指出:“在暹罗的华侨当中,以潮州人居多。在中暹交往中,潮州人、潮州的港口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2]“郑信创建吞武里王朝后,同清朝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没有正式请封,清朝政府没有给予封号,只称他为暹罗‘国王’。在他执政的十多年中,为中泰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拉玛一世登位后,利用郑信为中泰关系发展打下的基础,顺利地同清朝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了封号。”^[3]从而使中泰友好关系得以继续发展。

19世纪70年代后,中泰政府间的关系曾一度中断。1932年,经当时的民国政府与泰国政府商谈,泰国政府同意中国在曼谷设立一名商务专员。随后民国政府任命

当时的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守明（陈黄利家族，祖籍澄海）担任这一职务。陈守明和中华总商会为中泰的交往发挥了桥梁的作用。泰国前总理乃挽限·信拉巴阿差曾称赞该会“作为泰国华侨华裔商人之联络中心……当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泰两国仍没有外交关系，这一中华总商会则履行了中国大使之任务，以沟通当时之暹罗政府及后之泰国政府，为时几十年”。^[4]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泰王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泰国潮人对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关系由于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以及两国各自所处的不同条件的制约，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之后，在幕后知己练·磨素旺（王慕能，原籍普宁）的影响下，泰国的政变团首脑屏·春哈旺陆军元帅，与泰披汶总理一起听取了外长旺·威泰耶康亲王关于万隆会议以及与周恩来交谈的情况汇报。两人同意派出代表前往中国，探讨建交途径，为双方建交铺平道路。由于当时的形势，与中国公开接触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泰国政府决定派密使前往中国。1955年12月以亚里·披隆（陈文彬）为首的代表团一行4人，分别取道香港、澳门，秘密前往中国。这些泰国的地下使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主席还专门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了长达1小时45分钟的谈话。泰国客人对中国访问，在中泰关系史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55年12月16日和17日，泰国政府总理泰披汶·颂堪的代表乃汕·帕他努泰和练·磨素旺（王慕能）与中国政府的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秘密会谈。经过两天的会谈，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双方议定两国愿意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并将尽快采取措施，增进相互交流，建立贸易和文化联系，以便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鉴于当时的情况，这项联合声明没有公开发表。但是两国在声明签署后的一段时间内，都遵循既定的原则，加强了多方面的交往，向中泰关系正常化迈进。

但是由于后来泰国国内发生政变，对华政策随之改变，中泰建交被迫拖延达14年之久。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泰国也同许多国家一样，调整对华政策。1972年8月，亚洲乒乓球联盟邀请泰国乒乓球队到北京参加乒乓球锦标赛。泰国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团”决定派出革命团财经和工业事务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许敦茂，1915—1999，原籍澄海）为顾问、警察中将春蓬·罗哈差腊为团长的泰国乒乓球队赴北京参赛，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这样，中断了14年的中泰两国的交往开始得到恢复。许敦茂在京期间分别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顾问廖承志、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和商业部副部长李强等。周恩来总理赞扬许敦茂先生是为建立中泰友好关系铺路的

區者。1972年10月中旬和1975年6月8日，許敦茂又先後以商業部長和國會主席身份，兩次率團訪問中國，為中泰建交做出不懈的努力。由於促進中泰的建交，敦茂在泰國被譽為“泰國的基辛格”。^[5]

1973年6月，泰國乒乓球總會邀請中國乒乓球隊訪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派往泰國訪問的第一個代表團。泰國政府對此十分重視，副總理巴博元帥、總長他威空軍上將、外交部副部長察猜·春哈旺少將（陳姓後裔，祖籍澄海）等級官員，親自接見和宴請了中國乒乓球隊。中泰雙方通過乒乓球隊的訪問，實現直接接觸。泰國輿論界把這稱之為現代中泰關係史上的“乒乓外交”。^[6]

1973年10月14日，泰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導致他儉政府的垮台。官政府執政後，調整了對內對外政策，開始探尋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建立外交關係的途徑。當時的泰國政府高層對於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存在兩種根本對立的線。時任民主黨黨魁披猜·拉達軍（陳裕才，祖籍澄海）在1975年2月23日的火會議上，力主與台灣斷絕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7]。外部長察猜·春哈旺也曾指出，發展中泰友誼，關係到泰國的“國家的生存”^[8]，親自制定措施，著手實施建交事宜。

1975年6月30日，泰國政府總理克立·巴莫親王應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邀，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會見了克立總理等泰國貴。鄧小平副總理同克立總理舉行了會談。7月1日，中泰兩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簽署了聯合公報，決定從即日起相互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中泰兩國關係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泰建交後，泰國的潮州人繼續為發展中泰友好合作關係做出自己的貢獻。察·春哈旺（陳姓後裔，祖籍澄海）、披猜·拉達軍（陳裕才，祖籍澄海）、針隆·西（盧金河，祖籍澄海）、班漢·信拉巴阿差（馬德祥，祖籍潮陽）等潮人後裔，在他們出任政府要職時，都先後率團訪問中國，或到祖籍省親，促進了兩國的相互了和信任，增進了友誼。

民間的交往更為頻繁。中泰建交後，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中泰兩國的友好往來日趨頻繁，泰國的潮州人與故鄉的聯繫也日益增多。令人難忘的是，1995年中泰交20周年時，泰華各界除在泰國舉辦各種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外，還組織了以謝如先生為首的慶祝中泰建交20周年千人團（後因泰國大選，實際人數約400人）北京旅遊，受到了我國政協、外交部、國務院僑辦、對外友協等的熱烈歡迎和熱款待。江澤民主席還接見了謝慈如先生及其親屬，以及部分團員，在泰華各界產了深遠的影響。

二、 泰國潮人與泰中文化交流

潮州人移居泰國的同時，既把潮州文化帶到泰國，也介紹泰國文化來到中國，

促进了中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潮人与泰国本土人民的和睦相处,增进了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

(一) 潮剧在泰国生根开花。大量的潮人涌向泰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潮剧。潮剧何时传到泰国已很难考证。泰国的修朝先生在《中国戏剧在泰国》一文中,引述了大城王朝时法国使臣戴夹蒙特的助理戴夹西教父在其日记中有关中国戏剧表演的记述:“公元1680年11月1日,丰肯(获大城王朝拍那莱大帝赐封‘昭拍耶威差然’爵位的西洋人),在其府邸中举行盛宴,祝贺葡萄牙国王……宴毕有各种娱乐表演。这些表演分批进行,计有各种杂耍、舞蹈,最后轮到中国戏的表演……”他认为,这就是泰国有关中国戏剧的最早记录。也即是在大城王朝的拍那莱大帝时期,就已有中国戏剧在暹罗的演出。尽管戴夹西教父在其日记中还说明当时的中国戏班是从广东省聘请来的,但这尚不能作为潮剧进入泰国时间的证据^[1]。

其实,潮剧何时进入泰国,在本文中并非十分重要。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潮州地区农村的大量新移民源源不断涌入泰国,使潮剧在泰国有了欣赏的主体。大量潮州人的存在,加上潮剧的内容大多以历尽艰辛、否极泰来、飞黄腾达、家眷团圆为模式,这对于远离桑梓,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企求日后发达的潮州人来说,很容易产生共鸣。另方面,自拉玛四世(1851~1868)以来,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章回体小说,被翻译成泰文,在泰国广为流行,而不少潮剧取材于这类章回体小说,两者相得益彰,使潮剧颇受青睐。此外,潮剧本身所保存的民族古风 and 独树一帜的弦乐,也深深吸引泰国民众。于是,“七世王(1926~1934)及八世王(1934~1946)在位时,是潮州戏在泰国的两个兴旺时期”^[2]。“潮剧在泰国的蓬勃,不仅体现在戏班的众多及戏院的林立,尚体现在专业编剧名家的出现,剧目的推陈出新方面。”^[3]这是潮剧在泰国的黄金时期。仅在曼谷的华人聚居区耀华力路,主要的潮剧戏班就有:中一枝香、老怡梨春、老梅正兴、中正顺香和老宝顺兴。这五大班潮州戏在耀华力路天外天街一带的弹丸之地,或互相竞争,或遥相呼应,日夜上演,长年不断,几乎场场满座。

1979年,中国广东潮剧一团在中泰建交后,首次到泰国演出。此后,应邀到泰国演出的中国潮剧团相继不绝。但总体上讲,潮剧在泰国的景况已今非昔比。其主要的原因,应是潮州人的后代已逐渐泰化,能够看懂以至欣赏潮剧者已越来越少。潮剧虽然难以在泰国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作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地方戏剧,能够在异国他乡持续兴盛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在中国的戏剧史中实属罕见。

(二) 为泰国的中医药业的兴起推波助澜。泰国王室对中医中药十分重视。早在泰国的大城王朝创立之初,华侨就已在该国的巴耶区开设药材店,中医生是最受欢迎的人,连国王的御医长也是中国人^[4]。拉玛五世国王(1868~1910)曾亲自出席并主持天华医院的开幕仪式,并赐该院8000铢经费和柚木大柜,以示祝贺^[5]。此举大大推动了中医中药在泰国的发展。

潮州人为泰国中医药业的发展贡献良多。泰国的天华医院成立于1904年,中华

曾医所成立于1922年,这两个慈善机构中,主要以中医药为贫困民众赠医施诊。其中,无论是医生还是捐资者,都以潮州人为主体的。位于曼谷唐人区耀华力越三振的日元堂药店,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原籍澄海的李松青在曼谷创办李天顺堂,出售中药,并且第一个开设代客煎药、赠医施诊业务,其后代继续经营,成为药业世家。¹¹潮州人林白昔年曾在曼谷三聘街开设一家杂货店,后易名为德恒裕药行。当年最畅销的产品是麒麟牌加楠水,专治泻吐。20世纪初,拉玛六世国王(1910~1925)所组建的量子军曾一度有不少人患急性肠胃炎,用该药水治愈,林白名声因此大振。由于多次有功于王室,林白家族获得秦王御封的OSATHANUGRAH之姓。

目前在泰国从事中医药业的,不少仍是潮州人。泰国的联华药业公会的领导层以及会员,许多是潮籍人士。“医生多属潮、粤籍贯之人士,药品多为省、港等地区之产品”。¹²在华人的主要聚居区耀华力路、石龙军路一带,仍有不少药店在出售中药。一些老“侨领”,也仍然喜欢用中药的补品来调养身体。不久前,中泰两国达成了协议,正式确立了中医药在泰国的地位,中医药在泰国的发展中,潮人将有更大的作为。

(三)潮人的一些信仰和习俗得到保持,有些已经成为中泰人民共同习俗。泰国信奉的是小乘佛教,但潮州人和其他华人把中国的大乘佛教也带到泰国来,并且使之得到发展,与小乘佛教相安无事。最早由潮州人建立起来的庙宇是1816年在万望(地名)的一座古庙¹³。在曼谷颇具盛名的龙莲寺,始建于1871年,由华僧续行大师倡建,五世王赐予建寺地皮,敕封龙莲寺泰文名,1875年全部建成。

潮州人也把自己的神明带到泰国来,如大峰祖师、三山国王庙、城隍庙、关帝庙、妈祖宫、伯爷公等等。一些地名也与这些神明有关。如耀华力的龙尾爷街,因街口有一座“龙尾爷”古庙而得名;真君爷街的北端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古庙,奉祀真君大帝塑像;耀华力路东端的海国新村,是华人劳工住宅区,奉祀的神像叫太子爷,这条小巷便叫太子爷巷;横贯耀华力路和石龙军路的妈宫前巷和妈宫后巷,则有奉祀水神的庙宇。

泰国的许多潮州人,特别是年纪大者,现在仍然过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年终谢神,拜祭祖先,祈求平安,并且以节日活动为纽带,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亲情。中国农历除夕夜,仍是许多潮人合家团聚、围炉送岁的时刻。正月初一,亲友互祝新正如意、新年发财。清明节前后,家家户户到祖宗墓地拜祭祖先,刷新墓碑上已退色的碑字,锄杂草,培新土,烧香过纸,敬献各种食物,利用这种形式教育子孙后代不忘祖宗。五月端午节,包粽子。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即佛教所称的盂兰盆会,兼办慈善活动,施舍穷苦百姓,潮人俗称施孤,办得轰轰烈烈,场面盛大,且成为制度,年年不断。八月中秋节,拜月、拜祖先,潮州风格的各式月饼、豆沙饼、云片糕、瓜册糖,应有尽有。还有十二月谢神,燃烧程式各样的纸马,给神明乘坐上天述职,并放鞭炮为神送行。

在伦理方面,许多潮州人仍教育子女要讲孝道,要孝敬父母,孝敬长辈,要尊

卑有別，內外有別。“有恩必報，有仇不忘”。家里來客人時，女主人和子女一般不能跟客人一起同桌吃飯，要等男主人與客人一起用餐後再用餐，或者在另桌用餐。婚喪喜慶、生日壽慶、功德法會等，仍然保持着潮州的传统習俗，一些習俗保持的完整性，甚至在現時的潮汕地區已很難一見。

這些潮人的風俗，在泰國，特別是曼谷，都搞得有聲有色，甚至影響了不少泰人。1996年初，泰國國王的母親逝世時，泰國商聯總會聯合泰華各界為王母舉行了一連十天的功德法會，場面恢弘，莊嚴肅穆。中國的一些傳統節日，泰國人也跟着過。一些商家，還別出心裁，利用這些節日，大做生意。

(四) 潮州話成了泰國華人華僑的主要通用語言，並對泰語產生影響。由於潮州人在泰國的華人華僑中占了大多數，而且潮州人在經貿活動中占了主導地位，潮州話也就成了泰國華人華僑的主要通用語言。它不但是群眾語言，也是“商場語言”^[14]。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期，無論來自中國什麼地方的華人華僑，為了更好地在泰國生存發展，都得學講潮州話。甚至在泰國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僑民，為了跟潮州人做生意，也得學習潮州話。至今老一輩的華僑華人中，許多人還以講潮州話為主。有些人甚至以為潮州話就是中國的國語。

潮州話不但成為泰國華僑華人的主要通用語言，成為商場語言，也對泰語發生了影響。有人說泰國中部的泰語帶有“華人的口音”。這種“華人口音”實際上就是潮州方言^[15]。現代泰語中就有二、三百個外來語是直接用潮州話來發音的^[16]。

(五) 潮州菜成為泰國民眾的家常菜。潮州菜在泰國也非常普及，不但在曼谷的華人聚居區，幾乎隨處可見，也為泰國各族人民所接受，成為泰國飲食文化中的一部分。一些菜肴在泰語中更是直接用潮州話命名^[16]。

潮人家庭里，不少還保持着早餐吃粥配雜咸的習慣。潮州滷味（以澄海的滷鵪為代表）、各式潮州小食如魚粥、粿條、粿汁、牛肉丸、魚丸等，常見於潮人聚居區的市場或街頭巷尾。在菜市場或者是超級市場，隨便都可以買到潮州菜的原料。潮人家庭喜歡的一些小菜也有很大的市場。如橄欖菜、萝卜干、酸菜、咸菜、冬菜、魚露、魚干等等，味道與潮汕本土基本相同。泰國的潮州人不但自己食用這些小菜，而且很早就將其再精心加工包裝，推向世界各地的超級市場。

由於潮人眾多，潮州菜館在泰國十分普遍，幾乎所有的中餐館都是經營潮州菜，或者是以潮州菜為主。就是其他菜系的中餐館，也都受到潮州菜的影響，多少得帶有潮州菜的風味，才能在泰國立足。特別是在華人的聚居區耀華力一帶的中餐館，更是如此。泰國的潮州菜也受到泰國菜的影響。相對於潮汕本土而言，泰國的潮州菜相对比较甜和辣。

(六) 支持中國來泰的各类文化活動。近年來，在泰國，經常有來自中國各地的歌舞團、戲劇團、曲藝團、雜技團等各种文化團體的演出，或書畫展覽等文化交流活動，泰國的潮州人总是給予大力支持。來自潮汕地區的潮劇團的每次演出，更是與泰國潮州人的支持分不開的。1994年，泰國著名大慈善家謝慧如先生慶祝其結

婚和 81 寿辰时,潮州市潮剧团专门赴泰义演。由于得到了谢慧如先生的赞助,该阵容壮大,演艺精湛,获得了泰华各界广泛好评。1995 年,在谢慧如先生等的大支持下,中国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首次出国,来到泰国供奉,轰动了泰国,创造万人空巷,争相瞻仰的场面,为中泰文化交流增添了绚丽之花。

(七) 接受了泰国文化的熏陶。潮州人在泰国也受到其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上,现在泰国的潮州人,已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特别是年轻一代,多已经不会讲潮州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泰化。如男子要到泰国佛寺当一段期间的和尚。相互见面或道别时,和泰人一样,双手合十,互致问候。席地而坐时,学泰人的屈膝侧坐姿。新店开张,乔迁之喜,必定要请泰国和尚诵经祝福。有些是中泰合璧。如在过中国传统节日的同时,也重视公历的新年和宋干节(泼水节)、诞节、水灯节等泰国传统的节日。潮州人开的商店和个人名片,普遍采用中泰文照的方式,名字既取中文名,也取泰文名。结婚仪式亦中亦泰,一般要先举行文仪式,由女方请客;再举行婚礼,由男方宴宾。平时既到华人设立的寺庙中拜神佛,在家里设立祖先牌位和地主神位,也到泰国佛寺礼佛、布施和斋僧。老人百之后,要在泰国的寺院里出殡,或按照泰人风俗在佛寺火化,或结合中国传统的七日、做百日的仪式进行。

(八) 介绍泰国文化到中国。泰国的潮州人也热心把泰国的文化带到故乡来,进两地的文化交流。由知名潮人谢慧如先生捐建的潮州开元寺泰佛殿,促成了 1997 泰国诗琳通公主驾临潮州,成为中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由知名潮人郭丰先生倡导,得到广大泰国潮人支持的潮州淡浮院,其中供奉由泰王钦赐的 72 英寸佛以及其他来自泰国的珍品。自从开工建设以来,泰国王室枢密院大臣素拉育·朱暖陆军上将、前总理苏金达·卡巴荣上将、泰国国防学院校友联谊会主席威洛·盛尼上将、前副总理庵雷(林日光,原籍潮阳)等政要,以及谢国民、陈汉士、苏明、李景河等知名人士,多次莅潮访问。今年初,泰国副总理威莎努·柯昂博士,专门率团来潮,为该院第二期工程的落成剪彩。七月初,泰国总理他信也专门率来潮州访问。如今,泰佛殿、淡浮院等,已经成为中泰友谊的结晶,也是泰国潮为促进中泰文化交流所做贡献的缩影。

三、泰国潮人与泰中经贸合作

长期以来,潮州人在中泰之间的经贸往来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红头船、樟林、汕头港、大米贸易等,记载着潮人在中泰经贸活动中的历史轨迹。

自素可泰王朝起,泰国就向中国入贡。第一次朝贡是在 1295 年,最后一次入贡清朝咸丰三年(1853),历经元、明、清三朝,前后共 500 多年^[7]。明清两朝,出封建大国的思想,对海外各国的朝贡都实行“薄来厚往”,“加惠于远人”,以达到“怀柔远人”的政治目的^[11]。朝廷允许泰国入贡时,除贡品外,可以挟带不限量的

压仓货物,免税在中国销售,并允许泰国贡船购买中国货物带回去。朝廷每次对泰国国王和贡使的回赐,价值远远超过贡品。因此,泰国对中国的朝贡,其实是一种朝贡贸易,是泰国王室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方面。不仅是在政治上和中国修好,获得中国的支持,还在经济上获得重大的利益。“因该国人不谙营运,是以多请福潮船户代驾”^[18]。具有经商理财、航海驾船和其他方面的生产技术,加上语言方面的有利条件,来闽粤沿海的中国移民,成为泰国王室外参与朝贡贸易的最佳人选。潮人与其他华人在朝贡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祖籍澄海的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后,国内初安,就立即着手发展与清王朝贸易关系。1781年,郑信派人带公文到广东,希望发展暹罗与中国的贸易。^[21]而“当时澄海县和新会县出海的商船较多,久负盛名的红头船活跃在中暹贸易的航线上”。^[21]

从素可泰王朝至19世纪上半叶,泰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17世纪末叶,清朝开海禁之后,澄海的樟林港成了中泰之间大米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行走外洋的红头船,多以泰国为目的,从泰国运入大米、木材和其他土产;从樟林运出陶瓷、土布、干果、糖、盐等物资。”^[19]“始自清乾隆皇帝缓解国内自然灾害,米粮失收而造成粮荒,大量向泰国购进‘暹罗米’时,潮人(尤以澄海人)便在中泰大米贸易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潮人不断涌入泰国之后,随着泰国稻米商品生产和出口贸易的发展,遍布泰国城乡的稻米收购、加工、销售和出口的网点几乎全是由潮人经营”^[20]。1861年,汕头开埠后,潮州地区与海外贸易的港口转移到汕头。20世纪上半叶,“泰国对华贸易输出市场方向主要是在广东地区,汕头港是最重要的输出目的港”^[21]。“1910-41年间,泰国对汕头输出值占对华输出总值平均为74.8%”^[21]。汕头港因之成为中泰交往的重要口岸,成为泰国对华贸易的主要输出目的港。樟林港和汕头港在中泰贸易中的重要位置,显然与在泰国存在人数众多的潮籍华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现代的中泰经贸往来中,泰国潮人一方面依靠历史上形成的联系,一方面凭借着他们与祖籍的血缘地缘关系,继续对促进两国的经贸往来起着独特的桥梁作用。

1975年中泰建交时,中泰两国的贸易额只有约3,000万美元,主要是大米、食糖、橡胶和水泥等一般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的贸易,数量不小,金额不大。此后,双方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双方的贸易,已发展到机电、轻纺产品、自动化数据处理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微电子组件、彩色数据/图形显示器、钢材、初级形状的塑料、液化石油气及其烃类气、纸及纸板等化工产品,以及珠宝首饰等高附加值产品。双向投资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中方企业在泰国承揽的业务领域涉及房地产、公路、桥梁、冶金、水利、码头、航道疏浚、钻井、远洋航运业等;泰方在中国投资的行业涵盖饲料、养殖、食品加工、大型超市、摩托车、纸张、塑料制品、电力、建材、房地产和金融等。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的资料显示,2003年,泰国在华投资项目194个,合同外资额61245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7352万美元。截止2003年底,泰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共636家,投资总额为29.3亿美元;

泰贸易额 126.55 亿美元；中国在投资企业 245 家，中方投资额 26384.41 万美元。些与泰国潮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中泰贸易往来关系密切的泰华进出口商会、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泰国中华总商会，以及一些行业商会等社团，共成员绝大多数是潮籍人士。在华投资额最大的正大集团，以及盘谷银行、泰华商业银行、挽功集团、协联集团、顺和成集团等主要财团，都是属于泰国潮人所有。另方面，因在泰国的合作对象太多也是泰籍潮人。正是由于以潮州人为主体的泰国华人的梁作用，中泰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前景良好。

结 语

中泰友好关系发展过程中，泰国潮州人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泰国潮人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纽带作用，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祖籍的亲缘和语言优势，被泰国政所借重；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们对于中泰两国的特殊感情：“就像嫁出的女儿，居国就像她一生所寄托的夫家，而祖国就是她的母家。对母家的关切眷爱，这是人常情，所以华侨特别爱国，过去对祖国的贡献，历史都有很好的纪录，这爱国是条件的，是自动自发的，没有想及要回报。所以无论祖国或居留国，两者都一样爱护。”^[22]可以说，中泰关系的好坏，与泰国潮州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致力促进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对于大多数泰国潮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在文化方面，大量的潮州人在泰国的存在，使“潮州文化也随之在泰国社会广泛流行，以致一般泰国人往往认为潮州话即为中国话，潮州饮食及文化即为中国饮食及文化”^[23]。潮州人在努力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努力把自己的文化融入泰国的文化之中，使之成为泰国文化的一部分，促进了中泰人民的和睦相处，有利于潮州人融入当地的社会。潮州人“与泰人通婚并在文化上与泰国文化进行交流融合，使泰人群体演变成具有经济实力和良好教育的华裔泰人，成为泰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使泰国社会结构更为完善”^[23]。泰国的拉玛七世国王（1925~1934）也曾说过：“实际上，泰人和华人可谓真正的兄弟民族”^[24]。泰国诗琳通公主曾赞颂泰中友谊是“中泰手足情，绵延千年好”^[24]。文化的融合，对于中泰一家亲关系的形成起着粘合剂的作用。这种文化的融合，尽管泰国政府一度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采取了一些同化政策，但从潮人方面来说，不是潮人有意推行，也并非通过暴力来实现，而是靠中泰两国人民在和睦相处的过程中，相互融合，而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其中，既和泰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关，也与潮人在政治上不会对泰国政府造成危险有密切联系。因为“华侨和平善良、无野心的性格”，“在暹罗政府看来，同这样的侨民往来是不会产生任何政治上的危险的”。^[27]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上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有着借鉴的作用。

- [1] 范如松, 东南亚华侨华人,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 [2] 余定邦, 潮州人、潮州港口与清代中暹交往, 郑良树,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3] 余定邦, 郑信与清朝政府的关系, 潮学研究第6期,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 [4] 乃挽限·信拉巴阿差, 贺词, 泰国中华总商会, 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85周年暨新大厦落成揭幕纪念特刊, 曼谷: 泰国中华总商会, 1995.
- [5] 朱振明, 许敦茂与中泰关系, 泰中学刊, 曼谷: 泰国泰中泰中学会, 1999.
- [6] 侯志勇, 泰中手足情谊万古长青, 泰中学刊, 曼谷: 泰国泰中泰中学会, 1994.
- [7] 朱振明, 中泰关系史概述, 泰中学刊, 曼谷: 泰国泰中泰中学会, 1994.
- [8] 修朝, 中国戏剧在泰国, 泰国华侨华人史第二辑, 泰国曼谷: 华侨崇圣大学泰中研究中心, 2004.
- [9] 吴凤斌, 潮人在泰国的发展与贡献, 饶宗颐,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10] 朱振明, 中泰关系史概述, 泰中学刊, 曼谷: 泰国泰中泰中学会, 1994.
- [11] 葛治伦, 《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 周一良, 《中外文化交流史》,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12] 恩裕, 中国药品在泰供销忆述, 泰中学刊, 曼谷: 泰国泰中泰中学会, 2001.
- [13] 黎道纳, 泰国潮人宗教信仰探究, 李志贤, 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 新加坡: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2003.
- [14] 吴凤斌, 潮人在泰国的发展与贡献, 郑良树,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15] 哇拉塞·玛哈塔诺本, 暹罗的华人文化——1885-1910年的活动与演变, 泰国潮州人及其潮汕原籍研究计划第二辑: 汕头港(1860-1949), 曼谷: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1997.
- [16] 龚群虎, 泰语中的潮汕借词的义类, 饶宗颐, 潮学研究第8期,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 [17] 邓永正, 19世纪中期以前泰国华人经济概述, 泰国潮州人及其潮汕原籍研究计划第二辑: 汕头港(1860-1949), 曼谷: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1997.
- [18] 陈历明, 明清实录潮州事辑, 香港: 艺苑出版社, 1998.
- [19] 张映秋, 潮汕澄海人移殖泰国的历史发展, 泰国潮州人及其潮汕原籍研究计划第二辑: 汕头港(1860-1949), 曼谷: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1997.
- [20] 陈树森, 祖籍潮州的泰国华人对泰国米业发展之贡献浅析, 郑良树主编,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21] 罗晓京, 1910~41年泰国对华贸易与汕头, 泰国潮州人及其潮汕原籍研究计划第二辑: 汕头港(1860-1949), 曼谷: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1997.
- [22] 段立生, 郑午楼传,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4.
- [23] 奈攀·占塔哇匿, 序言, 泰国潮州人及其潮汕原籍研究计划第二辑: 汕头港(1860-1949), 曼谷: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1997.
- [24] 陈建敏, 我又见到了诗琳通公主, 泰中学刊, 曼谷: 泰国泰中泰中学会, 1999.

試論和平后泰國僑批史演變

(1945—1955)

。 洪 林。

暹羅僑批歷史，已歷經百年演變。民元以前，暹羅經汕頭之僑批已開始。昔年，羅僑批伊始，乃回鄉梓而流寓海外之潮汕移民，為生計為贍養家人胼胝在異地，有積蓄即掛念親人生活之困苦，於是，有了批信之往來。這種批信之主要渠道，早賴川走海上、陸地，有一定資產的華僑，乘回鄉之便，為人順便攜帶接濟錢銀、信，故謂之為“客頭”。此乃僑批之起源。由於移民逐漸增多，華僑這種寄錢回形式與日俱增，於是逐漸有人專門從事收批、批銀工作，僑批局也就隨著歷史之變而應運而生。

暹羅僑批可分為萌芽期、發展期、沒落期三個階段。上述，可歸為萌芽期的開階段。

這裡，主要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泰國僑批演變歷史，俾供參考。

我們知道，僑匯無論從僑眷生活來源的經濟觀來說，抑或從安定農村經濟來看，具有其歷史意義。泰國凡從事僑批業者，在溝通唐山、南洋的經濟、文化以及親，是一道十分重要的橋樑，我們應該肯定他們立下的汗馬功勞。在一個時代的特定意義來說，僑批史是泰國僑史最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份。探討僑批史，是歷史使。

和平後，泰國僑批業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這時期是二戰前三十年代蓬勃發展的繼續。和平後的1946年，泰國的批局大略統計，有160多家，不到200家。由抗戰時期僑匯中斷，家鄉仰仗之生活來源頓時中斷，幾致使家鄉親人了無生機。此，一和平，遠渡重洋求生之僑民，通過種種渠道匯款回唐，以濟嗷嗷待哺一家小。斯時，泰國僑批界活躍一時。

這裡，摘錄1945年8月15日到10月3日中原報幾則啟事，也許更能說明和平僑批是如何“起家”的。

1945年8月15日中原報廣告

張伯周啟事

啟者目下大局平定路途暢通鄙人準定不日直行返梓，約中秋節間，可達梅縣。諸親友如有委託，向家中報告平安信者，鄙人當踵府送到，以慰注念也。
通訊處：天外天街文文印務局

1945年8月23日

介紹敝夥回國啟事

梁銘修君任職敝行行歷有年平素品行端正誠實可靠現擬於最近返國諸親友如欲代報平安消息者，請移玉至新城門廖美和行接洽可也彼當踵府送過我屬人士恐未周知謹此奉聞

廖美和銀器行啟

1945年10月30日

陳經愛啟事

家兄經孝此次來還訪親，擬于最近返梓。諸兄弟親友如欲委託事項及銀信者，請駕臨高亭戲院前泰律公司接洽，無任歡迎也

1945年10月11日

侯振利銀業啟事

金 決於最近期間（約下月底）回梓省親。諸親友如有平安信件或其他事項相托者不論梅縣、興寧、豐順、大埔、五華，均當竭誠代為辦理。致以本號店務一切交托宗兄泉康及舍弟潤詩暫為料理。此啟

曼咯萬茂交通警署對面門牌27號

15 年 10 月 3 日

新大陸洋服行民信部廣告

本銀信部接受瓊屬各縣托信，即日專人由陸路運梓，進行派送。
現開張伊始，批價從廉，回批快捷，諸君光顧，無任歡迎。

萬華信局

專收潮梅各屬匯兌歷念余年快捷妥當早承僑胞贊許茲應
僑胞教鄉期望減低匯價特派張選青君回國帶送

黃橋下面

代理處：耀華力華窩里皮店

根據以上幾則簡單的啟事來看，和平後的僑批界似乎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似近於“單幫”，與正式批局有截然不同的經營方式。然而，也可從中看到，和平的泰國僑批界（正式掛牌的或不掛牌的非正式者）的活躍程度。

泰國僑批界在活躍的背後，也出現某些問題。這裡，根據 1946 年刊於中原一則廣告，是暹京榮豐利匯兌批有限公司的啟事，來窺看問題所在。由於戰事關，於 1944 年寄出之批包在和平後才發覺被遺失。這批批信列“歲它騰律呂調陽生水”等字，公司派專人赴唐，得於 1945 年底補發清楚，但回批信卻尚有人未領回。張明汕先生說，批局往往“放數”，以照顧貧苦寄批人，但常常遇到不來領回批。他說，積了多年的批信不敢處理，總希望日後有人來取回，卻總是盼望落空。據張先生之敘述，可知僑批局為了賺幾個錢不易，每每得有七分冒險，這是批局碰到的問題。然而，批局的成長率還是相對的高。

現在，我們根據 1948 年一份資料，來說明當年僑匯情況。資料指出，1947 年泰國僑匯全年的統計數字，從泰國發出之批信總共 1,530,250 封，批銀 4 億餘銖。這個統計數字只到 1947 年 12 月 16 日，16 日後到 31 日尚有二幫批未包括在內。這樣一匯款數字於旅居泰國華僑人數來說（據不完全統計，和平後從潮汕等地移民泰國的，約有 300 萬），平均每人每月只寄 11 銖左右。對於必須負擔贍養家庭寄家者，還不到四分之一；若從區域說，泰國華僑以潮汕人為著，當年，全曼谷有 113 批局，其中潮屬佔 83 家，其他如廣、瓊、客、福建各屬的總共只佔 30 家。因此，如潮屬批局每家每幫批的最高數字達一千封，那麼其他各屬大約只得二百封。從裡看到，潮人華僑人數眾多，佔了優勢，但不等於其他各屬在經濟上不如潮屬。一點，我們應有充分估計，才不致得出錯誤判斷。

因此，和平後，華僑大量匯款回家鄉，其實並未有絲毫損害到泰國社會經濟，

我們從以上的資料可以了解，華僑寓居泰國，在胼胝底下，開荒耕作，將荒地變作良田，為泰國社會製造財富。當年，泰國名經濟學家拍沙拉塞說過這樣的話，華僑是世界上最低廉的勞動力，估計每人每年為泰國開發的資源不少過 200 銖的話，而匯回唐山家鄉的只不過 25 銖，那麼成為泰國經濟財富的是 175 銖。因此，暹國不但不應排華，而且更須鼓勵華僑大量來暹，使暹羅更能開發，更加繁榮。這位經濟學家有眼光地中肯地指出經濟上的利弊，十分有其歷史意義。

然而，1947 年泰國僑批界雖是歷年來最為興旺的一個時期，但卻因來勢太猛，以致出現某些問題。泰國華僑社會有這麼一句俗話，“唐人生理無三日好。”正好說明斯時僑批界已開始醞育著一個危機。由於和平後寄批人眾多，僑匯生意好賺，不少華僑爭先恐後成立批局或兼收僑批的銀信部，乃致使整個僑批界處在山雨欲來局面。這種山雨欲來局面終於逐漸演變成僑批界一觸即發的危機。斯時，由於金融界某些投機份子掀起金融風潮，加上內戰激烈，使批價一落千丈，不少僑匯轉入地下，尋找其他出路。從所得資料看，當年僑匯款額百分之九十是匯回唐山親人作為生活費的，用在其他方面者甚少。金融風潮過後，出現的投機交易達到高峰。三勝一帶新開張的批局確如雨後春筍，有些批局開始採取投機手段，而昔日以信用著稱的批局，也被捲入其中。因此，危機開始出現。這種危機狂瀾來自各種因素，其中有的因托售汕匯虧蝕過重，而造成週轉不靈局面，致相繼倒閉。在倒匯中受到沖擊的，有熊常興、同裕昌、廣源和記、錫豐、協成興、遠洋等相繼倒閉，使整個僑匯界受到震撼。根據當年中原報新聞報導，倒閉數額達 2000 萬銖以上。時為 1947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

泰國批局倒風為期不長。十月份，根據中原報一家所刊出的約 10 家批局廣告可以看到，批業界開始活躍。各家廣告招徠術語與手段不一，其中包括“信用保家”、“交款迅速”、“忠誠服務”。“穩當可靠”、“回批快捷”等最常見，頗有“本批局最好”之概。縱觀這一時期，僑批界似乎又呈現生機。然而，到 1949 年 4 月間，僑批業又出現重重難關，斯時僑匯界出現的危機已到爆發邊緣。這是繼 1947 年金融風潮以後新的一次演變，若批業界不進行自救，前途是悲觀的。在出現退批及停收批之情況後所造成的局面，宛若陷入半身不遂症。其主要原因，乃因改收港幣後，利益微薄，營業收支難相抵等因素，致僑匯數額逐漸減少，退落約三十波升。據調查資料，從二、三月間的批局虧本者幾佔 90%，能獲微利或收支尚能維持平衡者，不及 10% 的狀況來看，泰國批業界遭受嚴重打擊。僑匯數額何以逐漸減少，其中主要因素有三：一是華僑對僑匯的保值問題，二是要求便當，交收快捷。三則因當局迫遷工廠等命令發出後，數萬工人失業，寄批驟減。倘若出現任何一方因素，倒風隨時都有可能襲至。

從 1949 年 6 月 14 日的新聞報導，泰國批局處在風雨飄搖這樣一個局面，不僅不面對現實，共謀解決途徑，而且還續削價之風，將存在的危機推向深一層地步。

根據1949年12月22日中原報新聞報導，其標題為“一幫不如一幫，僑匯危機深刻”，小題是“批局結束者又將有幾家”，說明泰國僑批界正處在一個十分艱的局面。從這裡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批業界，由於出現諸多問題而遭受嚴重挫，不少批局面臨渺茫前途，何去何從難以抉擇，一些難以維持的批局選擇自動停之途，以免血本無歸。然而，歷來銀信局有其歷史淵源，亦自不容一筆勾銷其所作用。總而言之，1949年是泰國批業界厄運的年代。

1949年12月以後，因為剛成立的中國政府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多少給泰國僑批帶來新的困境。但是，政府在僑匯政策上有新的規定，對華僑匯款有照顧，因此，國僑匯數額有所增長，增加了此間批局的信心，開始持樂觀態度。中原報於1950元月13日題為“僑胞寄家批是時候了！”的簡評中指出，汕頭當局為遵行中央人政府全國統一僑匯方針，一律以人民幣優待僑眷。說明中國政府是關心人民的。於這樣，泰國的批業界開始活躍。同時，隨著形勢變化，五十年代的泰國銀信局構，亦產生新的變化。

從1951年到1954年這幾年間，僑批界因紛爭不已而出現一片黯淡前景。19523月19日泰國政府第四份統制外匯部令頒佈，又使批局陷入另一個困境。據資料，52年9月2日，曼谷70多家銀信局受到統制外匯影響，均全部自動停業。影響所，僑眷接濟斷絕，批局放帳難收，對泰華社會構成嚴重打擊。

暹羅華僑銀信局公會為此向財長陳情，請求讓70多家批局及內地代理處有機會續營業，以濟三百萬華僑眷屬得以生存。1952年4月12日財政部在覆華僑銀信局會信中指出，銀信局之業務為代寄往國外贍養家屬者匯集信件及款項，為不抵觸制外匯條例者。因此為批業界繼續營業帶來新的生存希望。是月26日批局復業，幫批寄出，並顯示批封數比前有所增加，平均約增加40—50%，批局生存有望矣。好景不常，6月25日，不少批局因未領匯兌執照者只好停止收批。斯時華僑銀信公會曾根據第九份部令發出這樣的通告：“為通告事。案：據財政部於本月19公佈第九份部令第五條‘非經財政部長批准者，禁止任何人經營外匯、外鈔、信票’之規定，……，公會即席通過：凡我會員未領得財政部長批准之匯兌執照者，自即日起，停止收批，免干法紀。”曼谷的銀信界又一次人心惶惶。

1953年1月17日，泰國內閣通過決議，由國家銀行對銀信局實行控制，儘管如風風雨雨，從1950年到1956年，新成立的銀信局仍達15家，正是有人歡喜有人。

1953年1月份的一份統計，華僑銀信局公會屬下會員名單60餘家，比1951年減少20餘家，1952年只存40家，正準備停業者3、4家，因寄批人日見減少，形勢有新的變化。13日當局扣留僑批事件，事態嚴重，變化微妙。各屬銀信局代表聯請陳弼臣代為進行疏通，爭取發還僑批。經陳先生奔走後，得到答覆卻是遵循上命令，未給予確實答案，徒增銀信局更大擔憂。同時，本月份批局遭警方搜查，

並有四家批局的人被捕者五人，包括新華利羅介藩、振潮興陳府弼、南昌隆陳培南、和和許子衡和許培豐五人。被捕原因不詳。是時的二幫僑批被特別部查封，使數十家批局的營業完全陷於停頓。事件發生後，曼谷各屬批局已全部停止收批。年關在即，僑批被扣留，批局停止收批，為千萬僑眷賴以生存的生活費受到嚴重損害，因此，銀信局以銀信局公會會員名義又聯名呈文警廳，請求放行被扣留僑批，並解批局困境。

然而，批局已面臨一個多事之秋局面。第四份部令的頒佈主要在於實行嚴格管制批局的營業，目的在於採取外匯集中，必要時批信只准用明信片方式，批局須申領執照，未獲批准的批局不准營業。1953年2月4日，泰政府宣佈取消私營外匯後，同時只批准永順利、永華利和永興利三家銀信局繼續營業，並按規定向亞洲信託公司購買外匯。部令發佈後的批業界發生巨大變化，原有批局的存在已屬不合法。從2月5日石龍軍路、耀華力、三聘街以上三家開始正式收批來看，批業界已起新的變化，批價抬高，很有可能產生二盤、三盤或地下批，華僑十分關注這個重大變化，各屬僑胞均希望自己各屬有銀信局，俾減少寄批手續的麻煩。

殊不知於二月五日晚，由永順利、永華利和永興利三家批價所收的二千餘封僑批被海關廳扣留，理由是未接財政部命令。這突起風波，使僑批界呈現多事跡象，僑批又幾致中斷。華僑銀信局公會呈文中華總商會，陳述維護僑批作為溝通家鄉音訊之轉接站，保持僑胞與親人之直接聯係等利害關係，若中斷則影響家鄉眷屬贍養不繼，同時亦影響批局從業員及其家屬成千人之生活無所依賴，陳情以上祈代向當局請命……。至三月，財長覆文後，批局出現一線希望。東北線火警公會主席、大城銀行行長王慕能為此亦為數十家僑批局之營業問題奔走，使之不致停業。然而仍無法獲得批准營業之執照。財長表示，最好銀信局進行合作。因此，王慕能建議批局聯營，以解決三家與四十餘家批局之間的利益衝突，但不容易取得協議，最後，“信聯”還是成立。“信聯”成立後，以己為中心機構，並以17家批局為經收批員。至此，泰國批局分據局面基本敲定。至四月22日，中原報新聞報導，“信聯”改組，從一個公司改為三個公司，在全體批局中產生五名董事，分工合作，協理各公司事務。同時，任何一家批局可正式收批。當然，“信聯”不是正式的僑匯機構，只是財政部發給三張執照所組織的一個辦事中心機構，以指揮全體批局業務。時“信聯”董事長為王慕能，董事財政陳弼臣。4月21日會議上，通過決議：董事15人，潮屬10人、瓊屬2人、福屬1人、廣屬1人、客屬1人，分三組掌理三公司業務。時“信聯”立場，一為數十家批局能如常營業，二是照顧僑胞寄批接濟眷屬。後因批局眾多且都有投資，所以董事由15人增至27人，其中潮屬21人、瓊屬3人、客屬1人、福屬1人、廣屬1人，共63家批局參與“信聯”，購批代表則為61名，“信聯”壟斷僑批界的歷史開始，而批局也暫時處在相對安定局面。然而，批業界多事，暗礁潛伏，亦是其時矣。

1954年12月15日，國行又變更管制外匯辦法，佈告中指出，“信聯”為被承為購匯代理人，凡寄批者須向“信聯”申請、填表，並填明身份証號碼，認可後能購買外匯，外匯數目不得超過一千銖。國行此一規定，為僑胞寄批增加了繁瑣之精神壓力，亦為批業界帶來諸多不便，使營業又陷入一定困境。總而言之，國僑批界正處在一個風雨飄搖時期。

1955年11月22日，銀信局公會呈文財政部，請求批准華僑寄批免填隨身証號，重發被吊銷批局營業執照，但未獲批准。從這裡可看出，銀信局公會在僑批界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24日，國行再通知“信聯”，12月3日起，寄批手續按定執行，不得馬虎。為此，29日“信聯”決議，遵守政府明文規定，但仍將向當請求給予寄批手續一如既往便利。然而，“信聯”卻因陳弼臣、王慕能相繼辭去副董事長，給僑匯界帶來一定難題，批業界因此擔憂重重。11月29日，“信聯”陳培南等為代表，面請陳、王二氏為僑匯界著想，繼續效力。陳、王二氏堅持原，只願在法律範圍內從旁為僑匯繼續謀安全。“信聯”內部問題的存在亦給批業界帶來一定困擾。

1955年12月22日，“信聯”陳培南仍在為寄批在一百銖以內者免填隨身証號一事努力，並請王慕能向財長陳情請求，最終獲准，為批業界和華僑寄批者帶來便利。

然而，從1953年到1955年的廣告、新聞來看泰國僑批界，幾乎是處在冬眠時，幾乎沒有批局廣告可尋，新聞也偶而見到，因此，這個時期表面看“風平浪靜”，事實並非如此，而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時期。

總而言之，五十年代的僑批界已從輝煌年代走向沒落年代，接近劃上句號的年份。然而，由於華僑有如斯割不斷關係，才產生僑批以及其歷史。縱使僑批業在七十年代已劃上句號，但起於鄉情止於交易這樣一個事實，仍然構成一頁抹煞不了的史。原暹羅銀信局公會理事陳紹揚先生說，他十幾歲已開始從事收批寫批生涯，到赤貧如洗老一輩華僑自己“儉生儉死”，攢幾個錢，逢過年過節寄批給唐山親，真是一字一淚。陳先生說到此處，當年那種寫家批的感人至淚下的情景，仍歷在眼前。張明汕先生說，當年華僑寄批不易，在碼頭當苦力者，時時夜宿碼頭，致難以為繼，還得在咬得菜根中，省下幾個錢，夜深時冒雨敲門，趕在收批前寄。這種感人至深的情景，至今仍叫人不忍當日動人處。

因此，僑批史是華僑史中一頁血淚史，寫僑批史是為承前啟後，讓後人明白華史尤是僑批史是一頁血淚斑斑的歷史，俾永誌青史。

公元2004年8月

註：本文參考資料來源：1945—1955年泰國曼谷《中原報》。

一份華僑抗戰重要文獻的發現 與一條“口批”歷史資料的勾沉

陳訓先

首先，從一份華僑抗戰重要文獻的發現說起。這文獻是一封1938年9月21日，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和駐粵辦事處代表潘漢年、廖承志聯合致澄海信寧旅泰青年僑領蘇君謙和他的同鄉摯友郭子綱、黃奕等三人的覆函。因他們在國家危亡的關頭，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全民族抗日的主張，毅然合作捐資國幣200元，支援革命聖地延安抗大（抗日軍政大學）作為辦學經費。覆函中對他們的“愛國熱忱”和義舉予以高度的評價，並“盼望”他們于泰國“鼓勵彼方青年前來（延安）學習抗日知識”。這封“覆函”字跡清楚，印鑑明晰，至為珍貴。今筆者將此函件，斷句并加標點，公佈如下：

蘇君謙郭子綱黃奕列位先生大鑒：逕覆者，頃代收到抗大捐款國幣貳佰元，當遵命轉交該校當局。先生等關懷祖國抗戰人才之養成，愛國熱忱殊堪欽敬！查抗戰以來，敵路軍除挺進敵人後方，實行游擊戰爭以牽制和消耗敵軍之外，鑒于抗日戰爭民眾運動各部亟需干部人才，故有抗大與陝公之設立。蒙海外人士不棄，紛紛賜予物質精神援助，兩校校務，遂蒸蒸日上。最近復大事擴充，決招收大批青年，特別歡迎海外華僑返國就學。關於抗大、陝公海外隔閡，多有不便之處，盼望先生等廣為解釋，鼓勵彼方青年，前來學習抗戰知識，則幸甚矣！

謹致

民族解放敬禮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駐漢代表：周恩來（蓋章）

葉劍英（蓋章）

駐粵代表：潘漢年（蓋章）

廖承志（蓋章）

九月廿一日

上述這份華僑抗日文獻，是革命老區澄海信寧村革命後代詹家鎮一家，珍藏了多年之外，前些年因該村編寫村史的需要而特地公開獻出的。它不僅對於緬懷老輩革命家周恩來、葉劍英的偉績，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於研究潮汕華僑抗戰和抗戰金融流通史，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據文獻收藏者詹歐波的兒子家鎮先生稱，原“覆函”還有一封信，信封上寫著：“廣東省澄海縣信寧鄉晨光學詹歐波先生收”；落款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緘”。但因“文革”期間，詹家被抄，“函件”也被誣蔑為“反革命文件”而被扣留，後幾經據理爭才得以收回，收回時信封已被失落了。但人們不禁要問，“澄海縣信寧鄉晨光學”是一所什麼樣的“小學”？詹歐波究竟何許人？他與旅泰青年蘇君謙、郭子綱和黃奕等人有什麼關係？據《信寧簡史》介紹：1924年詹歐波和蘇君謙、郭子綱、奕等一批進步青年在鄉中成立讀書——“郁聯社”，接著創辦“晨光小學”；以後，君謙等人赴泰國謀生，詹歐波卻一直留在學校任教並擔任教導主任。1938年潮汕下黨派陳培志到“晨光小學”發展黨組織，成立黨支部；青抗會陳維勤（建陽村）等領導也經常到校發動抗日宣傳工作。蘇君謙在泰國獲知這一消息，十分高興，和郭子綱、黃奕等人，合作捐款，並通過“晨光小學”詹歐波轉達延安抗大。這是這份華僑抗日重要文件的來歷與保存的基本經過。

但問題又回到泰國方面，這200元國幣的匯款渠道，是通過正常的僑批寄匯，是托人捎帶回來？詹歐波先生的後代不知道這件事。筆者近日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澄海建陽村“增順批局”的後人談及此事，終於把問題弄清。

原來，這200元國幣，是由建陽村在泰國開設的“增順批局”，用一種叫“口批”的方式，寄達詹歐波先生的。據稱，“口批”是該批局抗戰時期的一種特殊僑匯，一律都是“大額要款”才起用這種寄匯渠道，即寄批人只用“口頭”說定，交與後由執事在泰國直接面受最可信賴的“批腳”，這類“批腳”的任務是強記所帶款數目和收批人的名字地址就行了。最能干的“批腳”能夠一次記住幾十乃至上百個的“口批”，至於寄批人是誰？只有執事知道，“批腳”大可不管。因為其時日寇封禁嚴酷，倘若暴露，隨時都有砍頭的危險。至於批款用途，一律由寄批人自便，批局概不負責。“批腳”到達汕頭後，立即到對匯的“銀庄”，用代號或密碼“口頭”支取，然後分送各地。其時，“增順批局”對匯的聯號是汕頭“友信銀庄”，但做這類生意的金融機構極少，只有大銀庄才敢冒此類風險。“友信銀庄”便是寥寥幾家中之一家。由此可見，“口批”是抗戰初期的特殊產物，儘管它在歷史上一瞬即逝，卻大有存史勾沉之必要，其意義十分重大。

上述資料表明，從一份華僑抗戰的重要文獻的發現，到一條“口批”歷史資料的勾沉，進一步證明，“愛”與“誠信”，是我們潮汕人最優良的傳統和最優秀的品質。

注：蘇君謙，澄海信寧村人。著名抗戰愛國僑領。曾聯擔任泰國潮州會館第五屆、第六屆和第十三屆至十九屆主席。一生為中泰友好作出巨大貢獻。

2005年7月25日

蘇君謙郭子綱黃奕列位先生大鑒逕復者頃代收列抗大捐款

國幣貳百元當遵命轉交該校當局 先生等關懷祖國抗

戰人材之養成愛國熱忱殊堪欽敬查抗戰以來 敵路軍除

挺進故入後方實行游擊戰爭以牽制和消耗敵軍之外並於

抗日戰爭民眾運動各部均亟需幹部人材故有抗大函陝公之

設立蒙海內外人士不棄紛之賜予物質精神援助該兩校之各

遂蒙之日上最近復大專擴充決招收大批青年特別歡迎海

外青年返國就學關於抗大陝公海外函國多有不明之處

盼望先生等演為解釋鼓勵彼方青年前來學習抗
戰知識則幸甚矣謹致

民族解放敬禮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駐漢代表

周恩來



駐粵代表

潘漢年



葉劍英



廖承志



泰國的早期華人銀行

攀尼·布勒著

黎光遠譯

泰國學者攀尼·布勒于 1986 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佛歷 2475 年至 2516 年間泰國商業銀行資本家分析》，全書分四章，另有結論一節。第一章是“佛歷 2431 年至 2475 年間（公元 1888 年至 1932 年）帝國主義和泰商業銀行資本家的出現”，第二章是“佛歷 2475 年至 2490 年間民黨統治下商業銀行資本家的新面貌”，第三章是“佛歷 2491 年至 2500 年間商業銀行資本家的生存之道與炮一昇和沙立政治經濟集團尋求利益之道”，第四章是“佛歷 2501 年至 2516 間在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下進入壟斷資本時期”。

這本書，寫的是泰國銀行資本的歷史，但其中相當大的篇幅講的是華人銀行資本家的歷史。

譯者從研究華僑史的角度出發，對早期華人銀行的興起及其後來的失敗懷著深厚的研究興趣。我以為，早期的華僑為了和西方資本抗爭，曾經在金融、航運，乃至各種工業領域作過種種嘗試。他們失敗了，覆滅了，到如今已被人們徹底遺忘了。種種書籍文獻，不再講述他們的事迹，他們似乎是一群不識時務、竟然以燈臂搖車的笨蛋！

我却以為，他們當日敢於和西方新興資本抗爭的精神，值得吾人懷念。沒有他們的嘗試，沒有他們的失敗，就沒有泰國華人的成就，我把他們看作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先行者。我懷著敬仰的心情收集他們的資料，敘述他們的事迹。

攀尼·布勒此書第一章“佛歷 2431 年至 2475 年間（公元 1888 年至 1932 年）帝國主義和泰商業銀行資本家的出現”，講述的就是早期華人銀行資本家的事迹。

我把這一章單獨譯出，為了醒目起見，還另外起了個題目。

譯者識

公元 1855 年泰國與英國簽訂鮑林條約以後，王家壟斷對外貿易的現象從此終止，民間的國際貿易從此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西方商人於是把“銀行”這麼一種金融服務機構引進暹羅，為其國際間貿易服務，最先設立的是西方銀行的代表處（代理），摸清情況後才設立分行。1888 年 12 月 2 日匯豐銀行在泰國設立分行。接著，若干西方銀行也在暹羅設立分行。1904 年，暹羅國內資本開始投資銀行業，最早開

內是暹羅甘摩尊銀行，是當日暹羅國內規模最大的銀行。接著，從事國際貿易的人商人也開始設立銀行，只是，這些華人銀行不久就遭遇資金問題和缺乏銀行專壘等問題而停業。

凡此種種，下文將分別加以敘述。

外國商業銀行的出現（1860—1932）

1855年泰國與英國簽訂鮑林條約以後，泰國與西方的貿易增加，英國人首先進泰國經營銀行業。初期是以代理公司的形式出現，那時英國人與泰國有著巨大的易利益，最早進入泰國經營銀行業，亦可以維護其在貿易方面比較其他國家的優越地位。那個時期，泰國是英國和法國勢力之間的緩衝國。英國的大公司於是把商銀行也引進泰國來。

在1860年就已經建立代理公司的商業銀行如下：

英國麥加利銀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其代理公司是
A. Markwald & Co.

英國有利銀行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其代理公司是 Winsor & Co.

英國匯豐銀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其代理公司是 Juker Sigg & Co.

這些代理公司從事銀行的業務，收取存款，放貸、開出銀票，與此同時，公司身的業務仍舊在進行，只是進行銀行業務時，並沒有嚴格遵守銀行的規則，終於現問題，有的甚至倒閉。如 Juker Sigg 接收的存款，大多是定期存款，在曼谷的州人士和上層社會中信用極好，甚至政府也予信賴，存款達5000餘斤（chang）。稅官繳付稅款時，使用該公司的期票，政府亦照收無誤，然後才向該公司提款。來該公司不加管制地濫放貸款，最終不免倒閉。

後來一個時期，經濟形勢陸續呈增長趨勢。西方資本家認為，代理商已不能像行那樣有效率地從事其業務，於是調整其代理機構為其支行，理由有二，一是方調動越來越多的利潤；二是機構內的公司若是出現財政問題時，便於進行援助。

促使這些銀行建立支行的其他重要因素，就是泰政府修築鐵路的計劃。建造鐵的調查合同簽定的消息傳遍全世界，那些正在想方設法前來泰國尋求利潤的大國是非常留意，因為鐵路的修建說明泰國的交通建設開始了一個新紀元，貿易往來更為方便快捷。外國貿易公司看到了修建鐵路後的利益所在，例如，公司或外國府的工程師將前來尋求工作和機會。此外，鐵路的修建要有巨大資本用於國內外週轉，如工錢的發放、各種器材和建築材料的購置。因此，匯豐銀行於1888年首先在泰國設立支行，後來其他銀行才相繼開始支行。

這個時期前來開設分行的外國銀行如下：

1888年	英國匯豐銀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1894	英國參加利銀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1897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 Banque de L' indo-Chine
1909	四海通銀行
1919	廣東銀行
1920	英國有利銀行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這個時期經營進出口業務的大公司都是英國公司，如英哥沙炭公司、孟買帕麻公司、慕娘公司。這些公司與渣打銀行和匯豐銀行經常作業務來往，但與其他銀行來往甚少。至於沙炭甘瑪尊銀行是這些公司的備用銀行，而不是認真來往的銀行。而與東方匯理銀行來往的公司，多半是法國公司。

英國銀行的海外分行，其總公司在英國註冊，在英國內外各地設立分行。殖民地分行的經理其職務和地位與國內分行經理的職務完全一樣，一定要遵從總行的營業方針，同時接受總行在資本方面的支持，分行須把幾乎全部利潤匯回英國。此外，其營業還與英國外匯的起落有關。

這些分行的主要業務是商業服務，即接受存款，從兌換支票和發放信用中尋求利益。發放的信用大都是短期貸款，一般是有單據擔保的貸款，或給小規模客戶兌換支票。銀行發放貸款給從事國際貿易的出入口商人。因此，這些銀行對殖民地經濟發展起的作用甚是有限。

外國銀行在泰國建立分行後，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缺乏貨幣。由於當日的貨幣不足以滿足商業迅速增長的需要，為了減少貨幣不足和防止貿易的停頓，這些銀行於是發行鈔票，持有者可持本票到銀行換取金屬貨幣。匯豐銀行是首家獲准發行鈔票的銀行，首發日期是公元1889年5月21日。後來渣打銀行也於公元1898年發行鈔票，匯理銀行則於1899年發行鈔票。

銀行發行鈔票是為了方便在泰國的歐洲人的貿易罷了，因為貿易的迅速增長造成國內貨幣的匱缺。泰國政府在公元1902年9月19日自行發行鈔票時，便要求上述三家銀行收回所發行的鈔票。

由於外國銀行分行的目的主要是方便國際貿易，其注意力在於國際貿易和外匯買賣，而不關心接受泰人的存款，也不關心放貸給泰人，這些銀行的金融業務只管他們自己的貿易公司，因此這些貿易公司的營業甚有效果。與此同時，泰國經濟也受到新經濟制度的影響。由於西方貿易公司接踵而來，把重要的商品如大米、柚木、錫礦運送出去，這些公司入口的商品有布疋、化妝品、食品以及其他奢侈品，還有西方的種種新技術，如石油和機械。這些公司有銀行支持，成為重要的推動力，促使泰國的經濟需要更多地依賴對外貿易，從事生產這些公司出口的商品，購買這些

司進口的商品。

。泰國商業銀行資本的出現

由於泰國華人大米商和火礮主的業務有了長足的發展，在西方人前來投資銀行一段時間以後，泰國國內也開始集資籌建銀行，其目的主要是滿足國際貿易的需要。泰國商業銀行的出現與商業銀行發源地的歐洲的銀行不同，歐洲銀行的出現，主要是滿足其社區內部信用的需要，後來國際貿易發達了，銀行業務才有所發展，支持國際貿易。

西方貿易公司的到來，把泰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軌道，開展國際貿易。泰國的階層和華人資本家於是紛紛籌建銀行，以滿足事關重要的大米國際貿易的需要。這個時期泰國出現的商業銀行資本可分為如下兩種：

1. 沙炎甘瑪尊銀行，由貴族、大臣、華人和外國人組成；
2. 華人銀行，由國內從事貿易的華人組成。

這兩種銀行，其經營既互相聯系又有所區別，下面將詳細提到。其不同之處還定了上述銀行繼續存在抑或將面臨消亡。

1 匯商（沙炎甘瑪尊）銀行

匯商銀行是泰人的第一家商業銀行，由皇弟公摩萬瑪希拉差哈立台親王發起，成立於公元1904年10月4日，【譯註1】初期試辦名稱是讀書會（讀書俱樂部，BOOK CLUB），資本三萬銖。他邀請友人存款，年利百分之7.5，第一次動員到存款8萬銖。加上註冊資本，共有11萬銖。讀書俱樂部的業務僅限於國內，包括存款和借貸而已，試辦取得成功後才擴大為真正的銀行。這種轉變令當時控制著泰國金融的英國和法國銀行等外國銀行不高興，因為將損害他們的利益。

（【譯註1】沙炎甘瑪尊銀行由讀書俱樂部改名為沙炎甘瑪尊銀行的時間，有佛曆2449年1月1日說、佛曆2450年2月說和公元1906年說，其根據是該銀行1955年印行的創辦50周年紀念刊頁11，說是佛曆2450年，因此“佛曆2450年說”是正確的。至於佛曆2449年1月1日是當年檔案上注明的日期。那個時期，泰國的新年是4月；自公元1940年起，泰國才改以1月1日為新年（不再以4月為新年）。因此佛曆2449年1月1日，按新曆法應是佛曆2450年元旦，即1907年元旦。可見“公元1906年說”錯了，這是沒有把泰國1940年改變曆法的因素考慮進去的緣故。）

皇弟公摩萬瑪希拉差哈立台親王在奏文中宣稱：

“說到國家的銀行業，毫無疑問，如果泰人在這方面擁有多大的權力，那麼，泰人就可能擁有多大的自由。金融是國家保護民間利益的工具，軍隊是緊急情況下維護利益的工具。這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才可成為真正的力量。如果缺乏其中一種，就不完整。我國的金融業如同池塘中的水，有兩條渠港出入，一條是英國的大渠，另一條是法國的小渠。這兩條水渠的主人或許會關閉其水渠，那麼池中的水就會腐臭。這大渠，雖然有了小渠即法國銀行在，也不擔心，因為其價格還有油水，何況小渠淤淺，水流不暢，曼谷紀年 112 年（譯注，公元 1894 年）時，其主人還壅碍于渠，至今尚未淘干淨。如今池塘中的水浸淫日久，穿孔而出，甚至讓一些綠水流入，漸成大渠港，故不宜閉塞使之腐臭。何況如今海水還不時發“猶安癩”病，曾湧進來礙手礙腳。在英人心目中其想法如下：英國的政策是，對我們搞軍隊並不感驚異，因為英國是水的主人，可以關閉渠港。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也可開啟水，軍隊或許有力量挺胸而行。有水，開渠港，或多或少有水用。……”

英國出面反對泰人開設商業銀行，因為這所新銀行也從事外匯業務。英國建議說，如果開設銀行，那麼就僱用英國人。英國人一是反對，二是派人來管，因為這個時期商業銀行的主要收入來自外匯買賣。如果能夠自由地操作，新開銀行就可以壯大，可以從英國人那裡分得不少利益。

英國方面的問題終於很好地解決了，政府認為，有必要建立泰人自己的銀行，以保護國家的金融利益。公摩萬瑪希梭拉差哈立台親王邀請曾與外國銀行來往的稅務官來參與新銀行，他的理由是：

“……稅務官大都從事貿易，而且這家公司往往也和他們的利益相關。我之所以有這樣的念頭，因為他們可借給別人付利息，曾說過不如自己做（銀行）。他們大都不為（外國）銀行信任。他們中有些人，如拍耶博裏他們，要倒閉的時候，（外國）銀行都不支持他們。”

此外，公摩萬瑪希梭拉差哈立台親王還聯系英、法銀行以外的外國銀行，如荷蘭銀行 Deutch-Asiatische Bank、德國銀行和丹麥銀行 Dendanske Landmands Bank，這兩家銀行是作為歐洲國家銀行的代表來參股的。

在集合了貴族、大臣、商人和外國銀行的代表以後，匯商（沙茨甘瑪尊）銀行於 1907 年 2 月 29 日成立。註冊資本三百萬銖，分為三千股，每股一千銖，其股東名單如下：

- | | |
|------------------|-------|
| 1. 公摩萬瑪希梭拉差哈立台親王 | 503 股 |
| 2. 拍訥怕干希蘭吉 | 340 |
| 3. 荷蘭銀行 | 330 |

4. 金成利	314
5. 王室財庫	300
6. 丹麥銀行	240
7. 鑒巴訕厄算攀	110
8. 華人簡	100
9. 翁良榮 (譯音)	100
10. 蕭裕盛	78
11. 披耶猜耶育頌巴	77
12. 蒙昭比耶博里	68
13. F. Loks	58
總計	2,618 股

此外，為持股少於 50 股者。

銀行首屆董事會名單如下：

1. 鑒巴吉昂格尼 (蒙叻差翁門·打拉功) 為王室財庫代表
2. 鑒梭蓬碧差叻 (金成利，張見三)
3. 拍蒙里機乍吉 (天喜·沙拉信，黃天喜)
4. 拍訕帕干希蘭吉
5. 德國銀行代表 Mr. O · Lester
6. 丹麥銀行代表 Captain V. Gunbeck
7. 德國銀行代表 Mr. F. Killian

由於缺乏經驗，其經營要依賴外國人，首屆董事中，由德國人 F. Killian 擔任銀
要部門外方經理，拍訕帕干希蘭吉為泰方經理，拍蒙里機乍吉 (天喜·沙拉信，
喜) 為董事總經理。這種分工方式，造成外國人佔據銀行重要部門，泰方缺乏
部門的人才。這個時期的沙炎甘瑪尊銀行由外國人管理。

匯商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多次碰到麻煩，但由於王室財庫持大股，因此種種麻煩
在王室財庫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得以解決。而同時期的華人銀行遭遇同樣麻
但由於其資金少，缺乏支持，由華人資本合資成立的華人銀行終於紛紛倒閉，
若干大華商隨之企倒。

第一次，1913 年華人銀行的倒閉

1910 年，蕭裕盛 (差朗·奈耶納) 當選為匯商銀行的泰方經理。1912 年，他兼
察旺分行經理，這家分行建立的目的是在於增加收購票據的業務，這樣才能夠和
銀行競爭，以取得厚利。危機的出現是由於營業過程中過多依賴內部親戚關係，

放鬆了銀行財務制度，給予發生腐敗的機會。匯商銀行和華暹銀行簽署了透支協定(Overdraw)，同意互相接受支付款項。由於這兩份協定，蕭裕盛以匯商銀行分行經理和華暹銀行經理的雙重身份，挪用分行資金去幫助華暹銀行和他本人有利害關係的暹米火礱業務，這間火礱那時正處在接近倒閉的危機關頭。他動用存款人的存款，開出支票，匯商銀行的資金於是用完，存款人前來叻察旺分行提取存款時無法支付，造成匯商銀行本身搖搖欲墜。幸得拉瑪六世全力援助，才得以度過危機。

拉瑪六世的聖諭曰：

“……是交手問題，卻又十分重要，故派昭披耶戎瑪叻、披耶素帕功班那訕、披耶拉差沙梭蓬去召見乃差朗・奈耶納來詢問，問明拿錢去華暹銀行做什么用。如果需要查詢其它人，都可以叫來詢問。關鍵是，匯商銀行不能倒閉，華暹銀行可以倒閉。為了防止像昨天一樣，有人來提款取不到錢所造成的損失，在問題沒有弄清楚以前，可以先向王室財庫借款，或由財政部(Grasong Praklang Mahasombadi)暫付，以應付目前的損失。”

財政部大臣頌勒公摩拍占武里納立納由於恐怕匯商銀行倒閉將給王室財庫和當時的貿易帶來損失，於是充分合作，調動資金支持匯商銀行。匯商銀行這次損失實在大，根據頌勒公摩拍占武里納立納的奏章，匯商銀行損失約 200 萬銖，計給華暹銀行透支 40 萬銖，乃差朗・奈耶納挪用 1,681,000 銖。此外，所收票據中還有國外的假票據，以及本銀行客戶中的壞帳。

遭遇損失後的匯商銀行，其原有資本 3,000,000 銖如今僅剩 30 萬銖。為了維持其繼續營業，只得增資 300 萬銖，加起來其資本達 330 萬銖。原有持股人股份的價值減剩原有股價的十分之一，新股每股一百銖，共三萬股。

新股發行時，拉瑪六世按原來持股比例購買，以示支持，但由於某種困難，當日王室財庫沒有足夠資金按照規定依時繳納股款 1,635,000 銖，只得向財政部貸借。

借助於財政部的款項，匯商銀行於是得以重振，國王和掌管國家財務的大臣同心支持，匯商銀行終於能夠繼續營業。而同時期建立的華人銀行，由於缺乏類似匯商銀行的強力支持，於是全部倒閉了。

第二次，1931 年金融業遭遇風波

泰國商業銀行遭遇第二次危機發生在 1931 年，當年由於英鎊放棄金本位制，英鎊下跌。泰政府重新釐定泰銖與英鎊之間的匯率。匯商銀行在英國存放大量英鎊和英鎊本票，其所遭遇的損失約三百萬銖。銀行沒有足夠的儲備金以填補所遭遇的巨大損失。作為大股東的王室財庫因此也遭受影響。王室財庫廳長昭披耶是披博叻

納叻哥沙提波里稟奏拉瑪七世，聖諭准許王室財庫給匯商銀行無利息貸款三百萬。

除了同意借用皇上私人存款外，還諭令在此間銀行寄存大量款項的財政部按下旨諭行事：“鑒于存在問題，正在想辦法拯救匯商銀行，因此，財政部決不可作正常的取款，如有可能，還要按原來那樣存入。”

到了1932年，財政部也同樣遭遇財政問題，想從匯商銀行提款，亦礙於聖上手。當日的財政部長拍翁昭素帕育格森於是把此問題與王兄公摩拍甘烹碧厄卡拉育商量，然後上奏如下：

“基于聖上諭令財政部，在處理政府存放在匯商銀行的款項時，須按照佛歷74年12月14日編號33/383聖諭執行。如今，財政部資金短缺，不敷周轉，臣是求教於王兄公摩拍甘烹碧厄卡拉育庭，如果此時財政部想要提取政府存放于匯銀行部份存款，以解決財政部資金短缺問題，不知是否有何不便。臣獲得指示說，果數目不超乎尋常，尚可進行，但要預先通知。如果有時存入，有時提取，不是求提款，取消財政部與銀行之間的信任，那是可以的。臣的意見是，政府應該幫支持匯商銀行。至于何時須提取款項，以解決上述短缺，每次自當商量進行……”

由於國王和大臣們的支持，匯商銀行再次逃過這次金融危機。和首次危機一樣，動用王室財庫和財政部的資金，儘管負責全國財政的單位財政部於1932年遭遇大財政麻煩，但從匯商銀行提取其存款卻不順利，每次提款數量有限，而且還要先通知銀行，也就是說，儘管總的經濟很糟，還要全力拯救匯商銀行。

匯商銀行除了獲得國王和大臣的救助度過了兩次大危機以外，在開設兩所分行，亦得到有關支持。

1910年5月開設（洛坤）壹宋分行時，政府每年撥款8,000銖作為贊助費，初為時7年，總共56,000銖。這家分行建立後，由於業務額不大，不斷虧損，不久停業，在1932年3月關閉。

1927年1月清邁分行建立，開辦時向政府請求幫助：

1. 請求政府贊助分行的開辦費，共計3353.97銖；
2. 請求政府贊助分行每年30,000銖，為時3年，從1927年1月1日起。贊助每半年支付一次，每次15,000銖。同樣得到拉瑪七世的支持，皇上批示說：“同。准許按匯商銀行草擬的合同。簽署。”

綜上所述，從度過這兩次金融危機和分行的開設，可以看到匯商銀行和國王大的良好關係。

2 華人銀行

對外開放，接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入，造成外國貨進入國內市場和收購物產輸出外國去的差距。這種差距繼續擴大，促使西方資本家需要代理商以進行經濟侵略，於是產生了資本家代理人或買辦 Comprador。西方買辦的主要任務是，出口業務、進口業務和銀行業務。

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華人買辦資本家取代西方商人，掌握大米貿易。1855年鮑林條約的簽訂是中國人的黃金機會，初期，出口的大米來自華人的手工米磑。由於蒸汽機火磑（碾米）的出現，火磑事業為西方人控制。例如，1858年美國人的阿拉干火磑和曼谷火磑，1864年德國人的瑪寬火磑，1866年英國人的史各脫火磑，1867年還有一家不明公司名稱和主人的火磑。這5家火磑都是以出口公司形式出現，在曼谷從事出入口業務，是第一批引進歐洲火磑機器，從事火磑業務，出口到外國。後來還有一些公司從事火磑業，例如，慕娘公司、溫莎公司、耶社直公司和阿拉干公司。

西方人的火磑進行一個時期以後終於遭遇問題，無法與控制著國內市場的華人商人競爭。西方人不再擴充火磑業務，火磑業務逐漸落入華人手中。英國領事於1870年報告提到，有消息說，華人船主從英國引進大量碾米機器自用。1877年，英國領事又報告說：

“不久前，外國人獨資為火磑主，獲利巨大。如今不知疲倦的華人也設立火磑，他們不但成了西方重要火磑的主人，而且還是船務貨運、保險和其他業務的主人。這種變化，造成西方人在火磑業中失去其地位。”

公元1879年，和西方人的火磑一樣，華人火磑也在增加。1889年，曼谷及其周圍有華人火磑15家；到了1895年，增加到23家；1912年超過50家。與此同時，多數西方人的火磑賣了給華人火磑主，有的遭受火災後不再重建。約在1912年，西方人的火磑僅剩下3家而已。

華人之所以能夠在火磑業方面取勝，是因為華人能很快向西方火磑業學習，而且能夠控制米業。此外，泰國米的國外市場主要是新加坡、香港和南中國，進口泰米的公司大都是華人公司。約1880年，這些火磑主能夠輸送大米給自己在國外的進口公司。1897年英國領事報告說：“歐洲人在東方擁有的貿易特權根本無助於和華商競爭，他們詭計多端，尤其在大米貿易上更是如此。”

華商大米貿易的擴展，促使了貿易資本和信用的需要，因此，約於公元1907年，火磑主人和從事對外貿易人士相繼成立銀行，這個時期成立的銀行有四間（在此之前，都是一些主要從事批業的小銀莊）如下：

1. 蕭裕盛公司成立於1907年，即後來的華運銀行。

2. 蒙通銀行成立於1907年。
3. 源發利公司成立於1909年，即後來的曼谷 City Bank。
4. 華暹資金銀行成立於1910年。（曼谷 City Bank 和華暹銀行合併而成。）

這四家銀行都是小銀行，主要是為了支持投資人的業務而設。投資這四家銀行彼此都有貿易往來。這四家銀行開設後不久，由於資金有限，加上經濟的起伏，尋常不悖業。這群投資銀行的華人同時從事兩項業務，一是從事對外貿易，另一群則從事包稅。當國際貿易和包稅制度沒落之時，這些銀行就遭遇麻煩，加上政府部門不關心，不像關心匯商銀行那樣，這些華人銀行於是無法維持而關閉。

四家銀行的投資人

華暹銀行 原先，蕭裕盛（差朗・奈耶納）（蕭裕盛或差朗・奈耶納曾分別在英、泰國和曼谷華校讀書，曾在數家金融公司任職。）開了一家商店名叫裕盛興，來銀行業興起，於是於約1907年把此商店擴充為銀行，資本為50萬銖。裕盛興三聘小商販中招攬生意，迅速發展成為華人商人銀根週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銀行。1909年2月21日增資為300萬銖，並更名為華暹銀行。為了滿足華泰商人的需求，蕭裕盛發動存款活動，定出窮人也可以存款的規定，接收一銖以上的存款，稱儲蓄存款。蕭裕盛邀請華商數人參與其銀行業務，其1909年2月21日董事名單如下：

鑾拔蓬碧差叻（金成利）（譯注：華名張見三，潮安人張君丁獨子）
鑾巴訕厄宣攀
鑾維呢巴實威
乍蒙瑪哈勒
通耶（利清棧）
新加坡廣安泰行（拍披汶）
蕭裕盛（裕盛興行）
簡源發
元源興
陳光第（拍披汶的常記）
汪盛南
香港祥泰行（拍披汶）

華暹銀行這一任董事局的組成有米商和火礱主若干人，其中有在香港和新加坡分行的，如拍披汶博他那干（陳光第）。

蒙通銀行有限公司 發起人名叫乃車·杉帕干，最初設在佛統（大塔），那裡是泰國稻米生產基地，資本40萬銖，分為400股，每股100銖。

發起人名單如下：

鑾梭蓬碧差叻（金成利）（張見三）

拍室利艾耶沙旺

乃展

坤阿春拉提

拍拉差帕里

蕭裕盛

平·提帕叻沙

鑾約他探瑪拔得

這家銀行成立以後，沒有什麼突出的事蹟，可能和乃車·杉帕干破產一同倒閉。

曼谷 City Bank 原名源發利銀行，發起人是雲金發，或叫哥碩·雲達軍，他集合了同操海南語的商人，於1909年成立此銀行，註冊資本是200萬銖，實付資本為50萬銖。發起人名單如下：

拍杉帕干希蘭吉

坤是汪拉叻

簡源發

鑾巴訥厄宣攀

雲金發

元源興

銀行董事局由如下人員組成：雲金發、簡源發、乃汶律。雲金發擔任經理

（雲金發為海南僑領，於公元1903年開辦汽水廠，1906年時開辦雲瑞和藥房。1908年參與暹華汽船航運公司，任職公司經理。1909年與海南商人共組曼谷 City Bank）

City Bank 與火藥和新興商人往來，與沙炎甘瑪尊銀行（匯商銀行），尤其是蕭裕盛本人交往，那時蕭裕盛擔任沙炎甘瑪尊銀行的泰方經理。City Bank 不久就遭遇困難。1909年和1910年間，泰國在經濟上碰到若干問題，國內貿易停滯，連續數年收成不好，對經濟和以米為主的出口發生重大影響，泰國商人虧本嚴重，不少人終於倒閉。放貸的銀行無法如數收回其貸款，尤其是曼谷 City Bank。公司重要人物的經濟地位不穩。公司放貸給發起人拍杉帕干希蘭吉，放貸給股東元源興經營其火

業。結果，元源興虧損後死去。而簡源發借款去投資暹羅海運公司，大量資金積在海運公司而無法收回，於是倒閉，光是這兩家債務就達 50 萬銖。與此銀行相關的拍杉帕干希蘭吉於是衰落，關於這間銀行的謠言四起，大量民眾前來擠兌。為防止對銀行業的影響，以及與裕盛興銀行有關的元源興和簡源發的倒閉，華暹銀即裕盛興銀行於是伸出援助之手。

乃差明（蕭裕盛）這樣說：

“……援助一事要趕快全力以赴，也就是說，要讓存款人在各個分行取回存款目達 512,756 銖。曼谷 City Bank 的儲備金已經沒有了，只留下債戶名冊，經多次從仍舊無法收回的款項達 1,947,116 銖。此後，有關曼谷 City Bank 的消息才逐漸起來。”

後來，華暹銀行終於把曼谷 City Bank 接管過來經營，並改名為華暹資本銀行，問題仍舊層出不窮。最終，還是因為資本問題和國際市場的起伏而遭遇致命打擊，於倒閉。

華暹資本銀行是蕭裕盛自作主張建立的，沒有召開董事會。蕭裕盛一直是頭頭，暹資本銀行的業務一直是由蕭裕盛說了算。此外，蕭裕盛還用了拍耶他那瓦里、耶厄沙瓦波里、拍耶叻沙達君哥頌和拍派訕那瓦功四人的名字來持有其個人股。還讓拍耶他那瓦里、拍耶厄沙瓦波里二人為董事，而這些人對銀行業務一無所要用錢都是蕭裕盛的錢。蕭裕盛本人還擔任匯商銀行分行經理。

後來，為了幫助他的華暹銀行在發生第一次危機時不致倒閉，終於引發問題，使匯商銀行幾乎倒閉。

華暹銀行的倒閉是由於利用銀行週轉以幫助自己和同伙的業務，當這些業務遭麻煩時，當然也就影響到銀行。

問題起自乃通耶或鑾集占儂瓦匿，他當火礮業的領導人好幾年，其火礮用的就乃通耶為字號。他是最早把大米銷售到歐洲去的華人，而且當時是生產大米數量上的人。公元 1911 年，他的大米生意出現資本短缺的問題，他和歐洲商人簽訂了約，預售了一批大米而且收了部份訂金，他估計大米價格將維持不變，可是大米漲價了，他於是虧本了。華暹資金銀行的蕭裕盛出面幫助他，借款給他，而且還買了乃通耶的大米貿易合約。但是，由於乃通瑪雅的投资規模過大，而國內米價極高，乃通耶的地位還是無法保住。由於合併曼谷 City Bank 以後，要承擔其債，華暹銀行本身的地位就不夠穩定，這回也跟著倒閉，與銀行有關的其他人士一連累，其中最主要的是張見三（鑾梭蓬碧差叻，金成利）和鑾拔汶博他那功。

對於這次災難，蕭裕盛（乃差隆）是這樣說的：

“起因是簽訂了出口大米的合約，估計米價時以過去八年至十年間的米價為利潤還相當好，以為可以大富一場。但卻成了我們的大災難。兩三年前，民眾沒有收成，大家都記得米價貴極，還沒有米賣，更不用說做買賣。民眾連吃都

沒有，有的甚至餓死……。而和我們簽約買米的洋人催著要米。如果得不到貨，他就要我們倒閉。無論如何，要是倒閉，就虧本得兇，還是老辦法，只好維持著。華暹銀行只得墊付稻谷款，買來墊好蝕本賣出。又有誰能代勞，只有華暹銀行，也就是我本人，乃差朗・奈耶納……。只好要求鑾集（乃通瑪耶）請求皇恩浩盪，向國王財庫抵押其財產，得到部份錢以還給鑾集在歐洲債權人鴻先生，至於華暹銀行本身的債務，錢不夠，只好短缺鑾集那部份約 30 萬銖，連同原先的損失，一共損失 100 萬銖。”

由於要遵守與漢先生為代表的歐洲公司簽定的售米協定，乃通瑪雅欠下巨額債務，欠王室財庫和匯商銀行 1,070,000 銖，其中 80 萬銖已經蝕去，只剩下 27 萬銖。此外，還欠拍耶叻沙達功哥頌 5 萬，裕盛興 22 萬銖，常記（拍拔汶博他那功）13 萬銖，鑾梭蓬碧差叻（金成利，張見三）3 萬銖。另外還欠漢先生。乃通耶或鑾集占儂瓦匿的債務促成所有的債權人成立暹羅火礮公司，對其業務進行管制。

暹羅火礮公司成立於公元 1912 年 3 月 24 日，註冊資本 1,915,000 銖。合資人有：

鑾集占儂瓦匿（乃通耶）	1070000 銖
拍耶叻沙達功哥頌	50000 銖
裕盛興（乃差朗）	20 萬銖
常記（拍拔汶博他那功）	18 萬銖
鑾梭蓬碧差叻（張見三）	3 萬銖
現金（自華暹銀行）	135000 銖
總共	1915000 銖

所有股東都是鑾集占儂瓦匿（乃通耶）的債權人，部份資金在貿易過程中已經蝕去，剩下可供週轉的資金只有 685,000 銖，一是來自乃通耶典當其資產給王室財庫和匯商銀行剩下的 270,000 銖，裕盛興（乃差朗）和常記（拍拔汶博他那功）增加的 10 萬銖，以及向華暹銀行借貸來的 315,000 銖。

公司成立協定寫道，乃通耶為火礮經理，其權限僅在於管理礮米、買進稻谷和僱用工人，拍拔汶博他那功的常記代表陳光第是營業總經理，負責簽訂自火礮售賣稻谷的合約，負責公司營業來往帳目。常記在新加坡和香港有自己的代表公司，可以銷售送去的大米。此外，乃通耶的債權人 DD 漢的公司是歐洲大米貿易的代表。這家新成立的公司由乃通耶的通耶火礮和利清棧火礮進行業務。

暹羅火礮公司成立 33 個月，贏利 112 萬銖，但未能得到現金，因為其戶口在華

行，乃差朗將此款項全部用來扣除利息和所欠債務。後來，乃通耶不同意乃差羅火礮公司利用“匯單”的方法進行週轉：在票據到期後，收購票據者要到火礮公司收款。暹羅火礮公司根據在華暹資金銀行帳上餘款數目開出支票。但銀行沒有錢可付，票據持有者於是告公司破產，暹羅火礮公司不得不告銀行破產（原注：所謂“匯單”就是將輸送大米到香港和新加坡的票據賣給各家銀行，而曼谷的銀行取得現金。約 22 日，銀行按照所得票據將向香港和新加坡方面收款，增收百分之三的利息。）

華暹銀行缺乏週轉資金的原因，根據乃差朗的弟弟乃威還在法庭上所証時的說法如下：

“……十二月 13 日，華暹銀行週轉用的錢比平日多，因為新加坡廣益銀行倒閉。此銀行與華暹銀行有業務來往，華暹銀行的客戶十二月匯錢要儘量快，說是還新加坡銀行倒帳那一個月，客戶來說，在乃差朗那裡交錢，要証人付款。客戶是在証人這裡取款去。這些客戶曾經透支，華暹銀行的大客戶也曾一次透支數目。乃差朗命令証人這樣付款，証人以為，並不反常……。當廣益銀行倒帳時，才付款給客戶，因為新加坡銀行的客戶亦被催討債款，而新加坡銀行的客戶卻是華銀行客戶的債權人，故向華暹銀行的客戶討債。”

華暹銀行曾經拯救過的客戶如通耶、老萬成、萬興、常泰、常豐、常豐泰等，乃差朗開出的支票存根上，並沒有註明客戶名稱，總是數家客戶加在一起。華暹銀行本身沒有現款，而是乃差朗憑借有權代署，取自匯商銀行支的分行。只是，當人來分行取款時，匯商的分行卻無法兌付，終於導致查帳和控告，華暹銀行乃至倒閉。

華暹銀行的倒閉對市場有著重大影響，它掌握著大量的小商人和火礮市場。乃差朗說：曼谷市場的週轉資金不下于 2 千萬銖，在這個數目中，乃差朗以為，華暹銀行佔了四分之一。此外，華暹銀行還控制著四成的大米出口市場。因此，其倒閉影響甚大，三聘的小商人和各間火礮一片混亂，其狀況如下：

“如今市場生意，物價降低異常，如三聘一家商店，其財產價值估計 20 萬銖，人願意出售全部產權換取僅 4 萬銖而已。最為巨害的是有數十家店鋪，如價格 10 2 銖的傘，急于脫手僅賣 2—3 銖，15 銖的鞋子，僅賣 3 銖，上海紫色布每塊 9 只賣 4 塊五銖而已。巴拿馬帽每個 3 銖。還有其他貨物，無理地減價。原因只是，家銀行倒閉了，市場隨之震盪起伏。還有消息說，有的火礮每袋米賣 2 銖。如此重，可見銀根緊可能會帶來巨大災害。有的店主申訴說，如果是這樣，他也會遭因為他不能把貨賣得這麼便宜，如果他維持原價，那裡還會有人來買他的貨呢？是隨別人減價，又會蝕大本……。”

大米貿易亦和三聘的小商販一樣。報上消息說，11月6日的水上市場“稻谷下來約3千車，但只有9家火礮有錢入貨約1000車，火礮沒有錢付，但可以入稻谷者約30家，這一天，稻谷價格每車下降4—5銖。”

此外，昭披耶或瑪叻報告由於受到華暹銀行倒閉影響而停止營業狀況如下：

1. 乃通耶	4家火礮
2. 鑾梭蓬碧差叻（張見三）	3家
3. 老萬成	1家
4. 萬豐泰	1家
5. 源發盛（Mac Lom）	4家
6. 元泰盛	1家
7. 發利（Mac Neng）	3家
8. 常記（拍披汶與鑾沙吞）	3家
9. Teyinhock Steamship	8艘
大商行有：成順利	1
海華	1

華暹銀行的倒閉造成好幾位發家已久的大資本家根基動搖，最終不免倒閉，金成利就是最為突出的例子。

據以上敘述可以看到，泰國銀行資本家的產生，是由於國外貿易擴張到泰國導致國際貿易的擴展。泰國資本家大部份來自包稅官，他們起初擔當帝國主要的買辦和代理人，進口洋貨加以分銷，同時尋找外國資本所需的貨物出口到外國去。當貿易擴展後，泰國買辦資本的重要性也隨著增加，他們需要增加其信用，於是合資成立自己的銀行，以適應國際貿易擴展的形勢。當國際貿易衰敗，這群買辦資本家也就遭遇資金短缺的困難。這種現象不時出現。當這些買辦資本家的原有基礎——包稅官制度結束時，大資本家如金成利終於倒閉。而暹羅甘摩尊銀行（匯商銀行），雖然也與華人銀行一樣遭遇困難，但由於其大股東是王室財庫，資本比華人雄厚，加上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府，利用政府的財力加以支持，故每次都能夠逃過厄運，不致於象華人銀行那樣，遭遇倒閉的命運。

蘆溝烽火

一記“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

莊明崇

(一) 組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海外抗日情緒高漲，檳城《現代日報》曾聖提先生倡組“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回國從事戰地新聞報導工作。當年先生三十歲左右，氣宇軒昂，口才伶俐，能寫、能攝、能游、能跳，具備一個外記者充分的條件，活躍在星檳報界不在話下，但組團回國卻有困難，（一）團員沒固定收入；（二）炮火無情，生死要付之天命，在報館工作的記者大都已有家室，躊躇。曾先生不得已，只好求其次，從各地蓬勃的讀書會中找到四個既無家累又工作的廿歲出頭的青年小子，組成基本幹部，此四人為潮州人莊明崇、紀志文，粵人龍炎川，福建人駱德露，外加廿四、五歲、較為成熟的福建人辜洪濤，海南人XX（已忘其名），連團長饒平人曾先生，一共七人，組成這個記者團。

同年十一月，這抗戰後第一個回國的南洋新聞團體，便由星洲乘輪北返香港。轉道南京，但抵港時南京已告失守，乃決定經廣州赴漢口設立辦事處，展開工

一九三八年，適逢其盛，得以參加徐州會戰及武漢保衛戰兩大戰役，我們親歷出生入死，盡忠職守，自忖不負僑胞之望，直至同年十二月廿五日武漢撤退，形勢，工作方針改為著重後方新聞報導，戰地生活才暫告結束。

現在事過境遷，六十年歲月消磨，諸位同仁俱已先後作古。作者不慚老朽，特已憶所及，撿拾若干舊事趣聞，或可作為歷史愛好者談笑之助。

(二) 星港見聞

團員們在星洲集合後，第一件事便是到中國駐星總領事館宣誓效忠黨國，由員事高凌百先生主持儀式。事實上，團裡沒有半個國民黨員，為取得國內工作使此事勢在必行，好在還不致強迫入黨。

留星期間，南僑籌賑會派人前來訪問，還有許多青年朋友熱情慰問，令人感動。

記得乘坐回港的是“豐平號”貨輪，船票是曾先生揩油來的，一下了船，船長便教人打開大餐廳讓我們住宿，每日三餐大魚大肉，殷勤招待，不取分文。原來當日星洲抗日潮流洶湧澎湃，我們熱心投入戰地工作，自然得到船員們的同情和鼓勵。

在港逗留大約十天，負責招待的是十九路軍的黃精一先生以及許多香港抗日團體的青年朋友，曾先生為壯觀瞻，特為大家剪裁制服，藍呢大衣，當胸銅鈕兩排，每排四顆，外又領帶革履，儼然一位海軍官佐。這套制服還有一種作用，就是掩飾各人多少具有的自卑感，大家從來沒有吃過記者飯，忽然變成了戰地記者，而荷包羞澀很不自在，雖然都不願多說話。

香港當時左派勢力相當活躍，中共西南局張雲遠先生當來旅館訪問我們，張先生體格壯健，風霜滿面，一看便知不是住在市區裡的人。他對我們解釋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聯合全國一致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其時共產黨還是反叛的地下黨，在香港他們是不便公開露面的。

（三）廣州——南方大門

我們團裡有海外出生的，有從小隨長輩離鄉的，到了廣州以為回到老家，非常興奮。但廣州人的態度並不親熱，那時國語不普遍，廣州通行的是廣東話，而團裡懂得廣東話的，除了廣府人龍炎川外，只有團長曾聖提。言語不通更加重我們與市民間的隔膜，一腔熱情換來滿頭涼水。

但官方的反應卻完全不同，也許是出於駐星總領事的吹噓，或由於聖提的獨特的活動，我們受到熱烈的歡迎，被安排住宿一流的“愛群大廈”。省政府特派參議邢森洲來陪我們一起吃免錢飯，並引導拜訪黨軍政大員。

黨部頭頭的名字已記不起了，以後漢口的活動相信聖提得到他不少幫助。軍事首長余漢謀將軍是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他親自接見我們，並由軍部替我們安排廣州——武昌的一等火車票。省主席吳鐵城先生請我們吃飯，並和我們一起照相，這照片幸運的為曼谷一位朋友保留著，日期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

民間的組織反較香港沉寂，街上好像亦沒有歌詠或表演的活動，後來才知道由於政府嚴厲控制的結果。

邢森洲先生海南人，和我們很談得來，他始終跟我們在一起，直到我們離開廣州北上武昌為止。

一九四四年我在曼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國得到最後勝利，但駐泰大使館尚未成立。在一個偶然的日子裡，曼谷越三振一帶店戶忽然得到通知，夜裡各人店前要點亮燈火，歡迎我國大員邢公表示敬意，當時的“大員”大家都視作“欽差大臣”，是很威風的。隔天才知道，夜來由安南乘坐火車到曼谷總火車站的邢公原

是老相識——廣東省參議邢森洲：別來無恙，恭喜故人發達了。

（四）漢口辦事處

我們的辦事處設在漢口河街一家小型米較（火礮）樓上，門口掛著“華僑戰地通訊團團本部”的招牌，那是仿照國內軍政機關通行的，可捲的白布條幅寫著扁形隸書，很是神氣。

我們適和米較主人許老板同車，在火車上聖提仗著渾身解數說服了萍水相逢的老板，讓我們把辦事處設在米較樓上，許老板是一位忠厚的長者，原籍普寧，旅漢多年，他既不收租金，又供飯食，有時還親自剝蝦，炒一盤著名的“漢口蝦仁”給我們添菜。

當時武漢為全國軍政中心，軍隊調動大部份要經過漢口，他的米較常為過往軍人居住，不勝其擾。如今“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團本部”的老爺符竟可驅鬼，許多軍人過門不入，米較生意正常經營，真非許老板始料所及。說實在，我們的制服嚇唬了好多人，對門派出所的警察起始亦對我們高呼“敬禮”呢。

順筆談談漢口的潮州商人，那時長江流域的貨運大都要靠英商太古輪船，而蕭辦本身是潮州人，對潮州人特別看顧，只有潮州人才能得到船載，結果潮州人做了出入口業。潮州人的商行，明目張膽加上“太古”字樣。例如“信記”便寫“太古信記”，言談中自稱“潮幫信記”，儼然割據一方，使漢口人側目。他們布鞋長衫，一派“儒商”風度，沒有長衫穿的潮州人都被遣回鄉，不得在漢口。直到漢口街頭出現許多向人伸手的潮州人逃兵，這才真正丟他們的臉了。此話。

在漢口應酬頻繁。記得大公報亦看得起我們這些青年小子，設宴款待。胡政之、鄒魯諸位長者都親自出席，還有陪客的，已記不起姓名了。席間，我探問張致先消息，答云正受大公報館派去宜昌工作，以後一直沒有見面。張致先生湖北人，受谷新民教學，我和慶川、長侯諸兄跟他讀過陳豹隱的“新哲學大綱”（書名錯）。

亦有人帶我們去武昌吃“謙記”牛肉。當時“謙記”名頭很大，店裡掛滿黨國的題字，琳瑯滿目，其經營手法甚為高明。一般食店都勸客人多點菜，“謙記”道而行，故意刪減客人所點的菜，使客人不致過飽，所謂“少食知味”，下次來不可。

終於有一天，聖提說：“桌（酒席）吃得多了，開始工作罷。”

當時，辜鴻銘、黃XX兩位要獨立作戰，各奔前程。辜去福建，黃可能去海南。聖提親自帶領四個小將朝徐州出發。在漢口加盟的張赫茲、李秀良兩位則留守處。

(五) 徐州會戰

徐州處津浦隴海兩條幹線的交叉點，敵人為控制南北交通，打擊我方戰力，必須攻下徐州。我方則志在死守，以免國土割裂，戰力分散，終被逐個擊破，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當年防守徐州戰區的軍隊，號稱三十萬，番號複雜，大體言之有中央，廣西、四川、東北、西北等軍，最高指揮官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坐鎮徐州。

平漢車上偶晤新民同學廖政武，他坦白告訴我，他剛畢業黃埔炮科，決心去延安服務，並笑說：我若出破其事，他會被槍斃的。匆匆一別，從此無復晤面，聞他官至陸軍中將。未知還健在否？

在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辦理戰地記者證，並領取少尉軍服。主管說：戰地記者可以要求發給隨身短槍，但槍法不純熟的人可以不帶。並勸我們在前線行走，不必標示領章，這是戰地記者第一課。

接著，聖提兄為我們分派工作，我和炎川一路，德露和志文一路分頭出發。他借口氣候苦寒，老病復發，一個人先回漢口去了。記得我和炎川在一個軍部分手各奔前線，尋找寫作資料，我訪問過廣東軍的區壽年、中央軍的湯恩伯、東北軍的于學忠、西北軍的孫連仲和廣西軍的廖磊。印象較深的有：

(一) 區壽年將軍：他知道我的籍貫後，笑道：“你是潮州人，怎敢到前線來？我給潮州新軍氣死了，一來就想逃走，逃走時連槍枝都帶走了。”當時潮州徵兵出現收買壯丁，冒名頂替的醜聞。這些新兵多是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一有機會便逃回家鄉，再去賣身。

(二) 湯恩伯將軍：當我在湯將軍總部時，他們得了情報，馬上遷徙，誰也不知道這樣走夜路到底要去甚麼地方。那晚進進出出三個村莊，到了歇營地方天快亮了，他特定叫副官讓馬給我騎，又親切地說：“這種地方不來也罷，你還是回去後方讀書好。”大概是因為我個子體重小，只有四十多公斤，不像大人的緣故。

(三) 于學忠將軍：我曾在他的軍部作客，他真的把我當成他的客人，讓我跟他和高級軍官一起吃飯。東北軍人熱情坦白，不擺架子，但經過解釋後，他仍以為華僑是很遠的很遠的鄉親。

(四) 孫連仲將軍：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我獨自從前線回來尋求孫將軍的總部，在村外便被哨兵們喝住，電筒照面，刺刀抵在背後，查問清楚後，才被帶進村裡去晤副官處的軍官。隔天我看到孫將軍，西北軍人粗豪直率，他高興的題字給我，又問我：“你們華僑可以到鬼子那邊去吧？”

徐州會戰最高潮是台兒莊的勝利。台兒莊在徐州東北，有鐵道可通。守城主將為孫部池峰城師長。敵軍包圍台城，我軍四方增援，重重反包圍敵軍，結果敵軍全師潰敗，我軍取得勝利。

池師在城裡先挨打後出擊，傷亡枕藉。我們進城去會晤池師長時，一路死屍也，傷兵呻吟不絕。我和炎川爬上一輛敵軍遺棄的坦克車，志文拍了照。這照片寄學餘先生寄回曼谷，製版登在華僑日報週刊上。我的堂哥眼力好能認得出我，余先生並未說明車上兩個戰地記者的名字。

勝利聲中敵軍機動地以輕騎及坦克突襲徐州西邊之碭山，切斷隴海鐵路，說徐三面受敵，只餘東向連雲港跳入黃海一路。一時我軍反勝為敗，數十萬大軍各自目，尋求生路，瞬息之間風雲變色，全盤皆輸了。

感謝記者大哥們，他們帶同我們四個小子一共十多人，就近加入閻麟征將軍的某處一同突圍。少將處長率領參謀處人員一個特務連，移近一個沒有帶槍的工兵沿途又收容好幾百徒手的四川新軍，浩浩蕩蕩，目標很大。

突圍的方向是盡快向南走，脫離敵人的包圍圈越早越好。第一個晚上吃了不少頂，情報不明，盲目亂闖，既要遠離敵軍警戒線，又要避開火力重點。有兩次誤坦克車射程內，燈光直照，機槍掃射，倉皇退走，狼狽不堪。幸虧包圍圈廣闊，軍分散，兵力薄弱，不敢追趕，才得脫險。以後兩天，晝伏夜行，大部份時間奔于河南、安徽交界的黃塵滾滾，麥浪蔽野的邊區上，一路參謀處的人員憂心忡忡，容凝重，因為意外情況隨時可以發生。我們卻有食就食，有睡就睡，好像天塌下也不怕，最後到了一個整編單位，乘坐軍車去信陽車站，在車站前露天廣場上，門雖然衣衫襤褸，形容枯槁，但心情開朗，或坐或臥，過一個賦有詩意的夜深露內晚上。

然後乘坐免費火車南下漢口。

（六）河街舊事

一九九〇年十月，我和朋友作“三國遺跡”遊，路過漢口時，特定去訪問當年街記者團辦事處，不料大失所望。河街一帶毀於敵軍侵略炮火，重建後容貌更新，無人知道“河街”的名字了，但我難忘“河街”，“河街”使我記得許多舊事。

漢口街道上熙熙攘攘，生氣蓬勃，但辦事處寂然無聲，正所謂“斯人獨憔悴”。提未回，經濟困難，張赫茲雖為主任，亦難有所作為。聖提志大眼高，有時不免忌。憶在星時，“南僑籌賑會”許以經濟支持，但要記者團名義上為其派送，他願屈就，而星洲報界又不真心合作，將“記者團”稿件新頭去尾，雖然登出卻不如約發給稿費。他深知報界情形，到漢後即進行尋求經濟來源，當時漢口有兩大影機構，一為軍委會的“中國製片廠”；一為中央黨部的“中央攝影場”。他以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名義簡縮為“筆記公司”，多方活動，取得兩大機構出品南洋代理權，以為從此經費有著，可以大展鴻圖。不料第一部抗戰影片“保家鄉”到星洲，代理權即為國民黨一小組織所奪，導致漢口辦事處陷入窘境，聖提至此

亦無能為力了。

在漢口接觸的泰國華僑記得有兩位，一位是陳署本先生；他體健聲洪，來看我們時就跟我們一起吃許老板的免錢飯，有時亦宿我們的免錢客棧。許多年後，星洲駐曼谷大使館放映大陸影片，我去參觀，看見陳先生，問他還記得我否？他答道：

“你這弟燒做灰，阿兄還是識你。”一別快五十年，難得他好記性。

另一位是蔡學餘先生；蔡先生高瘦身材，看來不甚健康，那時是曼谷華僑日報的特派員，住在一家小旅館。他常來看我們，我們寫稿拍照給他，他帶我們去法租界“叫條子”。他到徐州三天，便被迫突圍回到漢口，大病半月，以為寫一篇動人的歷險記了。

記者團裡的張赫茲兄是客家人，是一位好好先生，性情溫和，彬彬有禮。他的朋友如黃藥眠、女作家白薇常來河街談天，他們自謙為創造社小夥計，我想他們都在那裡逗留過的。記得白薇小姐年齡較大，面有愁色，但她對我很友好，關心我去昆明讀書的事。黃藥眠一口客家國語，他個性執拗，國民黨時期因左傾入獄，共產黨時期卻因右傾入獄，終生與監獄結不解緣。

漢口文藝界同年發生兩件可讀性很高的新聞，先是兩個三等演員唐納和藍萍的孽緣。唐納失戀自殺，給藍萍的遺書在報上發表，轟動一時。唐納自殺不死，後來出國改行經商；藍萍去了延安，搖身一變，成為第一夫人江青。

次之是郁達夫王映霞的婚變。小報說：郁達夫嘗去旅館捉奸，得知房內周姓廬長身壯力大，不敢敲門，只在門口貼上便條便匆匆離開了，便條寫的是：“映霞我妻，你夫來過了。”修辭簡潔，果非凡手。

這一對佳人才子，恩恩怨怨夾纏了好幾年，佳人我沒見過，才子是真才子，外表卻不敢領教。漢口文藝界去徐州勞軍時，我有幸坐上文豪們的專車，他們的正團長盛成，副團長便是郁達夫。他頭髮蓬鬆，滿面煙油，一領絨長襯，一副落拓不羈的樣子，教佳人如何消受？看來他們是沒法善罷的。

(七) 武漢保衛戰

嚴格的說，徐州突圍後對入侵敵軍作戰，我軍陷於劣勢地位，所謂“武漢保衛戰”，宣傳大於實際。當局並不像保衛徐州一樣，結集大兵團準備一決雌雄。要在盡量鞏固武漢外圍，爭取布置重慶及其他後方的時間而已。

在敵機頻仍的轟炸聲中，武漢軍政機關主義部門逐漸向後方疏散。記者團為適應新形勢，由赫茲兄將辦事處南移桂林，起始德露已與第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先生接洽停妥，偕團外一盧姓同僑離圍趕赴延安。漢口餘下李秀良、莊明崇、紀志文、龍炎川四人徘徊于武漢外圍之間，採訪新聞、拍攝照片寄去桂林辦事處。

大部份時間我和志文一道，活動範圍限于武漢東面，遠至廣濟、黃梅，近則滸

黃州等地。在浠水時晤見縣警衛隊長，他和志文同是印尼華僑，格外親熱。他們去看一個剛捉到的間諜，這個日本人服裝講話都和本地農民一樣，被脫去鞋顯出大趾中間的裂隙，才不敢否認。他又提議，三個人拍照留念，時為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此相片因張仲筠兄之故，得以保留至今，惜仲筠兄已去世多年了。比較深的還有川軍楊森部，他的政治部長莊文彬上校和我同姓，受到特別接待，後來高升陸軍中將，再後來進役回返曼谷，與馬奕音學姐結婚，此是後話。

東線究竟不是必爭之地，敵人來了，好像沒有好好打過一仗。敵軍主力由九江長江兩岸逐步逼近武漢，一路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對抗。十二月廿五日，武漢終究放棄了。

小道消息說：蔣委員長於十二月廿三日拂曉離開武昌珞珈山行營。我們是廿三日下午離開漢口的。秀良和我爬上一只武昌—漢口的輪渡，這是最後西撤的船隻。時候武漢叫響了“堅壁清野絕不資敵”的口號，船上因應口號載了半載物資——幾鑄造的舊陰溝蓋，想是從武漢街頭的陰溝搬取來的。另外半載便是收容許多軍散兵和難民，為安全起見，志文和炎川另分一路，設法渡江去武昌，乘搭火車下，目的地當然都是桂林。

這艘古老的輪渡負擔重責，蹣跚前進。薄暮寒風裡到達六十里外的排鋪（郭沫若先生的洪波曲作“藤洲”）即見敵機二架，一先一後，向輪渡飛來，先隆隆轟炸，喀喀掃射，船上頓時呼兒喊母，哭聲震耳，亂成一片。敵人明知這是一只普通的渡，船上亦沒有武裝設備，卻肆無忌憚，任意屠殺，此種行為謬言為“武士道精神”，竟不以為恥，幸虧船長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盡快將船駛向岸邊，使船身慢慢臥淺灘上，離岸不過三四十尺，此時乘客倉皇跳水，出於求生本能；大都得以爬上岸，船裡死的傷的人就只好等候地方政府前來處理善後了。

我穿的棉軍裝浸濕了水，爬上岸後越來越覺得負荷沉重，天色已黑，寒風凜冽，手：“李秀良”，卻得不到回聲。無可奈何，祇好隨著人群去尋找鄰近的區公所。

那晚在一家農民家裡住宿，善心大娘替我把衣服裡水濕的棉花拉掉，然後烘干成一套夾衣褲。她慈和的問我：她的兒子也是出去當兵的，有沒有見過？我想起家的母親，她在遙遠的地方，像大娘一樣思念她的兒子。

隔天一早，區公所為我安排坐在一隻小划子的前端，艙裡躺著一個半死不活的兵，小划子將沿著水道進入湖南境內的洞庭湖，準備在湖邊的岳陽樓靠岸。

算是脫離了危境，望著連天煙水，心緒茫茫。此刻除了耳邊的呻吟外，我一無所有，我隨身的衣物早已完全失去了。

（八）桂林尾聲

我由岳陽經長沙衡陽，渡湘水到達桂林時，志文、炎川已先到了。太忙的列車

在武昌車站即遭敵機強烈轟炸，沿途又經過好幾次空襲。那時，我們完全失去制空權，敵機來襲時只好停車讓乘客逃走，一切生死存亡聽天由命而已。

我報告說：輪渡被炸，秀良不幸埋身江底。赫茲兄笑著拿出秀良的信，說的是輪船沉沒，明崇生死不明，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秀良又說，在長沙交了桃花運，碰到一位湖南姑娘，暫時不來桂林了。

當時桂林人心惶惶，空襲已是家常便飯。有一次，“救亡工作隊”的金山、王瑩來看我們，剛好警報響了，為了安全，大家一起去七星岩躲避。他們在籌備出國，要去南洋一帶巡迴演出。坐在幽暗的岩洞裡，隱約聽到金山安慰王瑩說：別怕，有我在，別怕。好自負的英雄口氣。這一對善男信女後來結婚了，金山的新娘並不是王瑩，王瑩的另一半亦不是金山，藝人離合本屬平常，他們演慣了戲，真真假假，有時難免混淆不清了。

桂林有許多工作隊，各有各的背景，比較有些意思的是范長江（大公报）、陸詒（新華報）領導的“青年記者聯合會”常有集會，言論相當積極。武漢棄守後，變相的投降論調抬頭，很多有心人擔憂抗戰堅持不下去。

會後的餘興節目大家都要參加，演出平日吊兒郎當，逢場作戲，粵劇、馬來歌曲都來，很容易過關。志文有些口吃，沒有人跟他過不去。我卻驚得手忙腳亂，窮於應付。有一次，一個滿口“狗熊”的河南小子唱完他的河南梆子後，硬要我唱，我以為他欺人不懂河南土腔，唱的未必對板。既後無退路，只好後著臉皮，無板無眼的唱出潮州古老的戲種“雙玉魚”、姜通舊的老丑曲：“我觀外甥貌堂堂，今日飼大歸別人……”，罵罵那個河南小子，結果亦自然贏得許多掌聲，但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唱歌。

如果記憶不差，桂林國民黨掃蕩報有一位查良鏞先生，文章寫得很好，他好像沒有參加過青年記者會。我一直不認識他，誰知半世紀過去，他竟成為香港“大儒商”金庸。無論“文筆”或“銀紙”，比我們曼谷的“儒商”來，實在“大”得多了。我對查家一向懷著感恩之心，往後我去昆明讀書就是金庸的大哥查良鏞先生——西南聯大教務長把我編進大學先修班的。

所謂“桂林尾聲”當日指的是我們的“記者團”。我們的團員大半離去，經濟困難日甚一日。那時，桂林和國外已有通匯渠道，聖提兄間或寄些錢來，但為數不多，無濟於事。我的父親卻從曼谷開始寄錢給我，並答應我去昆明讀書。

好心的赫茲兄為我辦好了兩份很有份量的介紹信，一是女作家白薇小姐寫給雲南大學教授楚圖南老師的，一是方振武將軍寫給雲南軍界元老李根源先生的，憑著這兩封信，在昆明是兜得轉的。

在桂林遊蕩了小半年，終於經不起父母親的催促，珍重辭別沙場餘生的同伴——氣息奄奄的記者團和清新秀麗的山城桂林，開始昆明之旅。

傣泰民族先民從雲南向東南亞、南 亞的遷徙與傣泰文化圈的形成

郑晓云

泰语系民族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南亚最大的族群，并且有着共同的民族渊源关系。有关傣泰民族的起源与流源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并且已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争论。【1】中国学术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成果，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而造成了观念及研究资料、手段的限制：如在过去我们对于泰人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南迁的问题上受一些上个世纪时代的影响，在反对西方学者关于泰人起源论述的同时也回避了一些客观的事实，即今天东南亚、南亚的泰人都是在历史上从中国向南迁去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赖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而对于傣泰民族自己的文献的运用不足，不重视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少有机会运用田野研究的方法来从获取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上述原因，对于傣泰民族的历史的研究仍然是不完善的，今天仍然有较大的科学探索的空间。由于傣泰民族是一个广泛分布于中国及东南亚、南亚的跨境民族，傣泰民族史的科学认识对中国与相关东南亚、南亚国家区域的和平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十余年来，笔者，有机会先后十余次前往有共同渊源关系的傣泰民族集中分布的国家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国进行实地研究，访问了很多研究机构与泰人居住区、与当地的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从而获得更多新资料，并结合中国的文献中有关傣泰民族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将结合笔者从中外获得的文献资料及田野研究的成果，对中国与东南亚傣泰民族流源与东南亚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2】

一、 泰人向缅甸的迁移

据掸族的历史文献记载，掸邦的泰人是在古代从中国云南迁移到掸邦高地的。掸邦的泰人占缅甸人口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并且是掸邦高地最大的一个民族。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自称是“泰”或者是“泰龙”、“泰亚”（Tai Long, 'Tai Yai, 意思是“大泰”），而掸是它称，并不是自称，这一点十分重要。同时，泰人称他们的

家园为勐为勐泰（泰人的国家）而不称掸邦。因此掸族及其居住地掸邦与泰人是有区别的。在缅甸，除了有被称为“掸”的泰人，同时还有自称就是掸的种族存在。这一点在中国学者的研究往往中没有注意到，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掸”就等同于泰人，这在很多有关傣泰民族历史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

关于掸的记载较早见于《汉书》等汉代文献，其中有掸国向汉王朝晋贡的记载，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这就是当地泰人。但事实上在汉代，有很少的泰人进入缅甸是有可能的，他们沿着萨尔温江迁移而进入缅甸，定居在萨尔温江流域。但是当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掸人并不是泰人，而是当地的土著，根据缅甸学者的研究，掸在泰人迁入缅甸前就已存在。因此汉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掸与今天的泰人还不是一回事。在泰人进入今天的掸邦高地之前，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孟-高棉人，因此中国汉代文献中记载的掸很可能是孟高棉人。泰国学者黎道纲先生认为古代的掸国与今天的的掸邦不是一回事。（黎道纲，2001）

自公元6世纪后的数百年间，泰人不断地从云南迁入缅甸北部，公元10至11世纪，泰人在缅甸北部的势力已以强大，建立了缅甸史上称为兰卯龙（Nam Mao Long）的王国，即中国史书称的麓川政权，其中心在今缅甸境内的瑞丽江北部。至14世纪兰卯龙王国的势力达到顶盛时期，在思可发、桑龙发当权的14世纪时期，兰卯龙王国不仅控制了整个掸邦，势力范围还达到了整个缅甸及老挝、柬埔寨、泰国。麓川政权也不断地侵犯中国，明朝曾三次大军征伐。1220年左右，桑龙发率大军向征伐，占领了勐宽，将勐宽变成了勐卯龙王国的第二大军事中心。勐宽的辖地包括了今天的整个缅甸北部。以勐宽为基地，桑龙发继续攻伐，进入今天印度阿萨姆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了一些泰人的地方政权，于1229年最终建立了泰阿洪王朝，这被认为是泰人历史上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扩张行动。这些军事征伐的重要后果在于泰人随着这些开疆拓土的行动而在整个缅甸及泰国、老挝、印度而扩散开来，使泰人的分布从缅甸北部扩大到了整个缅甸及邻近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是傣泰民族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根据缅甸文献记录，普遍认为的泰人从云南大量迁移进入缅甸的高潮是公元六世纪。他们顺着“南卯”河，也就是今天的瑞丽江往南边迁移，并且定居在了上缅甸的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渐渐变成了掸邦的政治权力中心，并且随着这里的发展一个新的移民潮又向四边展开，一部份泰人向东南方向不断分散到今天的掸邦高地的各个地方，有的人继续往西走进入泰国，这一部分人称暹罗人，第二个支系往北走，然后进入印度北部阿萨姆，进而形成了后面的印度的阿萨姆泰人、泰国的暹罗泰人和缅甸的掸人。但是由于缺少文献的记录，在公元七到十世纪，掸邦的历史在缅甸同样也是不清楚的。这一时期南诏国在云南兴起，其权力在公元七世纪末的顶盛时期，统治范围包括了今天的上缅甸，掸人也当然地在其统治之内，但是南诏国是否泰人建立的国家在中外学术界都是有争议的。中国学者认为南诏国不是泰人建立的国家，国外也有一些持相同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南诏国的统治对

平人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诸多方面。笔者认为,南诏国统治者不是泰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南诏国境内居住有大量的泰人,尤其是在其南部从今天的保山、德宏到上缅甸大片的区域内,这才使得泰文化在南诏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与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的很多文献中都可以寻到证据。是由于这种影响与地位,使得近代一些国外学者将南诏国的建立与泰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南诏国是泰人建立的国家的错误结论。

勐—版政权体制是傣泰民族最重要的社会基础,也是傣泰民族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建立新的勐是傣泰民族的扩张并且定居的标志,因此勐的建立也是傣泰民族多的的重要证据。泰人先民自云南迁入缅甸后,首要的也是建立新的勐与版。在公元前6世纪前,在缅甸北部的萨尔温江及瑞丽江流域就已有一些泰人的勐与版存在。月在此之前泰人就已迁入缅甸北部。在桑龙发统治勐宽期间,整个缅甸北部都建立了泰人的勐与版,并在每个勐都任命一个首领,称为“召发”,当时在勐宽境内有9个召发,也就是建立了99个勐,可见此时泰人数量已较多。在今天的缅甸克内仍然存在的当年由泰人迁移而建立的泰龙人的勐版达54个。【3】

缅甸这些多从勐卯龙来到勐宽定居下来的泰人自称为“泰朗”,今天仍然散居于下缅甸克钦邦。此时自称泰卯、泰潞等的泰人也迁入了缅甸北部,并居住繁衍至泰人在大量迁移进入缅甸之前就已是长期从事水稻种植的农民,从而具有较高农业技能,他们虽然与本地文化相融合,变得本地化,但是其较高的水稻种植技术决定了其文化较当地山地农业民族的先进性,因而泰人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在缅甸定居并发展壮大起来。

在公元13世纪以后,缅甸南部已有不少泰人定居在它通(Tharun)、马达马(Madama)、巴钩(Bago)、梅拉耶(Mawlamyine)一带,并建立了当地的泰人王国。文献传说国王瓦拉如是一个移民到它通的泰人的儿子,出生于靠近它通的一个叫杜吴的村子,长大后他到了泰国的素可泰并成为素可泰国王的一名象夫,他负责管理国王的象队并随象队出生征,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在赢得多次战争后,他晋升为国王的卫队长。此间他认识了国王的女儿,并与她私奔回它通。回到它通后,从事政治活动,并于1281年成为马达马的行政长官。1287年,他建立了自己的王

这一王国直到1539年才灭亡。存在了252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由于他与素可泰王国发姻亲关系,因而不少泰人从清迈及泰国西北部迁移到下缅甸。这些泰人迁移到下缅甸后,与当地的孟人相融合,共同发展起了较高的稻作文明,使下缅甸成为东南亚有名的粮仓。在瓦拉如王朝时期,不仅稻作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统治的南部海岸地区与欧洲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不少缅甸的土产品也输往欧洲。

在萨尔温江东部,是泰人较早迁移进入缅甸的地区,这居住着各种自称的泰人,

如傣泐、傣云等。他们在这一地区也建立起了一些勐及小王国。

在缅甸最大的封建王国是掸邦东部的景栋，面积达 12,000 平方英里，它是今天缅甸泰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区，南与泰国接壤、东与老挝接壤、北与中国接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景栋居住着不同支系的泰人，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泰人迁入缅甸的历史。同时这一地区也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如佤族、景颇族等。

在上缅甸的萨尔温江流域及瑞丽江流域、中缅边境地区，泰人居民最多的是与中国境内相同的傣泐人，在缅甸境内的八莫、勐宽、南坎、木姐、密支那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他们迁入缅甸时期较晚，因而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较多。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很多勐及小城镇。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两国仍然有不断的居民迁移的现象。在十年文革中，一些村子曾搬迁到缅甸居住至今。

泰人迁入缅甸后，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其分布遍及缅甸全境，成为缅甸境内一个较大的民族，并且在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王国曾在历史上强盛过。但是由于缅甸历史上战乱不断，泰人曾经不断与周边民族与国家发生战争，如明朝时期与中国的战争、与泰国北部、老挝的长期的战争等，其内部也不断发生战乱，导致其势力的渐渐弱化。在 16 世纪以后，泰人地区曾发生过三次大的反抗英国入侵的战争，但最终泰人聚居的上缅甸还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综上所述，缅甸的泰人是由中国境内迁移去的。最早的历史已无可考证，但据缅甸文献记载较多迁入缅甸的时期是公元六世纪，如上节所述，傣泰民族的先民从滇中向南迁移是在汉以后的事，至公元六世纪前后的南诏时期，傣泰民族才较多地分布于滇南地区。南诏的战乱，尤其是南诏国的灭亡及大理国的灭亡所带来的动乱必然是泰人大量向缅甸境内迁移的重要原因。但泰人迁入缅甸除了有一些高潮时期以外，不同规模的、不断的迁移肯定是存在于各个时期的，今天接近瑞丽市缅甸境内的很多村子的人们都还能说清楚他们从中国境迁入缅甸的历史，并且这段历史并不长，仅有百余年甚至数十年。早期迁入缅甸的泰人凭着其较高的水稻种植技能及勐-版的组织体制的优越性，在迁入缅甸后较快地在当地立足并发展起来，在缅甸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足迹。【4】

二、泰人向老挝的迁移

老挝的国民统称老泰，语言属泰语系民族，但真正属于泰族的主要是两部份，一是普泰人，二是泐人。其中普泰人数最多，近 50 万人，泐人有 10 万人左右。

“普泰”意为山区的泰人，可能与其迁移的过程有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论述。普泰人实际上包括了多个泰人的支系，如红泰、黑泰、白泰、绿泰等。普泰人在老挝分布很广，在包括首都万象在内的 15 个省市都有分布。

泐人主要分布在老挝北部与中国接壤的省份，与中国云南的傣泐人相同。

老挝，尤其是老挝中部、北部处于泰人分布的中心区域，因此也是泰人迁移的重要区域。老挝的泰人源于中国在学术界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并且不论是现在一定争议的有关哀牢国族属问题，还是泰人自越南的迁入等问题，目前都没有人认为他们源于中国，后又迁入老挝。

老挝泰人的迁移较为复杂，原因是老挝的泰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有迁移的史实，直到上个世纪 50、60 年代仍然有中国的傣族及越南的泰人迁入老挝。根据目前的研究，较早迁入老挝的泰人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中国迁入越南北部的泰人又迁往越南北部、西北的莱州、山罗、义安等省一带，再迁入老挝，一是从中国的云南迁入老挝北部，这一部份人主要是傣泐人。

在泰人迁移的历史上，迁入越南的历史要比迁入老挝早。泰人在公元 6 世纪后迁入越南，而大量迁入老挝当在公元 9 世纪以后【5】，这是较为可信的，在此前也可能有一些泰人迁入老挝，但大规模发生在公元 6、7 世纪是不可信的。老挝的早期历史由于文献的不足而留下很多空白，但在公元 6 至 10 世纪的数百年间，迁往老挝的是孟—高棉人，在公元 10 世纪以后孟—高棉人及其文化才在老挝渐渐失去统治地位。到公元 11 世纪到 13 世纪之间，泰人在今天老挝中北部广大的地区已建起了很多居住区，有了广泛的分布，并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泰人城邦，即琅勃拉邦与万象。

我们首先考察从越南迁入老挝的泰人。由于越南西北部与老挝接壤，因此大多泰人与越南西北部泰人的居住是连成一片的，只是由于国界而一分为二。泰人在公元 6、7 世纪沿红河进入越南后，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向越南西北部、西部迁

今天大多数泰人都聚居在越南西部高原地带如莱州、山罗等省，有的只有一二年的历史，因此越南泰人的迁移历史相对而言较为清楚，不少当地的泰人至今还清楚其迁移的历史。

越南泰人迁移的历史对于了解老挝泰人的历史十分重要。在越南，泰人聚居在两个重要的地区，一个是北部的莱州、山罗省，占越南泰人的 60% 余，另一个主要聚居区是清化、义安省，占越南泰人人口的 20% 余【6】。这些地区，尤其是越南北部与老挝主要泰聚居区相连。由于越南北部主要是山区，因此泰人也主要是居于山区及山区的河谷、盆地中，当他们迁移进老挝后，被称为山区来的泰人，即普泰人，普泰人一称便是由此而来。

据越南东南亚研究所阮维绍先生(Nguyen Duy Thieu)的田野研究，老挝桑怒省的泰人源于越南顺州的黑泰人，在距今 200 年前，(约 8 至 9 代前)从越南迁移到勐埃(Mong Et)、勐双(Muong Xon)，最终定居于桑怒省，而其它一些人则定居于勐桑(Mong Sam)、勐博(Muong Pua)等地。又据居住于勐双的红泰人的回忆，其祖先居住于勐哥达(Muong Ca Da，今越南清化省关化县)，由于避乱而迁到老挝。普泰人的祖先迁入老挝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的迁移，他们的祖先从中国迁入越南西北部，再

迁入并定居在老挝。另外一部份大量迁入老挝的是由于躲避战乱，在 18 末到 19 世纪初，在越南的西北部及清化、义安等地区战乱不断，尤其是黄旗军、黑旗军的起义战争，导致大批泰人迁入老挝。他们的迁入又把先前已居住在当地很久的人挤走。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尤其是 1952 年至 1954 年越南西北部的战乱中，又有大批泰人迁入老挝。在 1959 年至 1960 年在越南山区民主改革中，同样有数量可观的泰人离开越南迁往老挝。

田野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普泰人都是从越南迁入老挝的。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居住地方，他们不断地迁移，很多泰人都经历了不断有迁移过程。据一部份勐阿（华潘省）黑泰说，他们的祖先是从越南和平省的勐哈（Muong Ha）、勐门（Muong Mun）迁移到义安省，在那里居住了 15 年后再次迁往老挝的山陶（Sam To），并从那里分为不同的部份向其它方向迁去散居各地。从越南北部迁移到义安的黑泰与白泰都有很多人迁往老挝，并在老挝四处散开。【7】

老挝泰人的另一部份是从云南迁移去的。迁到老挝的泰人主要是泰泐人，与西双版纳傣泐相同，老挝学者认为老挝的泰泐是在公元 7 世纪从云南的西双版纳迁去的【8】。在古代没有明确的疆域，在地域上云南的西双版纳与老挝北部都是相连接的。在泰人从云南向南迁移的过程中，不论是迁往越南还是迁往泰国，老挝都是一个必经的走道。虽然说最早的迁移发生在何时已无可考证，但云南泐人向老挝的迁移在不同时期都有。在泰国北部的清莱、清迈、清盛、帕腰等府今天都居住有很多泐人，笔者在这些地区进行田野研究时，当地人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祖先从云南的西双版纳迁移到当地，时间在 9 代人前后，约 200 年前，其中很多人先迁到老挝，再从老挝迁到泰国。在上个世纪 50、60 年代，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原因及饥荒，大批傣族从西双版纳，尤其是从勐腊县迁入老挝及泰国北部。

总之，泰人在从云南及越南迁入老挝后的数百年中，不但散居于老挝各地繁衍生息，人口增多，更凭借着其较高的文明，尤其以水稻种植为核心的文明而以发展壮大起来，甚至将当地人排挤出河谷平地，由于自己的壮大，泰文明取代当地的孟高棉文明在 13 世纪以后成为主流文明，这其中浇灌农业起了关键的作用【9】。

三、泰人向越南的迁移

大部分越南泰人都集中居住在靠近老挝的西南高地一带，根据其地域分布，越南的泰人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西北部地区以及义安省。在越南共有泰人 104 万余人，【10】63 万人居住在北部高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省，即山罗省、莱州省，其他的居住在青化省和义安省。

泰族是越南的第三大族体（在越南还有一个典型的泰人族体——泐人，是单独作一个民族的，人口仅3,000余人，与中国西双版纳傣族相同，是其先民来自中国^[1]）。由于迁入越南的历史时期及种类不同，因此分为不同的支系，人数较多的是黑泰和白泰，其它的还有摆彝、泐、红泰等。黑泰主要分布在山萝、黄连山二省及广宁省的奠边府等地。白泰主要分布于莱州省、清化省的琼崖、北安、扶安等县。长期的历史迁移及与当地人的共处，很多泰人实际上已与当地其它民族发生了融合或在文化上受到了当地其它民族文化影响。如在沙巴、北河的泰人已被当地岱依人同化，在义安等地越老接壤地区，很多泰人来自老挝，因而受到老挝文化的影响很深。^[11]

泰人自古就不是越南的土著民族、而是外面迁徙来的，这一点在包括越南学者的学术界也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是从哪里迁入越南的呢？从时间上来考证，泰人大量迁入越南的历史并不是十分的遥远。早期的泰人可能在公元六、七世纪左右有一部分从老挝以及云南迁入泰国的西北部，大量迁入越南的泰人是在15世纪以后并且从15世纪一直到上个世纪初，都有泰人不断迁入越南并且向越南扩散寻求定居点的情况存在。如越南学者认为白泰是居住于中国的白夷的后代，在公元10世纪已在红河右岸有了较多的分布，他们比黑泰先到达红河一带。^[12]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越南的泰人主要是从中国及老挝迁入的。泰人从中国迁入越南的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中国的西双版纳地区，一条是红河流域。“根据越南民族的历史记载，他们的祖先大约在公元九世纪开始分别迁徙越南：一路从西双版纳(云南)到来；另一路从湄公河(泰国)过来。”^[13]由于越南及泰族自己的文献对民族迁徙的明显时间都很少有记录，所以民族迁徙的传说就成了重要的证据。越南很多地区的泰人都有关于历史起源的传说，不论是白泰还是黑泰，尤其居住在越南西北部的白泰人，传说他们的祖先在西双版纳，从西双版纳迁进老挝，再从老挝迁进越南的西北部定居下来。越南的黑泰也有同样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于西双版纳。

所以说今天越南黑泰及白泰中的很多风俗习惯，都和中国云南省的傣族非常的相似。中国学者范宏以134个基本词汇对越南黑泰、老挝黑泰、中国西双版纳勐腊傣语进行了对比，结果越南黑泰语与老挝黑泰语基本词100%相同，西双版纳傣语与越南黑泰语84.32%相同。这一比例扣除几百年来黑泰语在当地的融合与变化因素相当高。2001年9月，笔者应越南文化部文化艺术杂志社的邀请前往河内访问。

6日下午，笔者与一批从事泰族研究的学者座谈，他们都曾经在泰人地区进行过长期的田野研究。他们认为：越南不论哪一种泰人，大多数都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迁徙来的，根据研究，泰人家中有人死去时，人们在送葬的时候都要唱一些送葬歌，很多送葬歌中都唱到泰人是从西双版纳来，这方面的歌在越南的泰人中非常多，黑泰就有这样的歌唱到其祖先来自勐梭，而今天云南佤族自治县仍然存在勐梭这个傣族聚集的地方。这样的送葬歌在黑泰中也有，也明确的唱到他们的祖先是来自

南迁徙到今天的越南，在人死亡的时候，他们的魂也应该回到他们来源的地方——云南。由于历史文献记录的缺乏，这种代代相传的历史歌谣，就是人们历史的重要证据。

黑泰人也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和传说，说明他们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进入老挝再迁入今天的越南的，今天越南北部的大多数黑泰人的服装与今天西双版纳地区较为古老的傣族服装完全一样。越南民族学者在越南西北部地区的泰人中搜集到越南泰人用泰人手写的历史书籍《南猛记事》（后来由越南河内史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一书中就记录了越南黑泰人的迁徙与发展。在论述了人类经历了各个民族的共有的洪水泛滥的历史灾害之后，山罗省顺州泰族首领的祖先来到了勐翁和勐埃这两个地方，其中勐哀就在中国的西双版纳境内。从这两个地方开始，父子两人不但生育子女，他们的子女也不断的告别父母，迁往各个地区。到16代时，他们已经移居到老街一带。从他们迁徙的时间到现在计算，他们总共是15代人，共375年，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北宋时期，泰人迁入了越南西北地区，并且居住有今天的老街一带。【14】

从越南的文献与泰族的传说中看，从西双版纳迁入越南的泰人数量最多。从傣族的分布地域来看，“西双版纳傣族”的概念并非仅今天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行政区内，而是包括了今天的思茅地区一带的傣族。迁入越南的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是从西双版纳首先迁到老挝北部，再通过老挝进入越南西北部；一条是从西双版纳、思茅迁入今天的红河州西南部、南部，再向南顺李仙江（越南称沱江）、红河迁入越南西北部。应当说，在历史上，西双版纳、老挝北部、越南西北部都是一个傣族分布的成片的区域，当这一个区域形成后，尤其是在元朝以后这一个区域内基本都有了泰广泛的分布，这个区域内人们的迁移就变得很多频繁，部分傣族进入老挝后又迁入西双版纳勐腊一带，勐腊傣族至今仍然有其祖先因为追赶金鹿而来到勐腊并定居下来的传说。来来往往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边境一带政治环境不安定仍然有不少傣族迁移到老挝的现象存在。

除了西双版纳以外，红河也是一条重要的泰人迁徙的路线。越南也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和传说，记录当地泰人的祖先是从小河上游迁到今天的老街省一带的，尤其是在14世纪中后期，从红河流域迁入越南北部的泰人最多，一部分随后又迁到了老挝的中部和南部。自古以来顺着红河迁入越南的泰人，在各个时期都有，并且也有不同的支系，如今天越南的白泰和黑泰都有明确的记载和传说，他们来自红河上游。云南红河上游的花腰傣在今天的中越边境的河口以及越南境内也都有分布，他们都是从红河上游向南迁徙进入来到这些地方的，并且时间并不久远，河口县的花腰傣从红河上流迁到今天的居住地仅6至7代人，100余年历史，随后其中的一部份人再次向南迁移进入越南。从西双版纳迁入越南的傣族也有很多是从红河进入越南的。他们首先迁入云南的红河、金平等县一带，再沿着红河进入越南。今天与越南接壤的金平县傣族就充分反映出了傣族行迁移的情况。居住于勐拉普耳上、中、下寨的

族自称“傣泐”，也被称为“普耳傣”、“水傣”、“白傣”。他们的祖先居住在今天思茅一带，后迁到金平。几个自称与它称都透露出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傣泐”是正意义上的自称，表明其与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同支；“普耳傣”表明他们来自普，也就是今天的云南思茅地区北部，属于“西双版纳傣族”的范围。这其中最有义的是“白傣”的它称，因为越南相同的泰人也称为白泰，也自称是自西双版纳移到越南的。这就很多吻合地可以复原一条傣族自今天的西双版纳、思茅一带迁越南的路线，金平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居住在金平县红河沿岸的“傣罗”，他称“黑”、“旱傣”，他们来自红河上流的元江一带，其它相同的人也迁入了越南，与今天的部份黑泰人同源。

越南和平省枚州县的泰人据历史记载与传说，其祖先是在红河的上游，今老街北河县一带。大约在公元14世纪初由于社会不安定而沿着红河转向沱江，然后到木州、勐孔、枚州等地区居住下来，其它的泰人则向越南西北部地区、和平、清山区、义安—河静迁移，甚至进入老挝中部和南部。【15】

义安省是越南泰人聚居的又一个重要地区。根据1992年的人口统计，泰人在义省有21万人，在义安省的泰人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支系：泰勐（Tay Muong）、泰清（Tay Thanh）、泰蒙（Tay Muoi），其中泰勐是最大的支系。根据泰勐的历史传说，他们的祖先估计是一个称为罗衣的地方头领，是琅勃拉邦国王的儿子，当时他去到化省去并建立了哥达勐，由于思念祖先的土地，他决定回去。当他到了义安省一高地的时候，由于当地的泰人中缺乏一个头领，所以他被当地人邀请去做当地的头领，从而建立了泰人在义安省最早的一个勐。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当地的言和文字受到老挝语和文字较大的影响。义安地区泰人死了之后在送葬的时候，师通常都要念送魂经，以引导他们顺着祖先来的地方回到老挝去。其他支系中较的泰青，属于白泰，来自勐青（今奠边府），还有一些较少的支系来自越南及老挝同地区。【16】

四、泰人向泰国的迁移

泰国是一个泛泰主义国家，泰国国民统称泰族（Thai），但是泰国泰族的概念与他们一般所称的泰人（Tai）是不一样的。在泰国，构成一个国家民族的泰族的种族多个，包括了泰人、华人、马来人，北部山区的佤、拉祜、苗等山民。因此，泰是一个以泰文化为纽带融合而成的国家，【17】泰人仅仅是泰国的一个种族。

泰国的泰人主要分布在泰国北部及东北部，如夜丰颂、清莱、清迈、南邦、南、帕腰等十余个府。泰国泰人中最大的一支是泰元人（意为“大泰人”），其它还有泰泐、泰雅、泰賤（黑泰）等等，其中泰元、泰泐分布最广。

以泰文化为纽带的现代泰国的形成与泰人的迁徙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泰人的迁入及泰文化的传播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泰国。

泰人最早在何时迁入今天的泰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而难以考证,因此中外都没有定论。大规模迁入并且在当地产生广泛影响是在十一世纪之后,在随后的数百年间大量的不同支系的泰人迁入并定居于泰国,但在此之前也肯定有一些泰人已进入今天的泰国北部居住。泰北的文献记载在公元1150年靠近南奔的滨河(Ping River)岸边曾出现了一个泰人的村子。在此之后的200年间有一些泰人渐渐开始自北部及东部方向进入泰北的兰那境内。【18】

要了解泰人大规模迁入泰国的历史,有必要了解泰国北部的历史。泰国北部出现的第一个以泰人为主体的建立的王国——兰那王国,中国史书称为八百媳妇国。

兰那的历史较早,八百媳妇国的开始一般以当地传奇性的王子坤真的政权为标志,开始于公元1135年【19】。而在此之前兰那的主体居民是南亚语系民族的拉伾人(Lawa)。早期的文明集中在今天的南奔(Lamphun)一带。约在公元750年,当地人邀请位于今天泰国中部的罗布里(Lopburi)国王的公主前来做建立于南奔的新城的管理者,而罗布里王国是孟人(Mon)建立的王国德瓦拉瓦蒂(Dvaravati)的一部份,因此当公主带着一批包括僧人在内的随员到达南奔时,也随时之带来了孟人的精神与物质文化。孟人的宗教里是融合了大乘佛教的,因此大乘佛教也传入了这一地区。从此实质上南奔与南邦组成的一个城邦国家也就在孟人的统治之下,成为了其附属国。在公元1005年以后,罗布里成为了高棉人的附属国,高棉文化开始影响到南奔。后南奔与罗布里曾发生多次战争,在1200年之后由于高棉人势力的减退,南奔城邦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在被泰人占领之前存在了几十年。

1263年,与西双版纳勐泐王有亲戚关系的茫莱王在清迈建立了“茫莱王之城”,随后占领了南奔。1296年4月12日,茫莱王建立了清迈新城,至1350年清迈基本控制了南那地区,比孟人的南奔-南邦城邦控制的范围还要大得多,泰人在兰那取代了孟人的统治,泰文化也渐渐取代孟-高棉文化成为兰那的主流文化。

茫莱王传说是傣泰民族的传奇英雄,也是西双版纳第一个国王叭真(泰国称坤真)的后人。据西双版纳的《泐史》记载,叭真建立了西双版纳的景龙国,并在1180年到1200年间执政21年。在叭真执政期间,景龙国势力十分强大,兰那国、勐交国(今越南北部)、勐老国(今老挝琅勃拉邦)、南掸邦等一些小国都置于景龙国的统治之下。

传说叭真的6世孙建立了兰那王国。【20】他是兰那王、勐交(今天越南西北部)王、勐老(老挝)王等傣泰人王国国王的祖先。据傣族文献记载,叭真有4个儿子,分别分封管理勐南掌(老挝)及兰那(清迈)、勐交(越南北部)、勐景洪(西双版纳)。【21】从傣泰人迁徙的历史来看,这种事实是成立的,因为今天的研究已证明了这些地区的大多数泰人的祖先都有是来自西双版纳。1996年4月笔者曾作为特邀贵宾参加清迈建城700周年庆典活动及学术研讨会,在这个过程中接触过很多泰国及缅甸、老挝等国的学者与官员,很多人都说兰那城的创始人来自于西双版纳,甚

有人说兰那的宗祖是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王室是大王室，兰那王室是小王室。当听到这些说法不免还有些惊讶，但今天以历史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切则基本都是事

与这段历史相对应的就是泰人在兰那地区的迁移与壮大了。泰北的泰人的主要
是泰元人 (Tai Yuan)。泰元人不仅居住在泰国北部，在缅甸、老挝也有分布。
西双版纳傣族的文献记载，泰元人是汉以后从滇中迁徙到今元江一带，在元江流
住了很长时期再向南迁的。依笔者的看法，泰元人是沿着红河向南迁徙的，他
达今天越南北部、老挝北部后，再进入今天的西双版纳，其当时的首领就是叭
叭真在西双版纳建立了景龙国并任第一任国王“召片领”，意为广大地的统治者。
《泐史》记载叭真任景龙泐国召片领始于 1180 年，据有老挝血统的法国学者安
桑雷对傣泰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仪式、民俗学资料的全面研究，叭真其人
存在并且其政权在公元 1135 年就已存在于兰那北部，曾经征服过老挝的琅勃拉
(安派·桑雷 1992)。这在叭真进入西双版纳之前。

在傣泰民族史上一个较大的谜就是为什么西双版纳的景龙国能成为包括今天越
北部、老挝、泰国北部在内的一系列泰人地方政权的宗主国。事宜上在叭真进
西双版纳之前，在迁徙过程中作为首领已经占领了越南西北部、老挝北部，在这
区有了根基。傣族文献及传说中的叭真并非西双版纳本地人，而是追赶金鹿从
进入西双版纳并成为西双版纳统治者的。在此之前西双版纳当地的傣族先民是
。与此同时，已分布于老挝北部的泰元人继续南迁，进入泰国北部的兰那地区，
一切不仅与傣泰民族的种种历史传说相吻合，而且与西双版纳景龙政权为什么能
周边诸多泰人小国宗主相吻合，这就解开了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谜。在傣族
史记载中，并没有叭真攻占兰那的记载，但是他却能成为兰那国的宗主，兰那
的历史传说中也把叭真作为创始的英雄，他的几个儿子能够成为一系列地方王
领主，原因就在于他进入西双版纳并建立景龙国以前，事实上已成为威镇四方
英雄。其次，兰那泰人最早的主体是泰元人，而西双版纳的主体是泐人，西双版
人向兰那地区大量迁移是后面的事，为什么在同一宗主下两个地方的人不一样，
也同样在此。

随着兰那王国的建立与孟人统治的结束，兰那在 14 世纪中到 15 世纪初迎来了
时期，政治与军事势力强大，在锡兰佛教影响下的兰那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时
泰人建立的兰那王国的强大，使泰文化不仅在当地取代了孟人的文化成主流文
也向四周的扩散，尤其是锡兰佛教，即南传上座部佛教及其文化，传播到了老
北部、缅甸的掸邦东部及西双版纳，深远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形成了一个南
座部佛教圈。

中国中央政府对兰那的明确治理始于元朝。元军在 1292 年攻占景洪，控制了西
纳地区，进而最终控制了包括兰那在内的广大的傣泰人地方，先后设立车里总

管府及八百宣慰司(1327年)。在此之前元朝曾多次征伐兰那,兰那也曾多次反叛,这些过程中是傣泰人出现大规模流动的重要原因。元军在征伐兰那的过程中也曾征用西双版纳的傣人运输军需甚至直接参战。自此至明嘉庆三十五年(1556年)的200余年间,西双版纳与兰那地区都处于元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因此不仅有傣人迁入兰那,同样也有兰那人迁入西双版纳。

明嘉庆三十五年(1556年),由于兰那政权内部的内乱并加之明朝国力的减弱,缅甸东吁王朝攻占景迈(今清迈),中国政府永远失去了对兰那的控制权,兰那也置于缅甸的统治之下长达200年。在此期间,缅甸统治者在兰那地区实施的是暴政,迫使当地人民四处逃散,大批躲进森林。因此这一时期有很多当地居民逃到西双版纳。缅甸东吁王朝并不止于占领兰那,在此之后还不断地向四周扩张,甚至雇用葡萄牙人,不断侵犯云南傣族地区。由于兰那当地人外逃而变得人口稀少,缅甸军队发动了多次以掠夺人口为目的战争,曾攻破西双版纳,将大批当地傣人掳到兰那,这就是今天大量源于西双版纳的傣人居住于泰北的重要原因。1774年缅甸人在清迈的统治结束,随后的几十年内,由于地广人稀,大批泰掸人、傣人等从缅甸北部及西双版纳等地迁入泰北地区,兰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缅甸人统治兰那时期及随后,是西双版纳地区傣人等大量迁入泰北兰那地区的时期。1986年及随后笔者数次在访问清迈时与对兰那历史有较深研究的清迈名坤盖西先生交谈,他说清迈泰人中大部份都是当年缅甸人从西双版纳掠夺来的傣人的后代,甚至说清迈人就是西双版纳人,他本人的祖先也来自西双版纳。笔者在泰北的清迈、清盛、帕腰、南奔等府访问了很多傣人的村子,他们的历史都在一二百年,不少村子的人们现在还与西双版纳来来往往走亲戚。

泰人迁入的另一条重要路线是缅甸北部。在公元六世纪以后泰人从云南迁入缅甸,并沿着瑞丽江岸定居下来。至十世纪以后已壮大起来并建立了泰人的国家勐卯龙国,至十四世纪达到强盛的顶峰。自十一世纪后勐卯龙军队便向四周扩张,也包括了今天的泰国西北部,这一扩张也必然导致泰人大量进入泰国北部,这在缅甸文献中有记载。自此之后,缅甸各王朝都有占有泰北的野心,与兰那王国不断发生战事,在1556年从中国明政府手中夺占了兰那,统治兰那长达200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统治的需要及当地人外逃造成的人口稀少,大批缅甸泰人从掸邦东部被迁移到兰那,因此今天在兰那有很多泰人都认定他们是从缅甸迁来的,包括很多泰元人。他们的祖先从云南西部迁到缅甸,然后因为战争而迁入泰国北部。如 Ratchaburi 地区的泰元人是在泰国拉玛一世王时期迁到当地的,因此时间并不十分早。【22】

五、傣泰文化圈的形成与特征

由于今天生活在东南亚的泰人都是在历史上源于云南并迁徙到各地的,因此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自汉以后,泰人渐渐从云南红河流域、澜沧江流域、云

与南的瑞丽江流域等地区迁入老挝、越南、缅甸，进入而迁入泰国、印度。【23】

泰人在迁入这些地区后凭借着两个制胜的法宝而在当地立足并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水稻种植。据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云南是亚洲稻有作的发源地之一，云南的傣是当地各民族中种植水稻最早的民族，水稻种植是傣泰民族的传统生存基础。在迁入东南亚之前这此地区主要是孟-高棉人，他们主要的农业类型是“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广种薄收，因而不能支持人口的大量增长，也就是说难以支持一种高的文明，当傣泰民族的先民迁入当地后，水稻文明便取代了当地的文明，使泰人口较快地发展起来，在很多地区将当地的居民挤出外地，而泰人成了当地的主居民，这一点在很多泰人居住区的历史中都有明确的记录，如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各民族中都有在傣族到达后各民族重新分配居住地的传说，传说傣族迁入后当地民让出了平坝而进入山区居住，原因就是傣族会种水稻，但当时生活资料的获得山区更为困难，而今天的山区民族愿意居住于山区是因为山区的生活资料的获得坝区要容易，因此傣族的先民要求在坝区居住下来时，原先的居民并没有太多的议。这种传统在现实中是事实，大量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在亚热带山区确实较坝区容易获得食物(尤其是采集与狩猎而获得的)等生活资料。

傣泰民族的先民立足壮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其独特的社会体制——勐-版制度。这种制度在古代中国西南及东南亚地区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政治制度。“勐”的内涵是一封建行政区域、同时也是一个封建实体，有城市、城镇、行政区的意思；“版”是寨。“勐”、“版”都是一个有一定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实体，尤其是勐有封建的行政长官及一套完整的政权体系，是一个地方政权的设置。今天在中国及东亚很多地区都有大量以“勐”开头的地名，就是历史上由傣泰民族先民建立的地封建政权及定居区域。其次，不论是勐还是版，都有自己的一个神，起到了精神作为一个政权及一个民族定居区的凝集作用。在勐、版之内，有共同的经济制度，地公有，村寨及家庭使用，保证勐、版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田可耕，有生存的平机会。勐、版承担着明确的封建义务，要向不同的上级封建主负责，如交纳税、兵征战，甚至为上级封建主养育象、牛、砍柴等等，不同的勐、版又形成了一个的实体，并最终组成封建王国。在过去这种体制还十分有利于战争动员。这种政体制在中国一直沿袭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民主改革前，在今天东南亚很多泰人住区还存在。这一社会制度的功能与优越性在于能够在一个新移民地区较快地扎下去，并且按照一套既定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体系运行，形成一个个在新民地区的阵地。这就比分散的移民有更大的扎根优势，加之发达的稻作农业，使泰民族的先民能在新的移民地区扎根并且发展壮大起来。

第三是文化的复制。傣泰民族的先民不论迁徙到何处，都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一新的地区，这包括宗教、生产技术、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等等，因而今天不论何的傣泰民族后裔都保存着傣泰民族的基本文化要素。这种文化的复制机制在傣泰族的迁徙过程中起到了对于社会维系作用，使傣泰民族作为一种民族能够区别于

其它民族而延续下来。

傣泰民族的先民在迁移到今天东南亚、南亚的定居区域后,如上所述是在不同的地区复制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将发源地的文化带到了新的定居区,事实上是使傣泰民族文化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大,这种文化的扩大十分有利于傣泰民族的先民们在迁徙的后的定居与发展。如果没有这些机制,傣泰民族的先民们是很难在新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由于傣泰民族先民的迁移与壮大是以文化的复制为基础的,因而在今天的东南亚、南亚傣泰民族居住区域内不仅有民族同源的关系,也有基本共同的文化特征,因此也就形成了一个以傣泰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区域,笔者将这个傣泰民族分布并且有共同文化、共同民族渊源关系的区域称为傣泰民族文化圈。

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基础是共同的傣泰民族文化要素,其特征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

1, 民族认同。傣泰民族在今天的东南亚分布已较广,并且有很多不同的支系,仅在中国不同称谓的傣族就有数十个之多,但是不论属于何种支系,傣泰民族都有共同的民族认同,即认同自己是属于傣泰民族。这一点是傣泰民族能够长期生存并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民族认同已经改变,如在越南又安省的一些泰人已融合进当地的其它民族中去,已不再承认自己是泰人,这就已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事实上也就不再属于泰人。因此傣泰民族的民族认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目前事实上形成的傣泰民族文化圈内基本的傣泰民族认同是存在的。

2, 共同的分布地域。今天的傣泰民族文化圈有共同的地域构成,这是由于傣泰民族有共同的发源地并在历史上不断扩散而形成的。这一文化圈的范围大至是:中国的云南省、越南北部及西北部泰人分布地区、老挝北部泰人分布区、缅甸北部泰人分布区、泰国北部与东北部与中国有民族渊源关系的泰人分布地区。

3, 共同的语言。傣泰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即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由于历史迁徙的原因,傣泰民族的语言也有不同的方言,如中国云南的傣族就分为德宏方言及西双版纳方言两种主要方言,在东南亚各国方言则更多。尽管如此,这些方言的演化都是基于傣泰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在傣泰民族文化圈内语言基本相通,但方言差别很大,如云南红河流域的傣族与西双版纳、德宏的傣族语言差别就很大,没有一定的适应甚至听不懂,这也是事实。

4, 共同的社会制度。“勐-阪”制度是傣泰民族的基本社会制度,分布于各地的傣泰民族都保持着这一基本的制度,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再多加论述。

5, 共同的宗教。傣泰民族都共同的宗教特征,即自然崇拜。傣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都加以崇拜。与“勐-阪”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相对应的是勐有勐神、村有村神并加以崇拜,【25】这是傣族宗教的基本特征,大今天各地的傣泰民族人民都基本保持着这一宗教信仰。勐神与阪神(即村神)与傣泰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除了日常祭祀外每年都要公祭,每个村子都有神树、神坛。自然崇拜是傣泰民

共同的宗教特征,但是傣泰民族中的大部分人民在信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后,大部分傣泰民族人民都共同信仰原始宗教与佛教,因此两种宗教同时信仰又成为大部分傣泰民族人民的共同特征。尽管如此,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不是傣泰民族人民的共同文化特征,尤其是在傣泰民族文化圈内,因为越南的大多数及中国云南红河流域地区的傣泰民族人民不信仰佛教。

6,共同的文化艺术。傣泰民族人民都有基于民族之上的共同的文化艺术,如舞蹈、音乐、文学等。如孔雀舞、象脚鼓舞等就是傣泰民族中的普遍的舞蹈。再如民间传说《如树屯》也是傣泰民族中流传最广泛文学故事。

7,共同的生活习俗。傣泰民族有很多共同的生活习俗,如居住干栏式住房、食酸性发酵食品、好沐浴、纹身、染齿等等,这些共同的生活习俗构成了傣泰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

8,共同的经济基础。傣泰民族共同的生计方式是水稻种植,其历史上顺水迁徙原因主要也在于水稻种植。傣泰民族也因水稻种植得以较快地生息繁衍。由于水稻种植是傣泰民族共同的经济部门,因而形成了很多相关文化,成为傣泰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如水稻种植相关的农业祭祀、节庆、生活习俗、稻米食物制作等。不论居住在何处的傣泰民族人民,水稻种植都是其基本的生计基础。

以上是构成的傣泰民族文化圈的一些主要特征。

由于傣族是一个跨国并且与很多当地民族混居的民族,因而傣泰民族文化圈的概念仅是一个在界定傣泰民族的分布及对傣泰民族文化的理解时概念,并不否定与傣族共同居住的其它众多民族的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在傣泰民族文化圈内各民族的文化都有普遍的互相影响。傣泰民族文化圈内各所居住的各民族的文化互动,即傣族文化与其它当地民族的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涵化更增加了傣泰民族文化的生生。其次,居住在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傣泰民族人民基于生存实践在傣泰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上又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亚文化群,从而形成了傣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傣泰民族文化圈内的傣泰民族文化又是多样的,要指出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傣泰民族文化圈内的不存在区域与支系的文化中心与优劣,而是拥有共同的文化。在当代的发展背景下,一些地区文化有了发展并且与外部文化有较多的融合,传统的民族文化正在发生转型。

傣泰民族文化圈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有助于对傣泰民族文化的起源与现状理解,也有助于对傣泰民族共同渊源关系的理解。在当代,我认为理解这一文化圈根本一方面在于保护与发展傣泰民族文化这一古老而伟大的文化,另一方面是以民族与文化同源作为这一区域内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基于共同的民族渊源关系,相互理解、宽容、合作、开展社会与经济的交流,共同促进民族与文化的发展,才是当代理解傣泰民族文化的新思维。

- 【1】参阅陈吕范“关于傣族起源问题”，《傣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 【2】关于傣泰民族的早期历史，参阅郑晓云“从越人不是一个民族谈傣泰民族的起源问题”
- 【3】The Kachin Hill Manual. Rangoon: The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Union of Burma, 1959. pp. 17-18
- 【4】本节主要参考文献：The Tai Ethnic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Myanmar, by SAI AUNG TUN, Yangon University, manuscript presented. The Tai of The Shan State, by Neil Adams Alias Sao Noan Go, manuscript.
- 【5】THE PEOPLES OF LAOS: RURAL AND ETHNIC DIVERSITIES, BY LAURENT CHAZEE, WHITE LOTUS PREE HOUSE, BANGKOK 1999
- 【6】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HU THAY IN LAOS AND THE THAI IN VIETNAM, BY NGUYEN BUY THIEU, THE PAPER PRESENTED IN VI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N CHIANGMAI-THAILAND, 1996
- 【7】同注6
- 【8】《老挝卡沙里省诸民族》（老）昭坎曼·翁谷拉达纳，蔡文枫译，载《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2期。
- 【9】THE PEOPLES OF LAOS: RURAL AND ETHNIC DIVERSITIES, BY LAURENT CHAZEE, WHITE LOTUS PREE HOUSE, BANGKOK 1999.
- 【10】THE CULTURAL MOSAIC OF ETHNIC GROUPS IN VIETNAM,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VIETNAM
- 【11】范宏贵等译《越南北方少数民族·傣族》，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编印，1986年
- 【12】同注11
- 【13】吴德盛、张文生《老挝各民族语言的地理分布概况》，李道勇译，《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
- 【14】转引自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傣各族渊源与文化》第119页
- 【15】转引自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傣各族渊源与文化》第192页
- 【16】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HU THAY IN LAOS AND THE THAI IN VIETNAM, BY NGUYEN BUY THIEU, THE PAPER PRESENTED IN V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N CHIANGMAI, THAILAND, 1996
- 【17】泰国学者黎道纳先生认为泰国傣族是一个泰文化体，文化的影响比血缘的影响大。（2001年10月19日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 【18】汉斯·奔它《兰那简史：泰国北部的文明》A BRIEF HISTORY OF LANNA: CIVILIZATION OF NORTH THAILAND, P38. BY HANS PENTH, O. S. PRINTING HOUSE, 2000, THAILAND
- 【19】宋迈·普拉奇与安派·荣雷合著《兰那十二个月的传统》第一章。SOMMAI PREMCHIT and AMPHAY DORE: THE LAN NAN TWELVE-MONTH TRADITIONS, 1992.
- 【20】泰国《唐那迦记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翻译印本
- 【21】刀永明、康朝序译《车里宣慰世系》，载《车里宣慰世系集解》，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
- 【22】THAI YUAN AT KHU BUA DISTRICT, <http://kanchanapisek.or.th/cgi-bin>
- 【23】傣人迁入印度的历史见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察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 【24】参见朱德普《傣族神灵崇拜觅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從漢字的歷史看中文學習訣竅

・ 黃為緒 ・

泰國學生因為習慣於拼音文字，開頭對中文的字形望而生畏，教師是否善于引能否由圖畫引出象形字，使學生覺得學中文有趣，這是教中文的訣竅。

教師的訣竅就是把握適當的角度，幫助學生掌握理解漢字的切入點。例如：日+目一起就是明字，人靠在木旁就是休息的“休”字，“相”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木上或一側畫只眼睛，表示樹木是目察看審視的對象，目的就是考察樹木適于什麼用。“相馬”就是觀察瞭解馬的形體神態。春秋時代有個相馬的名師伯樂，能把千里馬與壞馬區別開來。“相親”就是觀察瞭解未來的丈夫和妻子。一個人手搭在眼睛上就是“看”字，“泪”字就是從眼睛流出的水——“眼淚”。眼睛受傷害就會“瞎”，瞎子就是盲人，“盲”字上邊的亡就是沒有的意思，如果時間長，講

《盲人摸象》的故事，學生必定對中文很感興趣。

還有一種口訣法，就是利用脛炙人口的口訣幫助學生理解記憶漢字。例如：堵+己，半堵就是己。用匕首還是弓矢，心中矛盾邊行走，這是“疑”字的生動象。

下面，舉例說明漢字的歷史發展：

在甲骨文中，立字的寫法是：上面是正面站著兩手張開的人，下面一橫表示地。《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意思是三十歲在事業上就可自立了。

唐時有一個大老粗出身的節度使，姓名是韓簡。由于他喜歡與文人談話又不太，所以鬧了笑話。有一天他聽了個文人講《論語》，第二天他就議論說：古人真笨，十歲才能站立。

一個人在社會上能夠獨立，就是說能立足，那麼他就能夠得到人家的尊重，介乎生人互相認識就說這位是某某先生。開會時說諸位先生，諸位女士，這些“位”即表示尊重的意思，說明其社會地位不低。

從“立”到“位”的教學過程，由具體到抽象，學生自然不覺得學中文枯燥。在教單字的同時，又給學生灌輸儒學精神，真是一箭雙雕。

從字在甲骨文中是二人同行，一個在前頭領路，一個在後邊緊跟著。兩個人並

列就是相從，聽從的意思。成語“從井救人”就是跟從落井的人跳下井去，既救不了別人，又害了自己，比喻救人的方法是愚蠢的。而“從善如登”這個諺語，就是說明跟從善道做好事好比登山般艱難。相反，“從善如流”這個成語，就用于表揚領導人接受規勸和建議如流水般順暢。

采字在甲骨文中，上邊像是人的手掌在抓取的樣子，下邊是樹上果實纍纍的樣子。兩部分合起來就是採摘的意思。後來的金文果實簡化了，採摘的意義不變。《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采芣》、《采蘋》、《采芣》……等都是反映勞動人民採摘植物的生產活動。這些詩歌都是民歌，通稱國風，收集民歌就叫采風。

“去”字在甲骨文中，上邊是個人向前走的形狀，下邊是古人所住洞穴的出口，整個字表明這個人要離開洞穴出去。離去就是“去”的本義，沿用到今天，“去世”和“去職”都是離去的本義。由於離去產生距離，李白的著名詩句“連峰去天不盈尺”中，“去天”就是離天的意思。距離可以是空間上的，也可以是時間上的，如有名的唐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去年就是已離去的一年。

從距離再引申，就有“失去”之義。如諸葛亮在《失街亭》中說：“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另外，成語“去粗取精”就引申為“除去”的意思。至於“來去自由”中，去就是往的意思。這個字義我們日常用來說“去北京，去美國”，其頻繁的程度就不在話下了。

“人”字在甲骨文中像一個側面站立的人形，到了隸書和楷書才變成一撇一捺，互撐站立為人。這樣的人在社會中講互相支撐；孔子說：“仁者，愛人”，就是說站立的人並不是獨自一人，而是以二為代表的複數。要互撐仁愛，仁愛精神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精神支柱。

從前有個土財主叫賈賁財，請個私塾先生教兒子識字，這個先生一開始就講漢字的特點，說是跟人有關的字大多數有豎人旁，跟石頭有關的字，大多數有石字旁，而跟木頭有關的字……財主的兒子搶著接下去說都有木字旁。

晚上土財主問兒子學了多少字，兒子說“學了好多字”，土財主高興地問他賈賁財怎麼寫，兒子提筆寫了價、債、財，土財主吼道：“這幾個字都沒有豎人旁”。

“難道你不是人？”

土財主生氣了就摑了兒子一個耳光，兒子于是懷疑先生的說法。其實，先生並沒有說錯，只不過籠統講了抽象的原則。比如，伙伴就是合伙成為兩人以上的伙伴，這是有關豎人旁的本義，而賈賁財三字則都是帶有貝字表財富的字眼，在古代，貝殼是可以當貨幣用的寶賁財富。

“貝”字在甲骨文中是貝殼的象形，因為這是一種來自南海的珍貴貝殼，它不僅美麗可當裝飾品，而且體積小、重量輕、比較堅固、容易計數，也就可以充當信物、禮品，漸漸地發展成為貨幣。《說文解字》稱“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貝化貨買，貨化貝賣。 貨為商品，流通財來。
貨音通活，死貨傷財。 貨真價實，無禍實在。

貨音通活，俗話說：“無農不富，無工不強，無商不活。”有了商品，社會經搞活了。這是一方面的意思；另一方面，“死貨傷財，活貨財來，”貨物滯銷，成貝（錢），就是死貨，就不是商品，而只是產品。要使得產品能夠暢銷，就要價實，不賣假貨，不哄抬物價，這才能活貨無禍財來。

由于“貝”字有貨幣的意思，所以用它構成的字就跟錢財、寶貴有關，現在許輕的父母對孩子的昵稱“寶貝”就源自于此。

“川”字在甲骨文中是漲大水的樣子，表示大河大川“川流不息”。李白的著句：“川橫三峽流”正是描寫長江在四川三峽不斷地奔流。

用“川”字作為偏旁，表示水流從頭（頁）“順”流而下。教訓的“訓”字，話順著道理，道理通順使人順從；馴服的“馴”使馬順從人意，其它家畜也可養。

“川”字用在字的下部作為偏旁時，最後一豎變成右轉折，如“侃侃而談”的“侃”字，表示口若懸河，發言流暢。“荒”字是草頭“艸”字底，中間“亡”是，字義表示洪水橫流，荒草叢生。成語“天地洪荒”就是用的本義。

“水”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像八卦中的坎卦，“坎”就是水的形象。“水去，規律即法。”水流的規律就是水往低處流。李白的著名詩句：“黃河之水天，奔流到海不復回。”用三點水作偏旁的許多字，如江、河、湖、海……等等，水流或蓄水的地方。大禹治水的故事，說明我們的祖先都是戰天鬥地的英雄。海創作的《黃河大合唱》滿懷深情地歌頌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黃河頌》[了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頑強不屈的戰鬥意志。整部大合唱自始至終貫穿著莊渾的抒情音調，就像黃河的河水綿延曲折，奔流不息。而在2004年3月份的《泰學》發表的《水燈之戀》，則通過放水燈的泰國風俗，抒發中泰人民的深厚情誼，現孔子“己欲立而立人”的思想。

兩點水和三點水是不同的，“冰”字就是以兩點水為偏旁。在金文中兩點在右在甲骨文中則是冰表面裂縫成晶體的形狀。《說文解字》把冰解釋為“凍也，象之形”，這就是左旁的形狀。成語“冰清玉潔”比喻人品像冰清透明，玉潔純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著名詩句：“一片冰心在玉壺”自表心跡和操守，中國文壇冰心的筆名就源于此，她的印章冰字就是用的甲骨文。

標準和準備的“准”字是兩點水旁，淮河的“淮”字是三點水旁；只有分辨清才不會弄錯。有些字，兩點水和三點水都可以，如“決”和“決”，“涼”，“淨”，“淨”，“況”，“況”，前者是簡體，後者是繁體。

“女”字在甲骨文中像一個女子雙手交叉，彎曲雙腿，跪在那裡。後來的古文字稍有變化，不再跪坐，仍是象形字。

“安”字的結構在古文字中都是上邊寶蓋頭，表示房屋；下邊是個女字。這是典型的會意字。“家”字同樣是寶蓋頭，但底下是個古代的豬字——“豕”，說明古人每家每戶都要養一頭豬以保證肉食和糞肥。在房子底下有豬雖成了家，但不能保證安逸舒適，所以房子底下有了女人可以“安家落戶”。

特別在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社會實行走婚制，女人是家的主宰，房子底下有個女人就更使人安心。不過，男人並不甘心在社會上當附庸，隨著社會發展為父系氏族時代以後，男人可以把喜歡的女人娶回家，就自然能“安居樂業”，覺得生活安穩，安康快樂了。現在“安”字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應用，如“早安”，“晚安”，甚至對去世的人祝其靈魂“安息”。

“步”字在甲骨文中上邊是正面的止字，下邊是反面的止字。《說文解字》說：“步，行也”。漢代學者劉安在《淮南子》中解釋步字和走字的區別，他說：“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他的意思是，走就是快（疾）走，步行則是慢慢行走的意思。成語“安步當車”有兩層意思，一方面，行走速度緩慢；另一方面，心情安詳，不坐車而不慌不忙地行走，只有正確理解這個成語，才不會受《抗洪搶險豈能安步當車？》這樣的批評。

“白”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像橢圓形的米粒。因為脫去稻殼的米粒純淨的潔白，所以用它來代表白顏色。中國現代古文字學家商承祚認為，甲骨文和金文的白字是日字的上部尖銳起來，像太陽剛露出地面時，光芒閃耀尖銳的樣子，這時天色明亮潔白，所以成為白字。

王之渙的《登鶴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李白的詩句：“地白風色寒”，都是指像霜雪一樣潔白的顏色。

潔白的顏色是顯明耀眼的《史記·秦始皇本紀》有“聖智仁義，顯白道理”，就是使道理更顯明。

真相大白于天下，就是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清楚了解真相。黑白分明，因這兩種顏色對比起來很分明。而對人們黑白不分，顛倒黑白則含貶義。

白費力氣，白跑一趟，白忙一場都是徒勞無功之意。

戲曲中的對白，也叫賓白。

表白、辯白中的白，則是陳述說明，使講話人的立場為別人清楚理解。

“白手起家”指的是沒有基礎或條件很差的情況下，自力更生，艱苦創業。

“定”字的寶蓋頭表示房屋，底下的正字表示平正，合起來就是安定的意思。當社會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態，人民渴望安居樂業的心理狀態就是人心思定。

“在”字是有字和土字的重合，請看漢字易符學的經文：

有土即在，何處定宅。 經緯定位，地球世界。
在音通載，地與共載。 在為空間，墓下留骸。

有是有象，這個象定居的住宅在何處？在地球上則可以通過經線和緯線交叉來定。

唐詩人白居易的詩句：“日沉紅有影，風定綠無波。”定是停止的意思，這聯想：紅日西沉，尚有紅霞滿天！清風停息，碧綠的湖面無波無浪。

《尚書·堯典》中說：“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那是中國人的祖先對陰陽曆加以修正，從而確定二十四個節氣，使四季穩定的辦法，這種曆法就是農曆。

在商業活動中，秤是少不了的工具。為了使秤公平符合標準，秤杆上的第一顆定盤星就起了檢驗這杆秤是否標準的作用。當秤砣懸掛在定盤星上時，秤杆和它就能保持平衡就可以相信這杆秤是標準的。買賣雙方通過定盤星而相互信任。

事前做出的決定，那就是規定。如：定期，定量，定時，定任務。如果是當事雙方共同的決定，那就是約定或協定。

定購，定做，定婚等。在約定的意義上，定也可寫為訂。

“火”字在甲骨文中是火苗的形象，彷彿上下竄動、左右搖擺的火苗，讓人一見就懂。可是發展到小篆就線條符號化了，今天的楷書也還是如此。

古詩句“紅日炎炎似火燒”中炎字兩個火字重疊，表示烈日熱得很，炎熱有如火。

我們海外華人總忘不了自己是炎黃子孫，因為炎帝是最早倡導用火而且善于用火的人。他教會人們放火燒荒，刀耕火種，發展了農業生產，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產水平。他還發明了用火燒窯製造陶器，使人民不必吃煙熏火燎的食物，大大改善生活條件。

由于火對人類生活的改善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所以紅紅火火就形容欣欣向榮的熱生活。

中醫指發炎紅腫的病因為上火。

怒火中燒形容發怒的激烈。

“刀”是遠古就產生的工具，在甲骨文中是象形的。由于遠古人類的工具不像那樣精細分工，所以刀也是一種農具，“刀耕火種”就是在放火燒荒後用刀為農進行耕種。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工具的分工越來越細，刀才專司切割。

在古代戰爭中刀是很厲害的武器，三國演義中關公的青龍偃月刀簡直是婦孺皆知的關刀。

現在農村還在使用的農具則有鐮刀和鋤刀，前者用于割禾，後者用于鋤草。戲曲舞台上包公則用鋼刀為刑具。

家用的工具剪刀在剪裁衣服時是免不了的。衣字旁加一刀字就是制衣之初。切字就是七刀，八加刀就是分開。鐮刀割禾很利，“利”字就是禾字加立刀旁。

“刀筆吏”是古代官府中專管文書的小官，這個稱呼與古代書寫工具有關。因為在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以前，人們用來書寫的材料主要是竹簡和木簡，或用毛筆寫或用刀刻字，要是不小心寫錯了，就用刀刮去重寫，因此這種專司刀筆書寫工作的人就稱為刀筆吏。漢朝的開國宰相蕭何就曾任秦朝的刀筆吏。到了後代刀筆吏演變為專管訴訟的官吏，人們指稱其筆如利刀能夠傷人，因而含有貶義。

刀的用途十分廣泛，除了用作農具外，日常生活中的水果刀、菜刀和裁紙刀，醫生用的手術刀，西方人用刀叉為餐具，其實，中國人在古代也用，《禮記·檀弓下》裡面就記載著刀匕的餐具。

制造刀的材料不斷進化，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石刀、骨刀，還有蚌磨成的蚌刀。以後逐漸出現銅刀、青銅刀，鐵刀和鋼刀。現在普遍使用的是鋼刀。

“耳”在古文字中是象形字。

耳聽目明，說明人的聽覺敏銳，視覺清晰。耳濡目染，指經常聽到看到，無形中受到影響。耳熟能詳，形容聽熟了能詳盡地復述出來。“執牛耳”源自古代諸侯間訂立盟約，由盟主執珠盤割牛耳取血主持宣誓立盟儀式。後來，人們使用“執牛耳”泛指在某方面居于領先或領導地位。

孔子說過：“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因而忠言逆耳就成了帶警惕性的成語。《魏書》中“耳聞不如目見”更告誡人們不可聽信道聽途說。

“取”字右邊的“又”字表手，是古代戰爭用手割取戰俘左耳邀功而造的字。

“兒”的簡體字“儿”只是記音，只有根據繁體字才能看出古人造字原來的象形，甲骨文中“兒”字上部就像初生兒的腦蓋，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對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的“兒，孺子也”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乳下子也。小兒初生，腦蓋未合，故象其形。”

唐代賀知章的著名還鄉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詩中兒童就是泛指未成年的男女兒童。而杜甫的《月夜》詩中“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詩中的兒女指兒子和女兒，而王勃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最後一句中兒女指的是年輕人，詩人在與好友分別時說，盡管我們天各一方，卻像鄰居一樣親近，不必在岔路分別時像青年男女一般哭哭啼啼。

“兒戲”比喻做事不認真不嚴肅，像兒童鬧著玩兒。

杜甫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魚兒的“兒”讀輕聲，沒有實在意義。這兒，那兒，今兒等都同樣讀輕聲。

“容”字在古文字中是寶蓋頭和山谷合起來，《說文解字》說，“容”盛也。從谷。”在甲骨文中寶蓋頭就是房舍的意思，而《史記》則有用山谷來量牛馬的記載。

和房舍都能盛受東西，能盛受東西的器皿稱為容器。建築物如禮堂、教室等，據其面積確定它能容納多少人。俗話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器物所裝東西的限量叫容量，而對於彌勒佛的形象則用“大肚能容”來描述。說“宰相肚裡好撐船”，稱贊偉大政治家的寬容大度，能兼收并蓄，博采眾長。《說文解字》說：“頌，貌也。”頌、容古音相同，清代古文字學家段玉裁說：作頌貌，今作容貌”。由于頌借用為歌頌，頌揚，才讀成 Song。

戰國時代養士之風盛行，所以流行“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這樣的話。美容，就是女人為喜歡自己的人而梳妝打扮。《詩經》中有描述女子因丈夫出征相思煎熬之苦，頭髮亂如飛蓬而懶得梳妝打扮，她自言自語：“豈無膏沐，誰容？”就是說，打扮了給誰欣賞呢？

“如”字在甲骨文中左邊是個女字，右邊是個口字，後來字體不斷演變，字形有變化。《說文解字》解釋說“如，從隨也。”意思就是“口”表示主人的命令，就服從，跟隨，依照主人的吩咐。現代漢語“萬事如意”，“如期完成”，“如制”中的“如”都是用的本義。

依葫蘆畫瓢，總會產生近似的效果。于是如字就由“依照”的意思引申出，“如好像”的意思。例如《詩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兮”。又如《論語·子張》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是，的過失，好像日蝕、月蝕，犯錯誤的時候，人人都看得到；更改的時候，人人視他。上述的“如”字都是“如同、好像”的意思。現在的常用詞語“如花似”“文如其人”“堅如磐石”等等，都是“如同、好像”之意。

《孟子·告子下》中的警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句中如字當得上”和“及”講，意思是：有利的時機比不上有利的地形，有利的地形比不心的團結、和諧。日常話“百聞不如一見”，如字就當“趕得上”講。

唐朝詩人王昌齡的名句：“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詩中的如是果、假如”的意思，現代漢語中多用這兩個雙音詞表示假設。

至于“空空如也”、“突如其來”中，“如”字沒有實在意義。

“巾”字是象形字，古文字都是那個樣子，就是楷書也沒有大的變化。《說文解字》說：“巾，佩巾也。”這種佩帶在衣服上的巾，既是擦汗、擦東西的實用物品，一種裝飾品。南北朝學者顧野王在其字書《玉篇》中說：“巾，佩巾也，本以，後人著之于頭。”由此可知，老百姓頭上戴的巾，也就是勞動時擦汗的布，兩用，非常方便。一直到現在，陝西、山西的農民也仍然用白毛巾裹在頭上，當作帽子，擦汗時就是毛巾。

在泰華的報章上常見巾幗英雄的報導，贊揚有突出貢獻的婦女。為什麼把婦女巾幗呢？《說文解字》上說：“幗，婦人首飾”，也就是古代婦女頭上戴的裝。根據《晉書·宣帝紀》所載，諸葛亮為了諷刺司馬懿像女人般膽小，把一套

女人所用的頭巾和首飾送到司馬懿營中，以羞辱其不敢出戰。後來，中帼一詞就成了婦女的代稱。

古人的衣服是沒有口袋的，所以隨身攜帶的物品就挂在腰間的帶子上。巾字就很像挂在腰間的毛巾。但隨身攜帶的東西不只毛巾，這就有了巾箱，其中主要裝毛巾，也可以裝重要文件。南北朝時期南齊有個衡陽王，名叫蕭鈞。他把儒家五部經典著作小手抄本放在巾箱裡。為了避免遺忘，他可以隨時取出閱讀，所以這種小書稱為巾箱五經。到了南宋時期印刷術已很發達，出版商為了方便書生應付科舉考試，專門印了這種小書，稱為巾箱本。後來，由于小書還可以藏在衣袖裡，就叫做袖珍本。

在戲曲舞臺上，巾作為頭巾的意義又再擴展成家常所戴帽子的通稱，如貢外巾、相巾、文生巾等等。

“工”字在甲骨文中像斧頭一類的工具，下部為斧頭的刃部。金文中像一把鎚，可是在小篆中，斧頭刃部變為一橫，使得文字符號化，寫起來很方便。

工字由斧頭一類工具，引申為手執工具的工匠，如《左傳・隱公十一年》裡有“山有木，工則度之”，意即山上有樹木，工匠去挑選。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就是泛指一切工匠，他斷定凡是工匠要把工作做好，必定先使器具鋒利。

唐代韓愈在《勸學解》中說：“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子雲就是揚雄，他和司馬相如的文風和內容雖不同，但都有很高超的藝術技巧。“工”在這裡引申出精巧之義，成語“異曲同工”就是說曲調或手法不同，但都精巧達到感人的目標。

由工的精巧義引申出擅長，長于的意思來，《韓詩外傳》裡說“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就是說舜擅長使用人，造父擅長駕馭馬。現在通用的說法：工詩善畫，工于心計等等，工都是擅長的意思。

工夫茶是潮州人特有的茶藝，用江蘇宜興出產的茶壺沖泡，講究沖泡的工夫。

“干”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都是木杆頭上分杈的長柄武器。用于進攻相當于矛，用于抵擋敵人相當于盾。後來，干指盾，在《書經・牧誓》中說：“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這是在戰前拿起干戈豎立矛，誓死作戰的話。

後來，干戈就指代戰爭，化干戈為玉帛就是把戰爭變為和平的意思。

《說文解字》說：“干，犯也。”就是表明，干已經由名詞引申為動詞，有侵犯義。現代漢語中，干犯、干預、干涉乃至干擾，都用的此義。

干的繁體字“乾”表示干燥，沒有水份，相對的詞是濕。干柴很容易燃燒，而蔬果曬乾了能長期保存，如菜干、葡萄干等等。

干支是十個天干配十二地支組成六十甲子，周而復始，這是中國人紀年的獨特循環。

干讀成 GAN 去聲，其繁體字是“幹”，樹干就是樹木軀體的主要部份，引申

鐵路的主要線路就是幹線，河道的主流就是干道。骨干就是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

，干用作動詞就是干活，干工作的干劲十足甚至干劲冲天那是主人翁的態度。華僑團體中有總幹事的職位。

“灰”字在古文字中都是用手拿火來會意。《說文解字》中說：“灰，死火餘燼。從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在燃燒時熾熱的火當然不能拿，到滅以後其餘燼不但沒有高溫，而且變成灰燼就可以執持。

李商隱的著名詩句“臘炬成灰淚始干”，就常用來比喻教師的奉獻精神：毀滅自己，照亮別人。

《莊子·齊物論》中說：“形固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為死灰”灰心一詞就源此，灰心喪氣，心灰意冷，萬念俱灰等成語也都一脈相承地源于此。

杜甫用“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表明他對國事是多麼失望。灰燼顏色不帶白，這就是灰色。現在對灰色作品、灰色人生的評價就是由比喻引申出頹廢失之意。

俗話“不費吹灰之力”說明事情極其容易。蘇軾用“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寫赤壁之戰中曹操的戰船驟然消失，失敗的慘狀多麼形象！

總之，中文雖然不是拼音文字，但是，只要教師善于引導，學生的興趣就會逐漸培養出來。

美國馬里蘭大學將設立孔子學院，主要培養美國首都地區的漢語人才，這是中國僑辦與該大學合作的成果，中國國家漢辦還將在有需求和有條件的國家辦孔子學。而東南亞的年輕人更把留學中國作為時尚。剛從北京學習中文回新加坡的學生《紐約時期》表示，過去有美國經歷很重要，但現在有中國經歷一點也不遜于美背景。馬來西亞過去三十年一直以英語教學為重，但現在學生紛紛涌入有中文教的學校。在我們泰華，雖然冷戰造成華教斷層，但是，詩琳通公主的榜樣鼓舞我前進：

燕園學子詩琳通，多年奮發學中文；
博士禮帽頭上戴，奮發凌霄多光榮！

2004年11月22日

泰中學會會務簡報

(2004年3月—2005年11月)

1993年初泰中學會成立。整整十二寒暑過去，人事迭更。然而，儘管歷經成敗利鈍，泰中學會仍然以既定宗旨，一直不懈致力泰中文化交流、促進友好的工作。

2004年，泰中學會新一屆理事會成立。新一屆理事會通過，將全力以赴于泰華僑史工作。3月，黎道綱、何紀文和洪林，于雲南與雲南省文史館談有關交流問題，並達成共識。4月28日，洪林與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座談，在研究僑批史問題上，取得合作與共識。5月，通過九月份舉辦僑批座談會。6月，理事會討論要案多項，並成立僑批座談會籌備小組。5月，學會黎道綱、洪林正式獲得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聘為特約研究員。6月4日，黎道綱與洪林拜訪陳漢士先生。陳先生對泰中學會歷年來致力泰中文化、僑史工作所取得的成績給予肯定與讚揚，並予以大力支持。9月12日，假大華大酒店十樓大會議廳主辦“泰國僑批座談會”，與會者約六十人。斯次會議，為泰華社會罕見之座談會，廣獲僑社人士讚揚和肯定。11月6日，學會許茂春、黎道綱和洪林應邀赴汕頭參加首屆國際僑批研討會。斯次研討會由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辦，黎道綱提交了論文“千字文推算批局開業時間之討論”；洪林提交了論文“試論和平後泰國僑批史演變（1945—1955）”，並在會上發言。2005年3月理事會通過，舉辦第二次僑批座談會，中心議題“和平前後泰國僑批與僑批業”。5月，在北京大學與泰國研究所傅增有、薄文澤、裴曉睿交流有關問題。同時，與北大華僑華人研究中心主任周南京教授見面，談有關僑史問題。7月，學會副會長黎道綱應邀參加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活動，先後在南京、北京出席是項紀念活動。南京市紀念鄭和學術研討會上，黎道綱提交的論文是“《鄭和航海圖》泰國南部地名考釋”，並在會上宣讀。南京會後，赴北京參加由交通部主辦、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盛大紀念活動。七月二十九日，黎道綱、何紀文與洪林應邀參加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次僑批研討會。黎、洪提交了“汕頭淪陷初期暹羅銀信局公會恢復批路之努力”和“簡述潮汕淪陷前後與暹羅僑批業”。是日，汕頭電視台、報社等採訪了以上二位，談有關抗日時期僑批問題。九月份，理事會通

僑批座談會定在十一月六日舉行，邀請範圍比前次更為廣泛。目前籌備正在積極展開。

9月28日，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周南京教授告之，計劃將《泰國》版所刊出的有關僑史作為中心叢書出版，書名：《泰國華僑華人史研究》，現在，編輯等各項工作已展開。泰中學會為第一本泰國華僑華人史能在出版並發行，感到莫大鼓舞。

以上所列，乃為學會一年來的主要工作與活動。

泰中學會2005年主要工作，還將出版《泰國僑批文化》，準備在十二月版。《泰國華文學校史》作為學會叢書，已於五月底出版。

2005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日澳門潮州同鄉會主辦第六屆潮學國際會，泰中學會黎道綱與洪林應邀參加，並提交《泰國潮人與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泰國潮人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貢獻》論文。論文將收入論

泰中學會黎道綱、洪林多次應邀出席國際研討會、會議，其論文先後為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網、揭陽網、潮州網、汕頭大學圖書館網、潮人網等網絡或全文或摘要收錄。以上亦可看到泰中學會歷年取得之成績，備受關注。

多年來取得的一系列成績，能為海內外學界及有關人士之支持與讚揚，而得到無比的精神支持。學會全人將抱著勝而不驕和既定宗旨，繼續為文化交流做出努力，繼續為泰國僑史有一分光發一分熱。（洪林）

編 後

《泰中學刊》在秋高氣爽的九月出版。九月，是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抗日戰爭勝利 60 週年的紀念日子。而七月，卻是中泰建交三十週年的紀念日。泰中學會為配合這些來之不易、難忘的日子，出版了這本《泰中學刊》。

《泰中學刊》收進了十六篇文章，共十六萬字，乃成汪洋浩瀚而自成一家。縱觀這些篇章，有一半關係到泰國華人社會的某些側面，具有參考價值。

《泰中學刊》還特別收進雲南省東南亞研究所朱振明的“中泰建交三十週年來中泰關係的發展及啟示”、“中泰友誼再添新篇”二篇大作，是應時文字，不僅為我們帶來某種啟發，而且也讓我們有機會了解中泰關係歷史這塊光輝的里程碑。因此，《泰中學刊》的出版，將為學界朋友以及關注學界的朋友，提供一定的參考資料。

泰中學會本著交流、學習宗旨，一直堅持出版《泰中學刊》，俾能為學界、為泰華社會做點有益工作，以促進泰中友好關係，以貢獻泰中文化交流。因此，經年的籌備工作，《泰中學刊》順利出版。

作為主編，辛苦之餘，也衷心為泰中學會有如斯活動與成績，而喜悅而自豪。泰中學會願與各界朋友共勉。

洪 林

2005 年 9 月 27 日

《泰中學刊》版目錄

主編：洪 林

目	作 者	期 數
		起 - 止
04 年 3 月 23 日		
沙江河谷傣族的歷史和文化	王國祥	927 - 937
瑪五世時期有關中國僑民的政策和法律	陳健敏譯	928 - 946
氣生財	錢耕森	938 - 944
荷生和《水擺夷風土記》	王國祥	938 - 946
族文學經脈錄	王國祥	944 - 949
邊府和十二主泰	黎光遠譯	947 - 947
耶羅閣的故事	披色・謝占蓬作	黎光遠譯 948 - 952
和船隊有可能發現美洲嗎？	李金明	950 - 955
本主義經濟對村社經濟的影響	察提・納素帕著	光遠譯 953 - 966
世紀是中華世紀嗎？	黃為緒	955 - 956
態視角下的花腰傣文化	王國祥	956 - 967
可泰時期實行“自由貿易”麼？	倉維・格色實里作	光遠譯 960 - 962
和在海外的影響及其意義	孔連志	967 - 974
05 年 1 月 18 日		
泰民族先民從雲南向東南亞。		
南亞的遷徙與傣泰文化圈的形成	鄭曉雲	967 - 980
東史籍中納黎宣王伐洛韋城的記載	光遠譯	968 - 970
羅鉢底國不在湄南河東辨	黎道綱	974 - 975
溯的淵源 — 對某些文化和語言痕跡的探索	謝遠章	975 - 979
漢字的歷史看中文學校的缺窠	黃為緒	976 - 984
金三角”禁毒背後的中美泰緬四邊關係	林錫星	980 - 983
琳通——中泰人民的友好使者	岑容林	984 - 987
論漢字與中華文明	黃為緒	985 -
一口通商時期中暹貿易中的潮州籍華僑	王元林 劉強	988 - 993
象 泰國和拍貼公主的象徵	馬維克	988 - 990
泰友誼再添新篇	朱振明	2005、6、28
泰建交 30 週年來中泰關係的發展及啟示	朱振明	2005、7、12
國的禁毒運動	岑容林	993 -
王時期京都吞武里的布局	黎道綱	994 - 996
外華人國籍問題縱橫談	周南京	997 -

《泰國僑史》目錄

主編 洪林

題 目	作 者	期 數	起 - 止
2003 年 8 月 16 日			
泰國華文學校史	洪 林	1	— 93
噠叻仔慶雲寺林公墓考	黎道綱	1	— 2
漫談僑批業風雨五十年	谷 子	3	— 4
黃包車夫與泰國勞工史	樊尼・磨錄作 方剛節譯	4	— 35
國仇家恨話僑史	谷 子	5	— 5
暹國王弟利雲王沙考	黎道綱	6	— 6
1782-1855 年間鮑林條約簽訂前的華人移民	黎道綱	7	— 14
《黃包車夫與泰國勞工史》簡介	方 剛	7	— 7
竹報平安話僑批	谷 子	8	— 8
《暹羅國誌》與謝猶榮	艾 英	17	— 18
華僑配偶趣談	谷 子	18	— 18
慈母心・遊子情	谷 子	19	— 19
潮安張若丁生平探討	黎道綱	20	— 22
2004 年 1 月 17 日			
立場與記者	魯 純	24	— 24
我的記者生活	魯 純	25	— 25
我與陳賓	魯 純	26	— 26
我與《培英學校》	魯 純	27	— 27
優良的中華傳統文化 孕育篤誠守信僑批業	谷 子	27	— 30
桂河橋的華工冤魂	黎道綱	31	— 45
亂世赤子心	遞 生	33	— 37
從華僑銀行到亞洲銀行	黎道綱	36	— 36
泰國社會中的華人勞工	蒲瓦隆・頌巴碩作 方剛節譯	38	— 45
蕭佛成在“中暹”社會上的觀點和角色	育馬譯	39	— 39
漫憶・懷念・思孝——寫在好友黃友泉永離之後	黃雲 黃堅明	43	— 45
橫逸的早期華人	黎道綱	46	— 46
僑批訴滄桑，一片冰心在玉壺	谷 子	46	— 47

目	作 者	期 起	數 止
潮州話初探	楊錫銘	47	— 54
約故事	黎光遠	48	— 48
越巴碩素他瓦寺海澄鄭氏碑	黎光遠	49	— 50
早期華文教育拾零	黎光遠	51	— 50
敬先生傳略	黎道綱	52	— 53
華僑銀信局公會	艾 英	53	— 53
千人樹碑，該！			
—《黃包車夫與泰國勞工史》	方 剛	54	— 54
華僑公會	艾 英	54	— 54
華英學校創辦年代辨	黎道綱	55	— 56
華僑公會	艾 英	55	— 55
僑一個公道 — 探討耀華力事件歷史真相	黎道綱	57	— 64
華僑派報聯合會	艾 英	57	— 57
僑批文化歷史見證人	谷 子	60	— 65
和平後泰國僑批史演變	洪 林	60	— 66
杏華僑協會	艾 英	62	— 62
僑批與潮汕僑鄉的密切關係	王煒中	63	— 65
知道的演說街	方 剛	64	— 64
僑批研究的若干問題	黎道綱	66	— 66
中山先生 1903 年來暹考》討論	黎道綱	67	— 72
良好的開端	方 剛	68	— 68
《泰國僑批座談會》記	紀漢清	68	— 68
泰中的“信使”	羅欽文	70	— 70
不繼 父親受害	魯 純	70	— 70
盼待一片燦爛陽光一片熱烈掌聲	洪 林	70	— 70

年 1 月 8 日

永恆的情結	洪 林	71	— 71
父與批仔	文 風	71	— 71
界余子亮	魯純譯	72	— 81
潮人的對聯創作	楊錫銘	73	— 73
珍貴的《合艾開埠全景》照片	方 剛	73	— 73
貞先生史略	文 風	74	— 74
士在僑批座談會上的講話		75	— 75
揚在僑批座談會上的講話		75	— 75
楚在僑批座談會上的講話		75	— 75
春在僑批座談會上的講話		75	— 75

題 目	作 者	期 起	數 止
千字文推算批局開業時間之討論	黎道綱	76	— 79
府山暹羅兩地說僑批	正 陽	76	— 77
我靠僑批長大	盧永光	80	— 80
鴉片廊	艾 英	80	— 80
涉僑民歌民謠管窺	楊錫銘	81	— 82
蟹爺及其後裔	素帕叻・叻帕匿軍作 黎道綱節譯	83	— 85
南洋中學創辦始末	艾 英	84	— 84
孫中山拜見拉瑪六世	光遠譯	85	— 85
泰國伍藍三家族：華僑本土化的思考	蔡志祥	86	— 89
泰國的早期華人銀行	攀尼・布勒作 黎光遠譯	90	— 98
暹羅華僑教育協會	艾 英	91	— 91
噠叻仔漢王廟	黎光遠	94	— 94
樂披汶為什麼“親華”？	陳 青	95	— 97
建救總會	魯 純	98	— 98
《泰南華人：軌跡和力量》簡介	方 剛	98	— 98
歷史上的普吉	方 剛	99	— 99
簡述潮汕淪陷前後與暹羅僑批業	洪 林	99	— 100
普吉的華人	方 剛	100	— 100
汕頭淪陷初期泰國銀信局公所恢復批路之努力	黎道綱	100	— 102
七十八年前一個新民學生的故事	未 明	101	— 103
劉繼賓——天華醫院創辦人之一	黎道綱	103	— 104
蠟光炎為解決抗戰潮汕僑批難題的貢獻	陳訓先	104	— 104
盧溝烽火——記“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	未 明	105	— 108
演說街	洪聲銳	105	— 105
難忘的會見	博 之	105	— 105
一份華僑抗戰重要文獻的發現與一條“口批”			
歷史資料的勾沉	陳訓先	106	— 107
文化界強人鄭光盛	魯 純	107	— 107
“高節君子”蠟光炎	陳訓先	108	— 109
鐵蹄下的“東興匯路”啓示錄	江 寧	109	— 111
僑批予我影響至大	墨未濃	110	— 112
泰國潮人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貢獻	洪 林	110	—

泰中學會第十屆理事會產生 歡迎學界人士加盟推進會務

泰中學會成立已十週年。為慶祝十週年會慶起見，現《泰中學刊》泰中學會十週年紀念刊已正式出版。該紀念刊內容豐富，可讀性高，尤是以僑史為主者，更為可貴。版的這本紀念刊，收到海內外學界贊詞賀信，為學界之共識以及一頁與各方學界友好往來的佳話。為加強會務加強僑史工作，泰中學會特選出第十屆理事會，俾在僑史和對外交流中能做出更多貢獻。

年中舉辦僑史座談會

泰中學會活動多姿彩

泰中學會第十屆理事會已於本年初產生，並上會，分工完畢。現報名單列下：會長洪林、副會長林長茂、秘書何紀文、理事方剛、盧永立、理事會上，討論要案多項，並擬于下月理事會上，泰中學會為更好推進會務，將與各方友好工作中為泰華社會做出應有貢獻云。

首屆國際僑批研討會

泰中學會獲應邀參加

許茂春黎道綱洪林11月6日赴汕市

泰中學會成立十一年，不懈地為促進泰中文化交流，貢獻自王支持，對推動會務將有一番作為。其已細力。二〇〇四年始，該學會決定將工作重點放在僑史研究上。月理事會上做出多項議案，其中最為關，俾為我泰華社會先僑批之血汗史，繁榮社會等方面，留下珍。定將在本年度中期舉行一次有關僑史座談會，為以後出版一部泰國華人華僑史作好基礎工作。九月十，重探討泰華僑批與僑批的問題，盼有三日，該學會所主辦的《泰國僑批座談會》，獲與會者及有關社心提供資料，但屆時座談會能獲得大突會人士之共識，為研究僑史打響第一炮。據記者了解，泰中學會批史料更臻完善，造福後人。同時，泰同人受到莫大鼓舞，均表示將盡最大努力，將僑史研究工作做好。定今年將組團與中國有關研究單位進行加強了解，共同探討學術領域有關問題。據悉，十一月六日到八日，泰中學會許茂春、黎道綱、洪林、陳靜、張

汪。記者相信，該學會有關負責人赴潮汕參與研討會，定能取得學界之盛事，亦是歷來學會為交流泰中心得云。

泰中學會舉行常月會議 決定九月舉辦僑史座談會 陳漢士對僑史研究工作表示讚賞

一九九三年泰中學會成立以來，十一年間一直致力泰中文化交流，取得一定成績，並獲得海內外學界共識。二〇〇四年泰中學會新一屆理事會產生後，學會同人在僑史研究工作上取得一致認識，均認為必須全力以赴做好此項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五月理事會上通過舉辦有關僑史座談會議案，中心議題為泰國僑批。據悉，泰中學會六月常月例會上，討論要案多項，其中包括座談會的地點、形式、內容等。通過在本年九月份舉行，並即席成立工作小組，負責具體事項。目前，該學會已開始積極準備各有關工作云。

又悉，泰中學會負責人黎道綱、洪林近日正式獲得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聘書，聘為特約研究員，學會同人認為，此乃本會之光矣。洪林是在次會上說，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在汕頭與該研究中心座談時，對方表示將與泰中學會在僑批史方面加強合作，當獲悉泰中學會將舉辦小型座談會時，他們表示十分關注，並擬派代表前來參加云。

又悉，六月四日，泰中學會黎道綱和洪林應約前往拜訪陳漢士先生。在一個多小時交談中，陳先生在了解了泰中學會多年來的工作實際情況後，對泰中學會加以肯定，尤對僑批史更為肯定。多年來，陳漢士先生在華文教育、僑史方面也做出積極貢獻，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斯次交流，促進了進一步了解，於未來僑史研究取得共識。

泰中學會負責人黎道綱洪林

獲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聘為特約研究員 僑領陳漢士對泰中學會研究工作予以肯定

25/6/04
一九九三年初泰中學會成立以來，十一年間一直致力泰中文化交流，取得一定成績，並獲得海內外學界共識。

二零零四年泰中學會新一屆理事會產生後，學會同人在僑史研究工作上取得一致認識，均認為必須全力以赴做好此項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五月理事會上通過舉辦有關僑史座談會。

項，其中包括座談會的地點、形式、內容等，通過在本年九月份舉行，並即席成立工作小組，負責具體事項。目前，該學會已開始積極準備各項工作云。

座談時，對方表示將與泰中學會在僑批史方面加強合作。當獲悉泰中學會將舉辦小型座談會時，他們表示十分關注，並擬派代表前來參加云。

又悉，泰中學會負責人黎道綱、洪林近日正式獲得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聘書，聘為特約研究員，學會同人認為，此乃本會之光榮。

又悉，六月四日，泰中學會黎道綱和洪林應約前往拜訪陳漢士先生。在一個多小時交談中，陳先生了解了泰中學會多年來的工作實際情況後，對泰中學會加以肯定，尤對僑批史更為肯定。多年來，陳漢士先生在華文教育、僑史方面也做出積極貢獻。

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

泰中學會將舉辦僑史座談會 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參加

一九九三年初泰中學會成立以來，十一年間一直致力泰中文化交流，取得一定成績，並獲得海內外學界共識。

洪林是在次會上說，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在汕頭與該研究中心座談時，對方表示將與泰中學會在僑批史方面加強合作。當獲悉泰中學會將舉辦小型座談會時，他們表示十分關注，並擬派代表前來參加云。

泰中學會主辦泰國僑批座談會

十二日在大華大酒店隆重舉行

二零零四年泰中學會新一屆理事會產生後，學會同人在僑史研究工作上取得一致認識，均認為必須全力以赴做好此項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五月理事會上通過舉辦有關僑史座談會。

又悉，六月四日，泰中學會黎道綱和洪林應約前往拜訪陳漢士先生。在一個多小時交談中，陳先生了解了泰中學會多年來的工作實際情況後，對泰中學會加以肯定，尤對僑批史更為肯定。多年來，陳漢士先生在華文教育、僑史方面也做出積極貢獻。

泰國泰中學會成立迄今十餘年，歷來致力於中泰文化學術交流。近年，鑒於泰國華僑史仍為一頁空白，學會同人認為，應該為華人社會盡一份綿力。因此，從二零零四年起，泰中學會通過決議，以僑史為重點工作。學會同時通過舉辦《泰國僑批座談會》，使之更廣泛引起泰華社會熱心人士關注，俾使僑史研究工作更深入开展。為配合僑批工作之開展，泰中學會特於九月十二日主辦《泰國僑批座談會》以擴大影響，達到「承前啟後」之目的，並將如期假大華大酒店舉行。

黎道綱和洪林應約前往拜訪陳漢士先生。在一個多小時交談中，陳先生了解了泰中學會多年來的工作實際情況後，對泰中學會加以肯定，尤對僑批史更為肯定。多年來，陳漢士先生在華文教育、僑史方面也做出積極貢獻。

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

泰中學會主辦的《泰國僑批座談會》，歷經數月，各項籌備工作已基本上就緒。萬事開頭難，泰中學會同人深有此感。據悉，屆時中國駐泰大使館將會派人來參加座談會。學會還得到陳漢士、馬君楚、陳紹揚、許茂春、賴錦廷、劉利洲、蕭漢昌、劉源泓、賴金熙（老三）等支持並熱情參與其盛。記者相信，泰中學會同人的努力不會白費。記者也相信，泰華社會第一次有關僑史的《泰國僑批座談會》活動，一定能取得圓滿成功。記者謹此

又悉，泰中學會負責人黎道綱、洪林近日正式獲得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聘書，聘為特約研究員，學會同人認為，此乃本會之光榮。

又悉，六月四日，泰中學會黎道綱和洪林應約前往拜訪陳漢士先生。在一個多小時交談中，陳先生了解了泰中學會多年來的工作實際情況後，對泰中學會加以肯定，尤對僑批史更為肯定。多年來，陳漢士先生在華文教育、僑史方面也做出積極貢獻。

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

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

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

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黎、洪二位對此也給予讚賞和肯定。

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會活動

日昨出席座談會者有：中國大使館李達飛，楊學平二位秘書，北京駐泰中央電視台張傳昌及夫人崔國花，中新社羅欽文，中通社鄧玉芳。張傳昌還認真地拍攝了座談會整個過程。泰華社會與會者有：陳漢士，陳招揚，許茂春，賴錦廷，林薇，劉源泓，劉利洲，賴金熙，蔣漢昌，謝紹福，王儒生，劉丹睿，楊作為，紀松才；泰華作協有馬君楚，夢莉，陳博文，老羊，倪長遊，白

泰中學會創立十一周年以來，一直堅持與促進中泰文化學術交流，並在泰華僑史研究中取得一定成績。因此，該會黎副會長能有機會應邀參加以上二次紀念活動，實是該會工作已為學術界朋友肯定。吳宏

主席汕市僑
洪林黎道綱

僑批乃是反映近代中國僑鄉與海外華僑緊密關係的一條主要訊息，亦是家鄉人維持生計的重要紐帶。因此，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於七月廿九日，

提文論文

泰中學會黎道綱提交論文「汕頭淪陷初期暹羅總信局公所恢復批路之努力」，洪林提交之論文為「議論潮汕淪陷前後與暹羅僑批業」，與會者提交之論文約十餘篇。從方方面面闡述各個歷史時期有關僑批的側面，內容豐富。泰中學會決定參加斯次會議，乃為進一步了解有關新訊息，俾日後為從事研究僑批工作提供更廣泛資料。七月份泰中學會理事會通過擬于十一月初舉辦第二次僑批座談會，屆時日期落定，頗次僑批座談會，屆時日期落定，頗次僑批座談會，屆時日期落定，頗次僑批座談會。

有研究華人問題的學者王光和乃巴實，日本研究華人問題學者村島英治出席了斯次會議。泰中學會成員侯志勇、何紀文、吳鶴川、陳靜、陳漢昌、方明、曾志光、

，銀信局公會的史實，令與甯耆傾耳聆聽。張明油以其歷史見證人身份說出華僑與家鄉關係，寄批人的血淚史。許茂春則以其珍

功，令不少人感到意外。陳漢士先生說：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活動。許茂春先生也表示，這個座談會開得成功。

泰中學會主辦泰國僑批座談會
道盡滄桑史意義深遠圓滿成功

領，林牧。報界有陳華，劉銀通，馬海彬。泰華文學會研究會有紀漢清，陳青，于鵲媽，洪冰，文風，陳真，許家訓，陳桂林，陳燁玉。尚有泰華原僑世界許漢均，許錦華也出席了座談會。還

陳健敏等與會。

座談會一拉開序幕，陳漢十，馬君楚三位扼要地道出當時僑批與華僑血肉相連的感人心弦的故事，言簡意賅。座談會主要發言人陳紹揚娓娓道來當年僑批與

寄批的概況。黎道綱、洪林根據當年報刊資料闡明遠羅僑批界的滄桑。

縱觀整個座談會，場面嚴肅，秩序良好。可惜的是，因時間短促，發言人未能盡言，致遺珠萬子，最後連自由發言時間也被佔用，真有未能暢所欲言之遺憾。斯次座談會直到十二時半才圓滿結束，全體留影為念。

據記者會後聽到的反應，（泰國橋批座談會）能開得如此成

21

出席汕市僑批座談會
洪林黎道綱提交論文